

共产主义掘墓人

赫尔曼·阿赫米諾夫著

(供内部参考)

共

12

共产主义掘墓人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社会学
(节 译)

赫尔曼·阿赫米諾夫著

北京編譯社等译

(供内部参考)



目 录

作者的話(未譯)	
对現代共产主义历史地位的怀疑(未譯)	
怎样获得优越的职位?(未譯)	
职业革命家的組織(未譯)	
俄国私有制的废除(未譯)	
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	1
其他国家的經驗(节譯).....	18
党的机关及其职能.....	24
技术知識分子——共产主义掘墓人.....	57
来自下面的压力.....	83
1937年——命运年(未譯)	
意識形态在苏联制度中的作用(未譯)	
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理論(节譯).....	105
以人民的名义.....	118
斯大林的最后灼見：回到馬克思那里去——未来的兵营.....	145
基本規律在起作用.....	170
牺牲斯大林，为的是拯救斯大林主义.....	196
今后二十年的斗爭.....	230
結束語(节譯).....	264
注 释.....	266

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

可以肯定，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綱領，取消私有制，其目的不是在于医治高級資本主义的弊病，而首先是在于建設一个現代的工业社会。共产主义使俄国历史上的資本原始积累有可能实现，这样，它就承担了古典資本主义国家中早期資本主义已經解决了的那些任务。因此，对于俄国來說，共产主义乃是受阻滯的早期資本主义的替代体，我們把它叫做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是完全符合它的历史观点的。^①

用一个新名詞来称呼人們慣于概括地称之为“共产主义”的那种极为复杂的現象，有些讀者大概会感到有些不太舒服。其实，关于它，已經有过不少詞汇了，如社会主义、国家資本主义、布尔什維主义、苏維埃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但是，它們全都掩盖了它的本质，而不是反映了本质。

在对第一个名詞的审核中，共产主义这个詞就不灵了。人們对它的理解至少包括四个現象：共产主义运动（即旨在取消私有制的全部行动，包括所謂“无产階級专政”在內）；意識形态（即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信仰”）；苏維埃制度（共产党統治）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終极目标）。

这些名称多少是可以弄明白的，要是我們能够遵循共产党人的解释的話：共产主义是一种未来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从資本主义

① 參見君特·瓦根累納(Günther Wagenlehner)对現代共产主义历史观点所作的有趣分析：《苏維埃經濟制度和馬克思》(Das sowjetische Wirtschaftssystem und Karl Marx)，科隆—柏林1960年版。

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保留它的名称，而意識形态則始終是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实质内容并没有得到澄清。不过，根据我們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拟議中的未来社会仍然可以保留共产主义这个名称。但是，苏維埃官方把社会主义說成是一种后期資本主义現象，那是錯誤的，我們試行采用的这个名詞能够反映出，共产主义同資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毫无关系。

“国家資本主义”这个詞也是不可取的。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半官方的政治經济学教科书把資本主义說成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劳动力也成为商品。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商品生产具有普遍的性质。資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点是剝削雇佣劳动，而資本家雇用工人不是别的，而是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工人出卖劳动力，資本家购买它”。①〔1〕

換句話說，資本主义乃是一种經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者就是商品的制造者，借用同一本书的話，也就是具有如下属性的产品的制造者：“第一，它能滿足人們的某种需要，第二，它的生产不是为了自身消費而是为了交換”——所謂交換是指用金錢来买卖。〔2〕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願意不願意劳动可以听其自便。

这个定义是无可非議的。它使我們看清，国家資本主义不能用来正确地称呼現代共产主义：

現在——或者說，直至最近——的苏联經济的特征，既不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不是为銷售目的而进行的生产，恰恰相反，是对商品流通有意識的、有系統的和粗暴的調节。到現在为止——就真正的消費品而論——基本上沒有生产过商品，只生产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过供制造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国家）自己使用的物品。农产品，有一部份用征收实物税的办法从农民手里夺了去，有一部份被国家用强制价格“收购”了，只有一小部份能够进入自由市场。

首先，谈不上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工人不仅没有权利去按照自由议定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在多半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岗位是被指定的，他们必须接受人家确定好的条件。人人都必须劳动——游手好闲是要受惩罚的。

此外，还有苏维埃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几个概念——它们往往只能表现一个阶段的发展，不是在时代上，就是在地理上受限制，因此，对我们没有帮助。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这个词。

我想着重指出：这里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完全不是为了对其进行评价。我知道，有很多人多半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对这个词有过敏的反应；对于他们，资本主义就是万恶的化身，而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用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来称呼现代共产主义，必然意味着，把这种否定的评价扩大到苏维埃制度身上。我不属于这一类人——按照我的见解，甚至英国的早期资本主义也要比它的苏联替代体更人道一些。但是，问题不在于怎样评价，而是在于寻找一个词来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事实的状况。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番：

可以证明，共产党独裁之所以在俄国产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是因为它根本还没有超越初步阶段。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先是西欧的经验，可以断定，如果资本主义在那里能够及时地发展起来，共产党独裁在俄国本来是不会产生的。迄今为止，共产党独裁在俄国历史中所完成了的任务，不过是早期资本主义在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所已经完成了的：它保证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我们终于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史和苏维埃政权的

历史中找到了无数相仿的事例。

卡尔·馬克思曾經深入研究过早期資本主义的历史，并把《資本論》的第二十四章用来論述“所謂原始积累”。一开始，他冷嘲热諷地譏笑了那些把这个过程描写成田园牧歌似的国民經济学家，然后接着說：

“在现实历史上，被公认是征服，压迫，劫掠，杀戮，总之，是暴力起重大的作用”。^[3]今天，我們还可以加上集中营、奴隶劳动、国际間的屠杀，以及，以阶级斗争和其他名目去灭絕整个整个的社会集团。

如果我們繼續往下看看他的分析的实质部份，我們就会更多地发现今天苏維埃制度所具有的早期資本主义特征。他对資本原始积累所下的定义尤其意义重大。定义是这样的：

“所謂原始积累，不外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資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它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資本及与其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史前时期。”^{①[4]}

在另一个地方，他說：

“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資料轉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資料，是多数人的零碎的财产轉化为少数人的大宗的财产，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土地，生活資料和劳动工具的剝夺。人民大众所受的这种可怕的殘忍的剝夺，就是資本的前史。”^{②[5]}

“生产者和生产資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对于我們特別重要。馬克思在不远的一頁里对它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上一切在資本家阶级形成过程中起杠杆作用的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农村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剝夺，是这全部过程的基础（！）。”^{③[6]}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② 同上。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說：

“資本的原始积累，那就是，它在历史上的发生，究竟是指什么呢？如果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轉化为工資雇佣劳动者，不仅仅是形式变化，那就只是指直接生产者的剝夺，也就是，只是指那种建立在本人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的解体。”〔7〕

按照馬克思遺留給我們的見解，私有制的废除，直接生产者的剝夺，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原始积累的基础。

关于剝夺的方法，馬克思当时写道：

“直接生产者的剝夺，是最无情的凡达尔主义，在最可耻最丑恶最卑劣最可厌的激情冲动之下进行。”〔8〕

这不是說的强迫集体化么？或者，我們来看看“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法律”。它淵源于臭名昭彰的“8月7日法令”（1932年），老百姓管它叫“为了一点小事就枪毙人的法律”。它以死刑来威胁每一个从自己的田地里偷取几根麦秆的人。接着又頒布了关于盜窃铁路运输的貨物、合作社儲藏品、牲畜等的法律。这些法律针对的首先是饥腸轆轤的农民，但是也针对其他居民集团。

鼓励“最可耻的激情”的号召也有的是：1927年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对农业集体化作了原則性决定。它所引起的反应是农民减少了，首先是所謂富农减少了，他們的生产和隱匿起来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資料减少了。党的領導許諾說，凡是发觉左邻右舍貯存物資并予以检举的，可以得到繳获物品的25%作为对犹大的犒賞。〔9〕

早期資本主义的精神同样也出現在苏联关于青少年的法律之中。同它們相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抨击过的剝削儿童的事例，就显得平淡了。

③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1935年4月7日頒布了一項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年滿十二岁(原文如此!)的青少年犯盜窃，杀人或杀人未遂，以及其他重罪的，所受刑罰与成年人相同——也就是說，在这种情形下，均处以死刑。〔10〕1941年7月7日，有一項特別決議解釋說，青少年即使在因过失而犯罪时，也应当負完全的刑事責任。〔11〕这是同有些法院对1935年4月7日法律的認識相反的。

关于早期資本主义的破坏行为就談到这里为止。

早期資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照馬克思看来，絕不是国家的强力在資本形成中的积极作用。关于这一点，他写道：

“原始积累的各种不同的要素，或多或少，可以按時間的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上面。它們在英国十七世紀之末系統地組合起来了，其中包括殖民制度，国債制度，近代課稅制度和保护制度。这些方法一部份建立在最殘忍的暴力，例如殖民制度上面。但所有这些方法全都利用国家的强力，利用社会积聚的有組織的暴力，溫室般地助长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轉化过程，縮短它的过渡期。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經濟力。”①〔12〕

在另一个地方，他簡單明了地說：

“工业家的原始資本是一部份直接从国庫出来的。”〔13〕

所以，国家的强力在資本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絕不是苏維埃制度的特征，而是在一切早期資本主义中都可以观察得到的特征。

連苏联材料也承认，要保证国家参与經濟的領導，是用不着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德国的經驗使列宁有理由談到一种特殊的“工业化的普魯士道路”。《苏联大百科全书》曾以德国的經驗为例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这样写道：

“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和法国来得晚，进行得却更为广泛和深刻……在德国资本主义为了在国内巩固地位和为了在‘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取得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中，国家的支持有着巨大的意义。德国资产阶级还在发展的幼年时代中，1818年时就已经从普鲁士政府那里取得了保护关税的实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起，国家就已经依据法律，用安排定货和给予补助等办法，对经济活动和个别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进行了积极的干与。”^[14]

关于日本的经验，该书还这样谈称：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这里，大金融资本同官僚的君主政体密切地勾结在一起……

在力求实现扩展的目标的过程中，日本国家在1866年革命后加紧扶植大工业。1856年，国家模仿欧洲的式样建立了第一个纺纱厂。1871年在东京建立了织造厂、船塢、毛纺厂等等。日本国家利用保证利润的办法，来奖励大工业企业的兴建。1880—1890年，国家兴办的工厂移交给实业和银行资本。”^[15]

最后，依照马克思的看法，“古典”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特征乃在于：在这个时期中劳动力还没有成为“商品”，即，还不能自由买卖。可以说，“经济以外的强制”还占统治地位，利用这种强制，就可以把劳动力召拢来，就可以压低他们的工资。关于劳力出卖者和雇主之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生时期”的关系，马克思曾这样写道：

“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利用国家的暴力，来‘调整’工资，把它强迫限制在与货殖要求相适应的限度之内，延长劳动日，并把工人维持在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中。并且这件事正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基本要素。”^①^[16]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这个“基本要素”足以說明共产主义中的整个列宁方向。

“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結合”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在工人运动中消除資本主义的“唯工会活动論”的尝试，也就是說，使工人們不要去首先設法直接改善他們的境遇。

在取得政权和內战获得胜利以后，列宁又重新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对付工人們爭取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問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已經宣布，拥护所謂“工团主义”思想，即认为必需扩大强大的工会的思想，是同党员資格不相容的。

不仅如此，一年以后，列宁又找到了机会来談“工会在新經濟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他确切地說：

“在这种（苏維埃的——作者）条件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与，都必須认为是絕對有害的，不能允許的……

工会必須是国家政权的（即雇主的——作者）最亲密和必需的合作者，因为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經濟工作都是由工人階級的觉悟的先鋒队——共产党領導的。”〔17〕

这样一来，力求上进的“未来的总經理們”，就有可能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去“調整”工資——而且还可以决定劳动条件——，而他們确曾充分地利用过这种可能性。

关于工人状况、劳动条件、以及苏維埃制度下工人的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說，无权利状态，文献极为丰富，我們在这里仅仅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出自列宁的“新階級”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伊·巴·巴尔金的笔下，而且在我們看来也是最能說明問題的。

伊·巴·巴尔金生于1883年，1905年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而受过輕微处罚，一个工科毕业的职业工程师，曾在美国当工人时作过短期的深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叙述，他是“最早”願意为苏

維埃政权效劳的苏联专家之一。〔18〕

他还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工程”之一的庫茲涅茨联合企业的总工程师，指揮了一支将近五万建設工人的大軍。当庫茲涅茨冶金联合企业着手兴建的时候，他受到热烈的頌揚；1929年，最伟大的苏联詩人符拉基米尔·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年），为这个伟大的工程写了一首詩，写詩时心目中大概想到了巴尔金：

“我知道——
城市
会出现，
我知道——
花园
会开花，
因为
有这样的人們
在我們
苏維埃

国家！”〔19〕



革命的浪漫主义歌手符拉基米尔·馬雅可夫斯基，于一年以后朝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了。可是，使他絕望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預示第二次布尔什維克革命的一道胆怯的閃电而已。

巴尔金死于三十年以后，获得了俄国所能頒发的最高荣誉，他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因此，他往上爬的努力肯定地已經得到了报酬。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代价有多高昂，而付出代价的又是誰。他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庫茲涅茨联合企业：

“人們日以继夜地劳动着。入夜，建筑工地上灯火通明；夜班工人们不願意成績降低。建筑坑槽挖到一半深度时，突然出現了烂泥层，他們仍然繼續挖掘矿井，冰冷的水齐腰深……”

严寒来临，建筑工地的粘土地全都冻得硬邦邦的，这时土方工程仍然不停。在凜烈苦寒之中，挖土机开不动了，但，冻得象石头似的土地無論如何也要挖开。共青团員們决定增加临时班次，不要报酬。沒有一个人开小差。人人都是热火朝天的战士。在寒冷的濃雾里，共青团員們开始抡鎬打冻土。他們的脚冻僵了。他們的手指冻得发硬。然而，沒有一个战士下火綫。他們在灯火通明的工地上彻夜地干活。他們战胜了冰冻和严寒，战胜了倔强的西伯利亚。²⁰

伊·巴·巴尔金易于为工人們的英雄行为所沉醉，可是，为了战胜那“倔强的西伯利亚”，他用不着涉足于冰水之中。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說来，他的着迷是一个政治問題，因为他是那些肩負共产主义的“未来的总經理們”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怎么能够期望二十世紀的工人会接受这种劳动条件呢？尽管可以用国民的普遍貧困和支出拮据来解释低下的生活水平，首先是低下的工資水平，但决定劳动力这样殘酷地被使用的先决条件却是“經濟以外的强制”，馬克思曾經把这种强制确定为早期資本主义的一个特征。这种“經濟以外的强制，即使沒有“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結合”，即使不把工会改造为雇主的“最敏捷和无条件的合作者”，在組織上也是不可能的。苏联在着手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就已經开始运用“經濟以外的直接暴力”，以便为工业提供尽可能廉价的劳动力。1931年，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一斯大林宣布了“胜利的六个条件”，其中第一条是这样的：

“任务是要用与集体农庄訂立合同的办法，来有組織地招收工人……”²¹

几年后，这个原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实际上包括了一个人的整个劳动生活。

这个体系始于学徒的培养工作。根据1940年10月2日的法律，出现了国家的“劳动后备军”，出现了直属苏联政府管辖的学徒训练学校，每年应召受训的十四岁至十七岁之间的学徒为数达八十万至一百万人。

1940年10月28日又有补充规定，青少年凡擅自脱离训练学校的，均应判处一年以下在劳动改造队中的监禁。

1940年6月26日的法令规定，凡根据自己的愿望更换工作岗位的，判处六个月以下的剥夺自由，在原工作地点执行强制劳动改造，也就是说，没有工资。

同年7月17日，这项法令扩大到领取工资的农业劳动者。1940年10月19日，法律明文规定，实际上全体劳动者都可以被强制地从一个工作岗位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甚至另一个地区的工作岗位。这样，工人附属企业这一事实，在法律上已确定下来了。^[22]与此同时，农民被束缚在集体农庄上，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过去（和现在）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们的居住地点。

我们还可以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援引一个恰当的评语：

“被强迫从土地剥夺出来，驱逐出来，变为浪人的农民，因此又要按照滑稽的恐怖主义的法律被鞭打……被迫去接受工资雇佣劳动制度所必要的纪律。”^{① [23]}

最后，苏联在资本积累期间，可以说是，依靠了合法的奴隶劳动，即囚犯们的（以及，后来的战俘们的）劳动。

关于苏联的集中营制度，有好几十本书已经描写过了，^[24]所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以，我們可以稍稍提一提这个主题就算了。我們研究所感兴趣的只不过是，指出集中营制度的扩大是同“直接生产者的剥夺”以及正在着手进行的工业化是携手并进的。

經過內战(1918—1922年)的“赤色恐怖”时期以后，苏联政府在新經濟政策时期中轉而采取相当温和的做法。1928年3月26日，甚至頒发过一項特別赦免令，根据這項赦免令，一年以下的监禁均可作为輕微刑罰而改用較寬大的方式服刑。

但是，根据1930年5月5日的決議奉行全盘农业集体化以后，情况就立刻改变了。农民进行反抗，并被大批地“非富农化”^①和放逐。于是，第一批劳动奴隶就进入了集中营。

在(1932年)“8月7日法令”公布后，判刑的就增多起来，刑期均为整数：五年、七年、十年，后来是十五年或二十五年——或死刑。^[25]

接着就是1936—1938年的“大清洗”，受打击的首先是城市。此后，根据难以辨认的观点，又有层出不穷的新居民集团受到个别“行动”的打击，他們是：前貴族、企业主、商人、在国外有亲属的人，在国外呆过的人、同外国人有来往的人、祖籍德国或日本的人、个别民族集团的成員。斯大林死后，苏联官方承认了这些事实，尼·謝·赫魯曉夫甚至断言，斯大林所以沒有放逐乌克兰人（举例而言），是因为他找不到适当的地点来安排他們。^[26]

劳动奴隶，也就是說，那些終日劳碌而不得温飽不得自由的不幸者究竟有多少，是永远无法确定的，因为，在斯大林时代，集中营和“自由”的界限非常模糊。服过刑的人虽然往往从集中营中被释放了出来，但是他們既沒有权利，也沒有可能离开被放逐地区。另外一些人根本沒有进集中营，他們被放逐到无法离开的地区里。

^① 非富农化意即被当作富农予以处罰、剥夺、消灭。——譯者

总之，这个共产党国家想尽了办法，使好几百万的劳动奴隶能够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所支配。

归纳起来，马克思确认早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如下：

一、为了建立大企业，对大多数生产者，首先是手工业者和农民实行粗暴的剥夺。

二、国家借助于立法和通过直接的资本积累，积极参加资本的形成。

三、没有自由劳动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对为资本形成而投入劳动力的工作所进行的调节。

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在苏联很容易就辨认得出。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也有几个特点是不容许同“古典的早期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其中有：

（甲）私有制的“废除”。

私有制在苏联的地位，尽管可以在形式上援引禁止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一事来加以说明，但这样做并没有接触到实际。一方面，禁止的面广泛得很，因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所谓私人所有制最广泛地消失了。另一方面，党一再对人们普遍喜欢拥有财产的心理表示让步，为了解决经济任务，有时也为了解决政治或军事任务而一再给予物质刺激。因此，在我看来，“废除”这个词是十分恰当的。党认为财产是某种不道德的和值得唾弃的东西，因为在自由化时期中，人们总是一再设法取得它，而它又一再地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借口剥夺掉。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私有制的废除，对于向往“私人资本主义”的西欧人，往往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不弄清楚这个现象，就根本无法理解共产党独裁的发展。因此，我们将举几个事例来考察。

六十年代之初，苏联领导实行大规模的剥夺私有房产。这时《党的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齐卡耶夫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短篇小說。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高級經濟官員，他想自己蓋一所房子。齊卡耶夫不久就發覺只有依靠“投機商”的幫助才能實現這個計劃，並且要犧牲他的“共產主義良心”。由於貪婪、由於鄰居們的惡感，以及力圖取得更多東西的努力，整個家庭氣氛日益變壞。

短篇小說確實是這樣說的：“房屋將會最終把黨證吞噬掉。人們將會變成財產的奴隸……人們將會絞盡腦汁地思索，怎樣才能平整一個小土坯……以及，用一道石頭牆來代替木板牆……並且，債務一旦清償以後，人們就突然間種起楊莓來。楊莓確實多得很，自己吃也吃不完！於是，人們不知不覺地就從一個共產黨員變成一個凡夫俗子，一個小商人。”〔27〕

此外，齊卡耶夫還出租房屋，因此就有了不勞而獲的收入，於是他就面臨被開除出黨的危險——他終於決定“自願地”把他的房屋轉讓給國家。

這是一個借助於對正在興起的衝突及其解決所作的“不受約束的”文學的描寫來確立標準的典型事例。誰也沒有責備齊卡耶夫不法。人們“只是”把他置於這種抉擇之前：使他宣布自己願意“讓那房子去見鬼，而自己卻去做人家要他去做的一切。”

私有制的“廢除”絕不僅僅牽涉到財產。財產，例如一所房子可以成為不勞而獲的收入的源泉，甚至是“人剝削人”的源泉。1962年秋天，《共青團真理報》寫到一些（以前的）共青團員，他們在1954—1955年期間曾響應赫魯曉夫開發新荒地的號召，並且後來在已開發地區定居下來：

“牲口、菜園、箱籠（裝滿了雜物——作者）……討厭之極！他們來的時候，全是些地地道道的年輕小伙子，簡直可以說，只穿有襯衫。他們踢足球，出牆報。而現在呢，你瞧瞧，他們都沒有工夫了。他們必須修繕（自己房子周圍的——作者）籬笆……那里已經

沒有新荒地^①。只有沉悶的乡下佬(деревенщина)。”

該报在結束时写道：

“很多人都中了个人主义的毒，中了这种难以約束的‘崇拜私有制’的毒……新荒地生活方式的最美好的特点正在消失。”[28]

这里所談的，不是违犯苏联法律的事。私有财产之多，也不成为“废除”和剝夺财产的絕對尺度。

这里所反对的是实实际的占有，首先是要求占有的那种意願。

由于在正规的早期資本主义里私有制是一切价值的标准尺度，所以，对于它的共产主义表现形式，就必需采取另外一个詞。

(乙) 資本积累与新领导阶层普遍接替旧领导阶层一事是相輔相成的。

虽然我們可以在一切工业化中观察到社会阶层的更迭，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与此相联系的并不是对旧领导阶层实行彻底的剝夺和肉体上的消灭。然而，这种做法却是早期資本主义的必然特点。

(丙) 政治对于經濟的优势。

这一点必然是从国家对生产資料的所有制中产生的，这种所有制使任何經濟都取决于国家，亦即取决于政治。但是，这种論点不可以絕對化。既然政治管辖經濟，那么，政治家在計劃时就必需考虑到經濟的要求。十分明显，主动权是在政治方面，这同“正规的”早期資本主义往往把国家看成是經濟的奴僕的那种傾向全然相反。

(丁) 全部生活的意識形态化。

在共产党的权力范围内，为整个制度辯解最終必然要归結到

① 据这个官方报道的英雄传说，这里所說的“新荒地”的含义是“前綫”。

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這已是人所共知的，用不着進一步說明了。

(戊) 一種人們可以最恰當地稱之為“烏拉規劃”^①的經濟方法，也就是說，一種極為獨斷專橫的投資政策。

準確地計算收支，是真正的資本主義，也是真正的早期資本主義的特點，可是，對於早期資本主義替代體，情況卻相反：應當做什麼，應當建設什麼，全由黨的領導來決定，而在原始積累的第一個時期，大約相當於192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時，資本從哪里來是完全無關重要的——主要之點是，必需有資本，在當時這已經成為原則了。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這裡指物質的和人的資源）的原則，在生產領域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簡直可以說，沒有結算，沒有盈虧的總結。儘管乍聽起來難以令人置信，可是，斯大林卻證實了這一點，他在1931年夏天說：

“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不復從事於……擬制正確收支對照表的工作。”〔29〕

不僅如此而已。在這段時期——以及以後很長時期內——在蘇聯簡直沒有經濟理論可言。無論如何，在1928年至1954年時期中，沒有出版過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那時流行的想法——雖然不是自始至終都如此——是，只要從事“有組織的全國性的國民經濟”，“一切根本性國民經濟理論問題，如價格、價值、利潤等等，就會徑直煙消雲散。”

在二十六年當中，主要起作用的是“烏拉規劃”原則，這種規劃的最重要（雖然不是唯一的）基礎是政治機關的意志。

“清除”國民經濟理論的傾向甚至發展到這樣的地步：1931年，將中央統計局改名為“中央國民經濟計算局”，因為統計這個詞被認為帶有过份的“資產階級”氣味。

① “烏拉規劃”(Hurra-Planung)；烏拉(Hurra)本是一種歡呼聲，此處似指一種隨聲附和的表示。——譯者

不消說，在經濟方面的这个独断专橫的时期里，暗地里还有一場为爭取經濟决策的固定标准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关于这场斗争，我們以后还要談。

最后，这里还要指出另一个足以为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辯护的理由：从內容上說，这个名称絕不是永久一成不变的。有迹象表明，所謂“替代体”这个詞指的只是向真正資本主义的过渡——所以，在选用名詞时，有必要着重指出它的替代性质。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談到。

其他国家的經驗(节譯)

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里，当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的时候，要进行一場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說，要以新的领导阶层来代替旧的领导阶层，并不存在充分的理由。

德国人撤退——不管属于什么形式的撤退——以后，波兰人民无论如何总是要面临一項艰巨的全民性任务的，这就是国家的重建工作。

1945年，在匈牙利，这个国家并未受到触动。它的政府在外交上却是一敗塗地。在“正常情况下”，即，如果后来不是苏联实行占領的話，只会发生国家领导集团中的人事更动，而不会发生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更不会引起整个国家机器的彻底毁灭。

波兰和匈牙利固然不能算是工业国，但是对于这两个国家來說，工业化問題并非迫切到有理由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在波兰，在共产党人接管政权时，城市人口約占 27% (1931年) 至 41.9% (1954年) 之譜，亦即两倍于 1917 年的俄国，比 1949 年的中国則高出数倍。在匈牙利，共产党独裁建立时，城市人口約占 36.8%。^[1]用共产党的行話來說，两国都是农业工业国，它們充其量只能确立逐步地轉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而不能够确立急剧地“克服落后状态并轉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样的目标。

还有第三个因素：两国都有历史悠久的工会运动。

在波兰，工会运动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就已发生，在二十世紀初叶，就已經汇合而成立“职工同盟中央委员会”。1905 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它宣告解体，1919 年又再成立为“工

会联盟”，1920年，共产党人被撤除他們所担任的领导职务，1921年則完全被排除在外。社会主义运动也有綿长的历史；該国后来的独裁者毕苏斯基元帅等人就是从这个运动中出身的。

在匈牙利，1868年就已經有“工人总同盟”，“总工人党”成立于1880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0年。然而，匈牙利共产党也有一定的传统：1918年10月，有共产党人渗入的工人和士兵占領了布达佩斯的政府大厦，1919年3月，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成立。（附带指出：匈牙利共产党迟至1918年11月20日才正式成立，也就是，它成立的时候，起义已經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苏維埃共和国不久就被粉碎了，1919年8月，共产党被禁止。它轉入了地下，1944年才随着苏联占領軍重新出現。1944年12月，拉科西在得布勒森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

因此，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独裁都是一种人为地建立的、外来强加的，沒有任何内政上的理由足以为之辯解的制度；因此，恰恰是波兰和匈牙利向全世界表明了，共产主义統治只要实行极微小的自由化，就必然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潰，导致“私有制的废除的废除”，也就是，导致“資本主义的复辟”，导致自由經濟，这絕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們无法詳尽地探討叛乱的經過，尤其是人們已經不断地这样做，而且做得很出色。对于我們，重要的只是，着重指出一些对于我們的研究頗为重要的特点。

波兰和匈牙利的事态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苏占区也是如此），归根結蒂，应当回溯到斯大林之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由于克里姆林宮内部正在爭权夺势，苏联自己已經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从莫斯科去切实地控制东方集团的事态已属不可能——要不是苏联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那些本来是会左右国家命运的力量已經在慢慢地要求发言了。

在波兰，酝酿的过程一直持續到1956年春天，那时，坚决执行

“斯大林路線”的党的領袖波列斯拉夫·貝魯特突然逝世，党的領導內部就爆發了激烈的鬥爭，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瓦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

瓦·哥穆爾卡(生于1905年)是一位老波兰共产党员，1927年时就已开始从事工会工作。由于一系列事件——其中一件是，1950年他被当作所謂“铁托分子”而投入監獄——他获得了“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声誉。这一声誉是同普遍改革的模糊概念相联系着的，等到貝魯特一死，哥穆爾卡在波兰就已享有“領袖”的声誉(是否有理姑且勿論)；他被誉为能够拯救国家和使生活变得易于忍受一些的人。

1956年7月28日和29日，在波茲南爆發了工人叛亂，公共建築物，首先是保安机关的办公处和監獄受到襲擊，政治犯被釋放，群众被武装起来，于是国内政治形势頓時紧张起来。

包括坦克部队在內的正規軍被調来恢复秩序。人民获得了某些让步。10月底，又再发生騷亂，中央委员会决定任命瓦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为第一書記，这样，就承认他是党的領袖。

还要提一下，10月19日，一个未經邀請的苏联代表团在波兰出現，其成員有赫魯曉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和莫洛托夫，很明显，苏联准备干涉波兰。^[2]

我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使干涉受阻。不过，这个蜕化变质的共产党独裁的經驗有三个方面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第一，任何一个共产党独裁的衰落的必然后果，总是私有制的恢复，首先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崩潰。

波兰在这一方面通常总是远远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后面。尽管如此，据1955年的調查数字，約有集体农庄一万个，耕种着約20%的可耕地。^[3]在1957年春天，大約还剩下一千九百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制度已經崩潰。

第二，波兰的经验表明，广大群众不仅不想要“俄国的”共产主义，也不想要“哥穆尔卡的”共产主义。自从哥穆尔卡上台以来还不到一年，这位“民族共产主义者”就被迫调动军队去弹压8月里的罗兹的运输工人罢工和1957年10月初的华沙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后一个事件是对禁止学生杂志《直言》周刊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这份杂志曾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哥穆尔卡执政铺平了道路。此外，很有特殊意义的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哥穆尔卡在他负责专政的时候，对于一切反抗，甚至是精神上的反抗，除了设法镇压以外，就别无他法可想。^[4]最后，波兰的经验还表明，不充分地使用武力，单单靠说服，是不能够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和取消私有制的。在1957年，镇压工人和学生骚乱时，哥穆尔卡十分明白地表明，他准备用武力去对付独裁的进一步松弛现象。但是，据1961—1962年材料，波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却远远大于苏联集团中的任何国家。结果，尽管哥穆尔卡呕尽心血，作了努力，但是，在这一时期波兰的农业集体化仍然停步不前，甚至显示出倒退的倾向。总之，在1962年夏末举行的波兰生产合作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关于集体化过程的数字如下：

	合作社数目		参加合作社的农户	合作社的土地(公顷)	
	新建的	解散了的		总计	其中 国有土地
1958	215	180	22,534	222,011	80,150
1959	245	153	24,073	243,981	94,011
1960	273	132	25,587	266,109	103,087
1961	64	231	24,971	259,324	104,001
总计	797	696			(5)

结算起来，四年之中共增加集体农庄一百零一个，即，新建的农业合作社有七百九十七个，解散了的六百九十六个。

類似的經驗也可以從匈牙利的发展中找到，其表現形式當然還要更淒慘一些。這裡的中心人物也是一個所謂“鐵托分子”——伊姆雷·納吉——他於1953年7月被任命為總理。

“鐵面無情的斯大林分子”拉科西雖然掌握着黨的領導，至少在理論上掌握着權力，但是在所謂“新方針”的條件下，伊姆雷·納吉的勢力卻比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共產黨國家的總理所能擁有的勢力要大得多。

1955年春，他受到黨內激進派的極度猜忌，被解除了總理職務，後來又被控從事反黨活動，開除出黨。可是，拉科西再也沒法開動他的恐怖機器了，他自己的地位也無法保全。1955年12月，納吉已經成為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1956年7月，根據莫斯科的意見，拉科西被解除了職務，1956年10月23日就發生了人民起義。共產黨獨裁的崩潰容易得簡直令人驚異，共產黨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不可推翻的”這一宣傳神話被粉碎了——至少應該說，這是無名的匈牙利自由戰士所建立的历史功績。

十分清楚，共產黨獨裁是蘇聯軍隊給恢復的。據路透社報道，蘇聯在匈牙利調動了擁有約一千輛坦克的十五個坦克師，四個摩托化步兵師和兩輛裝甲列車。噴氣式轟炸機在布達佩斯投擲燃燒彈和殺傷彈。起義者沒有有組織的軍隊，甚至連象樣的政治領導也沒有，因為這次人民起義雖然把伊姆雷·納吉捧為領袖，但是，他是否希望人民起義還很難說。^①

據西方估計，這一次喪命的匈牙利人約為一萬五千名，蘇聯方面的損失估計為死亡二千三百人，受傷五千人。約有十五萬匈牙

① 一方面，他對事態的進程很明確地表示贊成，他於1956年11月1日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即，退出蘇聯集團。另一方面，他又同蘇聯進行談判，從而違反了任何一次起義的最重要原則：“防守就是一切起義的死亡”，這句話是列寧提出的，作為老共產黨員的納吉毫無疑問是知道這句話的。他這樣做就使蘇聯有機會從軍事上占領這個國家，從而使事業遭受失敗。

利人在匈牙利叛乱期間或由于这次叛乱而离开了他們的国家。〔6〕

我們也可以看到与波兰相仿的現象。匈牙利在集体农庄制度崩潰方面首屈一指。1956年1月时,有集体农庄九千四百个,7月30日时,有四千八百九十三个,1956年12月31日时,还有二千零八十九个集体农庄,庄員十一万九千三百十五人,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5%。〔7〕

在匈牙利,群众也是不仅不想要苏联的共产主义,也不想要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起义的結果是匈牙利退出东方集团和共产党独裁的崩潰,虽然老共产党员伊姆雷·納吉也許并不希望这样。

最后,匈牙利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证据,說明“民族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神話传说而已。代替伊姆雷·納吉上台的是亚諾什·卡达尔,他也是一个同样鮮明的“铁托分子”,曾經在監獄里呆过多年。

卡达尔好容易才把共产党独裁在匈牙利重建起来。他的政府經過三年以后才感到足够强大,可以着手解决废除私有制的问题。但是“铁托分子”卡达尔却办到了。1959年秋,开始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新行动,有四分之一村庄都需要警察去用暴力对待“与国家为敌的分子”,而且,国内还駐有苏联军队。1961年6月,伊斯特万·道比主席报告說,集体农庄已拥有总耕地面积的75.5%,总耕地面积的93%已經属于社会主义成份。〔8〕

党的机关及其职能

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的理论是在 1950 年研究出来的(同目前考虑的这个概念相比而言),并且同年发表在《幕后的力量——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一书之中。^[1]因此,我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根据后来出现的资料 and 事件去检验这个理论,毫无疑问,基本思想业已得到证实。作一个重要的实事求是的更正仍是必要的:当时我把“资本主义替代体”和“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这两个概念看成是差不多相同的东西,现在我认为只有“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才是一个恰当的名称。

我的理论在德国以及在德国以外都引起了注意。然而,我并没有能够使这个新名词得到普遍的承认,没有能够使那个最重要的结论充分地发生效力——我指的是这个论断:“新阶级”在胜利后不久即已分裂,而其中的一部份已经逐渐地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掘墓人。恰恰是这一点不是被彻底地误解,就是遭到否认。

我始终认为:关于当前形势或(首先是)苏联的未来发展动向的论断,如果不考虑到新领导阶层中的这种分裂,就势必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在目前世界形势下,这会招致重大的危险。所以,辩论一定要继续下去。为了使新增加的读者把论点弄清楚起见,必须对以前的历史作一简单的回顾。

在 1950 年,对现代共产主义基本上存在着三种见解。

第一种是苏联官方的。它的依据是,在苏联已经建成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事态发展中固然出现过某些特殊的东西,但是基本上还是符合马克思所指示的方向的。

这种見解現在可以置之不理，因为現代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后期資本主义現象，而在苏联也沒有出現一个沒有階級的社会。

第二种見解淵源于浪漫的民族心理学。它把現代共产主义看成是俄罗斯民族的現象。它的依据是，俄罗斯人已經成了一种不喜爱财产的动物，要叫它做什么事情，只要用鞭子抽打就行。

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尽管不一定对，但是人們到底还是可以不顾事实地断言，除了俄国以外就沒有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且非俄国的共产党人之多寡完全取决于俄国出錢的多少，那么，在1950年时，这种見解就已成为不合时宜的了。現在有一个共产党中国和一种反对俄国的“民族共产主义”。不过，当时人們还是可以沉醉于幻想之中，以为东欧的共产党独裁只依賴苏联軍隊，(共产党)德国人(举例而言)不会向德国人开枪，或者，會出現某种“非俄罗斯”式的共产主义。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获胜，以及“铁托分子”瓦拉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波兰、亞諾什·卡达尔在匈牙利建立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以后，这种見解就沒有立足之地了，特别是在今天，俄国共产党人被认为是“比較溫和的”，而中国人則似乎比俄国人“更俄罗斯化一些”，俄国人最近对财产显示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眷恋之情。^①

第三种，当时詹姆士·伯納姆所著的《經理們的革命》确曾风靡一时。这种見解的依据是，在西方，生产的实际領導不是操在股東們手里，而是操在經理們手里，按照伯納姆的看法，这种人更关心的是事业，而不是财产状况，他們已經建立了一个接近社会主义

① 当然，也还有些英雄們至今还否认非俄国的共产党人的存在。例如，爱德华·克兰克肖在《赫魯曉夫統治下的俄国》中說：“手段是俄国人为俄国人而发展的。很可能存在着贊同如下論断的理由：它适用于俄国人。但是，毫無疑問，在别的地方，它就不适用了。”[1a]不过，这种議論确是离奇而罕見的。

的社会。

关于苏联的社会，伯納姆认为，那里也在进行着一場經理們的革命，這場革命必将使苏維埃制度变得类似西方的生活秩序。〔2〕

伯納姆的見解是否符合西方社会，我們不能在此探討。但是，应用在苏联方面，它却包含着一个合理的內核，因为，他心目中的經理代表着一种正在成长中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而他早在1948年就已看出了这一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貢獻。

应当指出的是，詹姆士·伯納姆忽視了党的机关——苏联社会內部的第二个决定性力量——的存在。

現在已經沒有人否认苏联新貴族和他們的資產階級化了，爭論已經轉移到他們的性质方面来。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只有一个新階級，另一种看法是这个新階級至少已經分裂为两个特殊的、本质完全不同的社会集团。

埃里克·貝特彻对我的共产主义掘墓人論点进行了非常激烈的爭論，他在《十字路口的苏联經濟政策》一书曾經写道：

“在西方政論界中常常出現这样的看法：非政治专家的机构有朝一日会感到自己相当强大，于是它就敢于起来反对政治官員們的机构。这种想法是相当成問題的。

这种論点显然首先是由馬克思主义的叛徒們提出的，也就是說，是由那些抛弃了內容，但是沒有抛弃方法的人們提出的。例如，特別是詹姆士·伯納姆，以及在我們这里的赫尔曼·阿赫米諾夫……①

密洛凡·德热拉斯則是另一回事……他也同样用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工具来批評苏联以及依附它和差不多脫离它而独立的国家（南斯拉夫）中的那种制度化了的共产主义。他认为政治强力和經濟强力之間沒有矛盾，而只有已經實現了的合一。本书也主张同样的看法。”〔3〕

我們姑且不談被貝特徹先生渲染上个人色彩的那个淘汰原則。客观地看来，貝特徹有六个論点是我所絕不能苟同的：

1. 苏維埃貴族——在它的組成部份“实现了合一”以后——是一个統一的整体。

2. 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在今天的苏联政策中不起任何作用：

“馬克思主义作为制訂政策的准繩，已經失去作用，它从属于政策，每当出于其他原因（据貝特徹看来，就是提高生产——作者）而需要确定新的目标和采用新的标准时，它就时常改变。”〔4〕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說：

“归根到底，我們將把它（指馬克思主义——作者）看作是一种单纯为一种随心所欲的（！）强权政治辯护的意識形态……”〔5〕

3. 在苏联，如同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一样，經濟占有对政治的优势。

据貝特徹看来，“‘提高生产’这个目标掩盖了其他一切目标（对于苏联领导人來說——作者），提高生产所获得的成功被拿来当作为制度直接辯护的理由。作为意識形态，这种态度已經另成一格，因而同原有馬克思式的制訂目标实际上已經没有什么联系了。”〔6〕

4. 市場經濟同苏維埃制度是完全一致的：

“一个极权国家完全可以組織一种妥善的競争制度……”（当

① 据《东欧》杂志上的生平簡介，埃里克·貝特徹（1919年生）曾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任斯图加特—霍亨海姆农业大学正教授。（見1961年第6期《东欧》杂志。）

我和他只有泛泛之交，不記得有过什么私人間的齟齬，我深信他对我的攻击——不論是否指名——是力求公平客观的。对于大多数决定性論点，我們总是持有相反的意見。可是，貝特徹表示自己与德热拉斯“用馬克思主义思想工具”所获得的認識并无二致，那么，就很难明白，为什么“馬克思主义方法”在别人那里就成了絕對不可取的东西了呢。此外，还得澄清一下，所謂“叛徒”究竟何所指。我生在一个苏維埃社会里，我一有机会就离开了它——那时不过二十岁。我的科学教育是在西方受的。

然是指一个被共产党治理的国家)。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說:

“……他(赫魯曉夫)卷起袖子,无所顾忌地着手……用恢复竞争原则的办法,使生产所具有的商品性质得以保持。”[7]

5. 在苏联,掌权者和人民之間已經沒有矛盾,至少可以說,矛盾正在消失之中。

“赫魯曉夫的政策現在已經不再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这对他……是有利的……据此,現在(1)可以认为,一种强制的忠诚正在变为一种公民对于国家及其目标所抱有的百折不撓的忠诚。与此同时,新一代已經成长起来……”[8]

6. 共产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相似了:

“有一天,东西方的具体经济制度不再具有根本上的区别,而是頂多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这种日子确实已經为期不远。”[9]

我衷心希望貝特彻先生讲得中肯,那么,这个世界未来就会变得可爱得多。不过,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在于寻求真理,因此,我必須提出以下的論点:

1. 我們現在可以观察到,苏維埃貴族已經分裂为两个本质不同的阶级:党的机关和技术知識分子。

2. 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体现了党的机关——这个当前苏联社会中最强有力的阶级——的利益,因而这个学說——它通过党的机关而采取适合于它的政治目的的形式——就成为其他一切居民集团所必需遵行的指令。

3. 作为共产主义思想财富的持有者,党的机关始終一如既往地绝对保证使经济从属于政治的需求。

4. 苏联的对內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党的机关力求卓有成效地克服苏联经济的自发的市场经济倾向。

5. 广大群众同苏維埃貴族之間的紧张状况,以及特别是,苏維埃貴族內部的紧张状况正在不断尖锐化,并且成为决定整个苏联

政策的最重要因素。

6. 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异在不断地扩大，因而令人忧虑的是，由此产生的紧张状况在可以預見的将来，大概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可能导致軍事上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社会学看来，这两种見解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問題：在苏联社会中，我們所面临的究竟是政治强力和经济强力之间的“业已实现了的合一”呢，还是恰恰相反，是这两种强力之间日益尖銳的冲突？在这两种場合中，以后的一切不外是这种合一或这种冲突的合乎邏輯的后果而已。所以，我們想集中探討这样一个問題：是否可以只談論一个新阶級，还是，必須对新领导阶层内部的不同集团或阶級加以区别。

关于“领导”阶层、“統治”阶层、“主导”阶层的概念，無論在过去、現在还是未来，都存在着种种紛紜的意見，而在这里要提出一个最后的解决方案，則是我所力不能及的。按照我的見解，这些概念是沒有定义的，因为领导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甚至不是某一特定集团的特权，而是有时构成一个集团、有时构成好几个集团的人們的职能，对于这种人來說，共同之处只是：由他們去领导別人。因此，“领导”阶层就是所有影响他人行为方式的人們的总和（而不是集合体！），他們可以是国王或僧侶、学者、工业家或大商人，也可以是酒店老板或土匪头子，他們可以互相合作或者互相作对：只要他們执行领导职能，他們就属于“领导”阶层。

所以，無論如何必須加上某些居民集团，例如“专家”，因为他們由于自己的教育程度而比別的人优越。这从下面的表中可以看出：

黨員和候补黨員的教育程度

(1961年7月1日数字)

		%
黨員和候补黨員总数	9,626,740	100
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	1,283,548	13.3
高等学校或专科学校肄业的	2,852,158	29.6
受过中学教育的	2,755,652	28.6
总計:		71.5
小学及小学以下的		28.5 ^[10]

黨員在“专家”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当然又有所不同:

	“专家”的总数	
	(千人)	其中黨員数 (千人) (百分比)
1928年	521	6.4 1.2
1941年(1月1日)	2,401	494.8 20.5
1956年(12月1日)	6,257	1,744.2 28.0
1960年(12月1日)	8,784	2,495.2 28.5

在苏維埃政权建立后的第四十四年，仍然有 71.5% 的“专家”沒有党证。这个事实清楚地說明，在俄国有相当大的一批知識分子，即领导阶层中的人，仍然留在党外。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第二个表更意味深长。它显示出，在苏联受教育但沒有入党的专家的绝对数字，在今天要比五年前或甚至二十年前大得多。它从 1941 年的一百九十万零六千二百人上升到 1956 年的四百五十一万二千八百人，甚至上升到 1960 年的六百二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显而易见，苏維埃貴族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不会同共产主义完全一致的。

把共产党独裁的組織結構和工作方法分析一下^①，就可以为我們关于存在着若干个新階級的概念提供最重要的有利論据。

在形式上，蘇維埃國家的結構符合於民主的一切準則。那里也有經選舉產生的國家權力機關：區和州（或邊疆區）的蘇維埃（即議會），然後再由它們為相應的行政區域單位指派執行委員會。

由於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個較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和國，共和國內有一個最高蘇維埃和一個由它任命的政府。

對於整個蘇聯另有一個最高蘇維埃管理，它由聯盟院和民族院組成。每三十萬蘇聯公民產生一位聯盟院代表，而民族院的代表則由蘇聯的各民族按照一定的比例產生。

可是，除了每一個市、區、州或邊疆區蘇維埃以外，除了每一個共和國蘇維埃或最高蘇維埃以外，還有相應的市、區、州或邊疆區中央委員會，或共和國和蘇聯的中央委員會，它們同樣也從它們當中選出一個執行機構——通常稱為“常務委員會”（最高機構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現已更名為“主席團”）——這些常務委員會是各行政單位的實際政府。

國家權力機關的一切決定都必需先經相應的黨機關審查和批准，因此蘇維埃國家的形式上的民主結構只不過是徒具虛名而已。

在公共生活的其他一切領域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模型：在軍隊里，每一個司令員旁邊還有一個政委，政委雖然在部隊領導這個意義上受司令員管轄，但是他卻接受相應的黨的機關的政治指示。對工業和農業的控制則由黨機關中的部來實施，其方式繁多；有的通過在企業或政府當局中工作的黨務工作者，有的通過特派員，各相應的活動領域中的政委，例如曾經有一個時期在農業中就有中央委員會派駐機器拖拉機站的黨組織員等等。

這種“雙軌制的”領導方法，是弗·伊·烏里揚諾夫—列寧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後不久，在討論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里的工

① 關於共產黨獨裁的組織結構的改革（1962年黨的大改革），將在下文中予以探討。參見本書第212頁及以下幾頁。

会作用以及如何克服工人的反抗时提出来的。

他在1920年12月30日《論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錯誤》的演說中这样說：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組織（即不是由工会——作者）来实现……我們得到的結論是这样：可以說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鋒队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鋒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沒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共产党——作者）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要实现这些职能，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特別机关，即通过苏維埃机关。根据这些特殊情况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結論呢？結論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鋒队（即党——作者）与群众之間的联系^①……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工会，就是这样。”〔12〕

隔了几行以后，又說：

“沒有一些把先鋒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連結起来的‘引带’，就不能实现专政。”〔13〕

这些思想完全符合列宁为了未来的总經理們（即那个受阻滯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的传统观念，并且表明它能适应沒有生存手段的知識分子的战无不胜的专政的条件——工会一方面要保证廉价的劳动力，使扩建的基础稳妥健全，另一方面要帮助在工人当中物色一批新的未来总經理。

“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組織”，即工会，与新阶级的战斗組織，即共产党之間的严格区分，同样，只能够是列宁对全体工人不信任的表现。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先鋒队”，即党，与新国家政权，即与苏維埃的区分是新提出来的，因为，很明白，列宁不是在談論苏維埃专政，而是談論通过苏維埃来实现“先鋒队”的专政。

这些思想是一系列关于党同国家之間的关系的理論的出发点，这种理論已經由列宁的继承者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斯大林提出来，并且已經明确地写在他的著作《論列宁主义問題》之中。斯大林写道：

“沒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点当然不能了解为党能够或应当代替工会、苏維埃以及其他群众組織。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借助于工会，通过苏維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的。沒有这些‘引带’，就不能有稍微巩固的专政……”

例如在我們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們的苏維埃組織和其他群众組織，沒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14]

尽管进行种种“非斯大林化”，上述这些概念今天仍然有效，并且在国家宪法和党的文件中繼續有所發揮。

現行的苏联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确定，共产党成为“劳动者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1961年）通过的新党章里，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之間的关系有如下的規定：

“第三十五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和劳动者的社会团体中的党組織领导这些机关和团体的工作……”^[15]在老一套的宣传中，这种思想也被加以渲染。例如，在《苏联大百科全书》（1956年3月，第二版）的《苏維埃》条目中这样

說：

“在苏联，沒有党（即党的机关——作者）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16〕

这一段話虽然沒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引自斯大林的著作，我們在上文中也已援引过——这可以說是意識形态上的一个“非斯大林化”的典型例子。

“党”和“非党”的明确界綫，在今天也仍然全部有效。在半官方的教科书《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中，是这样說的：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它的領導作用呢？……党在領導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时候并不代替它們。它的領導可以比作乐队指揮的艺术，乐队指揮努力使乐队奏出和諧的音响，但是它自然不会去替每一个乐师演奏。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里工作的党员發揮自己的作用，保证实现自己的政策。

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的原則是由列宁制訂的……1919年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應該把党組織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应当努力領導苏維埃的活动，但是不要去代替苏維埃’。”〔17〕

实际上，“党的領導作用”在国家中是这样实现的：市苏維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即相当于市长，虽然是从市苏維埃中选出的，可是却是由党的机关提名的，他是个党员，也就是一个党組織的成員，在这个情况下，他是市苏維埃的所謂基层組織的成員。在形式上，这位市长只对他的选民和市苏維埃負責。可是，由于他具有党员身份，他受市党委的決議的約束——因而也就受上級党机关的決議的約束，党章規定“下級机关必需无条件执行上級机关的決議”。〔18〕

我們可以在半官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里找到一个比較

完整的“党的领导作用”的定义：

“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发挥它的组织者的作用，因为它用正确的政策武装人民，通过它的组织工作把人民团结起来并借助于教育工作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19〕

归根到底，在共产党独裁统治下党和国家的区分属于苏联学入门知识范围内的常识。指出下面的事实似乎是必要的：这种——首先是组织上的——区分在共产党独裁的全部历史都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并成为意识形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彻底弄清实质内容，应当认识一下“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取消私有制以后，经济工作也属于国家机关。

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听命于党的领导的做法似乎太过份了。1957年，《党的生活》杂志报道说：

“几年以前，在科培耳城，全部‘权力’还掌握在区党委会的手里。这里处理着党的、经济和行政上的问题。区党委的干部对各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发布有关他们的日常工作的指示。甚至象给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分配建筑材料、燃料、豆饼之类的问题也要有区党委的指示才能决定。

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它多半只是把在党委员会里已经做过了的再重复一遍。”〔20〕

这里所报道的就是对党过份监督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表示的忧虑，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常常可以听到这种忧虑的言论，当时有过企图削减党的机关的权力的尝试，党的机关就进行反抗，关于“党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报道应当归功于这场交锋。例如，在党的报刊上曾提到过，准备播种决不是什么“经济上的小事”，而是区党委应当过问的；有一篇通讯中这样说，党的干部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找零件，在另一篇通讯中，则要它们控制每一台拖拉机每天消耗的燃料。

在上級机关里，管理也是很細致的。在論文集《党在工业中的工作》里，斯維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会書記G·科茲洛夫要求党的干部去复查一下，制造某某零件究竟要多少金属，当时的莫斯科市委書記叶·福尔采娃写道，党委必須决定一个工厂是否应当兴建，当时的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弗·科茲洛夫宣称，党委應該确定生产哪一种类型的渦輪机，工厂中使用哪一种家具。〔21〕

在这些主张里，“党”似乎就是主管的党委员会。这是駁斥一个“新階級”論的最重要的論据，因为，根据上述說法，决定权限不属于过去那个沒有生存手段的知識界的全部成員，而是仅仅属于那些坐在党委会里的人。讓我們进一步来看看，“党”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或什么居民集团。

現在，我們还要向那些曾經給我們提供过材料的那些人士想办法，我們要看看苏联的文献，它們能幫助我們从某些段落和決議中看到一些具体的演变、人物和社会冲突。

有助于我們的探討的第一个事例曾經在苏联作家尼古拉·維尔塔的剧作《我們每日的粮食》(1947年)中描写过。

在进行分析以前，請允許我略为談談苏联的农业組織。在外表上，集体农庄是一个自由的农民生产合作社。实际上“党的领导作用”論对于集体农庄特別重要：集体农庄主席全都是由党的机关选定的，集体农庄领导机构的日常决定，如劳动力的使用、选种、种植計劃等等，均受党的机关或上級国家机关的經常监督。

1958年以前，集体农庄不能拥有自己的农业机器。农业机器連同人員都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里，以高价向集体农庄“出租”。在一定时期里，机器拖拉机站同时又是党领导的中心：它的党組織——有一时期叫“政治部”——在党内具有特殊地位，無論对地方的党机关或国家机关，还是对集体农庄都是如此，而且也是农业中的实际权力中心。

集体农庄的收入首先来自生产和农产品的销售，但是也有其他来源（如手工业、运输业、有时甚至还有工厂，如砖窑等）。

集体农庄只有履行了“对国家负有的义务”才能支配自己的收入，即按照规定价格交售农产品，并且以实物支付机器拖拉机站为其工作所索取的高昂代价。剩余的农产品可以自行消费或以多少可以说是自由的价格出售，但售价的高低要看政治形势和农业形势而定，也要看集体农庄领导是否能干，而且往往会有很大的波动。当然，全部收入首先被认为归集体所有。一定的部分——不久以前是15%——被作为所谓的不分配的基金，其余部分则按“劳动日”分配。

在西方没有类似劳动日之类的东西。替集体农庄工作均以“劳动日”或劳动日的分数来计算：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可以坐地分得二点五个劳动日，作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翻耕、播种、收获工作可以分到二至二点五个劳动日，运输工作则为一至一点七五个劳动日，较轻的劳动则为零点五至零点七五个劳动日。有时劳动日也按工作成果计算：一个养蜂员生产一公斤蜂蜜可得零点一至零点二个劳动日，培养一个学徒一个月则可得十至十五个劳动日。

劳动日的价值要在年底才能算得出，因为首先要履行对国家和机器拖拉机站所负的“义务”和扣除“不分配的基金”。其余的钱和实物则被集体农庄庄员所干的劳动日的总数去除，然后每人就可以得到他那一份——根据他所作的劳动日数。

这个制度有两个基本思想：

第一个是物质刺激原则：这种计算方法使每个庄员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他个人的工作成绩（即劳动日数）以及整个农庄的兴旺程度（即每个劳动日的价值）。

第二：国家利益优先于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利益。

实际上，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之间，庄员与庄员之间存在着

巨大的收入差別。集体农庄主席的收入一年可以达到四万五千馬克（1958年为十万零三千一百卢布^①），比一个普通庄員要高出十七倍。在一个兴旺的集体农庄里，一个劳动日可以达到約六十个戈比和二点二公斤谷物，总计每月約二十六个卢布（一百一十四点四馬克）。平均算，現在一个庄員每月的收入可以估計为十二至十六卢布（五十二点八至七十点四馬克），但是他們为集体农庄工作一无所获，也是屢見不鮮的。于是他們只好依靠所謂宅旁园地的收入，这种收入当然是不会很大的。

在这里，物质刺激原則也起着作用：每个庄員都有一块所謂“宅旁园地”，在苏联平均为零点三一公頃，但按地区而有所不同，在高加索为零点一四公頃，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則为零点五公頃。

如果庄員在集体农庄中所挣的“劳动日”达不到一定数量，他的宅旁园地就被收回。关于苏联领导为什么目前仍然保留宅旁园地的制度，1961年斯·古·斯特魯米林在《消息报》上写道：

“集体农庄庄員所以有宅旁园地，是因为集体农庄首先就不能滿足他的需要（对粮食的需要！——作者）。”^[22]

国家的利益：尽量从集体农庄中多取得一些东西，并阻止它成为一支真正独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国家的利益是由三种方式予以保证的：

第一，国家在春天按照預計的收成規定所謂的交售額，即，每个集体农庄应按照强制价格交給国家的农产品的数量。

1958年以前，国家以强制条件和高昂价格把农业机器“出租”

① 目前卢布的官价比率是零点九卢布比美金一元，而在1961年1月1日时卢布比价为十比一。为了使讀者知道究竟有多少起見，卢布的比价按照十个“旧”卢布等于一个“新”卢布，等于零点九美元和四点四馬克計算，还要着重指出，这种換算只能用作近似的依据。

給集体农庄，从而还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自从允許集体农庄拥有农业机器以后，机器拖拉机站就变成了修理站，修理站凭着他們的垄断地位为他們的修理工作也索取高昂的价格。

第二，国家从增加集体农庄的不分配的基金中也得到好处，这种基金实际上是庄員們的集体投資，而个别的庄員对它却不能提出什么要求。投資扩大了生产，目的是早晚要把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場，因此，不分配的基金乃是一宗潜在的国家财产。

第三，国家，或者确切地說，党，通过党組織随时严格监督集体农庄领导机构并施加有利于国家的影响。这一点被充分地予以利用，例如推行某种作物的种植（即使集体农庄种植这些作物无利可图），以及指导农产品的自由銷售和劳动力的使用，等等。

在农业里还有三种最重要的冲突：集体农庄与“上級机关”总是圍繞着向国家繳納的数額、按照自己的估計来确定投資額的权利、以及在集体农庄內按照自己的考虑来組織劳动的权利而进行着斗争。^①

所有这些問題都表現在剧本《我們每日的粮食》里。——（反面的）主人公是一帆风顺躊躇滿志的集体农庄主席西拉·吉希。西拉在俄文中意为力量，吉希意为寂靜——他象征着一种沉寂的、秘密的力量。

冲突很简单，也很典型。据說，集体农庄主席得到他的社会关系的帮助，隐瞒了預計收成的产量，因而相应地取得了較低的繳納数額。于是，他能够发給他的庄員們的实物就五倍于正式允許他所发放的。

后来出現了一个“铁面无情的布尔什維克”——区党委书记。他在几个知情人的帮助下，揭发了这个“阴谋”，設法以“把一个投

① 由于这里的介紹极为有限，請參見奥托·席勒在《苏联的土地制度》一文中所作的詳尽分析，东方研究論丛第21号，土宾根1960年版。

机者的集体农庄建立在投机倒把活动之上”为罪名控告和逮捕了农庄主席，此外还设法使庄員們“感到高兴”，因为终于能够向国家繳納比現在更多的农产品——然后他們兴高采烈地給“斯大林本人”写了一封信。〔23〕

这里描写的是 1947 年的情况。十年以后，这种局面基本上并未改变。这种情况可以在瓦連金·奧維奇金的作品里讀到。

奧維奇金生于 1904 年，从 1929 年起，即从集体化运动开始，就已經是个党员。他当时是个农业公社主席。他写作时间很长，然而只是由于小說《区里的普通一日》，才在 1952 年开始成名。在小說中，他要求（当时斯大林还活着）改变农业政策，其做法大約跟以后赫魯曉夫的差不多。此外，他还写了几篇小說，这些小說由于都是写同样热情肯干的人物，因而互有联系；它們在 1956 年时被編成一个集子，出版时用最后一篇小說那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名字《艰难的春天》来命名。

在奧維奇金笔下的人物当中，对于我們最重要的首先是那五个先后决定区的命运的党务工作者。

維克多·謝妙內奇·包尔卓夫^①，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一个“反面人物”，坚决維持斯大林式的领导方法；

彼得·伊拉利昂內奇·馬尔登諾夫，同一区党委的第二书记，后来接替了包尔卓夫，一个“正面人物”；

华西里·米哈伊洛維奇·梅德維捷夫，一个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在馬尔登諾夫底下任第二书记，在馬尔登諾夫长期患病期間，代理他的职务。“反面人物”；尽管他很年轻，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他还要采用斯大林的工作方法。

① 在俄国不仅使用姓和本名，还使用父名。維克多·謝妙內奇名叫維克多，是謝妙恩的儿子。女人名字也有相应的語尾“овна”，例如瑪利亞·謝妙內美娜。在同事之間通常用本名和父名互相称呼，多半还称“您”。

接着是两个州委书记，前面三个人的上级：第一州委书记克雷洛夫，一个“正面人物”，他当然是很少出头露面的，以及一个“反面人物”，州委第二书记马斯列尼柯夫。

还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农业干部：杰米扬·瓦西里耶维奇·奥漂金，人家叫他“阔佬杰米扬”，“苏维埃政权”集体农庄主席，年纪较老，阅历丰富，一个“正面人物”，以及

赫利斯托弗尔·达尼雷奇·多尔古申，五十四岁，以前在部里工作过，现在是机器拖拉机站站长，“正面人物”，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振兴农业，虽然他在被任命以前“只是在火车车厢里凭窗看到过”农业。^[24]

从瓦连金·奥维奇金的作品选出的第一个事例，跟维尔塔作品中的一样，都是写的某个集体农庄的交售额的。当然，这一次的着重点就完全不同了。奥维奇金描写了区党委第一书记、“斯大林主义者”包尔卓夫和他的“正面人物”、改革拥护者、当时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马尔登诺夫之间的一场争吵。争吵是围绕着一个问题进行的：虽然最优秀的集体农庄都已完成了交售定额，但全区还落在后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完成计划。包尔卓夫有一阵子出了远门，现在马尔登诺夫向他报告：

“‘苏维埃政权’、‘十月’和‘朝霞’这三个集体农庄已经完成任务。”

包尔卓夫惊奇地看着马尔登诺夫：

“请你跟主席们这样说——你们完成了任务吗？……把有关集体农庄的报告拿来……‘苏维埃政权’集体农庄——他们到底该交些什么呢？哦……把他们列入第九类^①怎样？”

“最高的那一类？”

^① 根据收成年景确定“类别”，而类别又决定交售额的多少。

“是的，最高的那一类。那会有多少呢？咱们来算算看……按照第九类，还可以从闊佬杰米揚那里弄到大約十五万公斤，从‘朝霞’农庄可以弄到八万公斤，从‘十月’农庄也可以弄到这么多。就这样，小伙子！你大概还不知道，粮食是怎样弄到手的吧？”

“我不是小伙子，維克多·謝妙內奇！我懂得这种开玩笑。你到底凭什么权利按照第九类去計算这些农庄的交售定額呢？”

“因为国家需要粮食呀！”[25]

这两篇报道可以互相补充，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矛盾都是一样的：一个党委书记认为，如果集体农庄非得按照国家确定的定額交售不可，它就会多繳一些。不同的只是，在維尔塔的作品里，那个集体农庄主席把一个“投机者的集体农庄”建立在“投机倒把活动”之上，——而奧維奇金却把集体农庄主席称为“一个确实有才干的經營家。”

促使馬尔登諾夫表示反对武断地提高交售定額的，并不是出于对庄員們的福利的关怀，而是出于怕庄員們少干活，因而国家和党会蒙受損失的考虑。一个发言反对提高定額的党委委員說得很坦率，使人不由得不依：

“我們要当心，千万别无意中把替我們生金蛋的母鸡給錯宰了。”[26]

赫魯曉夫在1953年9月的中央全会所发表的“就职演說”中证实了这种冲突的真相，他說：

“一个集体农庄一发展到超出其他邻近各农庄的水平，收购工作者就来剪平它，就象花匠用剪刀剪修花园里的灌木丛一样。”[27]

第三个例子出自1959年，我們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得到它：

办得特別好的“俄罗斯”集体农庄的主席N·F·雷斯金，曾經获得苏联的最高荣誉称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雷斯金确曾使他的庄員們享受到异常高的生活水平：1957年，在討論將該集

体农庄改为国营农場时，《十月》杂志写道：

“您試試把‘俄罗斯’集体农庄庄員改变为国营农場工人吧！在所有改为国营农場的集体农庄里，普通庄員的收入并不比国营农場工人高。在‘俄罗斯’农庄里又会怎么样？”〔28〕

1959年，N·F·雷斯金被撤职。据《消息报》报道，他曾从事“投机活动”。

人家发现他的劣迹并不多：1958年集体农庄沒有完成牛奶交售計劃，肉类生产落在交售定額后面。人家責备他最厉害的是，把集体农庄的利益置于国家之上：

“說到归还亏欠国家的債務，N·F·雷斯金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重利盘剥者。有人曾經問过他××集体农庄从（刚刚解散的——作者）机器拖拉机站买来的农业机器要到什么时候才把欠款付清呢？——十年……这难道不是富农思想（！），一切都捞到自己手里，对国家却什么都不給！”〔29〕

为了对党的机关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起見，我們再从工业中举一个例子。在这里，安納托里依·索弗洛諾夫的剧作《莫斯科性格》对我们特別有用。这个剧本在1949年和1950年是苏联舞台上演得最多的一个，并且获得了斯大林奖金。①

剧本描写了苏联的新貴族——工厂經理、党务工作者等。主要人物波塔波夫是某机床制造厂厂长，工作上一帆风顺，为人刚愎自負。他的岳父、工长格利農夫发明了一台新紡織机，于是在某紡織厂女厂长謝威罗娃太太领导下，有一帮妇女发动“阴谋”，先礼后兵地要波塔波夫接受这个机器的生产訂貨。經理拒絕了，于是事情被提到党的区委会。

还存在一些个人因素——波塔波夫的妻子、格利農娃同志是

① 引用一个相当老的剧本，有些讀者也許会感到不快，我們在这里先提一下，在下文里我們还要对这个剧本作一番較新的探討。

紡織厂党委会書記，她以这个身份来反对她丈夫。^①

下面这场戏是在区党委会里演出的：

“波塔波夫：从到会人的組成情况看来，大概是要討論我的工厂吧？”

謝威罗娃：要討論您作为厂长所领导的那个工厂……我們請区党委帮助我們，把立即組織生产的問題提到部里去。我指的是大批生产（！）……在我們看来，波塔波夫可以接受定貨——当然啦，要他願意……否則就要他非这样做不可。这件事情应由区党委决定……

波塔波夫：我想指出，我的工厂不是絕无仅有的一家，而不仅区里有，而且全国也有……我不能接受这项定貨，因为可能性有限。（而且）：紡織厂为什么要干涉我那个工厂的工作？我要問，究竟为什么？誰給他們这个权利？

格利婁娃：波塔波夫同志，你眼睛里只有：我的工厂、我的計劃、我的部下……你能够帮助我們，可是不願意帮助我們。

波塔波夫：我反对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

格利婁娃：波塔波夫，你会吃大亏的。我听见人家議論你。‘这已經不是工厂了，它成了波塔波夫的私人产业。’人家管你叫‘总督’。我有責任在区党委的會議上这样說，虽然由于可以理解的理由，这样做使我感到为难……我希望你有所認識，以免为时过晚……

（区党委的女書記同志更明白地說：）

告訴您，波塔波夫，您根本不懂得制造新机器对国家的意义。还有，您不理睬工厂的党組織。生活已經对您提出严重的警告……波塔波夫相信，光靠他自己和三五个助手就可以給工厂开辟出康

① 在苏联党内，女人們通常都保留她們娘家的姓氏。

庄大道。他随时都觉得，工厂的成績就是他，波塔波夫，个人的成功，而不是我們党的政策的成功。所以，他老是說‘我的部下’，‘我的工厂’，‘我的計劃’。您听說，人家叫您做‘总督’沒有？”^[30]

我們現在已經搜集到足够的例证，可以弄清楚“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的具体表現形式。

首先可以看出，在我們已知的所有事例中，体现“党”的是一个专职的党务工作者，而党务工作者^①的职能并不是自己去工作，而是发动别人去工作。

这个职能也可以从“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的定义中推理而知。权力的运用和政策的目标乃在于引导人去采取一定的行为举止方式。这个思想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中有穩固的地位。

在《共产党人》杂志的一篇編輯部文章里，有如下的說法：

“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可是，它始終是做人的工作。党組織（即党的机关——作者）的工作对象是在工厂里开动机器的人、集体农庄里的人、管理机关里的人，他們全都在生产着各种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

“教育群众和組織群众……是党的工作中最重要部分。”^[31]

把这种“做人的工作”同另外一个党的活动等同起来，是根本錯誤的。在苏共机关方面，問題不仅一般地涉及到政治，而且还涉及到如何在生产过程中运用一定的职能，以便解决由于取消私有制而产生的任务，这些任务也仅仅在私有制被取消或业已被取消的时候才会存在。

任务主要有三項：

第一，党的机关首先要設法把社会主义人为地建立起来，也就是說，废除私有制。关于这，第三个《苏联共产党綱領》（1961年）說：

^① “党务工作者”（аппаратчик）这个詞，在俄国常常用来称呼党的干部，而且早就成为党的干部的象征。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机关的成員”。

“和先前的一切社会經濟形态不同，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阶段——作者）不是自发地建立起来的，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領導下的人民群众进行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的結果。”〔32〕

在苏联理論家 G·格列則尔曼的評論文章中，有如下斬釘截铁的說法：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会自发地成长。”〔33〕

因此，必須有一定的力量，通过它的“組織工作”，“促使”人們去做他們所不願意的，即交出他們的财产——这种力量在苏联就是党的机关。

它的第二个任务是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經濟制度产生的。

沒有經濟以外的强制，資本的原始积累本身是难以設想的。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甚至把这种强制当作整个积累过程的基础。

采取“經濟以外的强制”可以使工人們“由于热情积极”而站在齐腰深的冰水里，使集体农庄庄員們去写信“給斯大林本人”，說他們因为終于去掉了那个保证他們有优厚收入的农庄主席而感到多么高兴。为了使这种事情得以发生，就要有人握有充分的权力，去从事“做人的工作”——而这就是党务工作者，这种人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統治的国家里早已被人认为和描写为一种社会学典型和心理学典型。

瓦連金·奧維奇金把他的“反面人物”、区党委第二書記华西里·米哈伊洛維奇·梅德維捷夫写得有声有色，很具有典型意味。

在小說所写到的那个时期——赫魯曉夫时代初年，梅德維捷夫大約是三十五岁至四十岁左右：他在1939年受完了师范教育，在战争期間負伤，战后入党并改做党的工作。他受过教育，“能够做报告”，他的性格特点如下：

“哪怕是最微小的独立思想，在他看来，都是对于国家和党的纪律的恶意破坏。他自己不敢贸然离开州委的指示一丝一毫，更不用说他敢去想一想，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34〕

在老百姓语言中，这种人叫做党的督促员。这个词已被采用在文学作品之中；例如，在奥维奇金的作品里就用来泛指党的干部中的“反面典型”。但是，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奥维奇金借一个“正面人物”之口说出来：

“您把他叫做党的督促员。我知道他的身价如何，我不会把他的能耐估计过高。可是，您难道不懂得我们需要象他这种人么？一点不错，亲爱的，我们始终都需要督促员。”〔35〕

“党的督促员”所以需要，首先是因为自从私有制废除后，工作的乐趣到处都大大降低了。这一点奥维奇金也写得非常明白。他写的特拉佩斯尼科夫，在内战期间曾为重分土地而斗争过，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发家致富曾经干活而晕倒，可是一到强迫他加入集体农庄，他对劳动的态度就完全改观。“以前他总是一个人扛口袋的，虽然他不得不大口喘气。现在他无论如何总要找别人帮忙。”〔36〕

如果想象一下，有千百万人都持有这种态度，那么就不难想出，为什么需要特别设有督促员。

不仅如此。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在西方被称之为利润动力，在东方被称为利欲心的那种因素，亦即每一个企业家从他的企业中尽量取得较多东西的那种努力也无影无踪了。更糟糕的是，企业领导者都想隐瞒他们的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以便取得最大限度的补助金、原料、机器、劳动力等等。

在废除私有制以后，工厂和农场只能够按照计划，即上面发下来的指示来生产指定数量的指定产品，基本上是无所谓成本核算

的；因为在原則上产品不是为了銷售，而是为了直接消費而生产的。由此可見，計劃的完成或超額完成乃是衡量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成績的唯一尺度。此外还由此可見，計劃訂得越低，为完成計劃所需的資金估計越是富裕，对每一个企业领导人就越有利。

从剧本《莫斯科性格》中的厂长波塔波夫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最初拒絕制造新机器的任务，“因为可能性有限”；可是，等到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后，他却說：

“你們用不着为工厂担心。我能够做到。党的决定对于我就是法律。至于我个人，后果要由我自己来承担。我要說的就是这些。”〔37〕

这段描写說的是 1948 年，是对于这种冲突的一种文学描写。可是在十三年以后，在为公布新党綱而組織的討論中，有一个国民經济委员会干部，N·拉苏莫夫声称：

“現在，各企业的經济工作計劃得怎样呢？是一場連續不断的斗争；下面的人努力想上繳少一些，得到的东西多一些，而上面的人呢，則相反，要把計劃扩大。”〔38〕

为了对付生产者的严重囤积习惯，就需要有党的督促員，虽然同把工人打发到冰水里去那种情况比起来，所需要的是不同水平和不同质量的党的督促員。但是，在根本上說来，这两种人則是同样的。

最后，党的机关的第三个任务是，無論如何都要保持政治对于經济的优势；因为“純經济的”做法容易滋长如下的思想：貫徹和保持私有制的废除也許是不必要的，把某些职能移交給私人企业主在經济上也許是相宜的——这种做法的最后結果就会是共产党独裁的覆灭。

党的机关的这一項任务，在关于党，即党的机关的领导作用的学說中也提得很明确。例如，在《党的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是

这样說的：

“經濟企业的領導工作对一个人可以起腐蝕作用……他把成吨的生铁、鋼、成千公尺的布等等，都看成是他的工作成果。逐漸地……他的注意力終於集中在他的工作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他的局部利益看得比整个国家的利益更重要。

“党組織（即党的机关——作者）必須設法使这种情况不致发生……要做到事事都从政治出发，就必须善于把当前的实际任务同党的基本目标，同党爭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联系起来。”〔39〕

这种“目光短浅”的某些表现形式已經为我们所熟知：集体农庄主席雷斯金想拖延买农业机器的欠款，厂长波塔波夫总喜欢把他的工厂看成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在下文里我们将看到，“局部利益”最終将导致要求恢复私有制和推翻共产党。我们先明确两点：

第一：作为全国和經濟、社会和文化生活各部門的控制和統筹机构，党的机关在以废除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是絕對必要的，因为“局部利益”，亦即离心力，在那里是极其强大的。个别人或个别团体对于整个国家的生存联系，在共产党独裁底下比（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要小得簡直无可比拟。

即使撇开由于拒絕共产主义而产生的所謂“敌对”态度不談，我們也必需指出，在共产党独裁底下，个别人或个别当局（不是指党的机关）感兴趣的只是，他們的計劃，他們的工作能够被人认为是滿意的。除此而外，对他們有約束力的只有那种对于各国都适用的爱国主义，或者，从生存上看，就是对于国家能够保护他們免受外来危險所抱有的那种期望。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曾經希望人們会把公共财产看成是他們个人的财产，这种希望后来又成为废除私有制的論据，可是現已证明，这种希望不过是粗鄙拙劣的騙局而已。

苏維埃人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几乎完全取决于他的那个工作領域中的成功，这一点大大地抵消了促使苏維埃人采取国务活动家态度的其他种种因素。（在資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全体公民对于币制的稳定、捐稅的控制、法律保障的扩大等等都有利害与共之感，而这在共产党独裁底下却是毫无意义的。）

党的机关是一个包罗整个国家并对它的全部状况負責的机构，对于这一机构的成員來說，在1962年党实行巨大改革以前，占首要地位的是，或者，更确切地說，曾經是整个（共产党）国家的利益。

奧維奇金所描写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从根本上說，这两个互相仇視的党务工作者都是以区一級的政治家自居的，不同的只是，他們以为在这种状况下必須走不同的道路：包尔卓夫认为，能够而且必須立即从集体农庄中榨取最大限度的东西，“因为国家（現在就）需要粮食”，馬尔登諾夫认为更重要的是先刺激劳动生产率，因为，不这样，“生金蛋的母鸡”就会被扼杀。

奧維奇金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其他社会阶层中的人不必象政治家那样去思考問題，甚至不能允許他們这样做。他描写到区党委第二書記梅德維捷夫同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多尔古紳之間的一場冲突。当多尔古紳为整个局面担忧而批評一个党的下級干部时，作者借第二書記之口說：

“我們要弄清楚这一点。不过，多尔古紳同志，請您在任何情形下都要考虑到，您是一个机器拖拉机站站长，我們首先要求您的是在拖拉机的工作、刈草的质量、給您規定的計劃完成的期限等方面負起責任来，而不是要您管黨員的教育工作……我們（党的机关——作者）曉得我們的职责是什么！而您呢，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同志，您应当懂得您的工作崗位。”〔40〕

在上述关于党的机构的职能的定义中的第二个要点是以下这一論断：“政治的”这一形容詞——其含义大体上是“政治家的”——与“共产主义的”这一形容詞完全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政治家的思想完全可以是反共的。然而，事实上，如果要保证“日常任务能够同党的基本目标”結合起来，实际上也就是保证日常任务能够同完全废除私有制一事結合起来，那么，党的机关就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正如我們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党的机关是居民集团中对此唯一真正感到兴趣的。

事实上，所有这些人，这些党的督促員，无论是文学上的人物也好，还是著名的高级党干部也好，只是首先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废除，才拥有权力和可能性，去下令逮捕任何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去武断地提高集体农庄的交售定額，去决定“大批”生产某一种紡織机器，去确定一个工厂是否应当兴建，去审查一台拖拉机消耗多少燃料。私有企业主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职责进行这样的干涉——由此可見，党务工作者只是为了生存的緣故才对废除私有制感兴趣。在另外一个社会制度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他們既沒有职能，也沒有生存手段。

总之，“党”，即致力于共产主义和废除私有制的那种力量，也就是党的机关。

作为一种机构和社会集团的党的机关的存在，实际上早已为人们所共知，而且被各方面人士，从里昂·托洛茨基开始直到克劳司·梅納特、鲍里斯·梅斯納、默尔·芬索德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人叙述和描写过了。^①然而，我們要指出的是，党务工作者不一定是一些渴望权力的个人，而是一群在共产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行使

① 參見默尔·芬索德：《俄国是怎样被統治的》，哈佛 1953 年版第 176 頁；克劳司·梅納特：《苏維埃人剖視》，斯图加特 1958 年版第 44 頁和 164 頁；鲍里斯·梅斯納：《剧变中的俄国》，法兰克福 1951 年版第 7—28 頁。

一定的客观上必要的职权的人，党的机关不仅仅是一种机构，而且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具有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的特征，甚至可以說，决定了它的全部性格特点。

“阶级”这个概念带有纯粹主观的性质。基本上，每一个社会学家都可以按照他的理解去随意解释，至于如何使他的同行们确信他的解释切实可用，则全在于他了。

在我个人看来，现有的最好的定义似乎是弗·伊·烏里揚諾夫—列宁的。这个定义是：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1〕

当然我还想把心理因素加进去，不过我们暂时还是保留这个定义吧。

依照列宁的见解，一个人属于一定阶级的决定性标志，是他在社会生产中的职能。因此，阶级乃是分工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的分析表明，党的机关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而且只有在这个体系中，具有极其明确的地位：它有十分明确的“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它强迫别人去劳动，而自己却掌握支配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它的地位是法律规定了的，它支配它领得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在这个体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为了避免人家指责我们片面，我们还可以举出另一个关于“阶级”的定义，这个定义是一个极端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亨利·A·梅斯提出的，内容如下：

“社会阶级是确知自己具有一定的行为方式的一群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有别于具有其他特点和行为方式的其他社会阶级……

一个人要成为某一社会阶级的正式成员，他自己必须觉得自己是这样一个成员，而且也要被别的人看作是那样。”〔42〕

我們已經知道，“阶级”这个概念的定义有一部分是符合于党的机关的；因为它的成员被其他人群视为“党的督促员”，即被视为另外一种人。此外，还可证明，党的机关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或甚至阶级意识，并自认为是一种伟大传统的继承者。它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它在法律上的确定的地位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可以追溯到很远。

用法律确定党的机关的特权的第一个措施，是《关于改善党的负责干部的物质状况》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首先有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五个负责的党务工作者的待遇得到了调整。这个决定于1922年8月公布，即在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也就是成为所有党务工作者的首脑后四个月。看来，这个决定使斯大林的权力比以前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所能够给予他的，有了更大的增长。①〔43〕

下一个阶段是1926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项决议是为了防止反对派的攻击而根据斯大林的建議通过的。决议中说：

“党的出发点是：……党的机关体现着整个党的领导部分；党的机关是由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不能冒着瓦解党并使党解除武装的危险去诬蔑这些人。”〔44〕

① 參見安德雷阿斯·比林斯基 (Andreas Bilinski) 关于党务工作者为争取在法律上确定他们的地位所作的斗争的说明，见于《东方法律年鉴》(Jahrbuch für Ostrecht, 1963年慕尼黑版)内《论苏联国家法》、《官员阶级问题》章。

這項決議當然是黨的機關所制訂的，類似的、足以證明它的階級意識的材料在整個蘇維埃時代都很容易找到。有一位相當有名的黨務工作者 D·巴克希耶夫於 1948 年寫道：

“革命前……黨的機關是由職業革命家、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們組成的，他們籌劃如何執行黨的指示……為了執行黨所委託的某幾項任務而成立的各种小組，也是黨的機關的成員，例如宣傳員小組……組織印刷工作、假造護照、籌措武器……等的小組”。而今天呢，黨的機關可以說就是黨務工作者。〔45〕

斯大林去世以後，這種態度並未改變。1956 年 5 月，亦即“非斯大林化”高潮的時候，《黨的生活》雜誌寫道：

“從事黨的組織工作的人就是黨的幹部。如所周知，弗·伊·列寧為了使黨組織的核心由最優秀的人組成而作過安排……職業革命者的光輝形象已經載入黨的史冊……自從黨執政以來，黨的機關的作用已經變得無比複雜……黨的機關是黨的最優秀人物的薈萃之地。黨的機關在我國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所有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都遵循黨的機關所指出的方向。做黨的機關的一個成員，乃是一種十分崇高的榮譽。”〔46〕

這樣強烈的階級意識的證據，不僅在現代，就是在歷史上，也是無與倫比的。如果我們還要提一下，黨的機關的成員均被列入一種類似“貴族芳名錄”(Gotha)，即所謂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名冊) 之中，而成為使用和提拔個別黨務工作者的依據的話，那麼，關於是否可以把黨的機關看作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的問題的爭論，就是無的放矢的了。

在說明這個階級的特點時，還要增添一點：屬於狹義的黨務工作者的還必需加入其他幾個職業集團，即工會、共青團、保安機關、“思想戰綫”的幹部；宣傳工作者、記者等，以及外交工作人員。

“黨的機關”這個廣義的概念，首先從對這些職業集團的成員

所执行的职能进行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即，工人阶级完全屈从于“党”的意志，是建立共产党独裁的首要条件，这一点列宁早在革命以前很久就已经明白地宣布过。在共产党国家里，工会干部就是党在工会中的代表，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工会运动陷于“自流”，工人不致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因此，必须相应地把他们视为纯粹的党务工作者。同样，这也适用于共青团的领导人；象工会干部一样，他们也是由党任命和领导的。

党务工作者只有在遇必要时才能使用赤裸裸的暴力，以及他们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多少有一些牢靠的基础时，他们的意志才得以贯彻实行。他们必须使异己的思想无法任意蔓延扩散，使人民大众在任何时候都受到尽可能深入的、符合党的精神的宣传工作的影响。因此，刽子手和宣传工作者都同样是“经济以外的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一如党的督促员那样。

最后，在共产党独裁的条件下，外交工作人员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那种外交官，而是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战士。既然世界规模的胜利的前景对建立和维持共产党独裁的关系极为重大，因此，世界革命专家就必需列入党的机关之中。此外，他们也很关心私有制的取消，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得多的为执行他们的职能所需的资金。

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们把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看成是党的机关的一部分：研究一下各个干部的履历，往往可以发现他们先是做纯粹党的工作，然后再转到工会、保安机关、新闻机关和外交机关中去。相形之下，党务工作者调到其他职业中去，则是极为罕见的。^①

党的职能和专门工作职能的这种严格区分的唯一重大例外，就是近年来常常有共和国总理，或苏维埃主席由主管的党的第一

書記兼任的現象，正是 1958 年初，在中央一級，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被任命為蘇聯的總理那樣。明白得很，這就是國家機關從屬於黨的機關的意志，也是黨的機關對國家幹部極不信任的表現，而不是共產黨融化在國家之中，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是中立的。在軍事獨裁政權中，當將領們被任命為文化部長或運輸部長時，人們也不會談論軍隊變成了文化機關或運輸企業。

最後提一下黨務工作者以前所受過的大學教育，這當然不能證明黨的機關和領導階層的其他部分“已經實行了合一”。第一，高級黨幹部以前所受的大學教育，往往是技術教育，那已是多年以前，甚至是幾十年以前的事了；例如，格·馬·馬林科夫於 1925 年二十三歲時未畢業而離開了工業學院，接着就在黨的機關里工作了二十七年之久。（參見本書第 182 頁。）其次，屬於哪一個階級不是取決於以前的教育，而是取決於職能、利益。當個別黨務工作者掌握他管理的那個部門的專業知識時，他的工作可能會輕鬆一些；但是他作為黨的督促員的職能並未因之而取消。

① 參見赫爾曼·阿赫米諾夫，《訃告，研究蘇聯中堅分子的一條線索》（*Obituaries as a Key to the Soviet Elite*），載於《蘇聯研究所學報》，1961 年第 7 期，以及對蘇聯領導階層的構成所作的深入分析，見約翰·A·阿姆斯特朗著《蘇聯的官僚中堅分子，烏克蘭機關的專門研究》（*The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A Case Study of the Ukrainian Apparatus*），紐約 1959 年版。阿姆斯特朗究竟怎樣根據他所搜集的材料得出一個“新寡頭政治”的推論，我當然是無從知道的。

技术知識分子 ——共产主义掘墓人

在小說《艰难的春天》里，奧維奇金把区党委书记梅德維捷夫写成是这样一个人：他“把独立思考的一切表現都看作是对国家和党的紀律的惡意破坏”。在他和机器拖拉机站长赫利斯托弗尔·多尔古紳之間曾經发生过一場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先是在党领导机构的狹小圈子里进行的，后来又挪到了区党委会的全体會議上。^①当机器拖拉机站长，即国家权力的代表，竟敢根据当前的政治路綫，以及某一集体农庄灾难性的經濟状况而采取“集体农庄民主”的手段的时候，于是一场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他未經上級党机关批准，就在集体农庄里召开了一次“公开的”党會議^②，会上决定，撤換集体农庄主席和包括党的書記在內的全部领导，他們的职位另委派新人充任。

这样，多尔古紳就越入了“党”所固有的权力范围，他侵犯了党所单独享有的领导他人的权力，后来，就有两个党务工作者去拜訪他，一个是区党委书记梅德維捷夫，另一个是比他仅仅高一級的州委第二書記，对他进行猛烈的抨击：“您这是反抗我們领导和指引

① 冲突的具体形式——尤其是机器拖拉机站长那种慷慨激昂的态度——取决于下列情况：它发生的时候，正是尼·謝·赫魯曉夫用各种方式去帮助那些后来才被解散了的机器拖拉机站，并扩大了机器拖拉机站长的权力的时候。从根本上說，这是一场“新階級”的两个代表，即一个党务工作者，与一个专家之間的冲突——正因为这样，这个事例对于我們特別重要。

② 在苏联，所謂“公开的”党會議系指党员和非党员都出席并且可以参加討論（在这里甚至可以参加表决）的党會議。

經濟工作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這樣子行不通，可敬的多爾古紳同志……我們過去領導過經濟工作，今後還要領導它。誰要削弱黨的領導和指引作用，都是辦不到的。”

這場爭吵在區黨委全體會議上繼續進行，由於多爾古紳的職務也是區黨委委員。區黨委書記做了一個報告，歷數“多爾古紳自從跨進站長辦公室的門檻那天起所犯的各种罪行：機器拖拉機站的修理費用預算已經透支；一個柴油引擎壞了；……沒有遵守關於保管燃料的規定；用機器拖拉機站的公款違法給集體農莊購買肥料；以及未經區黨委批准就進行某集體農莊新領導機構的選舉……”

梅德維捷夫還攻擊了個別的集體農莊主席，在攻擊時他還常常使用了一些凶狠的詞，如“破壞分子”、“害群之馬”等。這一次，對於區黨委書記的攻擊，人們並沒有逆來順受，不加反駁。奧維奇金這樣描繪了這次會議的以後經過：

“‘給他媽的豬鬃剪毛的時候，嚎叫聲很凶，豬毛卻很少。’平素冷靜的格洛托夫（另一機器拖拉機站的站長——作者）這時卻激怒了，他用這一番不平凡的話開始了他的發言。‘我們已經厭煩透啦，梅德維捷夫同志。叫喊，叫喊，還是叫喊！害群之馬，破壞分子。就好像區里只有您一個人關心國家利益，關心蘇維埃政權似的，而我們大家仿佛都成了國家的敵人或者十足的白痴……’

1937年的時候，你大概還是個黃毛丫頭……（那時正是大清洗運動的高潮。——作者）如果那時你已經掌權，——咳……你按照那時的做法還不曉得會干出些什麼呢！……你至少會把十幾個人關起來……您是個監工兼督促員，您就是這號人，梅德維捷夫同志！’”

這種政治上的論據又為經濟上的論據所補充和增強：

“您把集體農莊主席們說成是害群之馬。可是，對莊稼的最大

損害却是您自己造成的，梅德維捷夫同志。”他接着叙述梅德維捷夫在春天里强迫集体农庄主席去播种，虽然天气很不利，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尽早上报說播种計劃已經完成，格洛托夫还往下說：

“您坐汽車去那些集体农庄看看，凡是它們的主席无法抵抗您的压力的地方……現在怎样了呢？地里是一片慘黑……由于您瞎指揮，損失了成千上万吨粮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集体农庄主席奧漂金，“闊佬杰米揚”的簡短发言：

“我們那里的人都很喜欢多尔古紳同志。我們不会把这样一个机器拖拉机站长交給你去处置的。再說，也沒有理由处置他。秋天就要到了，庄稼一收，他工作的成績就看得見。”

奧維奇金的小說以区党委书记的慘敗告終：大会自发地給他一頓教訓。

這場冲突对于我們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面对着党务工作者所施用的“經濟以外的强制”，所有的专家們都懂得了休戚与共的道理。在事情的发生过程中，多尔古紳甚至建議，以“至善的連环保”来对付以梅德維捷夫之流为代表的“邪恶的联合”。这样，他自己就維護了决定善恶的权利——这正是一切階級意識形态的特点。^[1]

第二，具有特征意义的是，专家們是以經濟上的成功，而不是以来自上面的指示、計劃作为是非的标准。

这里誰对誰不对，无法确定，因为，在苏联經濟中，懈怠是不可想象的，因而，它就“需要督促員”。正因为这样，這場糾紛才具有根本意义，要知道，問題不在于标准尺度，而首先在于，作出最后决定的究竟是誰，是上級机关呢，还是直接生产者。換句話說，問題在于經濟上的强力和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强力。

反駁一个“新階級”論的决定性論据是：不属于党的机关的那

些成份表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心理，即所謂私人資本主義傾向。在分析這個階層的私下表現和他們在社會生產中的職能時，我們再來觀察這種傾向。

1953年6月，《文學報》刊載了謝爾蓋·米哈爾科夫的一出短小精悍的詩體喜劇，叫《索林卡》。這是一出徹頭徹尾的宣傳劇，以主人公的名字來命名這個短劇，就足以佐證了。索林卡的含義是“一粒小塵埃”。〔2〕

這個劇可以認為是對斯大林時代或斯大林死後的時代里變得日益尖銳的衝突的描寫。它大概是在斯大林時代里寫出，以後才發表的。

劇中的衝突是原始簡陋的。同索林卡立於對面地位的是退休的將軍庫茲馬·庫茲米奇·切斯諾夫（正面人物）——兩人是多年的密友。事情發生在別墅里，或者差不多可以說，是在索林卡的莊園里，他讓那些報酬優厚的集體農莊莊員替他干活，此外，他還進行着農產品的買賣，生意頗為興隆。

索林卡有“意識形態上的理由”來為他的私人資本主義活動辯護。他帶將軍去參觀他的產業，並且說：

“庫茲馬·庫茲米奇，這就是我的全部產業，你看怎樣？以前我們過的什麼日子，現在我們又變得怎樣了？我們祖祖輩輩的夢想都已為我們實現！我們過去忍受了多少艱難困苦啊！四次戰爭！為什麼老是想這些呢？只要瞧一眼我們的勳章就夠了。”

頭腦稍嫌遲鈍的將軍提醒索林卡說，他以前是個“沒有鞋子穿的牧童”，而不是商人的寶貝兒子，於是索林卡的妻子反駁他說，各人的需要並不盡同：

“有些人喜歡吃香蕉，有些人吃到西瓜就心滿意足。”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索林卡是這樣描寫他的私人資本主義活動的所謂內在邏輯的：

“种草莓要上肥就得有鸡粪。老婆买了几只鸡，可是太少了，不够。我們还得买肥料。后来我們又再买鸡，現在我要盖一个可容一百只鸡的厩。”

令人惊异的是，謝尔盖·米哈尔科夫的这篇短小的詩体剧里关于苏維埃社会的社会过程究竟能够报道些什么。

首先是这种論断：有私人資本主义倾向的人过去曾經是“沒有鞋穿的农奴”，他們由于革命而境遇变得良好起来，而且他們的先輩就已經梦想过出人头地。

此外，还写到了这些过去的“沒有鞋子穿的牧童”的个人主义，他們已經取得了地位和体面，他們为自己的成績而自豪。这一点，我們在波塔波夫厂长身上就已經看到了。党的报刊也一再抨击这种态度。在《党的生活》杂志中，以意味深长的标题《我和我們》发表的一封讀者来信里是这样說的：

“有些同志不管說些什么，人們总是很难得出他們在某个集体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印象……

首先，他們总是突出他們自己。从这种工作人員的嘴里，永远也听不到他們說，集体农庄里已經做了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他总要說：‘是我做的’——‘我能够做’——‘我要做。’当他談到集体农庄的計劃和打算时，他这样說：‘我能够做到’等等。”^[3]

这种人的第三个特质是，他們深信工作成績能够使他們可以提出权利的要求。这一点在詩体剧中表現得至为明显。索林卡直率无諱地說：“誰想說什么，可以說什么，不过，我們这些赢得了这一切的人，我們应得到荣誉和贊美”……

在苏联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例子。1960年9月，《文学报》发表了一篇匿名的讀者投书，为“小市民”声援辯护。（在苏联，“小市民”是指一切相信人应当有权享受舒适、取得产业并可以为此采取相应行动的人。）写信人攻击一篇反对私人資本主义倾向的文章，

他写道：

“請問編輯部，你們是否知道，这个‘小市民’，或者，更确切地说，千百万个‘小市民’曾經起来反抗过专制独裁，曾經挨过餓，曾經恢复了（在內战时期——作者）崩潰瓦解的經濟，完成了几个五年計劃，抵抗过匈奴（即德国人——作者）的入侵，完成了重建的任务——又肩負了发展工作的重担——但沒有得到足够的报酬。”〔4〕

这封充滿激情的讀者投书显示出非常鮮明的“小市民”的階級意識。

不属于党的机关的“新階級”成員的特质已經开列得相当完备，現在到了可以为这种人命名的时候了。在这里我們碰到了命名上的困难。

在社会学研究中，我們几乎一直在同运动着的現象打交道，同变动，在发展，往往不能独立存在，而是在同其他事物較量中才能存在的現象打交道——它有时过了一天就会消失，或者繼續存在于完全另外的一种形式之中。我們在研究革命知識分子时曾經遇到过这种困难：当时所关系到的是这样一群人，他們既包括普希金的默默无闻的叶甫根尼，也包括弗·伊·烏里揚諾夫—列宁，以及几十万象尼·謝·赫魯曉夫那种类型的天分非凡但却完全沒有文化的人。这群人的組成成份不断地在变动——有些人虽然說不上变得富有起来，但却过得安閑舒适，于是就脱离了革命知識分子之列，另外一些人則听天由命，仍然当他們的工人和小職員，他們只会为他們的家庭操心，另外有时候还有一些別的人也参加进来，等等。尽管如此，那些沒有生存手段的，因而起来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前后几达一百年的时期里，始終成为經常影响俄国政局的一支力量。当时我們克服了命名上的障碍，我們称之为沒有生存手段的知識分子，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們一方面受过教

育，另一方面在沙皇俄国又没有生存手段，我们还以此暗示：没有生存手段的知识分子的组成成份可以变动，政治上的作用则不能改变；个别人有了自己的生存手段，就脱离了这群人——但这个集团仍然存在。

没有生存手段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阶级，在1917年10月25日便宣告灭亡了。在那一天，他们全都有了“生存手段”，他们或者是成为正在形成中的“苏维埃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或者是被逐出政治生活之外，往往甚至被逐出国外。现在，我们的任务在于为他们的后继者寻找一个名字。其中的一部分已经确定了身份：他们是党务工作者，即职业的党干部，列宁的职业革命家的后继者。然而，构成“被阻滞的资产阶级”，即“未来的总经理”的后继者的主要部分的，在今天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首先是以他们的专业能力为基础，他们在工业、农业、商业、国家机关或军队中，但并不在党的机关里，执行着一种客观上需要的领导职能。

他们是工程师和工业企业的领导人、经理、职员、农艺师、商业企业领导人以及军官团。

其中不少人可能也是党员。但是——决定性的是一——他们所执行的职能并非要以共产党独裁、废除私有制为其先决条件不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是建筑在他们的党员资格上，而是建筑在他们的专业能力上。对于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来说，他仅仅是个党员还不够，他还必须会制造汽车。

在我们看来，技术知识分子和新知识分子这两个词似乎能够最准确地表现出实质内容。

“专家”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狭隘的，仅限于在其本行范围内活动的专门人员，而我们所要找的词却是能够用来称呼在政治上活跃的专家，即具有政治活动分子身份的专家。

所以，“知识分子”这个词是用来称呼我们所说的那个阶层所

不可缺少的，第一，因为它表现了社会发展的继承性：今天的知識分子是以前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后继者。第二，这个詞表明，它所說明的是腦力劳动者；最后，它也暗示对政权所抱有的敌对态度，在革命以前，“知識分子”这个詞也是专为持有批判思想的人們而保留的：忠实于沙皇的公務員即使极有教养、头脑聪明，也沒有被算为知識分子，而成为党的机关的一員以后，个人就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意見了。

就“技术的”或“新的”这两个形容詞而論，它們也各有短处。“技术知識分子”这个詞大体上相当于“經理”，是可取的，因为它易引起傳統的联想，而且，在俄文中它更具有階級名称的性质，而不是具有职业名称的性质。“新知識分子”也許最适合，但是同“新階級”太相似了，应当有严格的区分才是，而且还掩盖了这个事实：在我們所說的这一阶层中，技术知識分子們，經理們，不同于革命前的純知識分子，而是推动力。所以，我們想把新知識分子和技术知識分子当作同义詞使用：指新領導阶层的成員，党务工作者則不在此例。究竟使用哪一个詞，完全要看我們要強調的是这个阶层的統一性，或者如下这个事实：以前的“未来總經理們”已經成为真正的總經理，在这期間他們已經要解决新的問題和提出新的任务了。

人們也許会問，可否允許把“新知識分子”或“技术知識分子”这个詞扩大到这么大的一群人中去，这群人既包括軍隊的領導者也包括集体农庄的主席。首先，我們关心的是，反駁只有一个“新階級”的理論。我們的分类法絕不排除进行較細致分析的可能性，我們深信，在将来能够而且必須进行这种分析。

此外，还有一些考虑迫使我們只去观察苏联貴族內部的两个主要集团。首先有这种認識，就是最重要的分界綫是存在于一个輪廓鮮明的階級——党的机关——和其他苏联貴族之間，不論問

題牽涉到一個階級還是好幾個階級的集合體。足以為此作證的，有如下述：

第一，新知識分子的全體成員構成了一個有別於黨的機關的集團，因為他們全都是黨督促的對象，並且在這個意義上，構成一個整體。

足以為我們的決定辯護的第二個情況是，它的全部成員並不是在本質上同特定的共產黨獨裁相聯系，因此，他們全都同黨的機關有着根本的區別。

對於黨的機關，對於職業的黨務工作者來說，徹底實現共產主義綱領，而且是整個綱領，從廢除私有制到共產黨的世界統治，乃是他們的唯一目的。因為全部財產越是完整地掌握在國家手里，黨的機關可用以解決它的政治任務的資金就越多，共產黨統治越是分布得廣，共產主義思想最後獲勝的思想就似乎是更容易令人置信，黨務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就更加穩妥可靠。

然而，新知識分子首先是由專家組成的。對於他們來說，廢除私有制從一開始就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此舉雖然使他們有可能去建設大大小小的工廠，可是，就本質而論，這個階層同廢除私有制並沒有聯系，因為，如前所述，能干的專家在任何一个現代社會里都有用武之地。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理想一点也不適合他們的口味，這個理想不包括在他們的“社會存在”以內（例外的也許是軍人）。

最後，從開始以迄于今的俄國革命的社會史充分說明，我們把“蘇維埃貴族”暫時僅僅劃分為兩個階級：黨的機關和新或技術知識分子，是不致過於簡單化的。

更確切地說，列寧式的“新階級”分裂為兩個集團一節，在提出職業革命家的組織的學說時，亦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誕生之日就可以看得出來了，因為職業革命家和“被阻滯的資產階級”實際上

只有在否定現存秩序一点上是共同的，在終極目标方面就互不相同了。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新知識分子同革命家組織的分离，以及他們发展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

讀者大概还記得那两位曾經被列宁大加贊揚的工程师，他們在1917年9月，即在革命的前夜，就已决定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工程师联盟”，去“保护工人的利益，并同工人組織完全一致地进行工作”。

这两个工程师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他們只是表示听从調度。

七年以后，这种局面完全改观。工业化計劃还没有着手进行，就已經有了胆怯的尝试，蓄意破坏写在革命大旗上的平等原則。卢·費舍尔曾这样写道：

“工程师們在提出增薪的要求时，把自己与欧洲野牛相比——甚至沙皇也把这个品种硕果仅存的几个标本放到自然保护公园中去保护。对于这种罕有的动物尚且如此关怀，那么，对于同样稀罕的有毕业证书的工程师为什么不优待呢？”〔5〕

那是1924年的事情。又过了七年，工程师們用不着把自己比作欧洲野牛，他們能够证明，人家应当給他們較高的收入。1931年1月4日，斯大林做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把俄国的历史說成是一連串的灾难。同时，他不仅提出了“要赶上去”的要求，还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个口号使技术知識分子的地位根本改变了。

五个月以后，1931年6月，斯大林在一次經濟工作人員的會議上列举了“获胜的六个条件”：

1. 强行調动劳动力，禁止变动工作崗位。
2. 对于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給予有差别的报酬（取消“平均主义”）。

3. 企业领导或車間主任对于他所受托的工作要亲自負起責任来。

4. 造就新的技术知識界。

5. 更多地关注和信任旧技术知識界。

6. 施行并巩固經濟核算制,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6〕

随着这些“获胜条件”的出現,技术知識分子就被承认为一个特殊的階級,不管他們是新专家还是旧专家。

反对平均原則的斗争,特别是反对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的斗争后来进行得越来越广泛。政治领导方面設法用更大的荣誉来表揚工作成績。于是,一些离奇古怪的現象就出現了;

在三十年代中叶,在苏联出現了 знатный человек 的概念。знатный 这个形容詞的含义介乎“著名”和“高貴”之間;然而,这个字如果当名詞使用时,只能翻譯成“貴族”。человек 是“人”的意思。因此,знатный человек 就是一个知名的、著名的、高貴的人。

后来出現了一整套制服、級別和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在提到有关人的时候,在他的名字之前先冠以全部头衔,則早已相沿成风。在四十年代里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信封上是这样写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功勋科学家、三次勛章获得者、內河航运二級总工程师某某同志。”

技术知識分子的真正代表更重視的却是現金报酬。

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1903—1950年)曾任国家計劃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員,是技术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1946年关于战后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报告中,是这样說明工資和薪給政策的原則的:

“为了提高工資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完成国家計劃的意义,有必要改善工人报酬的累进計件工資制的运用方法,以及工程师和技术人員完成和超額完成生产計劃的奖金制度的运用方法,办

法是从根本上提高奖金在工資中所占的比重。”〔7〕

在考察之前应当先提一下：这就是承认个人有权取得同他的可以金錢来表示的成績相称的現金报酬，而这却是以前所未达到过的高峰——于今，这已是将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后来，这个政策虽然仍然繼續施行，但并不占重要地位，而近年来——由于公布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綱領——甚至有了重大的改变。（參見《斯大林的最后灼見：回到馬克思那里去——未来的兵营》一章。）

随着時間的推移，“获胜的六个条件”中的第三条和第六条已經演变成一个正式的技术知識分子綱領。

無論过去和現在，这实际上首先关系到生产領導人为扩大他們在企业中的权力的斗争。（具体地說，这关系到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考虑来支配企业中的物資，任用、解雇劳动力并支付报酬，可以接受第三方面的定貨单，向第三方面发出定貨单，在企业中积累所获利潤的要求。）

其次，無論过去和現在，这都关系到一場力求承认利潤是衡量經濟成就的唯一尺度的斗争。

斯大林早在 1931 年就談到必須“巩固企业領導对于他所受托的工作亲自負責的原則”和“經濟核算制”，这首先意味着，他及时地看到技术知識分子的上述要求。在三十年以后，这些要求还談不到已經实现。然而，使我們感兴趣的不是解决，而是問題本身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早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經清晰可見。

人們应当經常考虑到，苏联的經濟制度整个是建立在分派原則上的。这就是說，每一个厂长應該生产什么，使用何种机器生产，为了这个或那个目的可以花多少錢，上面都已明确規定好了。而所有这些指示都制訂在計劃之中，而且具有“法律”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这样的問題：厂长是否有权把預定用来作經常修理用的經費（举例而言），改而用作对某一机器的大检

修。认真地說，这样作就是违法行为，就是犯罪。虽然如此，在实践中还是一再发生这种事情。

据戴維·格拉尼克所述，因此，在三十年代里，厂长們就已經常常发表这样的見解：“每一个精明能干的企业領導人都必須准备为了使用国家公款于規定以外的其他用途而亲自負責……只有庸碌无能的領導人才始終不渝地按照他所应当遵守的法律規章去办事。”〔8〕

这种态度所显示的首先是，苏联的工业領導者常常被迫而不得不犯法，就是說，他們經常处在牢獄和荣誉之間。

第二，这里所关系到的是第一个——但，远远不是最后一个——证据，說明在苏維埃制度下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占有关系之間的最重要矛盾：从尽可能完善的生产的观点出发，生产者应当支配資金，而实际上資金却屬国家所有。

在三十年代期間使企业領導人苦恼的問題，在二十年以后也仍然是令他們担忧的問題。在五十年代中叶，他們也是为了同样的权力而斗争，大概当时走得最远的要算莫斯科“橡胶”工厂厂长伊·曼維洛夫，他于1955年8月在《真理报》上写道：

“早就應該把各企业从多余的龐大的結算工作中解放出来……在我們看来，对于企业只应当規定为数有限的基本指数标准：生产計劃、成本的降低、劳动生产率、工資总额。必須在这些标准的范围内給企业領導人以計劃开支、分配劳动力、确定工資……以及实现真正的經濟核算制的权力。”〔9〕

然而，又过去了好几年，到了1961年时，《共产党人》在一篇总结某次經濟专家討論会的成果的編輯部文章里不得不证实，到那时为止，我們所描述的那些紧张状况并没有消除。

技术知識分子的一位杰出代表，莫斯科汽車制造厂的总厂长阿·克雷洛夫这样說：

“监督工作不要做得太过分，以致一个有权生产价值几十万卢布机器的工厂，在用企业的资金去买一架小型工作母机时都要取得国家银行的同意。……”（因为投资是国家所有，而不是工厂所有。）

或者：“国家把好几亿卢布，甚至好几十亿卢布的资財都可以信得过某些大企业，但是，它们的厂长用一百个卢布都不能自行决定，都必须同一系列机关进行冗长的，往往是不必要的交涉。”

厂长在决定工资方面应当有较大的权力，这个要求被特别着重地提了出来。

文章里这样说：

“尽管一个人聪明过人，尽管他已证明自己是最有天才，最有办法和最能干的人，可是一个企业的厂长却不能给他确定（比上面所规定的）更高的工资。”

这里所讨论到的恰恰是苏维埃政权对工厂经理（！）的信任问题。

“现在已经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第四十四年，对于一个持有高等学校毕业文凭并富有生产和党工作经验的厂长，我们应当给予更多的信任。”^[10]

归根结底，苏联的经济干部显然希望有权“象私人资本家那样”工作。他们希望，经济上的成功以可用金钱表示的盈亏对照表来衡量，并成为评价他们的工作，即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的唯一标准尺度，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当放手让他们去干。他们希望有市场经济。

这种倾向在农业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得最明显，因为集体农庄在表面上有权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经营。例如，奥维奇金笔下的集体农庄主席奥漂金，即“阔佬杰米扬”（作者把他写成是一个“真正有天才”的经济学家），曾经作了一个有利于巧妙的市场经济

的报告：

“‘錯路’这个詞就是金科玉律。我們要懂得花錢，要使花出去的一个卢布在經過一段时期以后回到集体农庄时不再是一个卢布，而是三个卢布，甚至是五个卢布……”

我們甚至做过扫帚的买卖……什么东西对农庄都有好处。只要种大麻吃得开，我們也可以靠大麻收入一百万（！），我們也可以做罌粟、做洋葱头、做馬合烟的买卖……

能够增加集体农庄收入的，什么都有用。可是，要是让这些东
西迷了窍，——哎，但願不致如此……要是明天所有集体农庄都改
种罌粟呢？城市里的家庭主婦們就会不高兴了，如果市場上只有
罌粟可买，那你的算盘就落空了。不行，我們不能这样做。要是你
今天偶然做了一笔买卖，赚了大錢，那就把这笔錢投資在絕不会破
产的部門里……”〔11〕

在属于国家所有制的工业里，这种思想表現得沒有那么露
骨——不过苏联的工业領導者們正在明明白白地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我們已經熟悉莫斯科汽車制造厂厂长阿·克雷洛夫的要求，
他主张把企业厂长們从监督下解放出来。他在那次討論中极力申
辯，成功的尺度其实不是計劃，而应当是利潤；

“在我国，計劃都被完成和超額完成了，这就证明了一点：国家
确实拥有为完成計劃所需的物质資源。全部問題在于，以什么代
价来求得計劃的完成。”

莫斯科經濟理論家 A·比尔曼在論述到同样問題时宣称，并
不是完成計劃都是好的。有时候，厂房提前建成了，而机器却还没
有到。或者机器提前造好了，而厂房还没有动工兴建。这两种情
况都会引起資金的冻结。〔12〕

在 1962 年底以前，在要求扩大工业領導者的权力方面走得最
远的要算哈尔科夫工学院教授、經濟学博士利別尔曼，他在 1962

年9月9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他建议改变整个计划制度并且“明确规定，各企业的计划……在它们关于产量和品种方面的指标经过决定和（上级机关——作者）批准以后，完全由企业自行编制。”〔13〕

换句话说，按照利别尔曼的意见，上级机关不应当再有干涉生产过程的权力。

利别尔曼的第二个轰动一时的建议是，切实实行工厂职工和工厂领导分享利润的做法，奖金不应当取决于完成计划，而应当取决于利润。

我们还要再次确认，这些建议是很可以采纳的——虽然这里必然牵涉到对待经济的“资本主义式”处理方法。然而，这个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既然明白地有利可图，苏联领导为什么不能——在保持国家所有制或合作社所有制和某种计划框框的情况下——同意向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过渡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暂时进入共产主义理论的领域中去探访一下。

马克思把他的主要著作定名为《资本论》，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资本家》。这是颇有道理的，因为他首先研究了资本和商品的流通，以及按照 $G-W-G'$ 公式，资本变为商品，商品又变为资本的过程。根据对商品和资本流通的分析，他得出如下著名的论断：

“……资本不是任何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表现于一物上，给此物一种特殊的社会的性质。”〔14〕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按照马克思看来，只是资本主义的），仅就其与劳动分工有关方面而论，是被商品和资本流通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说，这只是他那个有名的原则的具体化而已，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劳动分工、生产关系上的变化，因为工业生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劳动分工）是以市场、以为

銷售而不是为了自身消費而制造的产品，即商品的制造为基础的，也就是說，它决定于資本和商品的流通。

因此，一切“社会生产关系”，凡是以金錢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都必须称之为資本主义，虽然，在这里重要的是商品生产，而不是所有制的关系。在馬克思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現象”，只是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在法律上的表現”而已。

对于这个資本主义定义，人們簡直是无懈可击，因为在我們的社会里（仅就取决于經濟功績那些現象而言），人們除了支付一定的代价以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得到任何东西。而且，买主也时有不同：个人、一个社会、国家，特别是它的个别机构。购买的对象也可以各有不同：一把牙刷、一台軋床、一支月球火箭、一座政府机关等等——尤其是，付款的形式更加不同（現金、股票的购买、納稅等等）。但是，在各种情形之中，有关的对象只能付錢才能取得。我們也可以在原則上，就各种情形來說——仍沿用上述例子——一把牙刷、一支火箭或一座政府机关要值多少錢，而要用的錢如果沒有，那么就沒有牙刷、沒有軋床、沒有月球火箭、沒有政府机关。

再者，以下一点也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入門范围以內的常識：資本主义始于商品流通，終于这一流通的被排除，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知識，由于商品生产，由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迟或早总要产生相应的，亦即資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思想象一条紅綫似地貫穿整个馬克思学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特別詳尽地討論过它，弗·伊·烏里揚諾夫——列宁不只一次地強調說，共产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洛希尔，而是街角的补鞋匠或卖牛奶的妇女。列宁这样写道：

“小生产是經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①〔15〕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在另一篇論文里，他說：

“……商品生产产生資本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图景，我們不应当忘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者)的基础。”^[16]

因此，列宁明确地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不仅在于废除私有制(这里指对土地的私有制)，还在于消灭商品生产，即消灭为銷售目的而进行的生产。他在1908年写道：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者)就是消灭商品經濟。而国有化只是把土地变为国家所有，这絲毫也不触动土地的私人經營……只要仍然有交换(指商品交换，不是指生产交换——作者)，那談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①[17]}

誠然，共产党人迄今为止还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真正做到把商品流通排除掉。但是，在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曾正式強調过，这种容忍是由于环境所逼，“商品經濟的消灭”一向是共产主义的任务，在新的“苏共党綱”(1961年)里不容誤解地說：

“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經濟上就将过时和消亡。”^[18]

苏維埃政权的經驗完全证实了“商品生产产生資本主义”的思想。

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市場經濟也可以自发地生长出資本主义，这一点有一位苏联养老金領取者描写得相当深刻动人，他在退休后种点菜园子，可是突然发现发财致富……的“危險”正在威胁着他。于是，他，看来象是个信仰坚决的共产党员于1961年9月在致《苏維埃乌克兰》报的讀者来信中写道：

“看样子，如果我仍然随我的喜好繼續种我的东西，掙我的錢，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就成为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寄生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虫^①了……。”[19]

从这个老头子开始按照市場法則所确定的价錢——自由价格在苏联是很高，因为什么都缺——出售他的苹果和高苣头以来，他所积攒的錢越来越多，以致成为一笔巨款，使他有可能得到不劳而获的收入。

这种“贏利的連鎖反应”，我們从米哈尔科夫的詩体剧，以及关于齐卡耶夫的报道中已經相当熟悉了。如果一个人不是一个十分狂热的共产党人的話，收入的增加必然要引起这样一个——已經純粹政治的——要求：使私营活动的积极性合法化，首先是使私人有权雇佣別人（按照共产主义概念就是“人剝削人”，就是純粹資本主义）。苏联方面的資料也证实了这种傾向。瓦連金·奧維奇金曾經写到一位退职的后备役大尉卡尔梅科夫在談到农业时插了一句：

“‘把你們这儿长滿了杂草的休閑地分給农民吧；每一个人能种多少就分給多少！让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腰包去拼命吧！如果随我的意，那么，一开头，我就要种他一百公頃。’

“‘在斯摩棱斯克区大概有你父亲的田地吧，大尉？’

“‘那是我的田地！’

“大尉把他的背囊放在膝盖上，从里面掏出几块金表、一个金香烟盒、胸飾針和手釧来，随手擱在桌面上。

“‘瞧，这些东西。……起个头，这就够了吧？’他説着，嘻嘻地笑开了。”

有人問这些值錢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道：

“这是光明正大的战利品……是我从被我亲手杀死的法西斯分子（这是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德国人的通称——作者）身

^① 所謂“寄生虫”，現在在苏联系指凡不在社会主义部門中工作而另有收入的人，即使他們并没有任何不法行为。

上繳获来的……”

卡尔梅科夫大尉十分坚决地维护他的私人资本主义野心，他不仅要求有权利“为自己的腰包”而耕耘土地。他还要求雇佣外来的劳动力，按照共产主义的概念去“剥削”别人。

在场的一位集体农庄女庄员说：

“这样值钱的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弄到手的。我该怎么开头做呢？我连一头母牛都没有……”于是，他答道：

“那么，你到我这里来。我一定会帮助你发财。不仅仅是你，还有好几个象你这样的人！只要是能干的庄稼人，谁也不会倒霉！”

这个发了洋财的小强盗表现出的却是一种近乎清教徒似的严谨作风，他心底里的愿望只是把掠夺来的财富用来投资：

“要是能够把这一切都变成一个庄园，那够多好！要钱有什么用呢！钱，要喝酒，要玩起来才有用……”①〔20〕

“公开的”资本主义有时也以团体的形式出现：1960年夏，《消息报》报道说，里加市有一些负责干部，在拉脱维亚部长会议最高法官参加下，成立了一个营造私人别墅的正规化公司，该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由别墅营造合作社社员建造的建筑物均为私人财产。”而第二十二条则规定，合作社领导“可以雇佣和解雇工人和职员，同时可以在由全体会议制定的工资基金范围内确定他们的工资”等等。〔21〕

当然，“公开的”资本主义对于制度并不很危险，因为，党的机关很容易识别它，并且可以公开地扫除它。

而另外一种现象，人们称之为秘密资本主义，却对共产主义制

① 事有凑巧，正好是一个以前的军官发表了这种见解，这就证实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就是，技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来看，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其中也包括会作战的专门人才。

度具有更大的危險性。对于这种現象，我們必須作更細致的研究。

据我所知，曾經最先描写过这一現象的著者是苏联駐墨西哥商务参贊基里尔·阿列克謝耶夫。他在1949年12月在美国的《实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写到了一家金属粉末工厂，这个工厂也正式算是一个正規化的苏联企业，附属于一个主管的托拉斯，并按照国家計劃进行工作。

然而，計劃所規定的生产只占实际的3%（1），有2%是为了超額完成計劃而規定的，其余的95%則是為黑市而进行的。

这就为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带来了巨額的利潤：

“当在工业里的平均收入还很少超过五百卢布的时候，而主要的参与者的每月收入却很少有低于七千卢布的。”

这个企业生意兴隆地經營了好几年，战争期間才关了門，从来没有“被揭发过”。

阿列克謝耶夫对此評論說：

“我只不过是举一个典型私人工厂企业的例子，从每一个經濟部門中，如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工业設計、建筑业、研究机构、集体农业，都会产生許多这样的例子。”〔22〕

这种“秘密資本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現象和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腐敗墮落。它所以产生是由于苏联的正式国家計劃——从各个独立的企业的角度来看——簡直可以說是从来不曾搞好过。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最常出現的却是，交貨的工厂未能完成計劃。据1955年5月《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例如，“1954年，（在斯維尔德洛夫斯克工业区）有三分之一企业沒有完成国家的任务……近年来，建筑企业沒有一次完成年度計劃。”〔23〕

1962年6月，《共产党人》杂志报道說，在烏里揚諾夫斯克州，“在二百七十一个企业中……有七十三个連續四个月沒有完成总生产計劃。”①〔24〕

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会妨碍生产的按计划进行：如上所述，从一个工厂的立场来看，提前交货是一种英雄行为，然而，却打乱了别的工厂的工作。顾客也可能改变了愿望。工厂也可能接到上级机关的指示，改变计划，等等。

因此，任何一个苏联企业的领导人常常会被迫决定，要么就不完成计划，要么寻求“自救”的办法，即利用“秘密资本主义”，工业的黑市。^②在第一种情形下，他虽然可以不受惩罚，但是，他不久就会“因为证明为无能”而丢掉他的职位，因为他的任务到底不是去发表站不住的理由来为完不成计划而辩护。

如果他求助于黑市，那么，他就自动地纳入黑市生产，因为除此而外，他无法支付黑市价格。阿列克谢耶夫也谈到了这一点：

“我曾在一个工厂里领导过一个部门。这个工厂如果等待政府的铁钉，那么我们就势必停工不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铁钉总是缺货……幸而我们的厂长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同铁钉有联系，他的铁钉正好是我们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得到的。我们用一车皮的铁皮换进一车皮的铁钉，因为我们为了稳妥起见曾经比我们所需要的多要了一些……那两位给我们送钉子的先生们，自己要了铁皮也没有用，可是，莫斯科近郊有一个集体农庄却等着铁皮用，它就用最受欢迎、最有利可图的货物——农产品来支付。

这种以货易货的贸易，每做一笔，总要有一小笔款子失落。为了对这种非法的贸易的扩大程度有一个概念起见，人们只消用上述那些错综复杂的交易每月乘以十万就得。”^[25]

① 为了避免误会起见，应当说明一下，这里所谈的不是一般地完不成计划的情况，而是个别的指标没有达到。这种情况恰恰就是问题的癥结所在，因为，当一个工厂在等着铁钉用的时候，它即使知道交货的那个工厂在制造螺丝钉方面大大超额完成计划，也不会感到欣慰。

② 关于苏联工厂厂长情况的分析，请参见克劳司·梅纳特著：《苏维埃人剖视》第133页及以下几页（斯图加特1958年版）。

“秘密資本主义”的全部流通額，亦即非法生产和黑市貿易的流通額，即使要求得近似值，也无法估計。那些以死刑告終的著名的侵吞公款案件所牽涉到的款項都在十万至一千三百万馬克（換算的）之間。（參見本書第 236—237 頁。）但是，侵吞公款不是“秘密資本主义”的最重要形式；更重要得多的是各种形式的“机关协助”，旨在帮助事务上有来往的朋友——当然不是无私的——完成計劃的非法交易，以及各种形式的行賄，如送礼、“服务”（例如修造私人住房借給挖土机）、支付“黑工資”等。这种买卖的規模究竟有多大，簡直难以估計。無論如何，“秘密資本主义”体现着一种非常現象，对它無論估計得怎样高都不为过。为了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就要經常牢牢記住：“秘密資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个人想发财致富，而是在于生产領導者努力要使官方的生产得以进行，而要这样做，不納入“秘密資本主义”是不行的。这个現象对于制度的危險就恰恰在于此：它是无法根絕的，因为它是少了不行的。一个生产領導人为了使官方的生产得以进行而违反了苏联法律，然后又私下貪污了几千卢布，这已經不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即使个人发财致富的願望处于第二位（人們首先得在生产中站得住，才能談到自己发财致富），然而，这种願望却是一个頗为重要的因素，因为起重大作用的千百万人都有这种願望。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生产領導人向市場經濟过渡的要求，即使“秘密資本主义”合法化的要求，成为最大的政治問題。这个要求既淵源于物质状况，使經濟領導工作适应于生产和消費的需求的必要性，也淵源于那些領導生产的人（他們也被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看待）的需求。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可以得出几个結論：

我們已經确认現代共产主义为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因为，实际上，共产党独裁在各种“典范的”事例中都沒有着手进行“后期資

本主义”对人剥削人现象的那种消除，而是进行了“前期资本主义”那种资本原始积累。

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是一个永无了结的过程。有朝一日，这个——原始的——资本积累了，投资也投过了，于是，为市场，为销售的生产就可以开始。接踵而来的就是从早期资本主义向完全资本主义的过渡。

在划分早期资本主义和完全资本主义的分界线方面，共产党理论家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他们具体地确定了什么时候是资本主义的开始。在1956年出版的半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充分发展的——作者）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劳动力也成为商品。随着劳动力也变成商品，生产具有普遍的性质。”①〔26〕

我们对这个完全资本主义的定义一点也不反对，我们只需要引出如下的结论：苏联工业领导人和经济领导人——以及象卡尔梅科夫那样的小强盗——渴望有权自行雇佣、辞退劳动力并支付他们的报酬的要求，也就是等于把劳动力变为商品的要求，即从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向（真正的）完全资本主义过渡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共产党独裁在执行其早期资本主义职能的同时——亦即在保证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同时，就创造出一些由于其自身处境而“希望”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势力。因而它所生产的，“首先是它自己的掘墓人”。

可是还不仅如此。

我们在分析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时一再遇到他们对权利的申辩。这种申辩从索林卡的话中已经可以听得出来，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我們这些人已經取得……(过美好生活的，維護我們的財產的)权利。”在索弗洛諾夫的《莫斯科性格》里，厂长波塔波夫的話就更加明显：“紡織厂为什么干涉我那个工厂的工作？……誰給了他們这个权力？”

这种渴望有固定法律准則的要求，首先产生自技术知識分子力求一絲不苟地执行他們的职能的努力(而不是，似乎产生于力求保护个人安全的努力，这种努力固然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上却是居于第二位)。为了能够很好地进行工作，他們首先需要免受来自第三方面的无法預計的干涉。

当然也应当指出，恰恰在这个方面簡直什么也沒有做过。多年来，苏联的专业刊物虽然也在談論厂长的权力和职责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的必要性——这种討論的高潮大概是在1955—1956年，然而，《共产党人》杂志在1961年夏天总结上面已提到过的那次經濟学家討論会的文章里，却不得不确认：

“……現在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时候了……首先应当制定工业基层单位即工业企业的法規。給师傅們、車間主任們和厂长們以一定范围的权限（他們的职责早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而最重要的就是，为使权力和职责絕對受到尊重而創造有利条件——那么，这就等于在消除工业的現存弊病方面迈出了一大步……”[27]

渴望有权力和有一个法治国家的要求，也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这种要求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出現，而是——特別是在一次社会革命过程中——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出現，它宣告革命的发展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阶段。

欧金·罗森斯托克—胡埃西在研究欧洲各国的革命时，获致如下的見解：

“在革命期間起作用的就是这样一句名言：La possession vaut

titre, 即财产代替了所有权证书。革命的目的就是为新业主取得所有权证书。”〔28〕

我們在苏联已經很清楚地看到新业主十分明确地要求取得所有权证书。我們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俄国革命已經接近尾声。或者至少可以說，在苏維埃社会中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希望結束这场“不断的革命”，而为了自己，作为新业主的他們却要求享有一种經過文件予以肯定的财产权。这不啻是共产主义的死亡。

来自下面的压力

在很多地方，人们不言而喻地认为，在共产党独裁的条件下领导机构掌有绝对权力。这种看法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苏维埃制度同法治国家完全是两回事，共产党理论家所吹嘘的恰恰是这个。“专政”这个概念也可以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就是指共产党统治。列宁关于“专政的定义”是这样说的：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是这个意思……”〔1〕

然而，这个定义所涉及的是行使权力的方式，而不是权力的规模——这是往往被忽略的，因为，定义中作为独裁的必要标志来强调的，是依附于这个制度的专横独断，而不是独裁不受约束这一状况。

由此可见，归根结底，独裁只可以设想为独夫统治，因为专横的决定只能由一个人作出。此外，还可以看出，在独裁的条件下，除独裁者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处在“下面”的，仅仅是独裁者采取行动的对象。所以，违反独裁者的意志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说是来自下面的压力，因为这些行为强迫独裁者采取这种或那种反措施。

这种解释也许失之过广，然而，它却是我们唯一可以用作立论的可靠依据。我们所亟欲阐明的是共产党独裁的决策过程，我们在考察区党委第一书记马尔登诺夫决定为什么不提高以闾佬杰米扬为首的“苏维埃政权”集体农庄的交售定额时，必需跟考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为什么决定枪毙国

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苏联經濟巨頭當中的佼佼者，尼·A·沃茲涅先斯基一樣，採取同一方式。

對“專政”這個概念的考察有助於使我們認識，來自下面的壓力，如同專橫獨斷一樣，也是獨裁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之一。

首先，每一個領袖的權力有時會受到天然的限制。他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這就迫使他把一部分決定委託給他的合作者。要做這些決定無論如何都必需具備專業知識。因此，他需要依靠顧問。他還必需考慮到不屬於他權限以內的因素，如其他國家的態度、實際可能性、自然界的影響，以及許多其他因素。

僅僅這些情況就已使他隨意作出決定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首先，每一個獨裁者都要依靠自己的黨羽，在這裡各種各樣的因素就開始發生錯綜複雜的作用，我們將就其與蘇維埃制度有關的部分加以考察。

在共產黨獨裁——以及其他一切獨裁——統治下，來自下面的壓力有三種形式表現得特別明顯：

- (1) 各種問題的壓力
- (2) 來自官方途徑(黨內民主)的壓力
- (3) “無形的團體”的壓力

各種問題的壓力，只要簡單地指出下面一點就很容易理解：即使是最強有力的獨裁者也要治理一個國家。為此，他有些具體的任務需要解決，即設法使經濟生活得以進行，建立一支健全的軍隊，使國家收入、國民教育、衛生事業、城市建設、行政管理等等都能切合需要，正確地發展同其他國家的交往，等等。

由此可見，即使是一個表面上毫無權利的罪犯——作為一個統計數量——對於一個“大獨裁者”也能施加壓力：因為，他要是死了，那麼，這位“大獨裁者”就沒有可以用來實現他的計劃的奴隸。所以，他得給他保留一塊麵包。

那种可以最恰当地称之为“抉择上的强制”的现象，就是这样易于为人们觉察，它所指的这种情况是：一种从独裁的观点看来抉择要比作出有关决定更糟。

这种抉择上的强制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物质性的。有时出现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一定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就是不良的，如冒险发动战争、使用恐怖手段、对国内或国外敌人让步，等等）的取舍不管政治制度的崩溃。尽管作了种种考虑，决定还是要采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物质后备和人力后备都是有限的，而采取一定措施的决定必然意味着放弃其他措施，或者，反之亦然。

属于有关政府权力范围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例如，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对尼·谢·赫鲁晓夫施加相当严厉的压力，虽然美国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没有代表。考虑美国态度以后所作的抉择，可能意味着莫斯科上空会落下一阵密如雨点的炸弹。

最后，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也属于这一类，这种抵抗在苏维埃的权力范围内确实存在着，它是我们以后要加以研究的。考虑到它而采取的抉择，就会意味着一场叛乱、一次起义，或甚至是一场内战。

各种问题的压力，即抉择上的强制，是人们在分析任何一个政府的政策时所必需首先予以研究的因素，而且，它也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可靠的线索，因为，各种问题的演变多半总是比人们的态度更易于预先估计，而可能得出的解决方案通常不会为数很多。

当然，在作实际分析时，重要的乃是发现可能得出的解决方案中究竟何者更稳妥一些，这时研究一下作出决定的是谁，用什么方式和根据什么原则这样做，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为此，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来自官方途径的压力。

在苏联，权力操纵在党的机关的手里，我们已经看到，在党的机关内部起主导作用的是党务工作者。（参见本书第 31 页及以下

几頁。)然而,这样問題仍未彻底探討明白,因为“党”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現象,不能简单地归結为党的机关。

1961年10月1日,苏联共产党共有党员九百七十万人,而全国的总人口超过二亿一千二百万人,其中有职业的在一亿人以上。^[2]因此,参加苏联共产党的,大約只占有职业的人口的10%左右。

苏联共产党是建立在所謂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这就是說,领导机关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但是,上級机关的決議下級机关必須服从。

根据党章,“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性首先在于,党员有权参加领导机构的选举。此外,每一个党员还有权“在党的會議、代表會議、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會議上和在党的报刊上自由地討論关于党的政策和实际活动的問題,提出建議,在組織通过決議以前公开发表并坚持自己的意見”。^[3]

各个組織中的选举和決議都是依据多数原則进行的。

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集中的因素:党员只能够“在組織通过決議以前”发表自己的意見。党組織做出決議后,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接受它,凡是为自己的意見寻求追随者的,都是从事“派別活动”。根据党章,“派別集团活动的任何表現都是……同留在党内不相容的。”^[4]

集中的因素还表現在上級机关有权撤銷“下級”机关的任何決議,因为,無論根据現行党章第十九条或布尔什維克的傳統,上級机关的決議下級机关都必须服从。

此外,党的机关在組織上可以随时抛弃全部“党内民主”;各个党組織的主管書記都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曉夫),他們构成党的机关的核心。他們对党内民主实行监督,首先是对选举实行监督,他們非常认真对待这个任务:每次选举,

每一个組織的大部分例行常会，都要有直接上級机关派人参加，这些人几乎都是职业的党务工作者，遇有必要时，他就进行干預。

因此，在实际上，党内民主受到以下五点的約束：

第一，党员发表意見的权利，一当作出決議时，即行消失；

第二，即使人数相当多的少数派也没有可能自己組織起来，使他們的意見为多数派所了解；

第三，在选派代表出席代表會議时；

第四，在代表會議选举领导人时；

第五，在委员会和其执行机构即常务委员会中表决时。

从表面上看，人們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党内处在“下面”的人們根本没有发表他們意見的可能性。然而，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在有些就其“本身”而言属于党的机关的范围内，如在人事政策和政治路綫的制訂等方面，“下面”、“群众”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认真細致地考察一下 1962 年年底以前的苏共組織結構，我們就会恰如其份地領会“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含义。

苏联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至 1962 年 11 月为止，都是以地区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当然有些地方也不尽然（军队和保安机关中的党組織等，就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党阶梯的最下一級构成党的基层組織，通常包括一个企业、一个政府机关、一个集体农庄等的党员。基层以上的党的机关則同行政区划单位相一致，它主管与此相应的地区。

基层組織选举本組織的書記，如果組織較大，則选举支委会。这种下級党领导人总数約达一百八十万人左右。

这一百八十万人左右基本上可以視为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因素，因为他們同普通党员和非党员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 1962 年年底以前，构成上級机构的是地区党組織——从地区一直到加盟共和国——的委员会。1961 年，参加这些委员会的

人共有三万零六千人，他們通常在党、国家、經濟部門、軍隊、保安机关和其他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

各委员会内部的力量对比最好是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例去观察，它的組成情况是可以相当精确地经过分析而得出的。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的图表：

二十二大(1961年)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組成情况

	委 員		候补委員①		总 計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党务工作者②	92	52.6	68	43.9	160	48.5
工会工作者	4	2.3	1	0.6	5	1.5
保安机关	2	1.1	1	0.6	3	0.9
外交工作	11	6.3	4	2.6	15	4.6
政治国家机关③	17	9.7	22	14.2	39	11.8
专业国家机关④	25	14.3	27	17.4	52	15.8
軍人	13	7.4	18	11.6	31	9.4
企业领导人⑤	4	2.3	5	3.2	9	2.7
知識分子⑥	4	2.3	6	3.9	10	3.0
“群众”⑦	3	1.7	3	2.0	6	1.8
总 計	175	100.0	155	100.0	330	100.0

① 据党章第三十八条，候补中央委員只有发言权。

② 包括共青团干部、新聞工作者、理論家、政治团体领导人。

③ 各苏維埃、部长會議的主席和副主席。

④ 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表面上是一个专业部长，根据她的职能，現把她列入党务工作者之中。

⑤ “企业领导人”中計有五个工厂厂长，一个大工厂的車間主任，两个集体农庄主席、一个国营农場場长。

⑥ 指作家和科学家。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阿列克西·苏尔科夫参加了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他們的角色大概是充当自上而下的“耳目”，他們并不代表任何組織、财政上独立，作为作家同各阶层人士都有接触。关于“最下层”的状况，党领导通过这些入可以得到——如果他們需要的話——一个真正未加粉飾的、未因“本位利益”而被歪曲过的形象。

⑦ 代表“群众”的是工厂中的“工长”(四人，相当于师傅)和集体农庄的生产队长(两人)。

如果以社会集团而不是以职业集团为依据，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基本政治力量对比作一分析，把图表简化，也是适用的。我们可以根据政治界限来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表示如下：

	中央委員 %	中央候补委員 %	總計 %
党的机关①	62.3	47.7	55.5
新知識分子②	36.0	50.3	42.7
“群众”	1.7	2.0	1.8
總計	100.0	100.0	100.0

① 党务工作者、共青团领导人、新聞工作者、理論家、政治团体领导人、工会工作者、保安机关和外交工作干部均包括在內。

② 所有专家，即国家政治和經濟的机关、軍人、企业领导人、知識分子均包括在內。

这份关于苏联共产党的最重要机构的组成情况的数字材料相当清楚地表明，我們所面临的是党的机关的地道的阶级独裁。这个阶级的成员拥有中央委员会中有表决权的票数的62.3%，以及全部票数的55.5%，即占绝大多数。同时，我們至少有十几个象“苏联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这样的人沒有考虑在內！他們由于长期充任党务工作者而被安置在国家机关的职位上。因此，要作出违反党的机关的共同意志的决定，是絕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低估技术知識分子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影响，也是錯誤的：他們的成员虽然只占有表决权的票数中的36%，但是他們的意見，党的机关即使不予以采納，也需要予以考虑。他們是各加盟共和国的部长會議主席、苏联和各共和国的部长、各委员会（科学研究工作协调、自动化等等）的领导人、科学院院长等等。

由于他們所处的地位，他們既代表他們屬下的人发言，也代表——甚至更多地——他們权力范围内的情况发言，而誰要是忽視了这些情况的話，誰就会吃苦头的。他們握有对他們有利的重

要論据：事实、統計数字、科学研究成果，当党的机关在这个或那个問題上意見不一致时，他們的意見就总有占上风的时候。

可是，“群众代表”却不能构成一个“派別”，很难表现为有力的因素。暫且不說，他們是精选的党员，他們不会表现出反对“党”的路綫的兴趣，而且，他們如果要使他們的意見为人們所听取，他們首先必須在党的机关或技术知識分子成員当中找到許多志同道合的人。同样，他們充其量不过是最高领导的“耳目”而已。

基层单位的领导人員由直接选举产生，上級领导机关——委员会——的成員則在区和州的代表會議、各共和国的代表大会或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由代表們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党的执行机构即常务委员会的成員，則由各委员会内部选出。（最高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 1952 年改名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党代表會議代表或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数約在一百五十人至五千人之間，委员会委員約在四十人至三百三十人之間，常务委员会委員則在五人至十三人之間。

大体上，委员会相当于間接选举产生的議會，但是，絕不能忘記，那純粹是党的議會，而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至于就它們同党的直接上級机关的关系而論，常务委员会可以比作国家权力机关。

常务委员会有委員五人至十三人，是由委员会内部选举产生的。

它們的数目大約可以根据苏联的行政結構的数字材料算得出来。

1961 年 10 月 1 日时，在苏联共有一百五十七个州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委員各約十一人，共有六百一十二个区和市委员会，委員各約九人，共有三千五百四十五个鎮和村委员会，委員各約七人。总計共有常务委員三万二千零五十人。由于这个数

字所代表的是最高人数，我們可以把它确定为三万人。

常务委员会纯粹是工作机构，通常由各有关权力范围内的党、国家和经济部门的最重要领导人组成。

还要考虑到党书记的数目，这个数目也可大概地算出来。州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可定为各五人，其他各委员会可定为各三人。据此，最高级的党书记约有七百八十五人，较低级的党书记则有一万二千四百七十一人，共有党书记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六人，他们体现着民主集中制中的纯集中因素。^①

总之，由此可见，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集团，它们作为不同的、往往相互冲突的因素而发生着作用。

在九百七十万党员中，（以整数而论）有一百八十万人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

有三十万党委委员，他们可以說一些話，有三万常务委员，他们必須說很多的話，但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說，以及一万三千名地方党组织的专职党书记。

党内民主的扩大或缩小的問題，实际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問題：約一万三千名党书记、三万名常务委员或者三万名党委委员和候补委员，是否能够对各级政策的制订发生积极的影响。^②

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的人口在二亿以上的話，这些数字看起来似乎不大。然而，在每一个国家里，专职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总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个問題：这少数“发号施令

① 此外，还有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三十万人。不过，他们絕大多数都不是专职党务工作者。他们不起重大的作用。他们包括在一百八十万这个数字之中。那一万三千名党的高级干部还远远不是全部党的机关，各个党委员会还有大約为数十倍的专职“教导员”和其他干部。自成一个阶级的党的机关还有其他居民集团。

② 在技术上，一百八十万名下层的小领导人只能够在基层党组织内部活动，但是，如果那三十万党委委员能够真正自由地维护他们的权利，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充分发挥作用。

者”代表誰？尤其是：在國家的實際決策機構里，各個居民階層的代表性如何？

現在，我們必須簡單地看看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

據1959年1月15日的人口調查的結果，蘇聯共有二億零八百八十萬人，其中有職業的有九千九百一十萬。其中又有二千零五十萬人從事“腦力”勞動，亦即非體力勞動；計九百四十萬男人，一千一百一十萬女人。^[5]

如果我們把那些由於他們在職業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因而能夠對他人的行為產生直接影響的人看作是領導階層，那麼，在1959年，他們的人數可以估計為五百四十萬。

1959年1月15日進行人口統計時，曾作如下的計算：

	人數 (千)	其中受過高等及 專業教育者占%
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及其分支機構的 領導人（即國家機關和黨的機關，工 會，共青團……等的負責幹部）	392.1	90.8
企業（工業、建築業、農業和林业、運輸 業和郵電業）及其分支機構（即狹義的 技術知識分子）的領導人	955.2	85.3
總醫師和其他主要醫生	44.0	96.9
教員、教育家和科學家	2,835.6	99.1
文學和報刊的工作人員	104.1	
文化和宣傳工作者（圖書館等等）	462.3	95.8
藝術家	190.6	89.4
法律工作者	78.7	98.7
商業企業領導人，等等	334.8	
總計 ^①	5,397.9	[6]

① 在制這個表時，曾經有過種種考慮。例如，十萬六千名體育教員和教練是否應當包括在內？由於體育運動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這個問題得到了肯定的答復。或者，商業、採購、供應和銷售方面的工作人員（共二百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人）是否應算入領導階層？又如，旅館的經理在世界各地都產生政治影響，因為他們掌握着必要的集會場所。可是，我們不可能把數字充分地分別列出，因此，把它們舍棄似乎是可行的。

党的机关只占这五百四十万人当中的一部分。它的具体人数很难确定，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根据，这就是斯大林在1937年发表的一次讲话。据他说，联共(布)的领导人员的组成情况如下：相当于将军一级的高级领导者二千至四千人；相当于军官一级的中级领导人员三万至四万人，以及党员士官生十万至十五万人。据此，当时领导党的干部约为十三万至十九万四千人左右。〔7〕

默尔·芬索德在《俄国是怎样被统治的》一书中，对于1952年也采用了十九万四千人这个数字，看来大概是正确的。然而，这个数字只适用于狭义的党务工作者，而在考察党的机关这样一个社会阶级时，则必需把象新闻记者或保安机关干部这样一些职业集团计算在内。如果考虑到这些职业集团，那么，作为社会阶级的党的机关可以估计为四十万至五十万人。克劳司·梅纳特甚至说“约有七十五万。”〔8〕

苏联的在业的人口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集团(整数)：

		%
1. 党的机关	500,000	0.5
2. 新知识分子	5,000,000	5.0
3. “群众”(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	95,300,000	94.5
总 计	100,800,000	

这种三分法同苏联社会中表示紧张关系的最重要界线相一致：一条线是在“群众”与“苏维埃贵族”之间划分，另一条是在党的机关和新知识分子之间划分，因此，这种三分法是符合我们的需要的。以后，我们还要作更细致的区别。

对党的最高机构，即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基本上，这种情况也重现在党的其他机构之中)所作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对来自下面的压力的现象作进一步的说明。

如前所述，委员会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由于他们所处

的地位，因而不能不去作出实际的決定，因为，他們既然負責領導他們那个权力范围，他們就是責无旁貸的。在要作实际決定的时候，总是会有意見分歧、为決定而作的斗争、为“力爭”作出这个或那个決定所作的努力——这些可以理解为来自下面的压力的东西。

第二个認識是，在苏联社会中起作用的各个社会力量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权根本不是公平的：占在业人口 0.5% 的人（党的机关）在中央委员会拥有总票数的 62.3%，而新知識分子，即在业人口的 5%，只拥有 36.0%，而“其余的” 94.5% 則只拥有中央委员会席位的 1.7%。

这就意味着，关系到千百万人的那千百万种社会矛盾，在决策机构中只是被片面地提到——或者是直接通过党的机关的眼鏡看到，或者是間接地通过新知識分子的代表——，然后，在党的机关的声音比其他居民集团的声音更重要得多的某一次討論会中，才予以解决。

我們可以以奧維奇金所描写的那場冲突为例，去观察这种来自下面的压力的具体性质。它向我們显示，党务工作者在实行独裁，即在运用“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的强力”时，曾试图向一个集体农庄榨取比計劃所規定的还要多的东西；另一个党务工作者則出于政治家的考虑（或者是在一次党内的勾心斗角事件过程中出于爭取人心的考虑）而捍卫集体农庄的領導；在这个事例中，“下面的”終于获胜了，但只是因为党务工作者之間意見不一；又如，有人提到說，到秋天就可以看到工作成績，从而使另一个党务工作者不能为所欲为，等等。于是下列几点都至为明显了：

通过官方途徑而来自下面的压力，不外是决策机构所要处理的問題所形成的压力。

但是，同样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在处理这些問題时虽然也經過官方途徑，但其方式絕不是經常单纯依靠分析党的有形組織就

可以得知的。在这里，我們还需要研究一下来自下面的压力的第三种形式，即“无形的团体”。

最先描写过“无形的团体”的現象的是約·維·朱加施維里—斯大林，他在1937年3月3日的講話中，批評了两个党的高級干部，因为他們从一个地方調到另一个地方时，带走了几十个“自己的人”。斯大林責备他們显然是想給自己造成無論对党中央还是对当地的干部的某种独立性，并且逃脫对他們的监督。^[9]

我們所談到过的維尔塔在1947年写的剧本《我們每日的粮食》中的集体农庄主席西拉·吉希，证明他自己就是一个“无形的团体”的推动者，他觉得这个团体势力很大，所以他在被捕时这样为自己辯护說：

“安魂弥撒虽然已經念过，但并不是为我一个人念的。我有一本秘密的牛皮帳。那上面写着，誰在什么时候拿到了什么东西。那里既写着从州领导机关那里弄来的梭子魚，也写着从区里弄来的鯉魚……我們給誰送了蜂蜜，給誰送了奶牛，我們为誰举行了一次命名日庆祝典礼。一切究竟会演变成怎样，我們还要等着瞧呢……”^[10]

“无形的团体”多半是在与“秘密資本主义”相同的基础上兴起的，都是由于需要完成計劃，虽然要在严格遵守法律規章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根本办不到。我們已經从基里尔·阿列克謝耶夫的文章里知道，在“秘密資本主义”发生之初，原料、款項、制成品、生产資料、劳动力等儲备多半是“为了有备无患”而置备的。

虽然人們“为了有备无患”而要求得比实际需要的更多，甚至居然也領到了，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順遂。还要把多余的商品从国家的循环綫路上轉到黑市上来。在1965年6月以前，一切轉让企业财产的行为，即使并无个人从中取利的情况，都要受到两年至五年監禁的刑罰，而第三方面又是一个国营企业。

从1955年到1961年，在經濟領導方面有过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然而，从1961年夏天起，对于犯有这种行为的甚至可处以死刑。^[11]

为了實現計劃而又不致被懲罰，人們必須把監督人員也拉進“陰謀”之中，即對他們行賄。於是產生了一種相互依靠的制度，於是就產生了一種團體，這種團體在已有的機構中存在著、工作著，它的成員多半是從不同的、在理論上為了互相監督而成立的機關中物色的。

1961年8月，《消息報》以《無主的別墅》為題，報道了一個“無形的團體”。

據報道，撒馬爾罕州和市的全部領導都牽涉到住宅修建案中：州和市的兩個第一書記，兩個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即國家機關的首領，以及還有六、七個其他人。

甚至當房子已經被沒收，上級機關要實行嚴厲制裁時，這群人還進行了有系統的抵抗。報上說：

“為了幫助‘遭殃者’，出現了另外一個非正式的‘委員會’（同上面指派的調查委員會相平行的——作者）。它把那些被迫放棄住宅第的人安置在盡量考究的住宅里……”

這個委員會還負責為這些被撤職的‘魔術家’安排工作。例如，市黨委的常務委員會把（兩個犯罪者）在‘服裝公司’倉庫中所擔任的職務撤掉了……但是，同時有好幾個常務委員，包括區黨委書記在內，都建議保留他們的職位，一個是高級商品檢驗員，另一個是他的助手。”

該報提到，有關其中一個參加者的“材料已經交給檢察院，但是沒有進行預審”。在另一案件中，對一位幹部“記了一次大過，但是卻‘忘了’把它記在人事檔案里”。^[12]

蘇聯建造部長恩·阿·德加伊在1954年以前所擁有的“無形

的团体”也是同样活跃的；他非法地让該部党組織的書記（一个专职的党务工作者）支取副部长的薪金。因而党委第二書記就以一个空头的司长为滿足，另外两个党务工作者也就以較低的“薪金”为滿足。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监督不起作用，那是再明显不过了。〔13〕

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在“无形的团体”中，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有着橫的联系，这种联系完全能够打破正式的监督制度，虽然它們的作用当然并不相同。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我們現在来研究几个实例，看看党內的民主和在各級机构中来自下面的压力究竟怎样发生作用，而我們指的“下面”就是有关党的机关的一般成員。無論从党的机关的組成，还是从独裁制度和本质来看，情况显然都是这样：在独裁制度下，除独裁者外，所有的人都是处在“下面”的人，或者，如果指的是一个下属机构，則独裁者的代表除外。党的机关的一般成員大多数都是下属的党和国家机构或其他組織的領導人，由于这种原因，他們不得不滿足他們所負責的下属机构——与有关的党的机关比較而言——所提出的要求。

我們已經知道，对于有关的党务工作者來說，党委会議并不总是开得很如意的；人們記得，在奧維奇金的小說里，区党委第二書記梅德維捷夫在同集体农庄主席的斗争中，曾遭受过失敗。

为了具体地考察党內民主是怎样实行的，我們进一步来观察三个实际的事例：

1955年，《党的生活》杂志报道了一位名叫別列斯托文柯的妇女当选为集体农庄党組織的書記的事。区委会希望另一个候选人当选，区委的代表尽力做到了使选举名单上只印有这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大部分党员却用自己的手把別列斯托文柯夫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这样做是允許的，于是她就当选了。

当选者拒绝接受委任，因为她同区党委的关系过份紧张，因而无法同她的直接上司很好地合作。于是，区党委的那个候选人就被通过了。

后来，上级机关，即州委会，进行了干预，别列斯托文柯夫人终于当了党组织的书记。^[14]

据《党的生活》杂志报道，1956年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一个高得多的党组织里：在查尔朱州委会（在中亚细亚的土库曼斯坦），有一位州委委员塔冈诺夫，未经上级机关同意，或者，违反了上级机关的愿望，批评了州委书记。州委书记认为这次批评是诬蔑，并公然在中央委员会代表、该共和国的农业部长阿里耶夫的支持下，要求州委会把批评者开除出州委会。先后共进行了三次紧张的投票，投票赞成开除他的委员先是十三人、二十七人，最后是三十七人，这才达到了必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

后来，土库曼斯坦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研究了这件事，宣布批评是正当的。决议中说，州委书记压制了正当的批评，理应开除出党。由于他承认了错误，他同阿里耶夫一样，受到一次记过的处分。^[15]

关于最高领导机构，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主席团）里的事情，可靠的报道很少。但是，可以认为，例如开除格·马·马林科夫，基本上也是采用同样的办法。

1953年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后，被所有观察家称为“王储”的格·马·马林科夫立即正式继承了故世的独裁者的位置：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苏联总理。就在同一个月里，他被解除了书记职务，于是就失去了对党的控制。他仍然是主席团委员兼总理。

1955年，马林科夫被迫公开进行检讨并放弃总理的职位，但他仍然是主席团委员。

1957年夏天，他連这个位置也已丟掉了，并且被戴上了“反党集团”成員的帽子。

基本上跟塔岡諾夫同志被开除出查尔朱州委会那次的情形一样，同样也进行了“三次表决”。

1953年时，在中央委员会里当然有人想推翻馬林科夫，不过他們的势力仅达到阻止大权不致完全集中在他手里而已。1955年时，这种势力已經强大到足以迫使他对自己进行贬抑并辞去总理职务。但是，其余的事情却要等到1957年才能做到。^[16]

党内民主和来自下面的压力所起的作用，不仅仅在人事安排方面得到证明，而且在最高领导的 decision making(决策)方面得到证明。

1955年3月，《党的生活》杂志报道說，苏联科学院国民經济研究所的党組織认为，不必接受党刚刚宣布的方針。这里指的是，对格·馬·馬林科夫政府的所謂“新方針”展开的爭論，这次爭論的結果是，1955年2月馬林科夫政府倒台，重工业对于消費品生产的优先地位暂时又重新被強調。

国民經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同这个決議息息相关，但他們始終保持沉默。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甚至曾试图为因此受到攻击的国民經济学家的錯誤辯解，他因此而被解除了职务。^[17]

后来的事态发展說明了为什么經济学家对党的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的攻击能够处之泰然：一年以后，即1956年2月，轰动一时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又重新提出了“新方針”，虽然用的不是旧名称，但是規模比以前大得多。

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显然已經知道，斗争还没有結束，“和緩的浪潮”不久就要来到，因此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另一个有趣的事例，是解散机器拖拉机站和将农业机器出售給集体农庄的經過。

我們知道，在 1958 年以前，農業機器通常都集中在國營的機器拖拉機站里。

因此，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之間經常產生緊張的關係，對工作造成很壞的影響。當時已經在對怎樣才能提高農業的生產率的問題進行討論。斯大林曾經親自叫人提出各種不同的方案，有兩個經濟學家，A·W·薩寧娜和 W·G·溫什爾夫婦提議，應該將集中在機器拖拉機站中的機器賣給集體農莊。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斷然拒絕了這個建議，^[18]而尼·謝·赫魯曉夫却一直等待到 1958 年。但，最晚從 1955 年起，開始暗中醞釀着一個終於導致機器拖拉機站解散的過程。1957 年 11 月，即在尼·謝·赫魯曉夫還沒有研究他對這個問題的見解以前，有一位蘇聯記者維尼申科在《十月》雜誌中已經描繪了這個過程。^[19]文章敘述了下面的情況：

1955 年，斯塔夫羅波爾州委員會要處理“基洛夫”集體農莊的問題，因為從城里派去的集體農莊主席已經把農莊搞得一塌糊塗。州委會沒有現成可以替換的人，於是決定由當時的機器拖拉機站站長馬雷金兼任集體農莊主席。因此，馬雷金就有權力支配他那個機器拖拉機站的農業機器，以及集體農莊的集體土地和勞動力。結果顯然是不錯的，這個例子被人們群起效尤了。

從報道中可以看到，早在 1957 年時就已經有許多著名的集體農莊主席，如 T·S·馬爾采夫、M·A·波斯米特尼、N·F·雷斯金（參見本書第 43、114 頁。）等人，分別在不同的形式之下，取得了兼掌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的權力。

這種毫未經過官方許可的事態發展，在 1956—1957 年似乎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因為，這時溫什爾在同維尼申科的一次談話中爭辯說，將農業機器轉讓給集體農莊已經是既成事實，儘管存在着種種意識形態上的規定，集體農莊已經擁有機器。

后来,《十月》杂志在1957年12月选登了一些集体农庄主席的来信,在大多数情况下,写信人呼吁把农业机器轉让給集体农庄时的語調仍然是畏首畏尾的,而1958年初,尼·謝·赫魯曉夫显然已經不能不作出抉择了:要么发布中央委员会決議,即使集体农庄已經取得了良好的經驗,也仍然禁止它們拥有农业机器,要么建議各集体农庄来仿效前例,从而把这个运动引导到官方的軌道上来。

人們决定彻底改变农业领导制度。人們期望改革会使农业更快地国有化,从而避开意識形态上的困境。在这方面堪称表率的,也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开路先鋒的,是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兼集体农庄主席馬雷金:1957年,前基洛夫集体农庄已經变成一个国营农場,它的領導人是国营农場場长馬雷金。

我們对这件事情感到兴趣,因为它证明了,来自下面的压力是存在着的。甚至斯大林也都維持某种形式的“党内民主”,因为,正如我們从薩宁娜和溫什尔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当事态需要时,他也容許人家提出一些异端邪說似的意見。

我甚至还想进一步指出,党的最高领导,不管体现它的是列宁、斯大林还是赫魯曉夫,他們都不希望各級党組織象一架沒有生命的机器那样工作着,成为不外是一个自上而下地轉达命令的工具。

所有官員对独裁者的依附,乃是一切独裁政治的組織基础。所有官員,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官員的职位越是不稳定,那么,这种依附性就越大。所以,当前的独裁者总是非常希望官員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发展“家族势力”,仍然借用共产党的例子來說,也就是希望每一个共和国、州、区的党委书记都要考虑到一个有控制的反对派的存在,当有关的官員竟然变得过份独立自主的时候,独裁者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反对派。

因此，批評（甚至是对上級机构的批評）的权利和义务，也都載明在党章里；第三条第三款載称：

“压制批評和迫害批評者的人應該受党的严厉处分，直到开除出苏共的队伍。”〔20〕

斯大林在 1937 年对“无形的团体”所作的攻击最能恰当地证明，党的最高領導即使是在权力最集中时，也不願意完全取消反对派，甚至是針對相当高級官員的反对派，也就是說，上面提到过的来自下面的压力始終存在着。

然而，我們不仅要突出在共产党独裁的条件下来自下面的压力的內在性质，而且还要突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所考察的各个事例中，較高級的党領導总是要尽可能地独攬大权。別列斯托文柯事件中的那位区党委代表和州委书记，以及塔岡諾夫事件中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會議上都能如願以偿；別列斯托文柯夫人虽然知道大多数黨員支持她，她仍然不願就职；而在查尔朱州委会中終於出現了如开除塔岡諾夫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

“黨員权利的維護”不是立即就能實現的，而是在直接上級机关、州委或中央委员会干預以后才能实现。

但是，重要之点却在于，上級机关的意志并不是最后决定的唯一因素，事实上，这个意志本身也会改变。最后决定是种种不同因素共同发生作用而产生的，如 1. “群众”的意願，即有关机构的一般成員的意願；2. 有关組織的領導人的意願；3. 党的直接上級机关的領導人的意願；4. 当时有关开展党内民主的党的路綫；以及 5. 事实真相，——因为例如，在塔岡諾夫事件中，他的批評看来象是有道理的。

也許应当把事实真相甚至放在第一位，因为它总是起主要作用。这一点我們可以从把农业机器轉让給集体农庄一事中特別清楚地看得到。

首先决定这种情况的是，农业生产經常远远不能滿足国家的需要，这就迫使领导去寻求改善生产的途徑。将农业机器轉让給集体农庄的决定，是由于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之間經常发生摩擦，以及由于集体农庄主席能够支配农业机器所取得的有益經驗而作出的。

集体农庄主席（其中最优秀的往往是区党委委員或甚至州委委員）和其他农业专家要求将支配土地、劳动力和机器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可以說，这种要求相当清楚地表现了来自“群众”的压力。

在能够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的机关里，如区委和州委，领导人大概在五十年代里曾經动摇不定过；在斯塔夫罗波尔，他們甚至决定，在人事上把农业机器的支配权和集体农庄的领导权結合起来。在其他情形下，他們容忍集体农庄主席暗中拥有自己的拖拉机和其
他机器。

第四个因素：党的直接上級机关的领导人，这里指的是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似乎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同样也搖摆不定过，因为，州委的工作經常受到中央委员会极其細微的监督，例如上面所提到过的关于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統一领导一事，如果没有相当高級的党的机关的容忍，那是不可能的。（如所周知，尼·謝·赫魯曉夫甚至还亲自研究过个别的重要集体农庄的情况。）

最后，第五个因素，“党的路綫”是斗争的目的物，因为，事情关系到对它进行改变——而它确是在改变之中。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看到它的作用。

1952年，这个“路綫”明确規定：不把农业机器轉让給集体农庄。至少过了三年，很可能过了六年以后，党在这方面的正式态度才得以改变。

1953年，“路綫”改变了，它明确规定，应当尽快地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样做，虽然没有废除斯大林的原则，但是，对于寻求更好的生产方法却给予了更大的自由。

1955年，在扩大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对集体农庄的权力的基础上，生产者在如何经营他们的经济方面获得了更加不受束缚的自由。这个决议本身是完全符合斯大林路綫的，它使地方机关有可能以试办的方式，把劳动力和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的领导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万不得已时，他们随时可以把这个措施说成是进一步扩大国家对农业的领导作用，因为机器拖拉机站是国营的。

1958年，当经验已经证明，生产资料集中在生产者手中很有好处，而且这一措施对于国家制度并不存在危险之后，“党的路綫”本身才被改变。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说存在着来自下面的压力，实际上无非是指：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会和组织并不是什么茶话会，也不是什么宗教集会，而是一个世界大国的执政机关，它的成员由于他们的职务而不能不作出真正的决定。因此，把共产党独裁者的权力看成是“绝对”的，把苏联看作是一架独裁者所操纵的没有生命的机器，或者——含义也是同样的——否认来自下面的压力，凡此种看法都是不科学的，十分幼稚的，我们必须予以拒绝。

这种来自下面的压力究竟怎样显示自己，最后的决定如何产生，以及可能的和——在这个制度范围以内——不可能的决定之间的界线何在，这当然又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将留待以后再探讨论。

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理論(节譯)

共产主义掘墓人的产生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要多花費一些時間。在《技术知識分子——共产主义掘墓人》一章中，我們虽然已經考察过这一現象，但是，还談不上已經进行了詳尽的分析。在那里，我們的主要論据是，新的知識分子，特别是技术知識分子显示出了有資本主义思想的人的一些很典型的特点（个人主义、追求财富等等），他們从自己的已建成的工厂領導人的地位出发，力图而且必然力图“象私人資本家那样”进行工作，即致力于市場經濟。构成我們的一系列证据的最后一环的，是共产主义关于資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連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这一定义，是引证列宁关于商品生产产生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經濟的这一認識。（參見本书 73 頁及以下几頁。）

有人认为，市場經濟同废除私有制是可以協調的。如果这种意見是正确的話，那么关于共产主义掘墓人的提法就站不住脚了。比如，关于共产主义体系可以与西方經濟制度同化这种理論的最堅決的辯护者，埃里克·貝特彻就写道：

“工业化已变成了制度本身的目的了……这样一来，現在所有的考虑相对地說都是針對工业化的过程；檢驗政治措施的依据也仅仅（1）是，是否有利于达到这个中間目的，而不再是，是否同最終目的協調一致。行动的真正指南不再是馬克思的著作，而是工业化的进展。”

除此以外，还有人确信，生产的提高可以掩盖“所有其他目标”，“一个极权的（共产党的）国家完全可能組織起一种很有效的竞赛制度。”

因此，貝特彻认为，只有实行了足够的物质刺激，也就是說，只有取消了对“私有财产的排斥”，竞赛制度才能发挥作用；物质刺激又是以某种市場經濟制度为前提的。他写道：

“根据‘物质利益’原則的內容，人們将来应该不受妨碍地(!)为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而劳动，以便使这种积极性也能为最大限度地扩大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成果而发挥作用。简单說来，社会主义向人們提出的要求：忍受极大的个人牺牲，拿最低的、刚刚能满足生活必需的报酬，为未来的更幸福的后代而劳动，现在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人的这样一种义务(!)，即现在就为增加自己的幸福和为增强自己在現存的社会制度下的地位而努力，以便也为爭取以后几代人的更为幸福的未来而发挥作用。”他在另一处写道：

“……如果不能提供真实的刺激……，那么就必須考虑消費者的願望，而且这些願望所达到的这种程度可能会使中央突然感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之中，即它的决定实际上至少有一部分是受消費者左右的。

这种情况基本上与現代市場經濟十分相似，生产的决定是由三个有关方面共同起作用的，即消費者、企业主(包括厂长和經理)和国家。”[1]

人們用一个简单的論据，就可以駁倒所有这些看法，这个論据就是：现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61—1963年的情况是，那些“肆无忌惮地为个人和个人需要”而劳动和取得財富的人立即遭到了处决，而且在經濟領導中，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强烈中央集权性的、旨在取消市場經濟的傾向。(參見《牺牲斯大林，为的是拯救斯大林主义》和《今后二十年的斗争》两章。)

不过，我们对貝特彻的看法是极感兴趣的，因为他比所有其他具有同样看法的人都更好地指出了这一问题的关键的本质：市场经济能否同废除私有制协调起来？

我们在《党的机关及其职能》一章中已经把我们的意见分歧总结为六点。现在，当我们已经阐明了我们看法的基本思想后，我们可以说，如果市场经济同共产党独裁至少在理论上是协调的话，那么貝特彻就是正确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争论由来已久。如果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和价值法则的学说的修正真的成为苏联经济政策的指针的话，那么八十八年前欧根·杜林所建议的那种经济制度就产生了。根据恩格斯的看法，杜林的观点“引导到这样的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留着不加触犯，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应该立即消灭。”①〔2〕

欧根·杜林的建議大致符合于今天在苏联被设想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私有财产应该彻底地（即比今天的苏联更为彻底）取消，商品的流转——包括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应该保存下来。“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可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去作。相反地，他正自傲着，在他所建立的世界中，每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3〕

还要进一步进行比较。杜林也规定消费要有一定的差别，因为“经济领域上原则上的权利平等，并不拒绝这样的情形，就是：除公平所要求的以外，还可以自愿地加上特别赞许与尊敬的表现……社会如果表彰高等的工作，而给以适度的消费品的增添，那么社会只是尊敬着自己。”②〔4〕

这种不平等，尽管不是不重要的，但是在恩格斯的论证中并不

① 异体字为原著所有。

② 同上。

起什么作用。他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即能够建立一种制度，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八个或十二个馬克的同等工資。恩格斯指出，但是，在貨幣存在的情况下却无法阻止“公社社員之中，有些人放起小錢箱来，而另一些人則不能靠着所得的工資来維持生活。杜林先生甚至使这种結果，成为不可避免，因为他公开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因之就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这点自然要在等量的消費原則上打开一个巨大的罅隙。独身者可以用每天八馬克或十二馬克的工資，过着极舒适的生活，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鰥夫，用这工資却只能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他方面，公社不加考虑，接受任何金錢的支付，因之就允許人們有一种可能，不必一定只以自己的劳动去获得这些金錢。金錢是沒有气味的（Non olet）。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錢，真的开始实行貨幣的职能了。現在已有便利的机会和动机，去一方面造成貯藏，他方面造成債務。需錢的人，向积錢的人借債。借得的貨幣为公社所收取，来作为生活必需資料的价錢，这种貨幣，又成为近代社会中的那樣的貨幣，就是，成为人的劳动之社会的体现，成为劳动的真实尺度，成为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无力来抵抗它，正好像无力来抵抗九九乘法表和水的化学成份一样。因为金錢的积蓄者，有可能来逼迫需錢者偿付利息，所以高利貸制，也就和那种尽着貨幣职能的金属貨幣一起恢复起来了。”

恩格斯接着写道：“公社的高利貸債主，轉成为一种以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轉成为銀行家，轉成为流通手段和世界貨幣的支配者，因之也就轉成为生产的以及生产資料的支配者，——虽然生产資料，在許多年內，还在表面上繼續作为經濟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5]

恩格斯的主要論据是：仅仅从法律上取消私有财产还不够。只

要货币存在，就存在着积钱和欠债的动机和机会，而且“任何法律和行政规范”都将无法阻止这种来自内部的对社会主义的破坏。这种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基本观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意识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观点。

时间证明了恩格斯是正确的，不过有如下一点保留，即他对变化过程的估计是有些过分谨慎了。在“高利贷者”变成生产的主宰者，甚至在成为一种值得一提的因素之前很久，体系的瓦解现象就会表现出来。

根据迄今所进行的把市场经济的因素注入共产主义经济的十分有限的试验的经验，可以看出下列这样一些倾向，这些倾向，在苏维埃的经济的领导中如果彻底运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就很可能发展到极端：

首先，党会丧失对经济的监督。至少对一些实际问题的决定权就会自动地转移到专家的手中。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几年，即1955年前后，当经济工作者的权力大为扩大和党的机构的权限相应地缩小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真理报》在1955年5月17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指出，应当取消对企业领导人种种过于烦琐的监督，并且提高对他们的要求。党组织的义务就是巩固个人负责制，提高企业领导人对完成生产计划、运用新技术的任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的责任。”〔6〕

这曾经是党的机构对技术知识分子让步的最高峰：这些让步后来就终止了，1955年所允诺的加强生产领导者权力的工作，直到1963年没有兑现。但是，仅仅这些权力在1953年到1956年这个时期的自发的和不平衡的扩大就十分明显地表明，党的机关的权力的丧失是其必然的结局。

当最高阶层为争取扩大企业领导的权力而斗争的时候，同时在下层可以听到地方的党的工作者的绝望的警告，因为他们面临着丧失手中权力的威胁。1955年2月，一个党的干部在《党的生活》上攻击一个成绩卓越的厂长说：

“如果完成了计划，那么区、市和州党委对厂长就都不再提出甚么严格的要求，这在我們奔薩已是司空見慣了……这样作的结果是，厂长在工厂里就开始感觉像在他的祖传的庄园上一样。譬如，在我們那儿，諾尔金同志（受攻击的厂长）被人称为‘东家’，而他自己也确实促使人們这样称呼他：他可以任意地提高工资，降低工资，甚至解雇工人。苏维埃法律对他来说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有趣的是，这位厂长赶走了至少一个敢于批评他的党的工作者，报道中还写道：“这位厂长在事后大言不惭地说，他又‘找到’了一位新书记。”

但是，党的工作者还是取得了胜利：几个月之后，党的刊物报道说，諾尔金厂长被解除了职务。^[7]不过，党的工作人员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帮助下，才战胜这位厂长的。

同样，1955年初，《党的生活》发表了工业中心车里雅宾斯克市党委的一位工作人员的来信，他指责一些负责的经济工作者和各主要管理局的领导人否定党委的作用。其中有一个人“甚至根本不想同市委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在他动身之前，人們几乎是用武力才把他拖到市委来……。”

另外一个人，一个总管理局的总工程师，“在工厂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熟悉了自己的工作和职工……（但是）却不願意同市委的工作人员见面。他召集工程师和技术員开会，采取各种措施，而这一切都是在完全脱离党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三个人甚至敢于干预党的机关最基本的权力范围——选拔干部。他常常“在我們五金工厂里调配部主任，并认为沒有必要同

党的市委就此商量一下……。

在最近两年（即 1953—1955 年）中，他沒有給市委打过一次电话，看来，他认为同党的机关保持密切的、实际的联系是多余的。”〔8〕

还有许许多多諸如此类的例子。

关于指責某个技术知識分子的代表“否定党組織的作用”，我們在斯大林时代就已有所聞了。因此，上述各例不一定就是有意識地同党的机关对立。

这些人都是一些大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几乎可以同克虜伯的經理們相提并論。他們都很忙，在党的机关由于斯大林的逝世而遭受到震动之后和一时无力通过“經濟以外的强制”手段来取得人們对它的必要的尊重的情况下，他們就会不去理会党的机关。

不过，对党的机关不加理睬，即使純粹由于缺少時間，也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問題，因为这就更加显示出党的机关的那种本来已經明显的无职能的現象和寄生性。假如市場經濟的原則真的要变成苏联經濟領導的基础，那么人們恐怕就不会“几乎用武力”把經濟干部拖回到相应的党委去了，因为何必讓他們浪費時間呢？他們有独自作出决定的权力！

苏联向市場經濟过渡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整个經濟結構的根本改变。

經濟領導者必須获得根据市場情况决定生产什么的权力。这些将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决定，人們从一个国营农場場长同尼·謝·赫魯曉夫的一次談話中設想一下就可知道，赫魯曉夫当时已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不过还不是部长會議主席和独裁者。

国营农場場长說，如果他有权根据自己的願望来制訂作物种植計劃的話，他将不再种小麦。

“那您想种什么呢？”

“草！”

他直言不諱地解釋說：……“小麦，我們必須向國家上繳，而下草却可以留在國營農場里。”〔9〕

我們在所有其他蘇聯經濟領導者身上也都看到了這種同樣的態度，不論是口口聲聲說“他的”工廠的廠長波塔波夫也好，還是“真正天才的經濟學家”、稱贊“‘銷路’這個金色字眼”和聰明的投資政策的集體農莊主席奧漂金也好。這種態度可能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是占主導地位的。儘管由於更加合理的經濟管理，國家的收入可能會有所增加，但是，“由於國家需要麵包”而任意從經濟中抽調出東西來，或者比如說由於國家“需要”宏偉壯麗的建築物而進行任意的投資，都會變成不可能的事。

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第三個不可避免的後果，在蘇聯採取了一些初步的謹慎的步驟後已經顯示出來了，這就是“秘密資本主義”的急遽興盛和因而使大量金錢集中於私人手中。

這樣作，每個企業領導者都必須有權根據自己的願望決定生產，分配和接受定貨，進行投資，在贏利的情况下提高工資等等，其目的就是根據利潤多少最好地安排生產。這樣一來，就為“秘密資本主義”打開了大門。例如，把機制的著名的俄國肉包子（一種有肉餡的麵包）的含肉量每個從六公分降低到四公分，生產者每天製作三萬個，在四年內就可以額外收入十二萬五千盧布（合五十五萬馬克），根據現行的法律，這就可以促成兩個人被判处死刑，幾個人坐牢獄。〔10〕

另外，可以引證一下一個食品廠的情況。廠長把蛋糕的配料單稍加改變：每個蛋糕增加一點面粉量，減少一點奶油量。節省下來的“剩餘品”為黑市加工，其結果就是廠長私人收入（被揭發出來了）十一萬四千盧布，即五十萬零一千六百馬克。〔11〕

1961年10月份第三篇報道是關於塔什干的一家五金製品工

厂的情况。在那里，找到了一种节约铁皮的新方法，用这种方法，工厂领导从每一千张铁皮中就可以节约二百张。这些节约下来的原料被用到黑市生产上去了。如报道所说，这样一来，厂长就可以造“一所宫殿”。〔12〕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党的领导坚持主张，掌管着国家几亿、甚至几十亿卢布的厂长，不同一系列机关进行长时间的协商，就不准进行一百卢布或二百卢布的投资。经验表明，“秘密资本主义”恰恰是从企业领导有任意决定生产的全权中产生出来的。

赫鲁晓夫曾提到过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一个情况。在那里，厂长们让两个工厂进行三班制生产，而根据正式的规定是进行两班制生产。第三班生产的产品就通过“秘密资本主义”的渠道销售出去了。〔13〕

最后，苏联经济领导完全采用市场经济原则的第四个后果是，将出现难以想像的苏联式的、甚至西方式的腐化堕落现象。

金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具有无比的威力，这在苏联的现实中天天都可以看到。

人们用钱可以买到国内所有的任何消费品，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即使是特别的需要也可以得到满足。用二万到二万五千（旧）卢布的“报酬”，人们可以得到在列宁格勒高等学校入学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外地人所无法取得的。〔14〕

如果有足够的金钱，人们也可以虚报完成了任务。比如，有些通过各种经营赚得很多钱的集体农庄主席，从国家的商店里购买黄油，再按照规定的收购价格卖给国家，记在完成计划的账上。当然，他们要蒙受一些损失，不过这些损失比起他们试图把自己的牛奶生产提高到所要求的高度，总是要小一些。〔15〕

一个“真正聪明的经济工作者”能够而且一定会充分利用即使

是最小的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去賺很多錢，集体农庄主席N·F·雷斯金的情况向我們說明了这一点。他除了被指責为“不想向国家提供任何东西”外，还受到其他攻击，因为他在苏联的三十三个城市和十二个村庄里設有銷售站和收购站，經營各种买卖，还当中間商。有一次，他把三百五十二吨葵花子(俄国人特别是在閑暇時間喜欢不断地嗑这种东西，好象美国人嚼口香糖一样)从北高加索販卖到薩哈林島(!)，賺得八百万(旧)卢布(合三十五万二千馬克)，从而弥补了由于沒有完成肉类生产而造成的亏空。〔16〕

甚至纵情的欲望也可以得到滿足，例如伊尔庫茨克的一位区委书记的三个漂亮的女儿組織过一次私人表演：她們表演裸体在香檳酒中沐浴，每张門票收五十(旧)卢布(合二十二馬克)。〔17〕

情况因此变得更加复杂，金錢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很快地变成了一种政治因素——因为人們用金錢可以进行賄賂，并从而能使党的监察机器失灵，这一点我們从前述的苏联建造部长尼·亚·德加伊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到。(參見本书第96—97頁。)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党的监督，因为党的書記所要监督的人恰恰是他所秘密服务的人，因此他根本不可能發揮这种监督作用。

1960年10月，两个州委书记，拉赫曼諾夫和尤庫鮑夫受到了指責，因为他們“利用他們的职权为自己建筑房子，并非法得到一些貴重物品”〔18〕。

在更早一些提到的关于撒馬尔罕州的私人別墅的事件中，除了有国家机关的头目，州和市苏維埃的主席們和几个經濟工作者参与外，还牵涉到两个很高的党的工作人員：州委和市委的書記。

为了使这幅图画更加完整，还要說明一点，这就是經濟工作者大部分是完全有意識地、目标明确地使党的工作人員腐化墮落下去的。比如，諾尔金厂长，他在赶走了一个找麻煩的党的监督者之

后，还以此大加夸耀，他所使用的手段中就有经济压力手段。报道中写道：

“曾有一个姑娘在我们那儿工作过。她领导着档案室，每月拿六百(旧)卢布基本工资。后来，市党委的一位官员的妻子接替了她的工作，而厂长马上把她的工资增加到超过国家工资标准一百五十卢布。”〔19〕

党的工作人员对“腐败”没有免疫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私人”，他们都是同其他人一样的人，他们想生活得好，住得舒适，溺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只是他们的社会职务才使他们成为专政的警犬。

只要他们手里掌握着实际的权力，他们就会反对取得私有财产的尝试，他们就会宁愿享受相当舒适的公家住宅这种物质利益，过着党的督促员的忙碌不宁的生活，而不愿要一所也许不十分舒适的自己建造的房屋。不过，我们所研究的情况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在国家经济的范围内得到承认，经济上的决定权集中在生产者手里，党的工作者变成了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获得利润和赢利是光荣的事。这样，经济工作者才有可能腐蚀他们的党的监督者，使任何机构都抵挡不住这种压力。这样，人们就不会再偷偷摸摸地向有影响的党的工作人员送建筑材料，而是完全公开地建造房屋，因为经济工作者有正式的权力分配和接受定货，以及规定价格。为此所支付的费用，可以作为“广告费”来报销，只要决算表明是盈利的，就必然会得到容忍。只要决算表明是盈利的，人们就会不仅付给党的督促员以任意高的工资，而且也会给他们的亲戚——从老姑奶奶一直到吃奶的婴儿——付高工资。至于人们什么时候正式把这个无权的党的机构推翻，以便把这一笔无用的开支节省下来，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恩格斯是正确的，他说过：即使生产资

料的私有制取消了，貨幣也還是有威力的；即使所有一切都是正式的国家所有制，只要有貨幣和貨幣流通，甚至在“公社”里也就存在以資本主义方式賺得和积累金錢的“动机”和“可能”。

一个共产党的政府——至少在理論上——能够使其居民有权利“为自己和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劳动，或者使人們把“现在就为增加个人的幸福和安全而操劳”甚至作为一种“义务”而承担起来，这种設想的唯一的弱点是这样一个问题：人將用他們的金錢干什么？經驗表明，最优秀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也是資產階級化最快的人，而且会力图用金錢进行投資，不劳而获。1962年9月《共青团真理报》的一篇报道就是这样写的：

“在台尔曼集体农庄……有一个很出色的联合收割机手。在收获期間，他的名字經常被宣传員所提到，或者出現在報紙上……不过，收获期一过，就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迫使他为集体的利益作任何事情了……他为社会作上两、三个月工作，当然这时他也竭力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其他時間，他就成了农場主，他沒完沒了地忙于他那无限发展的私有經濟。”

另外，还談到一个青年联合收割机手，“他的名字甚至在一些最大的庆祝活动中也經常被人們提到的。”他在黑海边修建了一座別墅，別墅并不閑置着，而是收取租金的。^[20]

这种連鎖反应是无止境的，已占有財產的人想使其财产合法化的願望太普遍了，以致沒有可能在市場經濟的範圍內对它进行限制。当然，一个“新階級”理論的維護者可能会认为，党的机关不会反对这种資產階級化的，它本身也正在資產階級化，它正在、而且将来也会一起去竭力促使資本主义复辟（根据这种理論，尼·謝·赫魯曉夫这类人也許就会变成金融寡头），但是，这是所謂看法上的問題。我們現在強調的，市場經濟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一个共产党統治的国家的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彻底改变，而这种改变

也就意味着共产党独裁的垮台。

这样，我們就可以得出产生共产主义掘墓人的結論：像新的經濟领导人不可能放弃他們所提出的使經濟决定权轉交給直接的生产者的要求一样，党的机关，如果不丧失它手中的权力，也是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关系之間的一个典型的冲突，这种冲突迟早必然会以所有制发生改变而告終。至于这种改变應該或可能怎样进行，这还是一个問題。不过，只要肯定这种改变是必不可免的，对我們說来也就够了。

其他的問題，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理論会向我們作解释。

以人民的名义

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基础的改变”),总是会引起政治结构和“上层建筑”的相应的改变。为此必须有各种前提条件:

一、推动改变的力量,即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但在现行的政治形式中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那个社会阶层,必须强大到能够起决定性的政治因素的作用。

二、这个阶层在保护其自私的阶级利益时必须要有以全民的名义来发言的道义上的权利。

三、它必须能够组织起来并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组织才能为一个社会阶层取得政权铺平道路。

促使苏联政治制度改变的第一个前提至少从1937年以来就存在了。因此,我们想研究第二个前提:这些新知识分子能在反对党的机关的斗争中以人民的名义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而出现吗?

为此,我们必须请读者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既不是狂热的共产党人也不是狂热的反共分子的一个有智慧的、爱国的苏联公民的地位。同时,可以想到为数众多的整个领导阶层,这部分人大约有一千六百万,居于各级领导岗位,包括为数众多的党员在内,党有一百八十万个小头目或三十万个委员会委员。我们所说的新知识分子是领导阶层的所有成员,但不包括《党的机关及其职能》一章所提到的党的机关中的成员。

首先，他們大家当然都傾向于肯定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終究是他們国家政府的意識形态。但是，經常对比研究那常常令人憎恶的苏联现实，人們就不禁产生怀疑。我們可以把新知識分子以全民的名义来保卫他們的階級利益和代表全民利益的那些特点概括为四点：

- (一) 意識形态和計算尺
- (二) 精神的自由
- (三) 取消恐怖
- (四) 值得为世界革命尽力嗎？

第一点包括了“要集中的国家管理經濟还是灵活的市場經濟”这一系列問題。

在我們研究这一系列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对共产主义經濟領導的理論原則作簡短的研究；不过，在这里我們只提及非常一般的原则。

我們已經了解了列宁下述这个明确的提法：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就是要取消商品經濟”，用馬克思主义的語言来理解“商品”就是要出售的产品。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商品經濟”就是等价物的交換；而“取消商品經濟”，即建設共产主义社会；从托馬斯·摩尔或者甚至早自柏拉图以来，共产主义社会就已被看作是一种不是等价交換产品（和劳务），而是“按需分配”的經濟制度。

迄今为止，共产党人还没有真正取消了“商品經濟”。^①然而，他們經常明确地宣布他們的这种意图，并对此进行了若干尝试。其暫时的結果是建立了一种基本上是純管理經濟的經濟制度，在这种管理經濟中通过行政途徑来規定生产、产量、产地和生产時間以

① 中国的“人民公社”也許是这方面的第一个成功的試驗，不过对它的研究还太少，很难对此作出一个結論来。

及供应。^①

这种制度的实际表现,就是所謂数量计划:委托經濟部門生产如此之多的(尽可能多的)吨数、件数、耗时等等,建設如此之多的工厂、平方米住宅或者車間,如此多公里的铁路、公路等等以及諸如此类的項目——基本上是不計算成本的。

然而不久以后事实就表明,即使是正經的共产党的領導,也不能放弃所有产品的(至少是象征性的)价格。用金錢来計算是必不可免的:

(一) 考核各个企业的生产率;

(二) 計算成本;和

(三) 制定作为商品到自由市場或有領導的市場上出售的产品价格。

这里,我們不想研究苏联經濟中制定价格这个特別复杂的問題。只要肯定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按照苏联最优秀的國民經濟学家的意見,用行政手段制定的价格确实是不适当的。比如苏联著名經濟专家L·J·麦森堡 1957年5月在苏联科学院苏联國民經濟研究所的一次很重要的討論中提出过这样一个問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四十年(1)的历史过程中,产品价格与价值^②不是一致,而是一貫长期脫节,人們該如何来解释这一事实?”^[1]很多人持有这种意見。

苏联經濟的全貌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决定的:

(一) 領導力图通过行政途徑,即通过物資和人力的直接調配,通过数量计划,通过禁令和命令来解决經濟中的所有問題;

① 在这里,由于对苏联經濟的問題只能作最低限度的闡述,請參閱以下两书中的詳尽分析,阿道夫·魏伯:《苏維埃經濟的今天——缺点和优点》柏林 1962年版;阿历克·諾維:《苏联經濟》伦敦 1961年英文版和威斯巴登德文版。

② 后面我們还要研究“价值”这一概念。(參見本书第 157 頁及以下几頁。)

(二) 同一領導試圖把市場經濟的因素滲入管理經濟，主要是通過任意的而且大多是与價值不相適應的價格的規定。

我們已經知道，技術知識分子幾十年以來就力求在蘇聯經濟中尽可能地擴大市場經濟的因素。但是，從一個蘇聯“正常的消費者”的立場來看，這意味着什麼呢？

在說明“要意識形態还是要計算尺？”這個問題時，我們只想研究下述這樣一些事實：

(一)集中的計劃經濟，或者較好的管理經濟的直接後果通過市場經濟一定能消除的事實；(二)為蘇聯公民所十分熟悉的事實；(三)即使不與其他制度作比較，一些也能够或者甚至必須被認為是嚴重的缺點或不公正的事實。

每一個蘇聯公民，只要稍微研究一下自己國家的問題，就會一再碰到至少是下列三種經營混亂的方式：

一、分配消費品和工業品的機構失去作用；

二、儲備物和資源的浪費；

最後，我們只能稱之為計劃經濟的愚蠢。

構成蘇聯公民考察蘇聯經濟制度的優缺點的基礎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在蘇聯人們的生活簡直是很糟的。儘管自斯大林逝世以來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今天仍然有許多人還是吃不飽。蘇聯經濟不能供應足夠的食品，此外勞動人民的收入也低得可憐。

在斯大林時代人們普遍吃不飽，這是很容易得到証實的；尼·謝·赫魯曉夫在“接管政權”時在(1953年)九月中央全會上的就職演說中宣稱，必須極大地改善居民供應，使人們能夠得到“對一個健康的人的全面協調發展所需要的營養標準的水平”，這樣，他就承認了到那時為止人們還沒有得到這種營養水平。從那時起，人們就相當公開地談論這個問題了。〔2〕

在以后年代中，作这种說明的，苏联資料就少了。但是，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會議主席德·斯·波利揚斯基1961年初承认，1960年“在一系列的城市里和工人住宅区里出現过中断供应居民以肉类、牛奶和黃油的現象。”〔3〕

1962年3月尼·謝·赫魯曉夫不得不更加明确地說：

“中央委員會接到了很多信。信中說，商店里肉和黃油太少。有些写信者认为，商店里缺肉是商业組織工作不好的結果，而中央委員會不了解商业中的这种中断現象。情况不是这样……問題在于我們沒有足够的肉。”〔4〕

1962年6月他又說道：“……沒有足够的肉，沒有足够的黃油。”〔5〕

这些“概括性的說明”又为无数具体的报道所补充，从这些报道来看，“有些地方……买不到像盐、肥皂、火柴……这样的商品。”此外，就是在旺季人們也抱怨缺乏水果和蔬菜。〔6〕在个别情况下是产品确实不够还是由于拖延、管理不当等原因使商品供应不上，这对我們來說是不重要的。一个母亲，当她的孩子挨餓的时候，她不会去研究产生这种困难情况的原因，而只是指出这种情况。

普遍的物資困难的一个特殊方面，是农民的飢餓生活。这种飢餓生活在非苏联的見证人所写的几乎所有报道中都可以讀到，而在苏联报刊上有时也报道这些情况。比如，有一次我在1938年（1）的《布尔什維克》（現在的《共产党人》）杂志上碰到一点不寻常的证据：

“在有些集体农庄里，按劳动日根本分配不到錢。一些集体农庄主席甚至要想采取措施，使集体农庄社員放弃他們应得的錢。”〔7〕

我們在1956年发表的尼·日丹諾夫的短篇小說《回乡》中找到了最近的关于类似情况的证据。1959年格魯吉亚中央机关报

《东方曙光报》不得不报道一个区的情况，在这个区的五十三个集体农庄中，有十七个农庄不能按劳动日分给农民一个戈比和一克粮食，只能分给一点奶酪。^[8]

农民们只是靠他们从平均零点三一公顷大的宅旁园地里所能得到的东西来维持生活，而在农庄里劳动是完全没有报酬的。他们不得不去劳动，因为否则连他们的宅旁园地也要被夺走。但他们几乎不会把这种义务看作是合理的。不过，问题不仅如此。

消费品缺乏不仅是由于生产不好，而且是由于分配机构的失灵造成的。从最终效果来看，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同的：供应不足和排长蛇阵；这是特别使人感到痛心的。很多官方的反映之一是：

“苏联人不应该把他的业余时间浪费在排长队上，这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情况无非是由一些所谓干部的拖拉和对人漠不关心造成的。否则怎能解释如斯大林斯克、美日杜烈契耶、克美罗沃等方面面包供应中断的情况呢？某些地方商店里缺少商品……而货架和供应基地里的货架确实要被商品压坏了。”^[9]

在一个乡村百货商店里，人们虽然能买到一个柜子，但是只能用三百个鸡蛋来换。“购买”布匹、窗帘和毛巾也是如此。^[10]

物资剩余的情况从原则上说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几乎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国家供应机构的无能和私营供应机构的令人惊奇的适应能力是苏联公民每天都可以看到的，甚至从苏联报刊上也可以了解到这种情况。报上写道：

“里海渔场扔掉几百吨贵重的鱼，因为盐没有及时供应上……（同时）‘自营’渔夫则到古里耶夫市场上卖出几百公斤的鲑鱼而不受惩罚……”

哈萨克斯坦的鱼罐头工厂一直不进行鲑鱼和沙丁鱼的生产。于是，几百吨非常好的里海鲑鱼不是简单地腌制了，就是加工成鱼

粉作飼料了……”〔11〕

这种报道对苏联公民來說，是一堂解答“要国家經濟还是市場經濟”这个题目的直观教学課。国家虽然能組織捕魚，但只好把捕到的东西又扔掉，因为加工跟不上来。而对此沒人負責任：漁民只关心完成和尽可能超額完成吨数計劃。至于下一步魚怎么处理，对他們是无所謂的。加工工业不收购魚，它所得到的魚是分配来的。如果供应与罐头的生产計劃不協調，那么这不是它的責任，部里要对此負責。較高的計劃机构太不灵活，因而不能保证各級的生产暢通无阻地进行。

这样的弊病絕不限于居民的供应上。它在国营工业内部表現更为严重。而在这里所造成的損失就特別大。在国营企业内部，貨物根本不出售，而仅是——有时按象征性的价格——进行分配。結果是各个部門之間經常有斗爭，下級部門爭取扩大分配量（就是为了有儲备以便搞“秘密資本主义”），而上級部門却企图尽可能压缩分配量。

由此产生的結果，人們可以从1961年春《共产党人》杂志关于爱沙尼亚計劃工作的一篇报道上看到。报道說，这个共和国1960年根据前一年的“經驗标准”分到了“乳脂計”（用它来測定奶的含脂量），虽然它不需要乳脂計。有一种橡皮管的分配也是如此：1960年分給这个共和国七点六吨橡皮管，虽然它只需要零点六吨。人們同意了共和国放弃多余的管子。但是，当这个共和国的需要到第二年上升到二十一点五吨的时候，“根据前一年的經驗指标”，它只得到一点四五吨：这样分配就已經增加了一倍多。〔12〕

然而，也还有更严重的情况。1958年夏天一家工厂抱怨說，国家計劃委员会从很远的矿井分配給它二万吨矿砂。第一，这个厂不需要，因为邻近矿井有儲存半年的便宜矿砂；第二，每吨運費要多花七十一个卢布，而两万吨就要損失一百四十二万（旧）卢

布。〔13〕

不过，这还不是现代经济管理上“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最坏的后果。

《共产党人》杂志在1961年夏天报道了一个机器制造工厂的情况，这个工厂为了完成鑄鋼生产的计划“吨数”，就把它的車間地面鋪上結实的鋼板。杂志写道：“工厂为每平方米这样的地面設施所花的錢似乎比用波斯地毯鋪成的还要多。”〔14〕

普遍爭取在数量上超額完成计划（常常不考虑多生产的产品是否需要）的結果是，喀尔巴阡—乌克兰电力采伐工人已經完成了1974年的计划，基輔地区甚至完成了1977年的计划，从而毀掉了森林，因为在这样“不顾一切地使用技术”的情况下植树造林是根本赶不上的。〔15〕

在另一地方，一个建筑的领导人命令将全新的鋼梁鋸碎，以便能完成他的废金属回收计划——因为完整的鋼梁是不会被当作废铁的。〔16〕

在工业管理上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第二个結果是这样一个情况：价值以百万計的貨物作为死的資本堆放在轉运站、仓库或經常处于露天情况的工厂院子里或者甚至被丢失。

这样的报道主要是指出，沒有为分得的或制成的机器造好仓库，或者运输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化肥也常常丢失，而且由于价格昂貴，集体农庄庄員們对这种化肥根本不敢問津。〔17〕

1958年夏天，《共青团真理报》报道說，一些男孩子在路边发现了一些装有零件、发动机和部分已經生了锈的車床的箱子。估計这些“宝贝”是一个建筑企业的設備，这些設備是1957年1月（！）制造者交貨，而收貨人沒有取走的。估計价值为五百万（旧）卢布。一年以后，这家报纸报道了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次事件“只”关系到两百万卢布。第三篇报道談到，1960年价值六千五百万金卢布的

进口的水泥厂成套设备从 1957 年以来就被乱扔在西伯利亚的一座城里，有些部分已经开始生锈了。〔18〕

这种形式的管理不当的最高峰是：人们“忘记”了完成整个建筑计划——或者不设法努力去完成。根据《党的生活》的一篇报道，未完成的建筑计划的数目从 1951—1956 年增加了二倍之多。1958 年夏天《消息报》报道了一个十二年前就开始建设的矿井的情况。根据这篇报道，有 85% 的计划用在新建筑项目的建设投资被冻结了，因为建筑没有完成。〔19〕

也出现过整个工厂都是明显的计划错误的情况。在奥尔斯克—哈利洛沃建立了一座冶金工厂，它的第一座高炉是 1955 年开始投入生产的。但是没有人对它生产的特种钢感兴趣。这样就不得不把这种贵重的金属当作普通的金属来销售，其价格远远低于成本。〔20〕

1961 年 9 月《消息报》报道了砖瓦窑的情况。原文是这样：

“……由于两种原因而停工了：第一，因为在那里建造砖瓦窑就是错误，那里没有原料（没有粘土——作者）；第二，因为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区的砖瓦生产要大大削减。”〔21〕

这种计划错误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在哈萨克斯坦建造最大的五金工厂之一时，人们建成了工厂，但是出入道没有完工，以致整个工厂就不能进行生产。〔22〕

不过，如果领导试图把“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与行政上实行“赢利原则”或“物质刺激原则”结合起来，那么“计划经济的混乱”就会更为严重。

至于采取纯行政的措施使经济更加赢利这种尝试的结果如何，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在开发远东时通常是将建筑材料从国家的欧洲部分经过漫长的路途运来。后来，交通部发现，这样代价太高，就下令全面禁止向东运输建筑材料。结果是：乌兰—

烏德城再也不能从位于它西方九十八公里的一座工厂里买每車皮一百五十卢布的水泥了——这个城市不得不从最近的、約一千公里远的、但却位于它东部的工厂买水泥，而要花几千卢布。〔23〕

后来，人們还試圖把数量計劃同貨幣計劃結合起来，并对生产领导者进行扩大銷售額和降低成本的物质刺激。但后果又是不良的，因为所提供的产品的大多数价格——因而以及对各个企业所产生的額外的費用——或多或少都是任意規定的，所以为各种阴谋詭計留了余地。

如果为各个企业制訂了卢布計劃，那么它們就任意提高它們产品的价格，而这往往是以“加工优良”为借口，并且降低生产量。例如，据《消息报》的一篇报道，有一个玻璃工厂 1960 年使高质量的餐具生产按貨幣計算提高了一百万卢布，但比 1959 年少供应了八万件。报纸写道，这个工厂把碟子镀上金边就提高了它們的价格，因而解除了提高碟子的生产量的义务（碟子严重缺乏）。〔24〕

如果要求生产者降低成本，那么，他們就不去精心維護——并且毀坏掉投資物資。普通的拖拉机手就开始这样干了。

“拖拉机手并不像真正的拖拉机手應該的那样对維護他的拖拉机感兴趣……”，1956 年一位机器拖拉机站的站长这样写道。还有一个拖拉机手，他不保养他的机器，却更为有利：他比进行各种維修检查的人賺得都多。他有更多的时间来“开垦更多公頃的土地”。〔25〕

也有这种事情发生，比如一个載重汽車司机在放空車时比他的确实运输貨物的有理想的同事賺的錢还多：

“……他得到同样多的里程費，除此之外还有一笔節約汽油和輪胎的奖金，采用奖金是为了提高司机对節約的兴趣。”〔26〕

然而，这种“直接”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則和“物质刺激”的“資本主义”原則的溶合，在工业和矿业方面造成了最严重的損失。例

如1953年《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写道：

“进行预防性检查和经常性的修理要矿井自己负担用费，而为此所付出的费用就会影响到生产成本。相反，总检修在“总检修”项目下可作为折旧得到分期补偿。简言之，总检修不需要矿井自己掏钱。因此，可以看到矿井领导人节省经常的修理，而对机器进行总检修，即使还根本没有必要，也这样作。”〔27〕

换句话说，企业领导人对毁坏机器感兴趣，因为越是国家花钱修理他就越能“降低”成本，并且得到“赢利的”企业经营奖金就越多。尽管人们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这种阴谋活动，但是，根据这篇报道总还是有十亿（旧）卢布仍然作为“额外的损失”和十五亿（旧）卢布作为“总检修费用”报销了。

这篇报道是1953年，即赫鲁晓夫时代初期发表的。尽管进行了各种改革，1960年《共产党人》杂志还是能够（或者必须）确认：

“如果一个企业超额完成了计划，它就被认为是赢利的，而且会得到物质报酬，尽管为它……偿付了几百万卢布（的债务），因为投资的物资过早地报废了，尽管在货场上堆放着没有安装的（荒废的——作者）设备。”〔28〕

显然，所有这些弊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竞争给每个生产领导者以一个非常强烈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不能建造不进行生产的工厂，因为这些工厂既没有原料也找不到顾客——或者由于耽误了经常的修理“只好”让投资物资坏掉。

然而如果人们考虑到，那些从自身的经历中体验所有这些弊病的俄国技术知识分子，同时也知道他们的多数人民是在怎样的非人的条件下生活，那么人们就会理解，他们在为维护其所提出的、为更好地管理经济所必需具备的政治前提的（阶级）要求时，有充分权利代表全民说话。①

新知识分子要求在维护其阶级利益时能代表人民讲话，要求

“思想自由”和“消除恐怖”(这两个詞最能說明其特点)。这两方面的要求必須作为統一体来加以研究，因为只有消除了恐怖才可能有思想自由，反过来，消除恐怖是以精神自由或者要求精神自由为前提的。

关于共产党的大規模恐怖和集中营制度已經写得很多了，以致沒有必要再討論这个問題。不过，有一点值得指出，苏联保安机关至少在十九年中（1934—1953年）是由一些被苏联法庭正式譴責为犯罪分子和判处死刑的人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局长海因利希·雅戈达（1934—1936年）、内务人民委員尼古拉·叶若夫（1936—1938年）和拉弗伦提·貝利亚（1938—1953年）。

在同一时期，思想的压制采用了极其罕見的形式。例如1950年5月有影响的莫斯科《文学报》用下面的論据来批評了一些科学杂志：

“我国有几份科学杂志在反对外来思想影响方面还不够有力，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反动、反人民的本质揭露得太少。而这正是它們的最主要的义务！”

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必須从杂志上清除掉。每一份杂志都有义务积极地教育从事科学的干部树立馬列主义的世界观。”〔29〕

反对恐怖和爭取思想自由的斗争很早就开始了，大概是在第二次布尔什維克革命初期。

① 由于西方常常把技术知識分子的使市場經濟的原則注入苏联經濟的要求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出来当作是这些要求的实现，所以，需要加以說明：1963年4月底，当这本书已經在写作过程中，尼·謝·赫魯曉夫再一次证实，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找到一条从数量計劃过渡到另外一种管理共产主义經濟的形式，他說：

“国家計劃委员会應該改变現行制度。現行制度只（！）根据生产的吨数来計劃和評价冶金工厂成績。人們應該（早就應該！——作者）制訂出一种能最有效地促进生产的节约的綜合指标制度。”〔28a〕

俄国作家亚历山大·阿菲諾盖諾夫（1904—1941年）作为第一批中的一員登上角斗場。1930年，他写出了話剧《恐惧》，并让他的主角——一位研究（苏联）人的行动动机的教授鮑罗亭說：

“在被調查的人当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經常生活在担心遭到指責或丧失其社会地位的恐怖之中，苏联官員害怕不断的清洗运动。党的工作人員害怕被人指責为犯了某种錯誤。科学家怕人指責有唯心主义世界观，工程师怕人把他的活动看成有害的工作。恐怖糾纏着人們，人变得疑心、沉默、不可靠和毫无原則。恐怖引起普遍的貧困，因为如果不受到申斥，就沒有人会去做出点事情来。消除恐怖，消除造成恐怖的一切，你們将会看到在我国会出现一个怎样丰富多采的、具有創造性的生活！”^[31]

虽然阿菲諾盖諾夫企图使人們接受他的剧本，但是在这以后的年代中还是遭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大恐怖”的时代来到了。

在斯大林死后，“消除恐怖”的要求又作为第一批要求之一提出来了，其表現是：1953年夏天“大恐怖”的主要散播者——保安机关领导人拉·貝利亚——的引起当时轰动一时的覆灭。

反对恐怖的另外一些高潮是：第一次“非斯大林化”即尼·謝·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1956年）对斯大林的“清算”，刑法的大改革（1959年），尼·謝·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1年）上所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第二次“非斯大林化”。把斯大林的塗有防腐香料的尸体搬出陵墓埋葬的決議，形成了这一次“非斯大林化”的高峰。

这两次“非斯大林化”是很复杂的現象，我們后面还将詳細地进行研究。此刻對我們說來肯定下面这几点也就够了，即关于法律保障的官方步驟无非是对下层要求的回答，法律保障的思想几乎总是同精神自由和常常是同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呼声分不开的。这既可以从苏联的官方和非法的无数文学作品中得到

证实，也可以从把政治，首先是立法纳入法治国家的轨道的试图中得到证明。

有一系列小说无情地描写过什么是个人迷信，什么是恐怖统治。杰出的作家亚·索尔仁尼津这样报道《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上的一次事件》；第一篇小说是讲集中营的一天——这是他连闰年计算在内的三千六百五十三天中的一天；第二篇讲的是一个中尉的战争经历，他被偵探狂热所吸引，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怀疑并告发过一个人进行间谍活动，——此后他再不能摆脱对一人之死负有罪过的感觉。在谢尔盖·伏罗宁的一篇短篇小说《黑夜里的恐怖》中，一个人在黑海休假旅途中的一天夜里坦率地同他的邻居进行了谈话。他说了下面的话：

“人不能隐蔽真理。人应该随时随地说出真理，那时一切都会是异常美好的。人们不应该恐惧。我们有过太长时期的恐惧。现在恐惧还藏在我们的心理。人们要从这种令人抑郁的感情之下解放出来，需要几年也许几十年。我不怕讲出真理。”

但是，恐惧在夜里却还是笼罩了他——他中断了自己的休假，并且在下一个港口仓皇逃离船只……〔32〕

这儿我们已有另外一方面材料：这是一系列用诗和散文写成的纲领性的声明。一位年轻的作家安那托利·格拉其林，在他的短篇小说《新年的第一天》中让儿子问他的父亲：

“我们应该怎样继续活下去？我们应该怎样继承父业而不重犯他们的错误？……我们不愿作一个‘万众一心’的群众，不愿作伟大政策棋盘上的无声无息的棋子。我们要自己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要有寻求的权利。”〔33〕

或者是R·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

“……要人相信明天的天堂是很容易的。”

要人相信今天的乐园却比登天还难……

祖国啊！

我們再不会說：有人为我們着想！

我們知道了这将如何告終……”〔34〕

叶甫图申科著名的詩《斯大林的继承者們》也是属于这一流派的。当人們把斯大林的尸体从陵墓中抬出去的时候，他写下了这首诗：

“大理石默默无声。
玻璃的光亮默默地时閃时熄。
卫兵們象是青銅鑄成，
默默地在风中佇立。
可是一股輕烟从棺材里升起。
当它被抬出陵門时，
隙縫中还传出了呼吸。
他也默默无声，
也这样！——
但却是阴森森地默默无声。
他在沉思默想。
他只是装作入睡。
因此我向我們的政府
提議：
墓碑前的哨兵——增加
一倍、
两倍，
不能让斯大林起来，
还有和斯大林相連的

过去。
我指的过去，不是神圣的豪迈的
过去：
那过去有土西铁路^①，
有馬格尼托工厂，
还有柏林上空的旗。
我指的过去
是中伤，
是监禁无罪的人，
是忘記人民的福利。
他有远見。
他在斗争的規律中增长了智慧，
他把許多继承者
在人間留下……
不，——斯大林沒有投降。
他认为死——
可以弥补。
我們从陵墓里
把他
搬开。
但是怎样才能从斯大林继承者們身上
把斯大林搬出？！
有的继承者在退休时际剪修玫瑰枝，
可是他們暗地里却认为
退休不过是暫时的現象。

① 指“劳改营”或“特种营”。——譯者

有的人
在讲台上甚至大罵斯大林，
可是在夜里
他們却
对过去的时光念念不忘。”

詩人用这样的詞句来結束这首詩：

“只要斯大林的继承者們还留在大地上，
我就觉得
斯大林仿佛还躺在陵墓中。” [35]

要正确评价这种詩的政治意义，人們就應該知道，在俄国詩朗誦成为純政治性的集会，有多大地方，它就能吸引多少人，多至五千或一万五千人并非罕見之事。素負名望的詩人詩集，十万册在短短几天之內就会銷售一空。

在立法方面，向往法治国家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证明。《社会主义法学》杂志在1962年初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最优秀的苏联法学家之一、科学院通訊院士米·斯特罗哥維奇。文章写道：“多年来，米·斯特罗哥維奇一直在为刑事訴訟原則体系和无罪假定論而辯护，辯护的方式同革命前的法学家著作……一模一样。米·斯特罗哥維奇不加批判地重复資產階級作者的观点，从而美化了資產階級的訴訟法規，支持了以另一种名义在苏联建立陪審法院的建議。” [36]

以全民的名义就可以提出建立法治国家以及爭取思想自由的要求，那是明摆着的事。只要強調指出一点就够了，即技术知識分子和新知識分子对此特別感兴趣，因为恐惧和思想不自由的消除，對他們來說不仅仅是个人安全和個人願望的問題，而且也是执行

本身职务的先决条件。阿菲諾蓋諾夫在 1930 年說过：“恐惧造成了普遍的貧困和苦难，因为沒有人做不受責备的事。”他的話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适用。

恐惧在生产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从《文学报》在斯大林时代快結束时所发表的一篇有关法律出版社的工作报告中就可以觉察出来。报告首先指出，出版数量年年减退，并且說：“法律出版社为什么停止出版学术論著？……原因应该在胆怯和怕担风险方面去找。

“当时，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受到苏联党和国家报刊的批評……出版社领导人因此作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有害的結論：

“(1)有新思想……或者有爭論題材的书籍不得出版（但願不这样！）；

“(2)其书籍在报界受过任何批評的作者不得納入出版計劃；

“(3)凡是已經过检查而沒有受到批評的东西，都应予以出版……

“(4)一般地說——出版的东西越少，日子就会过得越安宁一些。”〔37〕

这个报告不仅給我們描述了恐惧的后果，而且也描述了司法的情况：法律准則不断更改，法律家比誰都更清楚地知道，法律保障是多么沒有保障。这就說明了这方面的停滞状态……

由于害怕負責任而形成的停滞状态，絕不是只在出版事业方面，或是在与政治有关系的部門才能观察得到的。

停滞状态在工业方面蔓延更广，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工业部門的领导人經常是宁可不做冒险的試驗。例如不采用新机器，并遵循这样一条原則：干得越少，日子就过得越安宁。

尼·布尔加宁在 1955 年 5 月在全苏工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报告中說：

“在我們的工业方面还有这样的领导人，他們宁可生产陈旧的机器，采用过时的技术，而不願意去惹那些同实行新技术……联系起来的麻煩。”

两个月之后，他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又重申了同样的观点：

“制造陈旧的机器是要简单些。过渡到制造新机器以及对工艺过程的改造，需要大量的劳动，克服种种困难。在这方面也可能遇到不愉快，但願不会遇到。这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事情。”〔38〕

这次讲话是促进技术进步“行动”的一个开始信号，同时也为此做了一些工作。可是《真理报》在1959年6月却报道說，莫斯科“紅色无产者”工厂正在制造1936年型式的半自动化机床。几天之后，《消息报》报道了列宁格勒的一家工厂，其名字頗为讲究，叫“弗帕里奥德”（前进），还在成批地生产1929年（I）型式的机器。

在1960年的莫斯科州党代表大会上，对那些宁願在別人进行冒险实验之前等着瞧的“狡猾狐狸”，也进行了一番責罵。1961年4月，一个国民經济委员会的主席在《經济报》上写文章，指責“有些經济干部”对采用发明創造和合理化建議的事完全漠不关心。〔39〕

人們不禁会說：但是苏联工业經常取得很好的成就，有时甚至是尖端的成就。尽人皆知的卫星和奇迹飞机图—114难道不就是嗎？这些成就，从俄罗斯民族立場来看和从非俄罗斯民族立場来看是不尽相同的。

这些成就对一个非俄国人，特别是对一个出身于发达国家的人來說，也可能是意外的事，可是，对于一个俄国人來說，这样具体的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已經不断地取得这样的成就。对他來說，自己国家可能取得的成就和实际上取得的成就之間的矛盾更为重要得多。有思想的“苏維埃人”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認識到恐惧是不幸的原因之一。①

还有第四类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技术知识分子可以以人民的名义说，他们也正在这样说：值得为世界革命去费力气吗？

俄国人对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概念的看法同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① 对于一个俄国人来说，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把对外政策同意識形态上的教义联系在一起，使自己的国家实际上只成为实现这一主义的工具，是否适宜。

回答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尤其是目前的世界革命的概念——要是从俄罗斯民族立场来看——有着不同的意义。

起初，在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这种思想是同下列希望联系着的：

1. 按照不可阻擋的历史規律，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是直接摆在面前的事情，而且不要用俄国的援助，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会发生。

2. 世界革命帮助俄国完成了它的革命，解决了它的问题。

3. 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将带来世界上的持久和平。

换句话说，当时对所有出自国内政策考虑而拥护俄国革命和支持取消私有制的人来说，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和俄国爱国主义之間并没有矛盾。因为那个时候，在俄国的解释中，并不具有帝国主义的野心。

我知道，大多数观察家却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世界革命思想才真正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化身，而且永远是这样。这种说法对于缺少土地或是从事貿易的民族来说，那是不难理解的，尤其是在俄国人中間过去有过现在也有帝国主义者。

可是，我想坚持我的看法，其理由如下：

俄国将来也不需要土地。俄国人确实不是沒有空間的人民，即使外交上的成就可以迎合个别的人的虛荣心，要把扩张主义的外

① 參見克勞司·梅納特的《蘇維埃人剖視》中譯本第 118—203 頁和第 290—299 頁中有关思想自由和法律保障問題的詳細分析。

交政策綱領变为俄国人民运动的基础也肯定是不可能的。内部殖民化，尤其是对西伯利亚的开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也许是几百年的时间，而国内市场在可預見的将来是无穷尽的。因此，“典型的”扩张原因并不存在，扩张主义政策至多是政府的事情。

其次，俄国的历史使持久和平的愿望成为每一个俄国人能够为之而欢欣鼓舞的理想。

最重要的全民性任务不是扩张，而是保障长达二千五百公里的空曠无阻的，但是又很难捍卫的西部边界。几百年来，这里曾經是外国进行大规模侵略的入侵大門。每一次侵略都使俄罗斯国家的存在成为問題，同时每一次侵略都使俄国遭到无数的灾难和損失。1605—1606年是波兰人，1709年是瑞典人，1812—1813年是法国人，1941—1945年是深入俄国内部的德国人給这个国家带来了重大損害。俄国在每次抵抗中都打了胜仗并取得胜利品，这可能使政府和历史哲学家感到意气风发，可是却不能使那些在創造这些历史时失去生命的普通人感到欢欣鼓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倒下—个德国人，就有三个俄国人死去。因此，正是普通的俄国人为了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列宁想过，并在1917年把希望首先寄托在德国的革命上——主要把希望寄托在持久和平上，把希望寄托在永远不会有军队越过西部开放的边界来搶劫俄国的城市和乡村，这一点也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还要提醒—下，对于1917年的俄国人來說，尤其是回忆到奇耻大辱的1904—1905年俄日战争，以及想到极不得人心也不怎么順利的反德战争，就会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布尔什維克政府的第一个行动是发表对德国及其同盟国实行和平的宣言。在1917年那个时候，对于那些不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而拒絕共产主义的人们來說，除了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解为持久和平思想以外，沒有理由把它作其他的解释……

自此之后，已經发生了許多变化。早在二十年代，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人們就已經发现，不能期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胜利。

但是，首先人們仍然可以希望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全体劳动人民渴望共产主义革命，那里的共产党人会成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并有足够的力量給苏联——各国劳动人民的祖国提供重大的援助。信仰共产主义和对俄国友好是一致的，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在当时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俄国爱国主义者可以把共产国际从俄国資金中撥給的支持当作是有希望带来成效的投資而加以接受。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經驗使世界革命思想在苏維埃体系范围内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經驗說明了：

(1) 在軍事冲突的情况下，外国共产党不能給苏联以值得一提的援助。

(2) 外国共产党人如果是借助于苏联軍隊而在国内上台执政的，那么他們就只好违背人民的意志，往往只能借助苏联軍隊的一再干涉才能保持政权。

(3) 信仰共产主义根本不意味着非要同俄国友好不可。

西方对民族共产主义的整个問題的看法，是同俄国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共产党同志是否互相爱护还是互相仇恨，他們是互相称贊还是互相謾罵，这对西方人來說是次要的問題。問題在于，他們在遇有机会时将站在那一边战斗。而至今的一切經驗在这方面表明，共产党人最后还是联合起来的。

可是，对一个爱国的俄国人來說，事情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铁托主义”已經向他证明，俄国对外政策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結合在一起是不合理的。

俄国对于将来的铁托們或毛派的支持，即不可靠的同盟者的

支持，不能不付出高昂的代價，因為他們首先感到興趣的是對俄國進行詭詐。他們大都要價很高，可是又不帶來任何好處。當他們一旦掌握了政權，也就是說能帶來好處的時候，他們總是圖謀不軌，難以控制，或是採取完全敵對的態度。俄國正處於同各國絕大多數人民以及受共產主義統治的絕大多數人民的衝突中。它應該估計到，总有一天會因為毛或卡斯特羅而被卷進一場原子戰爭……

還要補充一種情況。我們以後將會看到，黨機器反對經濟和政治領導任何自由化的鬥爭，首先是在主張世界革命必須向前推進的情況下進行的；黨機器只有做到把國家的整個力量都用來為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服務，用來為爭取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鬥爭服務時，才能有效地對付新知識分子對自由化的要求。在這方面，世界革命思想正在成為俄國走向更美好未來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世界共產主義思想在發展中的“辯證飛躍”，在這裡也已經完成。

不管問題是否在於意識形態同計算尺之間的鬥爭，是否在於思想自由，是否在於消滅恐懼，還是在於放棄把俄羅斯國家的對外政策同世界共產主義思想聯繫起來，無論如何，問題的癥結在於老百姓的福利和幸福。新知識分子正是由於這一理由而感到自己在反對黨機器的鬥爭中是全國人民的代言人。這可能也是新知識分子，不論他是詩人，法律家，國民經濟學家，或是政治家之所以有膽量捍衛自己的思想的原因，這種膽量對於好些西方觀察家是不可理解的。

我們以這樣的認識來開始我們的探討，即共產主義掘墓人的勝利所需要的第三個前提條件是：有實際可能性組織起來，並樹立自己的思想，進而採取行動。而目前並不具備這一前提條件。但是，曾經有過一個時期，蘇維埃人在很狹小的範圍內，可以作為自由公民組織起來反對共產主義，如果要对单独在苏联发生的过程

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一經驗就应予以慎重的分析。

这个时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在这里却想到了所謂弗拉索夫运动。

我們在这里不可能对弗拉索夫运动的历史一一加以叙述，但是，最主要的事实还是要提及一下。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弗拉索夫中将在被俘之前是苏联杰出的將軍之一。尤其是在 1941 年冬天的莫斯科保卫战中，他表現得很出色。在他同第二突击軍企图解救被德国人包围的列宁格勒时，于 1942 年春季被德国俘获。

不論在思想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們都不能把弗拉索夫說成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运动的首創者。因为当俄国解放运动——俄国人反对苏維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已經形成之后，他才参加进来。这一运动开始于第一个跑到德国人那里要求武器的那个不知名的人，而这也許是在德苏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天发生的。

弗拉索夫中將會經企图把分散在整个前綫的这些志願人員聚集起来，建立新部队，使之成为一支具有打击力量的內战軍队。这是一个完全现实的計劃，因为志願人員的数量很大。（根据美国作家尤金·萊昂斯的材料，在战争的各个时期，約有八十万前苏維埃公民在德国軍队中服务。）可是，弗拉索夫却遭到納粹大人物的激烈抵制，首先是遭到罗森堡和希姆莱的激烈抵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弗拉索夫的主要思想（就象其他所有的俄国人一样）——只有通过俄国人自己才能战胜俄国——是同俄国人下賤和德国民族高貴的納粹主义概念相矛盾的，以致直到 1944 年 11 月才允許弗拉索夫开展一些活动。

1944 年 11 月 14 日，以安·安·弗拉索夫为首的俄国各族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布拉格宣言》发表了。但是，德国政府对于弗拉索夫运动也沒有一致的路綫，希特勒甚至坚决地拒絕亲自会見弗

拉索夫，而把整个事情交给希姆莱。

第三帝国崩溃后，弗拉索夫将军被引渡给苏联。1946年8月1日，苏联报界发布消息说，安·安·弗拉索夫将军及其部队的其他十一个将军已被判处死刑，并已处以绞刑——没有说明理由。

为了正确地评价弗拉索夫运动的历史意义，有必要考虑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从曾经同希特勒进行过合作的政治活动家这一意义来说，安·安·弗拉索夫不是一个合作者。他同德国人合作的根源不能从他在意识形态上或在组织上依靠希特勒这方面去找，而应该从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方面去找。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明确的反战态度，而苏维埃国家的奠基者同德国总参谋部进行了如此密切的合作，以致他在1917年4月可以从在瑞士流亡中自由地通过德国回到俄国。自这个时候起，有一个原则在所有苏联人中起着作用，这个原则是“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不论这个敌人是谁。

第二，德国领导不理解俄国解放运动，而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常不愿意地——宽容了这一运动。所以，首先要看到这一历史事实，即好几十万真正的苏联人是在苏维埃时代成长、培养起来的，而大多数又是在苏维埃时代出生的（德苏战争爆发时，服现役的人是1921—1923年出生者），他们利用了第一个机会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武装斗争。

第三，这已经是安·安·弗拉索夫中将其亲信的个人功勋。这一斗争是明确地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弗拉索夫是唯一的准备同希特勒进行军事上合作，而又不接受希特勒的领导原则，也不接受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的人（这大大地延缓了德国人对他的重视）。从我们已经提到的《布拉格宣言》的文件内容中可以清楚地

看到这一点。宣言首先试图同 1917 年的二月民主革命连接起来，并且谴责苏联共产党欺骗人民、奴役人民。宣言还为俄国人民的新国家制定了下列原则：

甲、推翻斯大林的专制统治，把俄国人民从布尔什维克制度下解放出来，把俄国人民在 1917 年二月人民革命中所获得的权利归还给他们。

乙、在缔结一项体面的对德和约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丙、建立一个新的、自由民主的、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剥削者的国家制度。

序言之后，阐述了被认为是俄国各族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目标的如下十四点纲领：

1. 俄国各族人民平等，在民族发展、自决和国家独立方面有真正的权利。

2. 建立人人有工作、国家的利益在于提高福利水平和民族发展的国家秩序。

3. 维护和平，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尽一切可能发展国际合作。

4. 采取大规模的国家措施来巩固家庭和婚姻关系，实行真正的妇女平权。

5. 废除强制性劳动，保障全体劳动人民有自由劳动的权利作为物质福利基础，对各种劳动要规定（最低）报酬，以保证文明的生活水平。

6. 废除集体农庄，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无偿地交给农民。土地耕种者有采取土地利用形式的自由……

7. 以劳动得来的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恢复商业、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为了发挥积极性，个人有参加国家经济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

8. 知識分子有为人民幸福而进行自由創作的可能性。

9. 保障社会正义, 捍卫劳动者不受任何剝削, 不論其出身和从前的活动如何。

10. 无例外地对所有人实行免費教育、医疗照顾、休息、保障老年的真正权利。

11. 废除恐怖和暴力的制度。取消强迫移民和大規模流放。实行宗教、言論、集会和出版的真正自由。保证人身、财产和住宅的不受侵犯。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实行独立和公开的司法制度。

12. 释放布尔什維主义的政治犯, 释放牢獄和集中营中所有由于反对布尔什維主义而遭到报复的人。对于放弃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維主义而奋斗的人, 不論他們是出于信仰或是被迫进行过这一斗争, 不加以报复和迫害。

13. 国家出資重建受到战争破坏的城市、乡村、工厂和企业的人民财产。

14. 国家救济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属。^[43]

如果我们撇开綱領中有時間性的那几点不管, 那么, 这个綱領显然就是我們从技术知識分子的情况分析中所得出来的那个綱領, 就非常象是技术知識分子的思想动向。許多“苏維埃人”在第一次有机会能够稍微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組織起来时就已制訂了这样一个綱領, 这可以說是我們分析正确的新证明。同时, 这大概也可以說证明, 将来一旦遇有机会他們也会提出类似的要求。

斯大林的最后灼見：回到 馬克思那里去——未來的兵營

如我們所知，約·維·朱加施維里——斯大林是第一個看到共產主義掘墓人在蘇維埃社會內部的人。出於這種認識，他提出兩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在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命題（1937年）和上層建築對維護其基礎起積極作用的命題（1950年）。

斯大林不只是指明威脅俄國的共產黨獨裁的危險；而且還制定了抵抗這種危險的措施。斯大林在關於語言學問題這篇著作里給“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下了如下的定義：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是不能停滯不前的，——它是在發展着和改進着。……因而，它的個別公式和結論不能不隨着時間而改變，不能不被適應於新的歷史任務的新的公式和結論所代替。

馬克思主義不承認絕對適應於一切時代和時期的不變的結論和公式。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的敵人。”^[1]

如果我們把共產黨人的這些行話翻譯過來，就是這樣的：

(1) 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他不僅要建設社會主義，而且也要建設共產主義，這是不成問題的。這在當時決不是一件不言自喻的事，因為人們認為，共產主義只能在世界範圍內，也就是說在共產主義世界革命成功之後才能實現。

(2) 在共產主義建設中應該走新的，“經典作家”所沒有指出

的道路。

两年之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篇著作里，也是他最后发表的著作里，提出了新的“行动指南”。他指出了如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并阐述了党为这一政策应该作些什么工作。斯大林具体认为：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第一，必须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第二，必须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

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发展……使社会成员能够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于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斯大林还提出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前必须解决的另外几项任务：

“为了作到这一点，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

为了作到这一点，还需要实行普及义务的综合技术教育……

为了作到这一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要继续不断地有系统地降低日用品价格。”〔2〕

这个纲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传统观点，尽管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被不正确地认为是乌托邦。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在1927年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关于共产主义未来的谈话，那就会很容易相信这一点，他说：

“要是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做一个……解剖，那末它就是这样的

一个社会：(甲)在那里不会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只会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乙)在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政权，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们将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经济上自己管理自己；(丙)在那里按计划组织的国民经济，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丁)在那里不会有城乡的对立，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戊)在那里产品将按旧时的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实行分配，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己)在那里科学和艺术将获得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可以达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里每个人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糊口而操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势的人’。如此等等。”〔3〕

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把只存在一种形式的所有制这个问题作为第一点提了出来，这是和马克思完全一致的。1952年他要求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请读作：把集体农庄国有化，这是走向这个方向的一个步骤。

(乙)点包含着几个思想，必须分别加以探讨。

如上所述，“阶级”这个概念，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因此，“无阶级社会”这一概念的具体含意也取决于人们对“阶级”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基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关于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的观点是与这一信念不可分的，即将来劳动分工将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最早合著的作品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已宣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每个人能够“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

在那篇无疑是在马克思主义“完全成熟”时期发表的作品——《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里，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向共产主

义过渡要以劳动分工的消失为其前提：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級阶段上，当那奴役（1）人們、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消失后……只有那时……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

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費了不少笔墨来駁斥“杜林先生的幼稚的（1）观念”，“他以为社会可以掌握全部生产資料，而……首先不要消灭旧的分工。”〔6〕

他們之所以坚持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消除旧的社会分工，还出轍于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就有点不言自喻的口气写道：“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7〕

为使劳动果实不落到个人手里，就必须消灭劳动分工，实现人們相互替換，因为个人才能和真正废除私有制是不相容的。

按照恩格斯的見解，消灭劳动分工决不仅仅改变工人的处境。恩格斯也为“有教养的階級”操心，他写道：

“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間接剝削工人的階級，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的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上空虛的資本家，为自己的資本及自己的利潤欲所奴役；……一般的‘有教养的階級’，为各种地方限制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自己的殘缺的专门教育和終身束縛于这一专门技能的事实所奴役——虽然他們的专门技能，只是在于坐吃現成，无所事事。”〔8〕

从那时以来情况有些变化。事情很清楚，分工并没有消失，而是越来越复杂化，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結構的复杂化。这样，斯大林不得不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一书里耍許多宣传伎俩，以使共新的論点得以通过：

“工业和农业之間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們之間任何

差别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这至少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斯大林为了使其新论点站得住脚，甚至作了某些自我批评。他在书中写道，“持有相反论断的同志们，大概是依据我的某些言论中……的一个说法。……但这就表明，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把它抛掉。”这还不够——斯大林走到歪曲“经典作家”的地步，以便证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没有被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而只提出过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9]

从上面引证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的那些话来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就在同一篇著作里斯大林还指责恩格斯说，《反杜林论》里提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大城市将消失的论断是错误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估价社会主义社会商品流通的作用时，详细地引述恩格斯的话，把恩格斯看成最高权威。

至于这种让理论去迎合现实，迎合执政党需要的作法，是“修正主义”还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共产主义就是大多数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的所作所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他们才可以决定，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坚持、改变或者抛弃个别理论。我们所能作的不过是指出，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作这种改变。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这里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对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理解已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些不同；不消灭劳动分工，而只改变所有制。

斯大林死后，馬克思主义关于无階級社会的理論的瓦解不可阻擋地变本加厉起来，这一瓦解在 1962 年党的机构的改革时达到了空前的頂峰。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共产党人本身也“奴隶般地被迫使”去服从“第一次大分工”，从而使“乡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中，而城市居民，則为各人专门的手艺所奴役。”这种情况取代了那个引为驕傲和富有吸引力的理想，即共产主义将鏟除“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10]

这种对馬克思主义原始观点的修正决不是随心所欲的。殘酷的現實迫使斯大林和赫魯曉夫作这种修正。同样的现实也曾迫使列宁将地道的馬克思主义的經濟宿命論观点称作是“对自发性的崇拜。”

共产主义理論家們試圖去拯救他們的理論中那些可以拯救的东西。建設无階級社会和致力于玄妙的“国家消亡”就体現在今天的綜合技术教育組織上，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这是必不可少的，以便使社会成員不致于“終身束縛于某一种职业”，就是說尽可能地交替工作。党的領導所以对此那么感兴趣，是因为这会使它便于对社会进行监督。

对于国家消亡实际上应理解为企图尽可能地把苏維埃国家的許多职能移交給所謂的社会組織，这里應該考虑到，共产党独裁的“国家”的含意是与其它制度有所不同的。它所少的，是政策的决定不是由国家作出，而是由党。它所多的，是它也行使那些在其它国家里由私人、各种公众机构、城市、經濟集团等行使的职能。其中有些职能應該移交給社会組織，这里有些情况只是冠冕堂皇的标签換記而已，例如国家把对体育的領導变为“社会”領導。在另一些情况下是起用不拿錢的干部，到一些本来是有报酬的工作里去“尽义务”。因为这牵涉到“按需分配”等一系列問題，我們后面再来談。不断的进行清洗的原則也被看成是“国家消亡”的步

驟。

讓我們再回到斯大林和美国工人代表团談話的問題上來。他描繪“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以下幾點是：

“（丙）在那裡按計劃組織的國民經濟，無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方面，都是以高度技術為基礎的”；

計劃經濟構成共產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再者，這一點不是標準，而是要求，蘇聯領導誠心實意地致力於把“尖端技術應用到工農業中去”。但並不總是卓有成效的。

“（丁）在那裡不會有城鄉的對立，不會有工業農業的對立。”

最後是引起爭論和誤解最多的綱領要點：

“（戊）在那裡產品將按舊時法國共產主義者的原則實行分配，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3]

關於這一點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已談得很多：

“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上，……當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變成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當……生產力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都盡量涌現出來時，只有那時，……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按需分配！”^[5]

實際上這一原則並不那麼振奮人心，也決不是特別吸引人的。這句話的第一部分已適合於社會主義階段，社會主義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它保證完全就業（這在實行徹底的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是很容易作到的）；保證每個人都有工作（這和天堂沒有什麼聯繫），同時又剝奪人們選擇職業甚至勞動場所的權利，因為，每個人有義務“各盡所能”地去工作，而對能力的評價卻操在國家手裡。

比較有趣的是第二部分，這是和社會主義公式的主要區別：“按勞分配”由“按需分配”來代替。如果有人從中得出結論，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一個人想占有多少就占有多少，那他將會大失所望的。

計劃經濟既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應該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是，仅仅是純技术的原因就已經使計劃工作不能考虑消費者的多种需要，甚至爱好。早在1958年，苏維埃的报界就把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可随心所欲地进行消費的思想，当作一个問題进行了特別激烈的討論并給予有力的駁斥。Z·A·斯捷潘尼揚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写道：

“只有无政府主义分子……才会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无限制地拿取消費品，稍加玩賞就把它們扔掉，再要新的等等。”^[11]

苏联意識形态专家中的元老、年迈的科学院院士斯·古·斯特魯米林在原則性的文章《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中写道：

“在确定这种(社会)需要时，各个消費者的随心所欲是不能允許的。在社会需要的发展中，同样也存在着普遍适用于社会主义計劃經濟的尺度和規律。‘按需分配’的原則和‘要什么，給什么，要多少，給多少’的原則并不是一回事。”^[12]

問題首先是，社会需要归根結蒂是要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加以安排的，但由誰来确定它們呢？答案是可想而知的簡單：由計劃部門，由国家来确定，即使国家已經变成了“劳动者的自由組合”时也是如此。

这就是說，在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里，人人都得到一份由国家規定的消費品和社会服务。

这就产生了第二個問題：这种經濟制度如何鼓起人們作出卓越成績呢？那种认为劳动，并且是一切劳动——也包括倒垃圾，在傳送帶旁干活，挑选卡片等等——有一天都会成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的說法，是过于烏托邦了，不值得进行討論。

但如果詳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也有办法搞劳动刺激。根据目前流行的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繪来

看，平等的理想已經消声匿迹。斯大林在 1934 年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就已經說过，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們的需要也是不同的，^[13]这种思想在赫魯曉夫时代也是广为宣传的。

苏联杰出的理論家和經濟学家、科学院院士康·奥斯特罗維雅諾夫 1958 年在《真理报》上写道：

“既使在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在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則之后，也不会有平均主义。因为人們的需要和爱好将会是不同的。”^[14]

从为数众多的种种提法里可以看出，如果不問其工作多少，每个苏联公民都能分配到最低限度的一份“基本配給”时，就可以說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經完成。关于这一点斯特魯米林写道：

“从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起，就包括供应全体劳动人民一切必需品（至少要达到‘够用’的有限水平），除了免費（由社会供应——作者）用膳以外，……还要免費提供工作服和充裕‘标准的用房’。”^[12]

这里提出了一种絕對“理想”：一份够吃而不太好的飲食（按照斯特魯米林的看法，飲食太好是有害的），工作服，再就是住房方面一种可以“在四分之一一个世紀中”实现的“合理的标准”——每人十五到十八平方米。^[15]

实行这种“基本配給”，领导机关就有办法“鼓励”人們去工作了。在个别情况下可以提高配給水平，这样就隱蔽地保留了“按劳分配”的原則。在这方面，斯特魯米林提出，不必在一开始就完全废除貨幣。

“比如，在公共食堂里免費吃飯可能很富有营养。但这并不排除在飯后喝上一小杯貴些的葡萄酒的需要，当然是花現錢，甚至（！）带一瓶酒回家，款待朋友。”^[12]

况且，人們也可以随意提高免費配給的水平，因为一般說来，

一切都可以理解为免費配給——為私人配備一輛汽車，一座別墅，一艘游黑海的帆船，一架配備有駕駛員的飛機。問題僅取決於當局如何規定“需要”罷了。

另一方面，也可設想，在有些情況下還可以用一種十分厲害的手段：停發配給品。斯特魯米林寫道：

“游手好閑的人在公社里沒有立足之地。我們有徹底教育他們的厲害辦法：‘不勞動者不得食。’”〔12〕

考慮到在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不應當再存在貨幣，就可以理解，停發配給品會迫使人們去干活，這力量並不比想多賺些錢的引誘力小。

斯大林描繪的共產主義“未來社會”的最後兩個“基本特征”純屬宣傳，不值得詳加研究。

總之，可以把共產黨人為我們準備的未來，簡單而恰如其份地稱為兵營中的未來。象在軍隊里一樣，每人都“按需”得到供應。在第一階段，如果搞得好，還能得到少許零花錢，在“公共食堂免費吃飯以後”享受“一小杯貴些的酒”。以後，突出的成績可以得到實物報酬，原則是：超額百分之一得到一張戲票——或者坐一趟公用汽車——或者給例假一天——就象在兵營里一樣。只是這座兵營包括全國和包括人們的一生；在兒童時代，國家負責教育；成年之後，生活的內容一定是勞動；甚至還要把婦女從對兒童的操心中“解放”出來，以便她們在生產中有所作為……①

向共產主義過渡，即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代替“按勞分配”的原則意味着兩件事：

① 在本書付印很久以後，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委員會主席列·伊利切夫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證據。1963年他在中央全會上說：“為什麼不可以規定一種制度，首先是使工作好的人可以休假，去療養院，得到住宅，而少給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人這些好處，甚至不給呢？”〔15a〕

第一，个人再也无权占有超过法定需要的东西；

第二，个人（以及各个組織）再也无权要求和希望得到与自己作出的成績相应的报酬。

一切剩余，一切超过法定需要的产品全部归国家，归中央机构所有——这正是关键所在。

这种情况与馬克思的理想完全吻合。在《哥达綱領批判》里，关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是这样說的：

“（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每一个别的生产者——作者）又从社会儲备中領得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費品。”

而“这里平等的权利（按馬克思的說法）在原則上仍然是资产阶級式的法权”，因为，“生产者們的权利是与他們供給的劳动成正比例的”。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要完全克服这种“资产阶級式的狹隘眼界”，就是說各人的收入不会与他們“供給的劳动量成正比例”了。〔5〕

这样說明情况之后，我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恰恰在1952年发出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指示。

那时的生活水平还如此之低，毫无理由去为“剩余”操心。（至于为数尚少的“苏維埃貴族”的富裕代表，本来是可以行政手段容易地加以控制的。）

斯大林是一位有經驗的政治家，他必須而且能够高瞻远矚。他知道，各种产品的极度匱乏迟早总会克服——归根到底，他本人就曾发出指示，要把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如果不是更高的話”——他也知道，苏联的共产党領導迟早要解决由于相对富裕，甚至由于各种消費品——投資商品的相对过剩而产生的問題。

这應該算是一个新的原則問題，是一个与每一个处于相似的

經濟發展階段的共產黨獨裁生死攸關的問題。

與其早期資本主義替代體的本質相適應，共產黨獨裁可以在長時間里進行最大限度的投資，形成最大限度的匱乏經濟，這樣，運用純共產主義的管理經濟原則（就是說，不用精確計算成本地計劃數量、進行直接分配的原則），就成了解決日常經濟問題的唯一可能的辦法：什麼都缺，所以僅僅為了得到某種產品或社會服務，人們準備付出任何代價，而直接分配（由於黑市交易而減輕了對它的壓力）至少可以保證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最緊迫的需要——這裡我們想的首先必須是生產的需要。

直到四十年代末，人們還想不到，生產出的產品在生產中，甚至在生活中會用不到。但在 1937 年前後，或者略早一些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說明那種在第一個積累周期中實行的“烏拉規劃”已經越來越成問題了。

我們知道，蘇維埃國家在 1937 年左右改變了其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路線，從而也改變了其政治發展的總路線。首要問題不再是資本原始積累，而是生產問題了。在付出了巨大犧牲而建立起來的工廠之間，必須有某種商業關係，這就產生了價格形成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迫切需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計劃經濟的愚蠢”越來越明顯了，特別是當人們試圖規定一種合理價格的時候。快得無以復加的向上爬的時代已經過去，技術幹部已經成長起來，人們越來越不願意忍受弊病了。

從理論上說，價格形成的問題，或者與此有同等意義的經濟受益問題在三十年代初，即早在官方還在經濟中為所欲為的時候就提出來了。

又過了幾年之後，才在這方面作出了一些事情。據說 1941 年才寫成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未定稿。^[16] 該書到 1954 年才出

版。

1943年，战争期间，理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强烈要求结束一直存在的忽视经济理论的状态。第一次有人要求考虑苏联经济计划中的所谓价值规律。^①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所著《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国民经济》（1948年）又进了一步。沃兹涅先斯基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要求承认价值规律是衡量经济成果的标准。这必然会导致要求扩大市场经济的因素，即要求从集权经济向商品流通过渡。

1951年11月举行了一次神秘莫测的“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经济问题讨论会”。这次讨论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出发点。

斯大林在这篇著作里专门用两节的篇幅，并在其他章节里花了不少笔墨来论述“商品生产问题”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他这样阐述他的基本态度：“有人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仍将保持其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这是完全不对的……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他在另一处写道：

“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

^① 由于该文权威性极大，有些观察家甚至推测，文章的作者就是斯大林本人。很可能，该文系尼·阿·沃兹涅先斯基的作品。沃兹涅先斯基在这一时期正青云直上，1943年正式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要求承认价值规律的斗争与他的名字至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钟点数量来计算的。”〔17〕

在这些看来理论性如此之强的论述背后，隐藏着苏联政治中的一个复杂问题，一个涉及共产党独裁在俄国存亡的问题。同时，它们也掩盖着苏联技术知识分子的第一位代言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年)的悲剧。斯大林的话是针对沃兹涅先斯基的这一说法的：

“国家计划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各经济部门间的社会劳动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利益的要求。”〔18〕

沃兹涅先斯基很可能为了这种观点而送掉了性命。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价值规律”呢？对于“价值规律作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力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应作何理解呢？为什么斯大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激烈地推行他的观点？

价值规律无非是说，每种产品不只有一个价格，它还有一种与价格不一致的“价值”。价格取决于供求，而价值则取决于生产这一产品(平均)需要的“必要社会劳动”的数量。

苏联官方的说法是：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商品的交换同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是相适应的。”〔19〕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虽然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但远非任何劳动都能创造价值；完全可能把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浪费在生产无人问津的货物上——而这样是富不起来的。

另外，商品的交换也并非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同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是相适应的”，而是根据其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进行的。而共产党人的官方补充说法是：“价值规律”

起作用正是由于价格脱离了价值。这也不过是空話罢了。

馬克思在世时，“价值規律”就已被否定了，恩格斯不得不花好大力气去保卫它。后来的“修正主义者”康拉特·史密特（1865—1932年）在九十年代前半期說过，即使在理論上是必要的，“价值規律”仍是一种杜撰。約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的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阿齐尔·洛里亚嘲笑說，馬克思“（研究）的价值是，商品既沒有也不可能按照这种价值来出售的价值”。〔20〕

談到資本主义經濟，“价值規律”只有一种价值：它是共产党人剩余价值理論的出发点，由此出发，他們宣称“价值”完全是雇工創造的；而雇主通过以高于成本，特别是工資的价格出售商品对工人进行剝削。

卡尔·馬克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的“交換价值”——即价格——可能与它的“价值”完全不同。例如，在致L·庫格曼的一封信里，他企图借助于对一些真真假假的事情的相当含混的觀察来抹杀这个事实，并且把有不同想法的人称作“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完全使用了蠱惑人心的作法。他写道：

“由于認識到（价值法則的——作者）这种情况在（資本主义的——作者）崩潰前，对于当前状况繼續存在的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就已經崩潰了。永远保持这种无知的混乱状态，也是絕對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21〕

我們完全可以把这个論据翻轉过来：由于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对于資本主义即将崩潰的“一切理論信仰”都崩潰了，而因为馬克思拚命說資本主义一定崩潰，我們免不了怀疑，他抓住“价值規律”不放，是为了使他的 *a priori*（先天的）命題免于崩潰。

即使如此，即使“价值規律”对分析真正的資本主义社会一无用处，那末，在苏联經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价值規律”的 *come back*（重新提出）肯定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苏联的經濟理論家要在虛构的“价值規律”里寻找一种为苏联經濟作出决策的准則，这是容易理解的。經濟国有化并没有(象某些人担心的那样)带来最可怕的后果：扼杀一切积极性。因为各机关完全能够煽起积极性，有时甚至搞得过度。

取消市場产生了更糟糕的影响，因为这样作以后，就没有任何可能来确定实际价格了。例如，如果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土地、机器、厂房值多少錢，如果化肥或原料的售价都是凭空标定的，如此等等，那么，怎么会知道生产一包棉花或一吨鋼值多少錢呢？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一书中說明，集权經濟的价格体系会发展到多么不合理的程度。他写道：

“这里是許許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曾經决定調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于是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和計劃工作人員提出了……建議。……按照这个建議，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中央委員們指出：……棉花一般(1)应当比谷物值錢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場价格(1)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議人对中央委員們的这些意見，沒有能說出任何明白的道理来。”[22]

但是，斯大林也說不出“任何明白的道理”来。他的“理由”是，棉花“一般”比谷物貴，而世界市場价格证明了这一点。換言之，他也举不出什么国内的依据来。

如果各个經濟企业要建立商业关系，而且要寻求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那么這個問題就特別复杂化了。(因此，“价值規律”、“获利原則”、“精确核算”、“合理价格”、“成本”等概念在苏联报刊中都代表同一个意思。)1956年9月，有一位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在《新世界》杂志里写道：

“在实际生活里，我們一再遇到成本这个概念，对它的意思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我們需要对农业經濟学的复杂問題有个清楚明

白的答案……（譬如，）机器拖拉机站用 ДТ—54 型拖拉机每把一吨东西运一公里就会得到半公升牛奶的实物报酬，这对不对？获利原则应当回答这个问题。”〔23〕

要决定投资是否合理就更加困难了。比如要建设一座生产 ДТ—54 型拖拉机的工厂，用的土地、建筑材料、机器至多只能有个凭空想像的价格，而大家也知道，工厂的产品换来的是凭空规定的实物报酬。

由于价格形成的问题日益严重，经济理论家开始抓住价值规律不放，这是可以理解的。劳动的消耗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准确计算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从生产全部产品所花费的“必要社会劳动量”导出其可以用货币表示的平均“价值”，大概是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的唯一可能……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继续研究这条路是否行得通。但是，斯大林为什么如此竭力反对这种为苏联的计划工作创造合理基础的意图呢？为什么他强调“在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要消失呢？为什么他反对在苏联经济中实行尽可能精确的计算呢？

斯大林举出三个论据来说明他的态度：第一，如果承认“价值规律”是各个工业部门劳动力分配的基础，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24〕

关于重工业的首要地位的提法，不过是政治对经济处于首要地位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过是要说明，党的领袖有权专断地根据纯政治的考虑来支配国家的物力与人力。因为并没有为重工业或轻工业的投资规定一条有效的界限，从而可以使我们看到重工业的首要地位何时始，何时终。

相反，政治对经济处于首要地位却是现实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投资，即使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也会处于优先地位。

这样，斯大林反对“价值规律”，反对精确计算的第一个理由就清楚了：他害怕这会导致限制共产党机构的权力。他是有道理的，例如，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老百姓并不是皆大欢喜，有人正是提出了搞卫星开支庞大这个问题。1960年夏，《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信里是这样评论 Lunik（月球火箭）的发射的：

“您难道不认为，对所有这些人造卫星和‘宇宙’火箭所表示的热情是过于早了些么？……我想说的是，地上的事情我们还忙不过来呢：缺房子，缺托儿所，东西贵。我毫不怀疑，这样一枚火箭花费了好多钱，假使人们知道它的价钱，会惊得目瞪口呆。让月亮见鬼去吧！我宁愿先吃得好些，然后再去和月亮亲热。”^[25]

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共产党机构每实行一项措施，都会遇到“这要花多少钱？”的问题。所以，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用一种矛盾的心理对待那种争取对成本与开支进行精确计算的作法。

在写给 L·D·雅罗申柯的一封信里，斯大林提出了他反对价值、价值法则和随之而产生的商品流通的第二条理由：

“雅罗申柯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指所有制关系——作者）和生产力的力量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这首先是与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商品流通……有关的。……（因为）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正在阻碍这种由国家计划化来完全包括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包括农业的事业。”^[26]

这里涉及的不仅是领导经济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对人的领导的问题，涉及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态度问题。斯大林完全有理由说，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集团所有制，首先是商品关系将会成为由国家领导机构“全面掌握”物质潜力的“障碍”。

我们还知道，有名的集体农庄主席雷斯金为了尽量提高“他

的”庄員們的收入，怎样逃避向国家支付借款。我們知道，一位国营农場(国营企业)場长曾經承认，假使由他放手去搞，他就会种那些国家不需要、但市場很需要的东西。关心“他的”工厂的利益的波塔波夫厂长也属于这类人。

如果承认“价值規律”，如果肯定只有用同样的价值才能从某一企业換到某一价值，无疑会加强各个企业“分裂主义”的作法，也会縮小共产党机构的权力。斯大林在反对这种发展上是坚定不移的。

最后，斯大林这部著作清楚地表明，他反对“价值規律”、商品流通等等的斗争，甚至他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全部綱領都是他对共产主义掘墓人的回答，是他为了通过上层建筑积极地保卫经济基础而采取的措施。他在那封《关于L·D·雅罗申柯同志的錯誤》的尖刻的信中写道：

“雅罗申柯同志的主要錯誤就是，他……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也就是說首先是經濟的——作者），同时还过分縮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所有制的——作者）……”按照斯大林的說法，“雅罗申柯同志便认为，在这里（在苏联——作者）生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产关系不再是发展的重大因素……

雅罗申柯同志以为，只要安排好‘生产力的合理(1)組織’，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难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他公然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爭取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是归結为在社会生产中正确組織生产力和合理使用生产力的斗争。’”[27]

当斯大林看到这些意見的时候，他异常憤怒，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否定“生产关系的独立作用”，也就是說试图将不管生产資料属于誰都不起特別作用的思想偷梁換柱地搞进来，这在斯大林看来本身就是犯了大罪。雅罗申柯走得还要远。他企图为其理論寻

找真凭实据，实际上这将导致倡导私人积极性和私有制。因为果真认为只要保证“正确組織和合理利用生产力”就可实现这一理想，那么我們所談到过的卡尔梅科夫大尉会立刻跑出来喊道：“把你們这儿长滿了杂草的休闲地分給农民吧；每个人能耕多少就分給多少！让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腰包去拼命吧！”

其后站出来的是闊佬杰米揚，他为集体农庄主席要求自由支配权，因为人們“也可以用黄麻搞个百八十万的”。再后可能是那些在今天会作为“投机者”立即被枪毙的“秘密資本主义”干部，他們渴望使其“正确組織和合理利用生产力”的活动合法化。企业的领导人也会强烈地要求把他們从“多余的巨大的結算”中解放出来，让他們“像一般私人資本家”那样工作。至于按照人們的設想，把市場經濟納入国营的企图会引起些什么問題，我們已探討过了。

斯大林回答得很干脆：

“最后，說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合理組織（！），說生产力的合理組織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遺了，說只要合理地組織生产力，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28〕

不鏟除集团所有制和商品流通是不会有共产主义的。正是由于这一爭論使他发展了我們所熟悉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綱領。

这就最后地证明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綱領只能是意識形态和計算尺之間斗爭的新阶段，是党的机关对技术知識分子日益高涨的强烈要求合理的經濟核算的回答。

从他的分析中也可看出，这是党的机关的綱領。列宁曾写道：

“在拉丁語中有‘*cui prodest*’（对誰有利？）这样一句話。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議、措施等等辯护时，那就應該提出‘对誰有利？’的問題。”〔29〕

是的，在苏联政治对經濟占首要地位，人們不是按劳，而是按

“需”取得報酬，每個人的勞不是“通過創造的價值”，而是從政治方面去評價，這些對誰有利呢？

首先要問，拒不承認以金錢反映盈虧是決定經濟政策的基本準則，對誰有利呢？無疑對那些大大小小的黨務工作者有利，他們的“勞”是無法用金錢來表現的。今天，人們已經引用精確的數字，直接了當地提出了質問：梅德維捷夫同志，斯大林同志，赫魯曉夫同志，“您們自己給收成（——一直說就是給生產）帶來了最大的損失。”

反過來“*cui prodest*”這一問題使人認識到，過渡到共產主義對於黨務工作者是有直接好處的。當我們了解了“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之後，這就清楚了。在那個社會里將賦予黨的機關新的異常重要的任務——去領導人。人的本能的占有欲越不能得到滿足，這種領導就越是必要。在共產主義社會，黨的機關的任務將是為每個人民團體和每個人規定勞動限額和配給量。這樣，實際上權力是無限的，因為，麵包籃子專政的殘酷程度並不比殺頭專政遜色……。

對於一個愛國的蘇維埃俄國人來說，這一前景是可怕的：客觀上，作為階級的黨的機關直接對保留一切“計劃經濟的愚蠢”感興趣。它的狹隘的階級利益排除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因為，如果不對各個經濟過程進行精確核算，即實際上不承認市場經濟原則，生活水平是不可能提高的。這一衝突原則上是無法解決的：市場經濟與保留黨的機構的統治是不相容的。

根據我們的探討看來，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綱領是為第三次布爾什維克革命作準備的。從黨的機構的立場來看，由於迄今的早期資本主義替代體的整個發展，有必要進行這次革命。

共產黨統治的歷史就是一部繼續不斷地廢除私有制的歷史。第一次布爾什維克革命鏟除了相對富有者的所有制和把占有看成是人的權利的政治勢力。但是還有許多許多的人占有財產并賴以

生活。第二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废除任何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宣布“废除”所有制——但是原则上保留了人们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按劳取酬的权利。它扩大了收入较高的人的数字，因为这次革命的社会内容就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数百万人被提拔上去了。

第三次布尔什维克革命也要把这个革除掉。列宁（今天在苏联用一切方法去提高他的威望）在其最重要的一篇声明里说：

“共产主义劳动一语，若是比较狭义地，严格地说来，乃是有利于社会的无偿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获得领取某种物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标准额，而是自愿的劳动，超过定额的劳动，不打算领到报偿的劳动，没有报偿条件的劳动，而是为了公共利益按习惯来操作的劳动，而是按必须为公共利益操作的这种自觉态度（已成为习惯）来劳动的劳动——是健壮身体所自然需要的劳动。”〔30〕

另一引语的内容大体相似：

“我们把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看成是共产主义……，在那里……无报酬地为集体劳动将成为普遍现象。”〔31〕

向“共产主义的”，也就是向无报酬的劳动过渡，已成为政策的实际问题。为了完成这个发展过程，最重要的方针是：某些以前有报酬的工作，将交给义务“志愿者”，这一方针是与国家消亡联系在一起。

新党纲中相应规定：

“必须设法缩减领取工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俄文本特别指出：领取工资的）……使这类机关的工作将来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32〕

它的实际含义是，譬如大量使用名曰“дружинники”（人民志愿纠察队）的助理民警（当然是无报酬的）。（单数为 дружинник，

是从“дружина”——民兵、义勇队的意思，派生而来的。)其它类型的“不给钱的”“机关”也会逐渐出现。1962年夏天，《共产党人》杂志曾报道，在俄罗斯共和国有十三万人参加了无报酬的书“商”的活动。在莫斯科地区有十八个城市苏维埃建立了“文化站”，这些文化站是由义务干部领导的。〔33〕

但决不仅是一些管理工作，甚至一些 white-collar (白领的)工作，将期待着“共产主义建设者们”无偿地去承担。这期间人们听到这样的呼吁：谁也不应束缚于一种脑力职业，每人还应该参加体力劳动。

因此，某个名曰 P·尤洛夫的在讨论党纲草案时，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在《消息报》上建议，应该组织所谓的“субботники”（星期六或星期天“自愿的”、无偿的加班），“以便更快地建立起幼儿园和托儿所网，为我们的城市 and 居民区穿上绿装。任何一个苏维埃人，每年都会心甘情愿地（！）为了这一崇高目的牺牲几十个小时的。”〔34〕

这些思想是完全符合“原始的”马克思主义的。

如我们所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考虑过，怎样才能不仅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而且消灭其一切差别。

迫使一个大学教授去当助理民警，未来的总经理如果想进技术大学的条件是，在此之前先参加两年体力劳动，诸如此类，都是把一个知识分子从“终生束缚于一种专业”中解放出来的现代形式。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纲领是党的机关对知识分子的财产和权力的剥夺，是准备一次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正如第二次布尔什维克革命那样——其区别在于，那次革命是“自上而下地——符合上层利益”而进行的（准确点说，是符合那些爬上去的人的利益）。第三次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此相反，它

不仅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背大多数新知識分子的利益。可以設想，一种“既要自上而下——又要往上爬”的革命是最困难的內政措施之一。

因此，我們可以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綱領是党的机关利益的翻版，是要解决它的两个复杂的階級問題：无能和击退共产主义掘墓人日益强大的压力。在党的机关看来，作为思想样本，这个綱領中——早在斯大林的提法里——沒有錯处。但是要實現它，則需像斯大林所要求的那樣，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如果不是更多的話”，起碼也要保证上面說的最低程度的配給量，——然而，这是一項非常困难的任务。斯大林意識到其困难，像他这样一位对用过激手段解决問題无所畏惧的人，这次也警告說要小心些。例如他写道，“集体所有制和商品流通……目前……对发展社会主义經濟有好处”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也将带来好处”。

他在另一处說，“勿需特別急忙……推行”产品直接交換制。同时他強調，應該寻找新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徑。肯定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斯大林死后西方流传着这样一种說法，赫魯曉夫扩大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以及寻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途徑的努力，是根本违背斯大林的遺囑的。实际上恰好相反。

斯大林对最終目的作了清楚的闡述，他說，尽管應該慢慢地推行共产主义制度，“但是應該一往直前、毫不猶豫地去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換的活动范围。”

斯大林的《关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問題》和《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两部著作是他的遺囑，是这位三十多年来对苏俄历史和世界历史起着决定作用的人的最后意志。在这里面他提出了至少要二十年才能實現的綱領——他可能不會希望亲自去實現它。

总括起来我們應該說：

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斯大林在其晚年認識到，在俄国維持共产主义专政的唯一可能性是建設“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制訂了一个归納起来可分为九点的綱領：

1. 推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2. “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資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3. “用逐漸……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4. “用逐漸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換制来代替商品流通”；
5. “把每天的劳动時間縮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縮短到五小时”；
6. “实行普及义务的綜合技术教育”；
7. “根本改善居住条件”；
8. 把工人和職員的实际工資至少提高一倍，也許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貨幣工資，而且要繼續不断地有系統地降低日用品价格；
9. 寻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途徑，因为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这个綱領中沒有一点是与傳統的、从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相违背的。但也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要在二十世紀下半叶，在苏俄具体的条件下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真誠努力的体现。

不久，斯大林就逝世了，这个綱領就成为一項困难重重，但也无法推卸的任务落到他的继承者的身上。实现——和反对实现——这一遺囑的斗争，同时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遺囑，构成了其后十年的固有内容。

基本規律在起作用

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苏共中央总書記約·維·朱加施維里一斯大林于 1953 年 3 月 5 日逝世了。他的死引起了許多猜測，只有少数猜測得到了证实。“王儲”馬林科夫，最高領導人的寡头統治，軍事独裁，集体領導，所有这些醒目的字眼，象实行新方針或自由化的希望一样，早就过时了。

确实存在着一些不易說清楚的事实，例如，一方面公开責难斯大林，而另一方面在斯大林死后八年公布的苏共新綱領却又宣布他的继承者始終不渝地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理想。

因为我們的任务不是撰写苏联历史^①，而是探討現代共产主义的規律，所以我們想把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九点綱領，作为衡量赫魯曉夫行动的标准，逐点研究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或再斯大林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斯大林要求：

第一点：必須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在这方面，赫魯曉夫远远超过了斯大林的遺囑，他召开了三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他越来越強調苏联領導要在不久的将来建設“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意图。再者，他尽了一个共产党人在意

① 有几本这类好书。我想特别提一提下列著作：約翰·A·阿姆斯特朗的《极权主义的政策》、《1934 年至今的苏联共产党》（紐約 1962 年版）；鮑里斯·梅斯納的《赫魯曉夫統治下的俄国》（慕尼黑 1960 年版）；和沃尔夫岡·列昂哈德的《沒有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宮》（科隆 1959 年版）。在《基本規律在起作用》和《牺牲斯大林，为的是拯救斯大林主义》两章里叙述的斯大林死后时期的一些眞实情况，凡沒有注明来源的都是引自这些著作。

識形态方面为此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他制定了新党綱，新党綱規定了具体的方針，結尾写道：

“党庄严地宣告：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1〕

第二点：在优先提高生产資料生产的同时，不断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

根据苏联的統計，1940年(100%)到1960年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产增长情况如下：

	1940	1950	1954	1955	1958	1959	1960
生产資料的生产	100	205	340	390	536	602	670
平均年增长率%	—	10.5	33.8	50	48.6	66	68
消費資料的生产	100	123	200	217	277	304	330
平均年增长率%	—	2.3	19	17	20	27	27

〔2〕

这些数字表明，尼·謝·赫魯曉夫在生产資料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增长率方面，基本上沒有采取什么新的政策，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由于整个經濟的規模比較大。

第三点：“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斯大林死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的数目如下：

年底的数字	1953	1955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各种类型的集体农庄	93,300	87,400	78,200	69,100	54,600	44,900	41,000
国营农場	4,857	5,134	5,905	6,002	6,498	7,375	8,281

〔3〕

这就是說，尼·謝·赫魯曉夫在八年內使集体农庄的数目减少了五万二千个，与此同时，国营农場的数目增加了三千四百二十四，即70%以上。約·維·斯大林應該对他的继承者在他认为

是最重要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滿意。

第四点：从商品生产逐渐过渡到产品交换。

新綱領說：“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經濟上就将过时和消亡。”〔4〕

赫魯曉夫在努力达到第四点时，表现了勇敢的首創精神，发现了“縮小”消費品分配中商品流通的新途徑。斯大林想以通过提高工資和降低价格来提高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要的生活水平。赫魯曉夫把这一建議載入綱領，而且指出了解决这个任务的两条途徑：

“1. 提高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計算的个人报酬，同时降低零售价格，不再向居民征稅：

2. 扩大用于不按社会成員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即无偿地滿足社会成員的需求的社会消費基金（教育、医疗、优撫贍养金、在儿童設施里供养儿童、过渡到公用事业的免費服务等等）。”〔5〕

綱領又說，“随着向共产主义前进，个人的需要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社会消費基金得到滿足，这些基金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个人劳动报酬增加的速度。”〔6〕

根据綱領，“在二十年終了时，社会消費基金的总額大約将等于居民实际收入总額的一半。”〔7〕

这条途徑比斯大林的建議更合情合理，因为它有助于直接降低货币的作用，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换”取消商品流通。但是綱領也包括一系列其結果将会扩大商品流通的命題。最重要的有：

“在共产主义建設中，必須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經濟核算（即利潤原則的同义語）、货币、价格、成本、利潤、貿易、信貸、財政这些发展經濟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8〕

这一段話倒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从一切現象来看，它涉及到了，甚至首先涉及到了生产資料的生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

經濟問題》一书中明确地反对了这样一种方针，他严厉地駁回了薩宁娜和溫什尔把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的建議，理由是，这意味着“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并且“是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9]

1958年，赫魯曉夫被迫去实现薩宁娜和溫什尔的建議。然而，他的縮小消費品分配中商品流通的政策，却带来了生产資料中商品流通的扩大。我們暫且先这样认为，下面再作解释。（参見本书第226頁及以下几頁。）

第五点：縮短工作日一字不漏地載入新綱領中：

“在今后十年期間，將过渡到六小时工作日制……在第二个十年內开始……向更短的工作周过渡。”[10]

第六点：实行所謂綜合技术教育，是1958年4月到12月苏联国内政策的主要問題，在1958年12月25日《关于巩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体制》法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根据这一法律，遵照赫魯曉夫的指示：

“……無論在城市，在农村，或者在工人住宅区，在全国，所有的中学毕业生（首先）要参加生产，任何人都不得逛来逛去……父母的地位或他們的請求，都不能使任何人免除生产劳动。”[11]

这些青年人經過两年的“实际劳动”之后才可以上大学。这就是所努力爭取的人的活动的多样性，他們可以在“清晨去打猎，飯后进行批評，而无需成为猎人或批評家”。这种政策是否能实行得通，只有将来才能证明，但無論如何它是正統的政策。

第七点：改善住宅状况同样写进了新党綱。

“在第二个十年終了时（大約于1980年左右——作者），每一个家庭，包括新婚夫妇的家庭，都将有設備完善的合乎卫生和文化生活要求的住宅。”[12]

第八点：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一倍或几倍），在新綱領里規定

如下：

“在二十年內，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将增加二倍半以上，就在头十年內，所有工人和職員的实际收入（社会基金在內）按每个工作者平均計算，将增加約一倍。”^[13]

最后，第九点：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寻找新的途徑。

大家都非常了解，赫魯曉夫擅长作出意想不到的决定。正是这一点，使他在那些由于苏联政策的各种花招而看不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人們中，落得了—个“实用主义者”的名声，如果不是“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名声的話。

人們也許会自問：赫魯曉夫的“意想不到的决定”的目的何在？他关于机器拖拉机站的政策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个例子。

斯大林有力地駁斥了解散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議。当尼基塔·赫魯曉夫于1953年9月晋升为苏共中央第一書記时，他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于1953年9月21日通过了中央《关于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进一步措施》的決議。这个決議扩大了机器拖拉机站的权力。甚至过去在机器拖拉机站当季节工、但是由集体农庄支付报酬的集体农庄的农民，都成了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人。于是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人就从1952年的八十三万三千人增加到1955年的三百一十二万人。^①

这条政治路綫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想像。赫魯曉夫借助这条路綫，首先把一大批集体农庄“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上来”，即改为国营农場。集体农庄的数目从1953年到1957年减少了一万五千个，即减少了16.1%，而国营农場的数目在同期則增加了一千零四十八个，即增加21%。

这些都是实现斯大林遺囑方面值得重視的成就。但是，党

① 奥維奇金在《艰难的春天》—书中描写了这种情况。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多尔古神竟然能将一位集体农庄主席撤职。

的領導的目的只是把相当富裕的集体农庄国有化，因为在一个国营农場里，国家要給农业工人发固定工資。

1962年初，一个工作比較出色的集体农庄主席写道，在他的集体农庄里，1961年大約为“劳动日”支出了二十万卢布，如果象国营农場一样发工資，那末就需要四十万卢布，这等于农庄的全部收入。^[14]

但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意义是，国家拿走“多余的部分”，即超过当局所規定的“需要”的收入，而不是国家往外拿錢。这就是說，国家要关心使其余的集体农庄也达到能“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发展水平，为此必須寻找新的途徑。

就我們所知，在決定把农业机器出售給集体农庄以前，經過了很长时期的討論和試驗。在討論和試驗的过程中，人們认为，要是把农业机器的使用权和集体农庄的領導权加以合并，就可以使集体农庄“成为国营农場”。（參見本书第 100 頁及以下几頁。）接着就決定进行改組，改組成功了。1958—1961 年减少了三万六千个集体农庄，达 1953 年集体农庄总数的 39.5%，而 1953—1957 年只减少了一万五千一百个集体农庄。1957 年以后，国营农場的数目增加得比較快，1953—1957 年新建了一千零四十八个国营农場，大部分是在新开垦的地区。而 1958—1961 年新建的二千三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場則主要是由集体农庄改組而成的。^①

赫魯曉夫的“背离”斯大林，清楚地表明了这是达到斯大林或馬克思所提出的目标的一个更好的手段。

如果我們现在就总结一下赫魯曉夫的活动，那末可以看出：

为了执行斯大林的路綫，或者更确切地說，执行正統的、传统的共产党政策，在只要有可能的地方，他都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

① 新建立的国营农場实际上要多得多，因为小型国营农場同时在扩大。这里所強調的只是普遍的发展趋势。

当旧政策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他找到了新的途径，但始终是同一目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只看总的方向，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正是通过对决定事态具体过程的那些因素的分析，才能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斯大林死后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宫廷政变时期，这个时期大约从“揭发”克里姆林宫医生的阴谋开始（1953年1月），到1955年1月8日马林科夫辞去总理职务时止。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双头执政时期，从1955年1月8日到1958年3月28日。

尼·谢·赫鲁晓夫独揽大权时期，从1958年3月28日到现在。

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斯大林死后的这一时期先后有三条“总路线”：“无路线”、为新的“总路线”而斗争、向共产主义过渡。

第一个时期还在斯大林的时代就开始了，这个旧独裁者把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同向一切人展开激烈的斗争联系在一起，首先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员中展开斗争。赫鲁晓夫后来向我们证实了，斯大林已经计划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清洗。〔15〕

斯大林是在宫廷政变开始的时候死去的。这次宫廷政变是自发的呢，还是由斯大林一手搞的呢？这个问题一时也许还弄不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的死正符合许多党的头目的心意。①

宫廷政变时期主要表明，苏联的命运，处在转折点的整个苏维埃制度的命运，是由一小撮人决定的。在斯大林死后不久，人数众多的“党的主席团”（1952年斯大林把它扩大到二十五人）变成了一个工作机构，它有十个成员：拉·巴·贝利亚、尼·亚·布尔加宁、尼·谢·赫鲁晓夫、拉·莫·卡冈诺维奇、格·马·马林科夫、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米·格·别尔乌辛、M·S·

苏斯洛夫^②和克·叶·伏罗希洛夫。

1957年6月，赫魯曉夫先被十一名有表决权的主席团委员（有一个候补委员）中的七名，即所谓“反党集团”推翻了，后来朱可夫元帅拯救了他。朱可夫用军用飞机把亲赫魯曉夫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一个国家的命运由少数几个人决定，证明这个国家的内部不稳定，是衰老的独裁制度的特点，将来也可能决定政府的样式。

其次，也证明了，共产党独裁远不象某些外界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稳固。至于对在苏占区（指民主德国——译者）、波兰和匈牙利的动荡中自由是否能取得胜利这一点进行推论是多余的。基本的事实是，这三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曾经一度崩溃了，只是由于苏军对苏占区和匈牙利实际上进行了干涉而对波兰以干涉相威胁，才得以恢复，尽管存在着“阶级森严的组织机关和行政机关”，并且据说，这些机关使“社会冲突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难于上升到共同认识的程度，至于发展成为一致行动，那就更谈

① 埃里克·贝特彻批评对“领导集团成员事件”分析的方法，并且断言，……苏联的流亡者有经常采用这种方法的倾向，特别是阿赫米诺夫。[15a]我确实没有犯这种“过错”，因为正如这本书所证明的一样，我主要是研究社会事件，没有发表过“揭露阴谋”的著作。

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我认为分析人事变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特别对判断政治路线中的短期动荡是很有益处的。例如，鲍里斯·梅斯纳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可以证明，最近逝世的弗朗兹·波尔肯瑙教授出色地掌握了分析人事变动的方法，他在1953年1月向法兰克福1947年经济政策协会作的报告中，根据对医生事件的分析预言了斯大林的死。

他这样论证他的预测说，克里姆林宫医生的职责的确是在于遵照上面的命令，分别使那些根据党的规定只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就医的苏联高级干部，恢复健康或把他们弄死。1952—1953年被捕的医生，是斯大林在1937—1938年在他们的前任也同样被控以进行谋杀活动以后任用的。现在又有人成功地诽谤了斯大林的忠实奴僕，并且把自己的医生偷偷地派了进去。这些医生现在是唯一有权医治斯大林的，而这对独裁者来说是有生命危险的，几个星期后斯大林死了。

② 原文如此，可能系馬·扎·薩布罗夫之誤。——譯者

不上了”。^[16]在苏联，尤其在流放地区，也发生了骚动。斯大林的继承者，特别在1953年7月10日推翻贝利亚后，采取了立即提高生活水平的激烈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措施首先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否则就难以理解。^①这样，例如感到惊奇的苏联公民就能从《共产党人》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学到关于重工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的一种完全新的见解，这就是说，重工业的“责任是满足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对设备、各种不同的原料和材料的迅速增长的需要。……完成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的订货，是重工业企业职工的爱国主义（！）义务。”^[17]

斯大林死后的发展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主要是因为“没有独裁者的独裁”的条件下，来自下面的要求都显露出来了，而社会冲突和将来要考虑的一些问题也都一目了然。

第一，法律保障的呼吁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953年4月4日宣布撤销对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控告。随后，《真理报》攻击了保安机关。“宪法所保障的苏联公民的权利是不可动摇的，是受到苏联政府保证的”的宣告，甚至列入1953年5月1日党的正式

① 1953年8—11月初采取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措施，给人的印象是，苏联政府所关心的就是提高生活水平。8月：强制性的公债减少了二百亿卢布；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宅旁园地的农业税最多减少到50%；设立食品工业和消费品工业部。9月：根据赫鲁晓夫的倡议，对农业领导进行重大改组；《关于发展饲养业》的决议、《关于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决议、《关于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的决议。10月：全苏商业专家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展苏维埃商业的措施》的决议、《关于扩大消费品生产和提高消费品质量》的决议；全苏轻工业干部会议；《关于扩大食品生产和提高食品质量》的决议。11月：全苏食品工业干部会议。

这是全苏范围内的最后一项措施。迫在眉睫的危机似乎被克服了。

苏联官方出版了《1917—1959年苏联经济生活》汇编。汇编在综述1953年经济政策时根本没有提到“重工业”一词，只在1954年的导言里写道：“在争取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斗争中，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列宁主义方针。”^[16a]

口号中。

在这方面，推翻拉·巴·貝利亚的努力确实起了作用。貝利亚在能够反击以前就被推翻了，但是，这个问题在貝利亚和忠于他的保安机关的其他首脑被处决之后仍然存在着：赫魯曉夫1956年2月向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作的“秘密报告”达到了高潮。

第二次“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也相当快地显露出来了，这就是要求给工业首脑更多的权力。早在1953年5月20日，《真理报》就号召各部要独立自主。由于苏联的各部都是专业部，这就被认为是扩大所有工业首脑全权的第一步。

同时，背离“斯大林主义”的第三点是，把赢利原则提高为计划经济的衡量标准。格·馬·馬林科夫在1953年8月8日說：

“任务在于中止对生产成本问题的轻视态度，保证有系统地降低成本，使每个企业都有利可图。”〔18〕

于是对斯大林关于商品流通的看法进行了审查。1953年5月29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迈出了第一步，它抨击了对商业作用的低估。格·馬·馬林科夫由此得出理論性結論說：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商品流通——作者）现在是，将来在较长时期内也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中分配消费品的基本形式，也是用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人需要的基本形式。”①〔19〕

这条路线在阿·伊·米高扬（当时任贸易部长）就进一步开展商品销售和改进国家的和合作社的农庄商业的措施作指示性的讲话时，达到了顶点。这些措施后来成为1953年10月18日和30日国家和党拟定相应的决议的基础。

随后提出了赋予集体农庄主席更大的权力的要求。这种要求已出现在5月28日的《真理报》上，并且成为“没有独裁者的独裁”

① 格·馬·馬林科夫虽然采取了这种“修正主义的”态度，后来还是被指责为“斯大林分子”。这就再次说明，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

时期和“双头执政”时期經常翻来复去加以討論的議題。

第六点意味着最高领导人承认了“个人”积极性的合法性（在苏联是不允許說“私人”的），无疑这是对来自下面的呼声的反应。格·馬·馬林科夫早在1953年8月8日就說，集体农庄庄員應該很好地运用自己拥有的宅旁园地和一定数量的大牲畜、家禽、蜜蜂和小牲畜等的权利，而尼·謝·赫魯曉夫为了胜过他的对手，在9月的长篇就职讲话中曾令人难以置信地断言：

“一个工人或职员有私人牲畜就是可耻的这种偏激的看法，也应该結束了。”〔20〕

此外，要关心消費品的生产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馬林科夫总理于1953年8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以国家机关，而不是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的，并且在西方新聞界中作为“新方針”（在苏联不用这个名詞）传播开来了。

宣布所謂“物质刺激的原則”，也就是說，至少在宣传上承认追求利潤的合法性（在苏联說法不一致），是和上述两个要求密切相关的，但不是一回事。尼·謝·赫魯曉夫在9月的长篇讲话中又毫不怀疑地答复了下面的要求，他說：

“企业或每个工作人員因付出劳动而得到物质利益的原則，是社会主义經營的根本原則之一。”〔21〕

第七，提出停止少数民族俄罗斯化的要求，这个要求自1953年6月起首先反映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报纸上。

最后，呼吁給知識分子以更大的自由。这种呼声主要是在著名艺术家的文章里提出来的。9月，《苏联音乐》杂志发表了曾在1948年的中央專門決議中遭到严厉批評的、苏联著名作曲家恰恰图良的一篇文章。接着10月份《旗帜》杂志发表了伊·爱伦堡的一篇文章，他为作家有更大的自由进行辯解。这是文学上“解冻”的序幕。政論家維·波梅兰采夫在12月的《新世界》杂志上强烈地

要求作家“正直”，并懂得把这种美德提高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原则。对此，一个月后《文学报》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22〕

总起来说：斯大林死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动荡的过程中，至少有下列十点被明确地认为是来自下面的要求：

1. 建立一个法治国家。
2. 让工业首脑象“私人资本家”一样工作。
3. 把利润原则变为决定经济发展的标准。
4. 承认贸易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唯一合适的形式并加以扩大(根据第二点,这也意味着把商品货币关系扩大到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来)。
5. 赋予集体农庄管理机构更大的权力,减轻对农民的压力。
6. 至少在农业中允许有私人的积极性(在一定的范围内)。
7. 采取措施,提高生活水平,把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政策的标准。
8. 承认物质刺激的原则,使个人或企业对利润的要求合法化。
9. 开始分散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
10. 精神创作的自由,借用波梅兰采夫的话说,就是,把正直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作为衡量精神文化价值的标准。

从大多数这些要求中，我們又看到了新知識分子的願望。我們不妨回顾一下在《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的理論》一章中作为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的社会基本規律所論述的問題：

“苏联领导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阶级——党的机关和技术知識界——的現阶段力量对比的表现,而与此同时知識分子的作用却在不断地增长。”

斯大林死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基本規律,而且只能这样来理解。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保安机关的“万能”首脑拉·巴·貝利亚的下台或“王儲”格·馬·馬林科夫的失敗,或各个阶段的政

治“路綫”的确定，都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根据这一基本規律，貝利亚的下台和馬林科夫的失敗表明，这些力量在不断发生作用。

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社会基本規律指出，苏联领导所采取的（不仅是努力爭取的）决定总是党的机关和技术知識分子现阶段力量对比的表现。这就是說，要是共产党独裁长期存在下去，只有那些享有两个阶层支持的人才有机会居于领导地位。

拉·巴·貝利亚作为保安机关的首脑，无疑是属于我們所下的定义的党的机关的（參見本书第 54 頁。），但是他只代表这个阶级的一小部分人，他既不能为大多数党的机关，也不能为技术知識分子作出什么貢獻，在他們的眼光里，貝利亚只是一个劊子手，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敗。

格·馬·馬林科夫的情况也相似。他和赫魯曉夫都是斯大林死后最主要的劲敌。要是我們對他們的經歷作一番比較，那么对馬林科夫的失敗，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

格·馬·馬林科夫生于 1902 年 1 月 8 日，斯大林死的时候他才五十一岁。他上过中学，革命胜利后，他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自願加入了紅軍。1920 年 4 月，即十八岁的时候加入了党。1921 年以前在軍隊里搞政治工作。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官方传记說，1921—1925 年他在莫斯科工学院学习（西方資料說他在工学院担任党的書記）。1925—1930 年在中央机关担任負責工作（西方資料說他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1930—1934 年在莫斯科党委会工作。1934—1939 年担任苏共中央机关部长，因此，在大清洗中他起了举足輕重的作用。1939 年 3 月到 1953 年 3 月除其他职务外还担任中央書記。

这就是說，馬林科夫从十八岁起就一直搞党的工作，而且都是負責的工作，在这期間学习了三年，至多四年。（二十三岁就放弃了

学习,肯定沒有学完,因为这方面沒有什么資料可查。)

馬林科夫的一生是一个出色的党务工作者,这一事实应当作为分析当时力量对比的出发点。〔23〕

赫魯曉夫的生平也是很清楚的。

尼·謝·赫魯曉夫于1894年4月16日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里,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当过牧童,后当鉗工。1918年入党。自1931年1月起主要做党的工作。在上升为中央第一書記以前的二十二年内,他担任过区党委书记、市委第二書記、市委第一書記,后来任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1938年1月到1949年12月,赫魯曉夫几乎一直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共产党第一書記,从1949年12月到1953年3月任中央書記和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

赫魯曉夫成为专职的党务工作者时(三十七岁)要比馬林科夫晚得多,虽然他1918年就入党了。关于前一段时期他的官方传记說:

“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在一个矿井里工作,后来到頓河工业学院工农速成中学学习。①尼·謝·赫魯曉夫在军队的团里、在矿井和工农速成中学里都积极做过党的工作,一再被选为党支部書記。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尼·謝·赫魯曉夫先在頓巴斯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基輔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29年开始在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在这里,赫魯曉夫被选为党委书记。”〔24〕

1931年1月他晋升为区党委书记,毫无疑问是专职的区党委书记。

据其他資料說,尼·謝·赫魯曉夫最多从1921年到1924年和1929年到1930年12月一帆風順地学习了六年,在这个时期他一面学习,一面做党的工作。②

① 工农速成中学附属其他教育机构。建立工农速成中学是为了培养有才能的、未受过教育的工农,使他們获得为深造所必要的知識。工农速成中学是赫魯曉夫的第一个学习場所,他的官方传记里都提到过。

格·馬·馬林科夫和尼·謝·赫魯曉夫都是名副其实的党务工作者。这一点之所以要特別強調指出，是因为在斯大林死后流传着許多关于格·馬·馬林科夫是“有毕业证书的工程师”的传说，甚至流传着尼·謝·赫魯曉夫是“工程师”的传说，虽然数量要少些。

但是这两位劲敌同样地都不代表党的机关的利益。格·馬·馬林科夫代表三千到四千名“党的将军”的利益；尼·謝·赫魯曉夫代表这个阶梯中的中层的利益。

对于三万到四万名党的中级干部和十万到十五万名党的下级军官来说，馬林科夫从二十三岁进入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处后，就一直是一个“官僚”或官僚机关的代表；反之，赫魯曉夫作为其中的一員，是从内战时期的小小政治委员和支部书记、区党委书记开始自己的生活历程的。

“党的将军”本身不是牢固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彼此間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他们相互竞争，他们同中央第一书记也相差不多，并非无条件服从他不可；因此，双方的力量对比大致如下：

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这两个劲敌各掌握一部分党的机关，而且两人都能討好技术知识分子：他们的诺言非常相同。但是馬林科夫在党的机关中的支持者都是些这样的人，他们最多把他看作是他們中間的第一号人物，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保持自己的地位。与此相反，赫魯曉夫面向党的机关的广大阶层，他们要借助于赫魯曉夫和牺牲馬林科夫的支持者向上爬。

② 参見貝特彻的看法，“一批老的政治家要被一批能更好地滿足工业需要的新政治家取而代之。例如列宁出身于职员家庭，后来成为学者，最后成为职业革命家。斯大林是教会学校学生，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赫魯曉夫是直接以工程师(?)的資格开始(!)自己的生涯的。”[24a]

貝特彻也許认为，在工学院学习两年就会获得“作为工程师的实际資格”，但是对于我們重要之点是，这种事实上的錯誤看法——从字面上看！——对他說来就使“证明的环节完整了，就可以令人明白，……两个机关需要作出怎样的行动才能和一个完整的組織結構和占統治地位的学說相适应。”

在这里，我們看到了列宁死后所发生的同样情况：广大的中层“党的貴族”压倒了“党的上层貴族”。这种情况不仅从人事政策，从个别党的领导者的个人悲剧来看是有意思的。

西方有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說苏維埃国家的命运是由各种集团，由无生命的“官僚机器”决定的。这些官僚机器或多或少都是作为某个领导者手中的工具在发生作用。沃尔夫岡·列昂哈德的“五根支柱”体制的方案指的就是这些。这五根支柱是：党的机关、經濟机关、国家机关、军队和国家警察。他在《沒有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宮》一书中強調說：

“这些支柱决不是社会学的一种抽象概念，每个苏联公民都可以从外表上看出这五根支柱，它們主要在各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在各州……和各区中心。”

他繼續根据自己的經歷說，在卡拉干达市，州党委、內务人民委員部州中央机关、州苏維埃，即国家支柱和军队各有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只有經濟官僚机关既沒有自己的建筑物，也沒有一个有組織的办事机构。〔25〕

列昂哈德提出了支柱利己主义的理論、各种集团竞争的理論和每个干部“个人从属感”的理論。

这些观察本身都是正确的，但是把它們加在一起却会得出錯誤的結論。

如果把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理論和基本規律的理論同“五根支柱”的方案比較一下，实际上是圍繞着两个問題：

第一个問題，是不是这些支柱，即有組織的各种集团决定着共产党独裁下的政策？

第二个問題，对政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五个因素呢，还是象这里所說的只有两个因素？

原来沃·列昂哈德在提出自己的方案时指出，“經濟集团”既

沒有自己的办公楼，也沒有一个有組織的办事机构，因为他和其他的观察家都怀疑經濟人員的政治意义。但是这种看法不完全对。

斯大林死后，正是这些有組織的“支柱”表明是馬林科夫、貝利亚、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元帅这些遭到可怜地失敗的領導人的非常可靠的支持者，这不是偶然的。这些“支柱”不是无生命的机器，不是領導人員手中的无意志的工具。它們是由这样一些人組成的，这些人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野心，自己的忧虑，自己的同情和厌恶心情。而在試圖了解組成这种“支柱”的人的态度时，人們很快被迫放弃五根支柱的理論，得出了两种决定性力量的概念。

支柱利己主义的想法首先破产了，因為我們看到有組織的“支柱”的内部，即党的机关的領導人員和中級干部，象党的机关和保安机关一样，常常发生冲突。

要是我們注意一下領導干部的傳記，我們就会看到，他們是怎样从一个“支柱”轉到另一个支柱，从党内集团轉入保安机关，或者从經濟部門轉入国家部門的，但是，每个干部的政治生命却总是在职业队伍里（我們把它算作党的机关），或是在“专家”阶层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可以证实一下这个干部是駕馭者还是被駕馭者，这样一来，“社会学的抽象概念”——“階級”概念，特别是我們关于对党的决定起积极影响的两个階級的理論，比卡拉干达的四座办公楼能更好地分析具体的事态。

然而在尼·亚·布尔加宁总理和尼·謝·赫魯曉夫第一書記双头执政时期，我們看到了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社会基本規律的胜利。

如上所述，爭取斯大林继承权的两个最主要的劲敌，都是純粹的党务工作者。他們当中誰應該代表党的机关，这个决定首先是在党内作出的。馬林科夫下台后，尼·亚·布尔加宁作为平等的掌权者和尼·謝·赫魯曉夫并駕齐驅，而布尔加宁是另一种类型

的人。

尼·亚·布尔加宁于1895年6月11日出生在俄国常开博覽会的城市下諾夫哥罗德（今天的高尔基城），父亲是一个工厂的會計^[26]（官方傳記說是工人）。这就是說，布尔加宁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例如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都出生在边疆地区），并且很难說是无产階級出身，他上过中学，也許毕业了，1917年（十月革命前）加入了党，1918—1922年在肃反委员会工作。

1922—1927年，布尔加宁在最高經濟委员会担任一項重要职务，1917—1931年同时兼任莫斯科发电厂厂长。鮑里斯·梅斯納把这个厂恰如其份地称之为俄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在那里，他在两年半內完成了五年計劃）。1931年1月任莫斯科市苏維埃主席（莫斯科市长）。1937年7月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理，1938—1941年担任苏联部长會議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家銀行行长。战争期間，布尔加宁担任过若干个前綫的軍事委员会委員，曾为中将、上将，最后，在1947年任国防部长以后晋升为苏联元帅，国防部长一职他一直任到1949年。

如果我們把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看作是标准式的党魁，那末布尔加宁則完全是一位技术知識分子的代表。

布尔加宁从一开始就努力为取得优越的职位而斗争，甚至在担任非常委员会的委員时就为消除旧的领导阶层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后来他从“未来的”总經理升为代总經理，即成为整个技术知識分子的代言人。

只要看一看他的經歷就知道，他在过去同被我們称之为技术知識分子組成部分的所有人員都有联系：例如工业首腦，因为他担任过厂长；行政机关，因为他担任过市长；国家机关，因为他曾經是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政府首腦；軍隊，因为他担任过国防部长；甚至和“金融界人士”也有联系，因为他担任过苏联国家銀行行长。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加宁同三个重要的部門沒有建立过联系，它們是：工会、农业和党的机关。^①

代表工人階級的工会，在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政治制度中沒有发言权。农民階級不是政策的主体，而是政策的对象，如前所述，它属于党的机关管轄范围之内。而同党的机关的关系，也許就是布尔加宁失去技术知識分子信任的原因。^②

布尔加宁晋升为苏联总理而建立双头执政，只能是国家中两个最强有力的集团激烈斗争的結果，也是这两个集团妥协的結果。

这說明他們两人所沒有代表的工农階級已失去意义。

其次，建立双头执政（根据基本規律）证明，自斯大林死后，技术知識分子的势力相对扩大了，他們的代表和共产党的領袖平起平坐，这在苏維埃政权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情况使非共产党国家的礼宾官員感到伤脑筋，因为尼·謝·赫魯曉夫当时在国家机关里只有最高苏維埃主席团委員的不重要的銜头，但是却必須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来接待。后来他改变了这种情况，但双头执政仍然持續了三年整。当然不是这两个人的生平，而是他們的政策迫使我們提出两个起决定性作用的階級之間的妥协和力量对比的理論。

在双头执政期間，苏联和整个苏联集团发生了一系列极其重

① 布尔加宁在肃反委员会工作到1922年，虽然保安机关原則上算作是党的机关，但并不能影响他1955年担任总理时对他的评价。肃反委员会固然和后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或内务部一样殘酷，但是它的任务是破坏旧的領導者的抗拒。这个革命的組織十五年后变成了“上层建筑积极維護基础的工具……”

② 参見埃里克·貝特彻的看法：能否假定这两个机关都真的具有两重性，至少在上层官僚机关里是有怀疑的。看来这两个机构的領導人員要再度溶合成一体。研究一下苏联最高領導人員的生平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政治生涯不是平坦的，时而做經濟工作，时而做行政工作，后来又担任党的工作。[26a]

我想，以上所述的“苏联三个最高級干部”的經歷“有力地”駁斥了这种理論，它同样适用于下級干部。

要的、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我們不妨简单地研究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事件。

人們也許記得，向双头执政过渡一般被解释为“斯大林主义者”对改良派馬林科夫的“胜利”，是“新方針”和“解冻”的結束。其重要理由是：1955年1月，謝皮洛夫（当时是馬林科夫的敌人，后来成为馬林科夫集团的成員）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尖銳地攻击了馬林科夫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而馬林科夫的下台，是由于大力增加軍事預算引起的。然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第一件事（双头执政还不到一个月）就是采取几項組織措施，大大增强这两个最重要的集团在技术知識分子、工业首脑和軍隊中的实力。1955年3月1日，两位計劃专家馬克西姆·薩布罗夫和米哈伊尔·別尔烏辛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这帮人中的第三个人是阿那斯塔斯·米高揚^①，此时，他同样地是技术知識分子的一位代表。

接着于1953年召开了一系列全苏會議：3月召开了鋼铁生产者會議。4月召开了厂长和工业研究部門領導人員會議、軋鋼專家會議和水泥工业干部會議。5月召开了普通工业干部會議。6月召开了各級党委負責工业部門的領導人員會議。

同时，党中央和政府还通过了許多決議，这些決議同样明确地显示出階級的影响。3月取消了职业学校强制動員青年的規定，从而为从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非經濟性强制过渡到自由征用劳动

^① 阿那斯塔斯·伊凡諾維奇·米高揚生于1895年，亞美尼亞人，他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在某种情况下倒是一个例外。象革命前的大多数老布尔什維克一样，他未能进入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构。可以理解的是，沙皇俄国的职业革命家都是来自沒有生存手段的知識分子，革命以后这种知識分子就不再存在。这个消失的階級的大多数代言人都沒有能改造过来，而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往往是个别人，而不是一个階級的代表）适应了新的环境。米高揚自然是唯一懂得这一点的人，直到今天他不仅活着，而且还身居要职，无疑这是他老奸巨猾的緣故。

力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即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把劳动力变成商品。随后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工业)部长权力”的决议。为了实行地方分权，通过了“关于改变国家规划形式”的决议(5月4日)，以及“关于在利用剩余物资中实行自由化方法”的决议^①(5月14日)。

这些决议值得特别重视，它们可以说是话剧《莫斯科性格》“改编”的法律根据。

我们知道，“剩余物资”，即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员小心为自己购买的“储备物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秘密资本主义”范围内完成计划的基础。1941年2月9日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任何“出售、交换和转让剩余设备和原料”的行为，都要判处五年以下的徒刑。

1955年5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废除了这项法律，并且宣布，凡过去受本法律处分的人予以撤销处分，以后免于处分。

接着通过了“关于利用外国经验自由化”的决议(5月28日)，“关于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议(6月4日)，“关于扩大厂长权力”的决议，“关于提高企业车间主任和师傅权力”的决议(9月20日)，而且从8月到11月还通过了许多整顿建筑业的决议。

1956年初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第一次“非斯大林化”。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事件，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进行研究。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必须提一下，这就是重新评价价值规律，尤其是死去的独裁者的最后著作。阿·伊·米高扬在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的独裁后说，他作为斯大林的天生的商人对价值规律所受到的攻击尤其感到痛心，他说：

^① 这些决议的名称不是引用原文，而是按内容编写的。

“不能不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中的某些其他原理，严格地看起来，也需要我們的經濟学家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深刻的研究和批判的审查。”

主席团里的另外两名委員米·安·苏斯洛夫和阿·伊·基里欽科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例如米·安·苏斯洛夫十分明确地說：“經濟学家沒有好好地研究价值規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作用。”〔27〕

党在价值法則問題上的立場迅速改变，无疑是技术知識分子强大压力的結果，从而再一次证明了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社会基本規律在起作用。大家也許記得，七年前，苏联国家計劃委员会主席、苏联副总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尼·阿·沃茲涅先斯基在提出类似的建議时被清洗掉了。

苏斯洛夫本人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态度，甚至引起了小小的轰动。米·安·苏斯洛夫自 1953 年来就担任中央書記，是一位出色的党务工作者和“正統的”苏联意識形态专家。据了解，苏斯洛夫在 1952 年，也許在 1949 年尼·阿·沃茲涅先斯基下台的时候曾是反对“崇拜价值法則”的代言人之一。1952 年 12 月 24 日他在《真理报》上写道：

“实际上，沃茲涅先斯基的著作錯誤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經濟学問題，并且……崇拜价值法則，认为价值法則是苏联国民經济各部門劳动分配的調节器。”

我們认为这种变化特別有意思，它清楚地证实了我們的許多論点：我們对意識形态在苏維埃制度范围内作为“行动的指南”的作用的解释（党的机关根据本身的階級利益操纵意識形态的作用）；我們关于苏联領導的每一个决定不仅表达了党的机关的利益，而且也根据目前的力量对比表达了技术知識分子的利益的論点；我們关于苏联总是执行階級政策的論点；以及关于各項政治路

綫(以后会证明这点)只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在一定程度上同特定的个人相一致的論点。

党关于价值法則的立場的急剧改变,是 1957 年直接对工业管理进行大改組的轉折点,也是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看法以及采取一系列复杂措施的轉折点。在这些措施中,有些措施符合技术知識分子的利益,至少是部分地符合技术知識分子的利益,而另一些措施則直接与他們的利益背道而馳,这些措施只能被理解为党的机关为“积极維護其基础”而采取的行动。

1957 年进行工业管理大改組,是从采取一項非常步驟开始的:頒布了尼·謝·赫魯曉夫关于彻底改組工业管理形式的“提綱”。提綱注明的日期是 1957 年 2 月 16 日,但是 1957 年 3 月 30 日才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时明确指出它是討論的基础。

提綱的核心是建議完全废除管理各工业部門的体制,取消专业部,不再按照行业而是按照地区原則管理工业。在取消旧专业部时成立了所謂国民經济委员会,負責領導本地区的整个經济。

为了了解这一措施的意义,我們首先必須为自己找一个出发点。

1917 年布尔什維克革命后,虽然实行了全部工业企业国有化,但是工业企业少得可怜,以致可以按照“总管理处”的体制来进行領導,即一个行业的所有企业由一个总管理处直接領導。

有油料总管理处,水泥总管理处,皮革总管理处,糖业总管理处等。1919 年有四十二个总管理处,后来又增加了許多总管理处。整个国民經济由政府設立的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領導。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由于經济的規模日益扩大,采取了托拉斯的体制,即把同一类型的一些企业組織在一起进行管理。1923 年有四百七十八个这样的托拉斯,其中三百四十五个托拉斯的規模很小,由地方当局領導。

1932年解散了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最初只分成三个“人民委員部”（即部）：重工业人民委員部、輕工业人民委員部和木材工业人民委員部。

从那时起，經济部的数目不断增长；1934年有十四个部，到1938年就有三十四部了，在五十年代已达到五十部。

据1957年統計，政府負責领导二十万个正在生产的企业和十万个未竣工的企业。因此可以知道，部长們（他們就是大型的、分散在二千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企业的领导者）并不能充分了解他們的职权范围。因此要求分散經济领导权是不足为奇的，这种要求是斯大林死后提出来的。国民經济委员会体制在采取了一些分散领导权的措施之后建立起来了，这显然是最高领导对来自下面压力的答复，他們广泛地考虑了工业首脑的愿望。

国民經济委员会（1957年有一百零四个）成为每个工业首脑生活和工作地区的一种“經济政府”。国民經济委员会都設在附近。即便国民經济委员会所属企业要想从苏联其他地区取得訂貨，国民經济委员会和国民經济委员会之間进行談判要比在全苏一級为訂貨而进行斗争容易得多。

但是，工业改組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最高經济机关的意义在猛烈下降，而党的中层机关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如果我們了解拟定決議和党对工业实行监督的形式，就会理解这一点。

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当时只建立了几千个工业企业），苏联工业的創始人謝尔盖·奥尔忠尼启則和皮达可夫認識每一个重要的工业领导人。斯大林能够对他們两人进行监督。他是这样做的——他使其中一个人自杀，把另一个人当作“人民的敌人”处决了。

但是工业在发展（例如經济权力的日益分散已成为最重要的监督方法），职权在移交給（必要时，应用“非經济性的强制”，即所

謂“击中要害”) 党的下級机关、区党委和州党委以及相应的保安机关。

我們可以从索弗洛諾夫的話剧《莫斯科性格》里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原来有一位职位很低的党的女干部,她在1949年竟干涉了一个大企业的負責人的工作,并且对他說,“生活向你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她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在必要时她可以依仗“头号”党务工作者——“伟大的斯大林”的威望和保安机关的恐怖机器。

1954年,在斯大林死后,保安机关由于其最高首脑的下台而被削弱以后,这位波洛左娃同志在請厂长到党委办公室以前,“再三躊躇”。她“向部里打听了一番”,她不敢逼迫他去“承担义务”。

一个小小的区党委书记虽然認識厂长,但不認識他的保护人——部长,她該怎么办呢?当然他可以到州党委书记那里去。州党委书记可以找中央一級的部长談,必要时还可以施加压力。但是,州党委书记也許在某一事件上正需要部长的帮助,于是他会自然而然地忽略一个厂长的小小錯誤……

部被撤銷后,苏联的工业干部一方面有更多的自由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另一方面他們也失去了最高級机关——中央委员会的“保护人”。国民經济委员会是比較小的机构,而区党委书记同志又有可能对本区的每一个厂长,每一个負責的专家施加影响,因为她的頂头上司——州党委书记,实际上同时也是所有的人的最高政治統治者。

因此,根据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基本規律,工业管理大改組是一次妥协,是党的机关和技术知識分子之間力量对比的表现。它是布尔加宁下台,結束双头执政的第一步,从而——至少在形式上——也是削弱技术知識分子的第一步。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以致目前还很难下結論。但是至少可以說,布尔加宁和其他几

个最高級經濟干部(他們同他一起下台), 不是俄国技术知識分子的唯一代言人。

1957—1958年我們在苏联所能看到的事件, 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唆使中級經濟干部反对經濟上的“貴族”, 中級人員起来反对最高領導人, 这在历史上是常見的現象。但是, 在我們能正确地理解这个过程以前, 我們必須看看与此相反的过程, 主要是看看恢复所謂斯大林主义的尝试。

牺牲斯大林，为的是拯救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死后，在政治术语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非斯大林化”。然而进一步看来，它却如同它的对立面“斯大林主义”一样毫无内容。

“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来自那些被斯大林剥夺了权力的共产党头目们的哀鸣，他们一再强调说，只是在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此后共产主义就变为“斯大林主义”了。

事实上这个词根本就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来理解它。对于托洛茨基说来，“斯大林主义”和“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和孤立是同义的；对于铁托说来，它意味着“干涉兄弟党的生活”。对于犹太共产党人，它主要是“反犹太的”；对于某些德国共产党人（例如阿尔布莱希特），它是“犹太统治”的宣言。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太“激进”了，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又太“保守”了。人们把“残暴统治”和斯大林主义等同看待，似乎是说，“清算”破产的共产党领导人，要比那些促使斯大林残暴的人清算俄罗斯贵族更为残忍。

“斯大林主义”事实上就是斯大林在 1923—1953 年期间所作所为的概括——斯大林时代的同义词。这就是粉碎左倾反对派，处死“右倾分子”；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里宾特罗甫—莫洛托夫协定，斯大林^①、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大的联盟；反犹太

^① 原文为 Good Old Joe（老家伙约瑟夫），这是西方给斯大林起的绰号。

主义和利用亲犹太主义；孤立地“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对外扩张，总而言之，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主义。

当1953年3月1日到2日的夜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又称斯大林、卡博、索索等，突然中风，并失去讲话能力以后，“非斯大林化”便坚决地不可动摇地进行了。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概念来理解“斯大林主义”和“非斯大林化”，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第一，把共产党政策的某种“路线”和某些人联系起来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苏联领导人对个别问题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在这些年当中推行着不同的政策。我们都知道，苏斯洛夫在价值规律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历史中有过许多类似的事例。弗拉基米尔·列宁既领导过“左倾激进的”军事共产主义，也领导过“温和”的新经济政策。尼·布哈林在1938年时作为俄国共产党人右翼的领袖和理论家被处决，而在内战时期他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左派共产党人。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曾是“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1953年至1955年时，他推行一种明显的自由的政策，在“战胜斯大林分子”的过程中丢失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1957年终于作为“斯大林分子”被打了下去。

不能完全否认对人事变动和个人的态度进行考察的价值，因为它对判断苏联政策的短期变动是很有用处的。（参见本书第117页。）然而，长期的发展则主要取决于社会力量、事态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而后才取决于个人。因而在判断个人时，首先也要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

第二，“非斯大林化”是一项有意识的政策，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已经指出，“非斯大林化”的第一件事，即在独裁者死后立即加强消费品的生产，其目的是竭力防止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整个制度的崩溃。即使是向“集体领导”的过渡，赫鲁晓夫

的晋升或是他在 1956 年 2 月所采取的著名的“清算斯大林”运动，都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所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实际上，一人統治本身就是共产党独裁所固有的組織形式。而所有的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五年的时间中都是在胆战心惊中度过。当由他們来确定斯大林的继承人时，就会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問題：誰会是我的劊子手呢？回答首先是：尽可能誰都不是！即使对最高的共产党领导人來說，这种原始的生存願望在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和推翻恐怖的秘密警察头子貝利亚这一点上，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就是“集体领导的誕生时刻”——赫魯曉夫的大好时机。

苏联领导人并不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就放弃他們繼續控制党和国家的命运所負有的义务——指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因为像苏共中央这样的一个組織是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进行领导的。

第一书记的人选，只能挑选一个优秀种族的党务工作者，一个大俄罗斯族人^①，即实际上只能从主席团委員中挑选。因而，貝利亚、卡岡諾維奇和米高揚，因为不是俄罗斯人，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了。伏罗希洛夫(1881 年生)太老了。布尔加宁、別尔烏辛和薩布罗夫都是行政干部或經濟干部，而并非是党内干部。剩下的只有馬林科夫(1902 年生)、赫魯曉夫(1894 年生)和莫洛托夫(又名斯克里亚平，生于 1890 年)，而莫洛托夫太老了，并且是一名典型的第二把手。

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从社会地位来看同属于一个階級，即属于党的机关。从个人来看，他們却是根本不同的。除了馬林科夫

① 在斯大林控制了国家命运二十五年之后，对于在人口中占多数并且由于斯大林的俄罗斯化政策而取得压倒优势的大俄罗斯人說来，是不希望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員居于领导地位的。最多像赫魯曉夫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小乌克兰族的风尚，还是能容忍的。

代表党的高级阶层，而赫鲁晓夫却代表党的中间阶层外，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手下的同仁中排在最末位的一个。他已经五十七岁，而且喜欢喝酒，与五十岁的、生气勃勃的、尤其是在斯大林手下合作得很好的马林科夫比较起来，赫鲁晓夫对苏联大人物的生命威胁自然要小得多。善良的意愿——赫鲁晓夫将比马林科夫死得早一些——的确是赫鲁晓夫掌握政权扫清道路的一种决定性的考虑^①。然而——这正是变化莫测之处——这是任何人都难以主动控制的自发过程。

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清算斯大林”，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决定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疏远斯大林，揭露他的某些罪行，这也可以理解为他还没有控制局势发展的一个反映。

1956年2月，赫鲁晓夫需要由党的最高机构，党代表大会，确认他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大权。经中央委员会任命，他行使这一职权已经两年半了。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必定要对三十几年来决定性地影响国家命运的那个人和其政策表态（他现在窃据了这个人的职位）。

这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斯大林的统治是一个专制和大规模屠杀的时期。这就是说，在此期间按照苏联法律有很多很多人被无辜地逮捕、流放或处死了。斯大林死后，许多被捕者回来了，被恢复了名誉并在党内起有影响。由于这些原因，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与斯大林毫无区别。

但也不可能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因为他的听众决非是反

^① 还须指出，四年后，当试图推翻赫鲁晓夫并由莫洛托夫任第一书记时，莫洛托夫当时已经六十七岁，丧失了许多与他有联系的人，因而他要建立完整的一人统治的时机完全不存在了。

共分子。这些人当然希望沒有恐怖。如果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就宁肯成为劊子手，也不願意成为受害者。但是，“非斯大林化”——这可能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結束——是赫魯曉夫的听众所难以接受的。

从进一步的观察看来，整个“清算斯大林”的活动表明，赫魯曉夫竭力向他的听众灌輸这种思想，即給予人民和国家如此不可言状的痛苦的并非是制度，更不是党的政策，仅仅是斯大林本人。

当时，在1956年，赫魯曉夫在他的官方的总结报告中只有一句相当温和的話提到斯大林的罪行：

“个人迷信的流行，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常常給我們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損失。”^[1]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所作的苏联至今尚未发表的“秘密”报告中，他就使用了尖銳得多的語調，但是他的闡述基本上不过是对著名的列宁“遺囑”^①加以說明，他原原本本地引用了这个“遺囑”，其中最重要的段落是：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調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等等……”^[2]

只要費点劲仔細讀一讀列宁遺囑就会相信，列宁遺囑的发表对于赫魯曉夫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列宁在遺囑中对其最亲密的同事作了簡短却极为有害的描述，他批評斯大林的唯一缺点，不是政治性的錯誤，而仅仅是不良的个人品格。上面的引文中被我

^① 列宁的这个遺囑，西方早在二十年代就公布过，現在苏联也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六卷中全文发表。

強調引用的“只是”兩個字，有着不可估量的政治意義。顯然列寧所希望的一個作為黨的總書記的人，並不是在政治上，而僅是在性格上強過斯大林。赫魯曉夫引用這句話，只能是一個意思：看，我正是列寧所尋找的人；我在性格上強過斯大林，因為是我揭露了他的罪行。無論如何，我是一個優秀的列寧主義者，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只要不是批評全面的政策，而只是批評個人政策和已故獨裁者本人，那麼“清算斯大林”對未來的獨裁者說來，在策略上就處於優勢。赫魯曉夫是斯大林手下最高領導人當中地位最低的一個，即使會揭露出他的某些罪行，那他是會計算到，“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對那些地位更高的主席團成員，也就是說對那些能夠激烈反對他的人說來，會受到比他更大的牽連。

由於他所處的地位，採取這個行動，預計是有風險的。但是，在沒有獨立審判權的現行制度之下，這種風險具有相當高的保險系數。（實際上蘇聯至今還沒有人試圖公開追問第一書記參與斯大林罪行之事。）

在爭奪獨裁統治的鬥爭中，個人權術的因素，在“第二次非斯大林化”中表現得更明顯，當時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1959年）上再次——這次是公開的——宣判斯大林有罪，並且聲稱，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和伏羅希洛夫反對恢復名譽“不是偶然的，因為對於許多大規模迫害黨的幹部、蘇維埃幹部、經濟幹部、軍事幹部和共青團幹部的事件，以及在個人迷信時期發生的其他類似現象，他們本人負有責任。”〔3〕

這就足以擊中他的最主要的對手的致命之處，因為提出控告的罪名是：謀殺。

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秘密”報告中的其他論點：如過去撤換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有計劃地清洗像米高揚等人，據說以後成為“反黨分子”的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也在清洗之列，批評斯大林

的軍事指揮是十足的自我頌揚，等等。这些都服务于一个目的：使与会者相信，人們可以放心地把斯大林的权力委托給他。

在那份常被引用的、但沒有流传开来的并且有許多地方完全被曲解的“秘密”报告中，赫魯曉夫对斯大林的政策所下的結論是：

“斯大林认为，为了在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陣营进攻的面前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他是本着工人階級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利益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我們不能說，这些是一个昏庸暴君的行为。依照他的看法，这些行动符合党、劳动人民和維護革命成果的利益。这是真正的悲剧。”〔4〕

赫魯曉夫絕口不提斯大林的真正罪行：对人民的罪行。对他說来重要的是，他能以恢复被判决的七千六百七十名高級干部的名譽而自我夸耀。数以百万計的普通苏联公民被剝夺财产、被剝削、被驅逐或是由于“犯罪”被判处死刑——其实这在非共产党的国家里要么根本就不判刑，即是判刑也是很輕微的——关于这些情况，他却只字未提。显然，他沒有斯大林独裁的那种决断的特点：党的机关的特权地位；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純洁性；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更不用說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原則了。……

我們反对“斯大林主义”和“非斯大林化”这些概念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同大多数偏激的观念一样，它导致了錯誤的結論。

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原因，斯大林在后輩的意識中成了一个妖魔，因而自然而然地就出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对斯大林的否定，必然有值得肯定之处，如提高生活水准，自由化，甚至制度的民主化。实际上，用这样一句話来概括这件事是再确切不过了：牺牲斯大林，为的是拯救“斯大林主义”，或者更恰当地說，是为了拯救共产主义，因为西方正是把这說成是“非斯大林化”的真正目的。

無論是“非斯大林化”或是“再斯大林化”，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即都是自覺地和有目的地——更確切地說——重建有效的共產黨獨裁。儘管這兩種提法都有不足之處，但是我們不能完全舍棄不用，因為全面概括這些有關的過程，從文體上說來是很困難的。從我們的觀念看來，“非斯大林化”就是不自願地放鬆黨組織的控制，再斯大林化則是自覺地恢復黨組織的控制。

斯大林死後不久馬林科夫所執行的政策已經表明，“提高生活水平”的口號完全有利於鞏固特殊的共產黨的統治。

1954年2月所宣布的開墾荒地的計劃，就是這樣的政策，只不過是比較成熟些。

開墾荒地是與提高生活水平的計劃聯結在一起的，繼貧困的斯大林年月之後，這種做法從一開始就在廣大的群眾中具有蠱惑人心的功效。當然黨的成員對於這項計劃也有興趣。

赫魯曉夫也像斯大林時對待工業化那樣，把開墾荒地當作一項偉大的政治任務。其實這項計劃並不特別偉大：在兩年時間內，動員了大約三十五萬青年，還要付給他們遷移到新開墾地區去的費用，並向他們許下了優厚薪俸的諾言。

然而這個較小的“偉大任務”是與赫魯曉夫當時的地位相符合的，他從而使成千上萬個黨的幹部——他們的職務是“做人的工作”和為新開墾地區動員志願者——完全就業，並且有了新的生存權利。後來，他們大力支持他們的頭頭，也就不足為怪了……

開荒計劃歸根結蒂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步驟，因為在新墾區專門建立國營農場，部份是新創辦的，部份是由集體農莊合併起來的。因此國家在農業中所占的比重——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大大地提高了。

我們已經說過，“非斯大林化”的另外兩個步驟——1956年2月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的“清算”和1957年上半年的

彻底改組工业領導——同时也是赫魯曉夫的一人統治的步驟。紧接着就是 1957 年夏取締所謂的“反党集团”和在 1958 年 3 月 28 日取消“双重領導”。

这两件事对于在个别階級內部分析階級冲突以及集团冲突都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对赫魯曉夫下台以后的局势发展起着启示的作用。因而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就我們所知，大規模的工业改組并不仅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經濟領導的权力下放，它也剝夺了“經濟最高权威”的权力，并且扩大了党的中层組織的作用，因为地方党組織要是想去对“他們的”經濟領導人施加压力时，不再需要求助于莫斯科。

斯大林时代所产生的政治和經濟的“上层貴族”起而自卫，并企图推翻赫魯曉夫。1957年 6 月 18 日举行了中央委員會主席团會議，在这次會議上决定，撤除赫魯曉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职务，任命他为苏联农业部长。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据說是由莫洛托夫接任，总理是馬林科夫。

这件事沒有成功。据說朱可夫元帅挽救了这种局势。結果还是确认了赫魯曉夫作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地位。他的敌人，(首先是)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謝皮洛夫(主席团候补委員)被宣布为“反党集团”，并且被撤除了职务。在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內(直至 1961 年秋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确定了新的主席团为止)，还有布尔加宁、基里欽科、別尔烏辛、薩布罗夫和朱可夫元帅(1957 年成为正式委員)也都从 1956 年組成的主席团中开除出去了。在 1956 年——“集体領導”的誕生年——的全套人馬中，赫魯曉夫、米高揚和(当时的候补委員)勃列日涅夫以及什維尔尼克是十七人当中四个能够保持地位的人。

幕后进行着一場激烈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較量，在这場較量中个人冲突和社会的冲突相互交織在一起。^[5]

老的共产党“贵族”，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对他们三个人说来，任何形式地审查他们的历史都是极其危险的）；原则上不反对改革的专家集团，如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随机应变者谢皮洛夫和年迈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他们之间的联盟本身就是不一致的，这些人只是为挽救个人的地位而进行绝望的挣扎，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政治纲领，并且也不可能有原则上不同于赫鲁晓夫的政治纲领。

朱可夫元帅的下台（1957年10月27日）也许是他和赫鲁晓夫之间个人冲突的结果。朱可夫元帅当时威信很高。此外，朱可夫给了赫鲁晓夫很大的恩惠，因为五个月以前，朱可夫不仅挽救了他的地位，而且很可能还挽救了他的生命——这对于一个正在成为独裁者的人来说，已经有把一个人打下去的足够理由。对于军队来说，也决不会因朱可夫的下台而比以前少有作为。赫鲁晓夫于1957年夏天在党和国家的危机中所取得的胜利，是一定的阶级和党组织大力恢复他的独裁的表现。其结果在半年后就很明显了，1958年3月，在苏联最高议院的一次例行的会议上布尔加宁被正式撤除总理的大权，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他的继承人。^①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由另外一个人继承总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集中于一人之手，这是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形式的根本变化。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去描述细节——根本性的问题是：

推翻赫鲁晓夫的企图失败后，苏共中央主席团逐渐在改组，它从一个由各个“特权阶级”的首脑组成的混合机构变成为一个纯粹的党的集团（正如斯大林时期那样）。根据1959年时的情况，除赫

^① 最初没有触犯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也许是为了冲淡由于赫鲁晓夫赶走了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组成的十一名主席团委员中的五名而引起的极其不利的印象。实际上是七名，也就是大多数。

魯曉夫和米高揚外，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還有（按字母順序排列），

阿·鮑·阿里斯托夫，1903年生，自1945年以來任各級黨的書記；

尼·伊·別利亞耶夫，1903年生，1945年以來任各級黨的書記；

列·伊·勃列日涅夫，1906年生，戰前是黨的幹部，1943年以後，先後為軍隊政委和黨務工作者；

叶·阿·福爾采娃，1910年生，1942年以來的黨務工作者；

尼·格·伊格納托夫，1901年生，參加過內戰，此後先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以後專門從事黨的工作；

阿·伊·基里欽科，1908年生，農業機械專家，1938年以來從事黨的工作；

弗·羅·科茲洛夫，1908年生，工程師，1939年以來從事黨的工作；

奧·維·庫西寧，1881年生，芬蘭人，職業革命家，共產國際幹部；

努·阿·穆希金諾夫，烏茲別克人，1917年生，1948年以來主要做黨的工作，曾短期擔任烏茲別克聯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和部長會議副主席，1955年為烏茲別克聯盟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尼·米·什維爾尼克，1905年的老布爾什維克，先後為黨和工會幹部；

克·叶·伏羅希洛夫，1881年生，職業革命家。^①

這份名單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改革的意圖。蘇聯實際政府的成

① 伏羅希洛夫之所以仍然是主席團委員，正如後來所證實的，僅僅是出於策略的考慮。他是“反黨集團”的成員，當時已經完全被剝奪了權力。他被人們所輕視，雖然他作為職業革命家完全應該受到重視。

員完全都是党务工作者，党的机关的独裁由于官方政府的改組再次得到大大的加强。

1958年3月28日赫魯曉夫被任命为苏联总理后，他任命党的主席团的两名最主要的委員弗·科茲洛夫和阿·米高揚为第一副总理，于是党的机关的霸权就完美无缺。

1958年以来所得出的結論大致是这样：为数众多的专业部长和加盟共和国总理——目前的情况是由他們組成官方的苏联部长會議政府——虽然可以在部长會議上向主席团在官方政府中的三位代表陈述他們的意見，然而决定权仍掌握在实际的政府，即党的主席团手中。在那里，党务工作者在一个階級力量均衡的集团內討論各种建議，并最后作出符合他們的階級利益的決定。全部权力集中于尼基塔·赫魯曉夫一人之手并建立起党的机关的露骨的階級統治^①，所有这一切——值得注意的是——都是在进一步“非斯大林化”和由于推翻了“斯大林分子”、“假革命者”等等之后才出現的；由于这种原因，他們也迷惑了不少西方的观察家。

遺憾的是过去已經有过这样的先例。赫魯曉夫并不是第一个用許諾“更多的面包，更多的衣著，更多的住房”来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領袖。

第一个“反斯大林分子”是約瑟夫·斯大林。他在二十年代中期成为实用主义者，正統的共产主义的敌人，成为一个除了为他的人民爭得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外別无他求的人。而当时有的“俄国通”也并沒能弄清这种情况，并且为“实用主义者”斯大林战胜“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而欢呼。

1927年11月20日，当时德国最好的报纸之一——《法兰克福汇报》評論苏联的局势时写道：“反对派不願意承认，由于內政外

^① 1961年，由于道地的計划专家阿·尼·柯西金的被提拔，这种情况又被冲淡了些，但是由此也再次证实了社会学的基本規律。

交的原因,对于俄国共产党人說来,所謂的英雄时代——不惜一切代价的革命狂热主义,已經是一个业已終結的时代,而大多数人則相信,現在和未来必須献給最平凡的工作日的最平凡的劳动。

斯大林、布哈林……和絕大多数党员认为,他們的任务主要是繼續以頑强的手工劳动来建設苏联的社会主义……更多的面包,更多的衣著,更好的住房,更多地受教育和更多的生活享受就是他們的口号。听起来,这并不是非常革命的,而是庸俗和平凡的。但是,如不……至少如果不暂时放弃繼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願望,那么,这项任务是可能完成的。”

的确,当时还不了解斯大林的統治。所以今天的“俄国通”不仅要更好地了解历史,也还要了解决定現代共产主义面貌的推动力量。

分析一下从 1953 年到 1963 年期間党的最高机构,也就是苏联真正的政府的組成变化情况,就可以得出“非斯大林化”——只要是关系到人事变动問題——的一般結論。属于这个集团的有:

	生年	入党 年份	身分	1953	1956	1957	1963	
1. 阿·鮑·阿里斯托夫	1903	1921	PA			×		降級
2. 尼·伊·別利亚耶夫	1903	1921	PA			×		降級
3. 拉·巴·貝利亚	1899		PA	×				枪决
4. 列·伊·勃列日涅夫	1906	1931	PA			×	×	
5. 尼·亚·布尔加宁	1895	1917	NPA	×	×	×		反党分子
6. 尼·謝·赫魯曉夫	1894	1918	PA	×	×	×	×	
7. 叶·阿·福尔采娃	1910	1930	PA			×		降級
8. 尼·格·伊格納托夫	1901	1923	PA			×		降級
9. 拉·莫·卡岡諾維奇	1893	1911	BR	×	×			反党分子
10. 阿·普·基里連科	1906	1931	PA				×	
11. 阿·伊·基里欽科	1908	1930	PA		×	×		降級

12. 弗·罗·科兹洛夫	1908	1926	PA			×	×	
13. 阿·尼·柯西金	1904	1927	NPA					×
14. 奥·维·库西宁	1881	1905	BR			×		×
15. 格·马·马林科夫	1902	1920	PA	×	×			反党分子
16. 阿·伊·米高扬	1895	1915	BR	×	×	×	×	
17. 维·米·莫洛托夫	1890	1906	BR	×	×			反党分子
18. 努·阿·穆希金诺夫	1917	1942	PA			×	①	降級
19. 米·格·别尔乌辛	1904	1919	NPA	×	×			反党分子
20. 尼·维·波德戈尔内	1903	1930	PA(?)②					×
21. 德·斯·波利扬斯基	1917	1939	PA					×
22. 马·扎·萨布罗夫	1900	1920	NPA	×	×			反党分子
23. 尼·米·什维尔尼克	1888	1905	BR			×		×
24. 格·康·朱可夫	1896	1919	NPA			×		反党分子
25. 米·安·苏斯洛夫	1902	1921	PA			×	×	×
26. 根·伊·沃罗诺夫	1910	1931	PA					×
27. 克·叶·伏罗希洛夫	1881	1903	BR	×	×	×		反党分子

注：× 主席团成员。

PA 我們的定义中的党的机关的成员。

BR 职业革命家,1917年前的党员。

NPA 非党务工作者。

斯大林死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二十七名委员中,已有十五名委员和赫鲁晓夫发生了冲突。1957年党内危机时的十四个胜利者,至今仅有七人身居要职,很有可能还会有人被赶下台。

这种内在的逻辑是不难看出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以及朱可夫元帅,这些人在

① 努·阿·穆希金诺夫于1957年12月选入主席团,1961年没有重新当选。

② 波德戈尔内,1946年前在食品工业部门工作,后在乌克兰任副部长。以后又在莫斯科的政府机构中工作,1950年转为从事党的工作。这十三年以来才是“纯粹的”党务工作者。

斯大林死时几乎和赫魯曉夫处于同样的地位，可是現在都从最高的地位上消失了。即使那些在反对斯大林的“上层貴族”的斗争中支持过赫魯曉夫的干部們，亦必已認識到共产党独裁的內在規律性，因为他們从朱可夫元帅开始正是按他們对赫魯曉夫的恩惠的大小而先后被赶下台的。

从 1963 年的情况来看，党的最高领导完全是由“赫魯曉夫分子”組成的，这与人們称呼斯大林的政治局的委員們为“斯大林分子”是同样的意思。赫魯曉夫是从四处把他們物色来的。一般地說来，他們只承认他的权威，并将忠于他，正如“斯大林分子”过去忠于斯大林那样：只要情况順利，只要他們沒有和“首腦”发生冲突。

即便是赫魯曉夫，也只有控制住势力的紛爭，才能信賴他的“亲信”。然而，正因为是在共产党独裁的条件下，“头号人物”本人也无权要求追随者的忠誠，所以，唯一可能的便是专权的一人統治。于是，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或者說由于“非斯大林化”，一人統治又重新出現。

显然，这是党的机构的胜利，它的工作人員終于又有了一個用以判別好坏的明确标准，即領袖的結論。当然他們不仅从組織上，而且从意識形态上着手巩固他們的統治，因为 1956 年秋天的匈牙利革命十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党独裁是完全有可能崩潰的，只有保证了这两条——党的机构有着严格的领导和灵活的政策以后才能避免。从組織上恢复党的机构的优势地位，自然不只是在最高阶层中进行的。它更多地表现为几十万普通的党的督促員为了他們的地位、权力，甚至仅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只要分析一下他們的冲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再斯大林化”的推动力量正是党的机构的成員。

如上所述，把党内民主简单地看成騙人的东西，这是錯誤的，

因为实际进行领导的机构(委员会,特别是各个常务委员会)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不可能是简单地重复最高领导的决定。而是必须对并非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问题作出实质性的决定。由于同样的原因,在人事问题上进行竞选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党内民主”可以起着各种不同的作用。竞选斗争可能是在党务工作者的严密的范围内进行,也可能是在委员会,甚至是在党代表大会这样一种难以控制的大范围内进行。

党务工作者从来就反对各种民主,也反对党内民主。斯大林时期,只要有上级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说了话就能决定的。斯大林死后,特别是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真正民主的影响(当然是指党内)大大抬头,这立即引起党务工作者的责难。例如《党的生活》杂志在第一次“非斯大林化”的高潮时,即1956年8月,发表了一封党的干部的指控信,信中写道:

“在党员大会上,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某些党员硬要把更多的候选人列入选票去选举……这样做对吗?我想,这是不对的。我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原来的党书记比别人少得一、两票,因为名单上的候选人太多,结果他就没有当选。要是在一个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名党员的组织里(也就是说,已经够条件安插一名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作者),实际上由一两名,或者说由十至十二名党员去决定这位书记能否参加新的支委会,这算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大家都知道,书记往往要被迫对这些或那些共产党员施加压力……就经常(1)会有一些被得罪的人,在投票的时候,并不是出于原则的考虑,而是受个人考虑支配的。”〔6〕

这个人说得对。一个党的督促员在一场公正的选举斗争中——即使在党内也好——都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由于这种原因,党内民主也就只能是一种受严格控制的例证。

这位普通的党的督促员的指控却被最高当局听到了。弗·科

茲洛夫——赫魯曉夫的負責黨內事務的副手，在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1961年10月）所作的報告中之所以對黨章的某些修改作那樣的解釋，正是由於“黨內民主”的矛頭往往是指向黨務工作者。他指責說，“有時，有經驗的和可貴的工作人員……只是因為有三、五票反對，卻落選了。”〔7〕

一直到1962年11月，才採取了果斷的措施來加強黨的監督者的地位。因為隨着黨的結構的改革，削弱州和區一級黨組織的地位的根源業已消除。

所有地區性的黨委會必須由四種類型的幹部組成：黨內監督工業的幹部，黨內監督農業的幹部，工業方面的專家和農業方面的專家。於是，黨務工作者加起來的票數往往超過半數。這樣一來，在黨的機關內經常會發生政治上的衝突，特別是常常發生個人衝突，因為黨務工作者大多數是可以相互調換的。此外，同一個工作範圍內的黨務工作者和專家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衝突，因為一方是監督者，而另一方是被監督者。

在“黨內民主”的條件下，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黨的機關的某幾票跑到工農業專家的穩定的“聯盟”手里（他們的票數加起來不到半數），如果黨的監督幹部本身不一致的時候情況更是如此。我們在奧維奇金的著作中就能看到這種情況。“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包爾卓夫專橫地要提高某個集體農莊的農業稅，由於遭到專家們——黨的第二書記是他們一伙的——的反对，而沒有成功。“斯大林式的”書記梅德維捷夫，也遭到憤怒的集體農莊主席們的斥責，他們無疑也得到工業專家們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見證人奧維奇金早在1952年就指出了黨內“工業”幹部和“農業”幹部之間的衝突。在他的書中，包爾卓夫對他的“自由派的”或者至少是受農民歡迎的對手說道：

“我真心誠意地勸你……到州黨委會去申訴對我的不滿……

人家会把你調到其他区去。那么我們就可以互相竞赛。就搞你的农民特权吧！而我仍以无产阶级的风格行事。”〔8〕

工业和农业的党委会分开后，各个委员会中，工业和农业专家之间的“联盟”被粉碎了，党的干部的統一战线被恢复起来了，他们之间现在仅存在个人之间的对立，不再存在工作上的对立，并且在他们上边有着共同的上司。自然，他们的票数又重新超过半数。

1962年党内改組的另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的最高领导对中下层党组织的严重不信任。

正如我們在《党的机关及其职能》一章中所指出的，斯大林时期的党的机关体现了政治家的态度。它观察任何事物时不受地方利益和职务利益的束缚，只是从全局利益的立场出发，当然不是从任何一种别的立场，而是从纯粹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

斯大林死后就发现，这位“区一级的政治家”在许多情况下都反对用纯粹共产主义的方式解决日常的问题。

从奥维奇金的极其有益的小说里可以看出，馬尔登諾夫反对任意提高债务。这里最重要的还不是反对的本身，而是那种政治家式的說教，也就是指示，他认为，“不应当莫名其妙地杀掉給我們生金蛋的母鸡。”

此外馬尔登諾夫——出于同样的政治家式的态度——主张采用固定的征购定额，强征赋税，但也主张給予集体农庄有获取更多收入的权力：

“即使某些地方因而发生面包不足，人們会諒解这一点的，会表示同意的。我們的宣传鼓动人員就会有牢固的基础：你們所賺到的錢都归你們所有。如果附近的‘苏維埃政权’集体农庄的人們得到三倍多的面包，那該多好啊！政策就該建立在这上面。”〔9〕

在书的結尾，馬尔登諾夫走得更远：他建議，在重新选举区委书记时，提出两名候选人（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并希望深得

人心的机器拖拉机站站长作为竞选候选人。馬尔登諾夫确信，党代表會議是会反对他的，但是他认为这是符合事业的利益的。出于同样的态度，他还請求，把他調到更为困难的区里去。

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出了——前后一貫地——这样的建議，在党的机构——常务委员会和委员会选举时也实行“党内民主”，也就是說，这正是党的督促員在同一时期內所竭力爭取的事情。〔10〕

（这次）恰巧是一名党务工作者为解除本階級的权力而辯护这一事实，与我們的分析，或者說与我們关于党的机关和技术知識分子之間的階級冲突的論点并不抵触。首先这是一部文学著作中的“正面的英雄”，也就是奧維奇金理想中的党的干部。其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最后，在階級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統治階級內部，整个旧社会內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銳，致使統治階級中有一小部分人脫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階級，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的階級。所以，正如先前有一部分貴族分子會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样，現在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轉到无產階級方面来，而这便是已經进步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历史运动过程的那一部分資產者思想家。”〔11〕

个别的党务工作者尊重技术知識分子——只要生活中出現了这种現象——也仅仅表明专制的恶化。对我們說来，这里重要的只是現象的內在邏輯：要是有人今天作为爱国的苏維埃俄国人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考慮問題，他——要想做一名好的共产党员也得如此（奧維奇金肯定就是这样做的）——就会相信，必須实行党内民主和真正的竞选，必須消灭党内专职干部这个階級，即解除党的机关的权力。

1962 年 11 月，改革党的結構，便是党的最高領導对这种趋势的回答。这种改革把全部州和区的党务工作者变为純粹的党的督

促員，成為——從他們的職務來看——不再需要從政治家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人，肯定這是不需要的，因為他們不再為所轄地區的全部利益負責，而只是負責在他們的工作範圍內做出最大的成就。

這樣一來，就直接了當地禁止地方黨務工作者，即職業政治家從政治上來考慮問題，因為按照新的黨的結構，從加盟共和國中央委員會這一級開始才有此需要，這一級的幹部實際上已經終生與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成為一體。

黨的最高領導承認，共產黨獨裁的社會基礎更為狹窄了，因為他們認為，真正可靠的黨員不再是近五十萬人之眾的黨的機關，而是大約只有五萬名的共產黨的“侯爵”和“公爵”。

從組織上進行整頓的同時，也從思想上整頓了蘇聯的和世界的共產主義。1956年11月6日，米·安·蘇斯洛夫為慶祝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所做的報告，就是這場思想整頓的序幕，報告中他已談到了共產主義發展中的某些“普遍規律”。〔12〕

下一步是中國人干的。1956年12月29日，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發表了一篇帶有根本意義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真理報》在第二天立即轉載了這篇文章。

紅色中國的理論家們論述了“五條基本經驗”，一年後又進而提出共產主義發展的十二條“普遍規律”。

意識形態的系統化表現為以執政的共產黨或所有的共產黨的名義多次發表共同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1957年的宣言和1960年的聲明；出版關於蘇維埃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教科書；以及1961年10月發表了蘇聯共產黨的新黨綱，它在蘇聯官方的宣傳中被吹噓為“二十世紀的共產黨宣言”，並且實際上是一個無可非議的正統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典範。其中，特別明確地表明了对馬克思和共產主義世界革命——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理想的信仰。

“社会主义——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科学地預言过它的必然性……在苏联成了真正的现实。”

“全世界劳动者的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輝天才照耀着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将在世界各处代替資本主义。”

“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全人类的发展道路。”

“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已經开辟。在这条道路上已經有許多国家的人民在前进，所有国家的人民迟早都要走这条道路。”

“新世界（共产主义陣营——作者）的宏伟大厦……是新社会的榜样，全人类的未来。”〔14〕

在宣布这些口号的同时，人們必須密切注意这些事实，开始了“第二次非斯大林化”，并决定把斯大林的塗有香料的尸体从莫斯科紅場的陵墓中移出，埋葬在克里姆林宮牆脚下。

这个行动給予苏联集团之外的很多观察家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于他們对于同时宣布的共产主义建設和把共产主义的統治扩展到整个世界的綱領或者置之不理，或者簡直是不能理解——然而这本来是可以不发生的。

这也是：牺牲斯大林，为的是拯救斯大林主义。但是無論如何，“第二次非斯大林化”首先带来的是放松了党的控制，特别是对国家精神生活的控制。

1962年10月21日《真理报》登載了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斯大林的继承者》一詩，可以說达到了思想自由的頂峰。的确，在这个时期一种倒退的趋势已非常明显了：1962年8月乌克兰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書記阿·斯卡巴曾經抱怨道：

“这些作家們所追求的創作‘自由’，完全是背离共产主义思想的。”〔15〕

1963年3月党的领导人亲自确定了这样的路綫：

“苏联的文学艺术是在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展的。”

党的宣传家头子赫鲁晓夫在一次对他来说是整个生涯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演说中，特别强硬地反对在意识形态方面可以和平共处的一切观点，于是在这个国家里，从斯大林逝世以来第一次以毫不含糊的形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苏联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它表达了全体苏联人民的愿望……党将清除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东西……”

“我们要使一切试图强迫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和平共处的人很好地理解我们的原则……谁在意识形态方面宣传和平共处的思想，谁就在客观上滑到反共主义的立场。”

在另一个地方说：

“标榜自己是沒有党性的人，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不同意党的观点和思想，是为了给自己招募支持者。”此外还提到：

“在斗争中，谁要是不加入劳动人民（也就是共产党人。——作者）一边，其实就是帮助了资产阶级。”〔16〕

赫鲁晓夫在同一个演说中确定了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就是最后的态度），在这点上人们甚至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风度。

196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全世界都紧张地注视着，苏联的新闻界将如何对待这一天——有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这一天将重新表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相当紧张的关系。但是中国和苏联新闻界都不重视这个纪念日。完全出人意料之外，赫鲁晓夫在三天之后，即3月8日，在上述的他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讲话中以此来恢复他死去的导师的名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是一个献身于革命的，我們党的杰出的干部……过去和現在，党都譴責斯大林粗暴地破坏了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則，譴責他的专橫和濫用权力。尽管如此，在斯大林对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績方面，党还是給以应有的評价。我們現在依然认为，斯大林是忠于共产主义的，他是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能，也不应当否认的……

“当埋葬斯大林的时候，許多人，其中包括我在內，流下了眼泪，这是忠誠的眼泪。”^[17]

这样就在意識形态上巩固了专制制度：斯大林被說成是党的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固然犯有某些缺点，然而受到永恒的偶像弗·伊·列宁的高度評价。在这个演說中还指出，貝利亚这个“可怕的人物”对斯大林所犯的罪过，也就是錯誤負有責任……。

终于在“非斯大林化”的外衣下悄悄地，然而却是坚定地繼續恢复斯大林的恐怖机器。

正如我們所知，斯大林逝世后，各居民阶层首先提出来的要求之一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1958年12月25日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維埃批准了迄今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保障权利制度的措施，以滿足人們的这种要求，人們通常把这些措施称为刑法改革。

然而与此同时也发生了另一种进程，这种进程将消灭保障法权的一切努力，并为一种新的恐怖制度开辟道路。

最早是1957年5月，先在比較小的烏茲別克苏維埃共和国和土庫曼苏維埃共和国内（在这些地方发生这种事并不使人感到很突然）頒布了关于加强对危害社会的寄生分子的斗争措施法。接着在其他共和国里也陸續地頒布了类似的法律草案，而这些法律經過很長時間才被通过；在俄罗斯、烏克蘭和白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直到1961年夏天才通过。

这些法律是针对那些逃避在“社会主义成分”内，也就是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劳动的人，他们依靠父母收入生活，或是有非法收入（私人劳动，私人商业）。首先规定惩罚的办法是流放，最长为五年。令人注意的一点是判决并不是由普通法院，而是由不定形的“公民大会”根据（党所操纵的）个别公民、“群众团体”等等的告发用公开投票的方式，以简单多数作出的。^[18]

迟至 1960 年 10 月官方宣布了恢复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和任何规章制度约束的，直接依赖暴力的权力的方针，《共产党人》杂志当时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刑事诉讼中的社会主义法则》一书，这书是由法学博士（在苏联，法学博士很少，是一种很高的科学学位）弗·帕·腊基柯夫所著，并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司法部长弗·阿·鲍尔迪列夫编纂的。腊基柯夫的基本思想是，人们必须区别破坏法律和破坏合法性。他所理解的合法性大概就是指法治国家的那些东西，特别是一定要遵守诉讼规则。他写道：

“破坏合法性不仅破坏了法律，而且也破坏了保证坚决而正确地运用法律的复杂的机构。”

《共产党人》杂志谴责作者说：如果他说普通法院和国家监察院是唯一的有权根据已定的制度来维护法律的机构，那么他就是站在“形式主义”的立场上。实际上“社会团体”，也就是党，党所操纵的工会，新闻界和“辅助警察机构”等等，都有权对判决起积极的影响。

显然，批评者在这里所谈的是新的方针路线，因此他再三强调，这本书“已经落在国家发展的后面了”。^[19]

这种路线的实际后果是在一年以后才表现出来的。

1961 年夏天，党的领导认为已强大到足以公开地过渡到一种“非形式主义的”残暴的司法。他们利用了一件非法牟利的七人集

团案件，大肆宣传，这个集团买卖外汇、黄金和古画。在逮捕时沒收了三十四万四千（旧）卢布，一千五百二十四个各种不同类型的金币，一万九千美元，五百英鎊和其他一些东西。1961年6月15日主管法院作出了判决：两名主犯判处十五年徒刑，其他人相应地判以监禁。然而1961年7月底却宣布，苏联最高法院对这项判决提出責难，于是該案件又重新提交法庭，并作出了新的判决，两名主犯判以死刑，并已执行。〔20〕

这个案件最重要之点是明显地破坏了“形式上”的合法性。被告犯罪的那个时候（1960年商店被搗毀），規定这种罪行的最高懲罰是八年徒刑。当他們被捕的时候已經改为十五年了。到起訴的前一天，1961年7月1日又頒布了一項法律，規定私套外汇犯一律判以死刑——而这项法律是作为判决的基础。

看来，“斜眼”揚·洛柯托夫和他的同伙是一个相当贪婪的集团，赫魯曉夫的女婿，《消息报》的主編阿历克賽·阿朱別依从宣传上尽量地利用这一案件来削弱对恐怖司法的反抗。在这一时期又頒布了一批法律，这些法律，特别是当它們具有溯及既往的作用时，几乎使每一个新知識分子，或每一个工业領導人都面临着被枪决的現實前景。同时，这些法律正是表明党的机关和新知識分子之間进行的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争。

死刑逐漸扩大到其他犯罪行为，如“大規模”的盜窃国家財產，伪造眼目（“弄虛作假”是苏联很流行的一种現象，它是由于生产部門的領導人竭力隱瞞沒有完成的計劃，和为“秘密的資本主义”取得資金所造成的），私套外汇和受賄等等。〔21〕

1961年10月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和所謂的“第二次非斯大林化”成为系統地制造恐惧气氛的一个新的轉折。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提醒党不要忘記，整个苏維埃时代的一半時間是以党，或者至少以党的名义进行大規模屠杀为标志的。赫魯

曉夫这样做的目的几乎无人不曉。

正是在这里，特別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則，“牺牲斯大林，为的是拯救斯大林主义”。

首先可以听到的是要求公开审判斯大林的前共事者。例如：党内第二把手，弗洛尔·科兹洛夫在他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譴責这个集团的成員犯了明显的刑事罪，他說：

“在这里，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崇高讲坛上，許多代表憤怒地譴責了整个反党集团及其各个参与者的卑鄙勾当。

已經揭发和列举出許多事实证明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馬林科夫参与了对許多无辜的人，其中也包括我們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的杀害……”〔22〕

从这篇冗长的报告中得出的邏輯結論就是，这些从来没有被称为“同志”的“反党集团成員”應該提交法庭，是否公开审判还不能肯定。但是公开的揭去老的領導者的“伪装”，已足以撤去所有不依仗赫魯曉夫而获得地位的人的职务，特别是从保安机关中撤去他們的职务。国家保安委员会的領導人之一，契斯特耶柯夫將軍于1962年9月宣称，保安机关的人員已全部更換，补充的人員是党和共青团干部。〔23〕

此外，“第二次非斯大林化”帮助了赫魯曉夫偷偷地贩卖他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綱領——第三次布尔什維克革命的綱領，然而它在外国，以及部分地在俄国，并没有馬上露出馬脚，尽管人們已經可以觉察到第三次布尔什維克革命的第一个閃光。沒收新知識分子的財產已經开始了，其目的首先在于沒收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是今天形势下广泛流传的“秘密的資本主义”的最主要表現形式。

和一种广为流传的意見相反，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已有有人在建筑私人住宅。1948年8月26日頒布了一項法令，苏联公民有权建造一所一层到二层，最多只准有五个房間（不带附屬間）的住宅，

以后的一切措施都是以这个文件为依据的。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于1957年7月31日作出一项决议，其中规定提供优惠的国家贷款，这项决定显著地扩大了各种类型的房屋建筑。^[24]

如果考虑到1959—1965年的七年计划中规定的，依靠国家贷款建造面积六千九百万平方米的一百七十万所房屋这一事实，人们就可以对私人建筑活动的规模有所了解。相反，国家建造的住宅只占整个建筑计划的27%。^[25]

就在这个时候，也已经出现第一批倒退的迹象。1958年7月18日决定把准许建造的住宅（不带附属间）限制在六十平方米，1959—1960年发表了一批反对“投机分子”的煽动性文章，要求采取限制建造私人住宅的措施，1961年各加盟共和国又颁布了反对建造私人住宅的极不统一的法律。^[26]

一年以后公开斗争开始了。先是颁布了一批法律（仍然是在加盟共和国一级）：“关于无偿地没收那些不是靠劳动所得的收入建造和购买的私人住宅、别墅及其他建筑物”。之后又从法律上规定，没收的不一定是那些非法的产业。在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法令中说：

“从1962年5月1日起，如果一个公民或一起生活的伴侣个人占有一所房屋以上，那么……所有者必须转让出第二所房子（以任何一种方式）……在缺少买主，不能实现强制出售的情况下，房子就无偿地转为国家所有。”^[27]

在“非斯大林化”外衣下实行“再斯大林化”的一个很重要之点是我們早已熟悉的永恒的清洗原则，实际上这个原则是斯大林所运用的，而现在已成为党的理论的一部分。这个原则是：

“为了使更多的有才能的人参加领导机构的工作，也为了杜绝国家管理部门的个别干部滥用权力的可能，党认为有必要系统地

更換領導機構的成員。”

“強制更換”的原則絲毫也不排斥權力集中在少數領導人手中，它甚至為此創造了最好的條件。黨的綱領中說：

“某些黨的活動家，由於他們享有公認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質、組織者品質和其他品質，可以在更長的時期內連續選入領導機關。在這樣的情況下，有關的候選人在不記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須有四分之三的選票投票贊成方可當選。”〔28〕

永恆的清洗原則根本不包括限制那些往往是第一把手的權力，這又一次證明了黨的領導人不僅對整個黨的基層，而且對整個蘇聯新特權階層的下層的極度不信任。

按照黨綱和同時通過的黨章的條文，黨、國家和“社會團體”的領導機構應該有系統地更換，但其比例不同：蘇共中央委員會每隔四年更換四分之一，四個主要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黨中央委員會更換三分之一。其他共和國、州和區的黨領導人每兩年或更短的時間更換，每次“不應少於四分之一”。

這種在形式上符合民主的國家機構的，而又可以成為民主的組織單位的蘇維埃應在每次選舉中更換三分之一。

對各種“社會團體”——工會、共青團、文化組織、體育協會等等規定，在每次選舉中至少更換二分之一的領導人，這無疑是因為這些機構有著強烈的擺脫黨的控制的趨勢。

還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項特別規定，禁止基層黨組織的書記——也就是與廣大群眾聯繫最密切的幹部——連續當選兩次以上，即連續當選兩年以上。〔28〕

最後還要談談，在“非斯大林化”旗幟下“再斯大林化”的一個方面。赫魯曉夫在1963年3月8日對作家和艺术家的談話中，按照斯大林好的老傳統提出了“一些理論問題”，並且發表了關於“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想法，他說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还有破坏社会秩序，背离集体意志（指党的領導——作者）的現象呢？这是可能的。但肯定是个別現象。不能設想，不再存在神經病患者了，瘋子也不会破坏共同生活的准則了……将会有某些对付他們的办法……。現在也还有一些給神經病患者穿的紧身衣服，以便使这些人不再可能发狂，毀坏自己和破坏环境。”〔29〕

值得提出的是，这种別致的“理論主張”是“在党和政府領導人同知識分子的集会上”宣布的。从而使每一个拒絕毫无反抗地执行党的路綫的知識分子清楚地了解到，如果他反抗“集体的意願”——其含意只有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才有权确定——那么，在某种情况下他可能被送进神經病医院。

总括起来，我們可以概述一下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的結果：

甲、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綱領，也就是实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遺囑。

乙、从組織上为第三次布尔什維克革命，为沒收新知識分子的财产和废除党的机关迄今还容許的“个人财产”創造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丙、向区别运用暴力机器过渡。原来的有效的枪决办法——至少首先——只是用来对付“主要敌人”，对付有“私人资本主义”傾向的人。显然党的領導人希望，借助于永恒清洗的原則足以把大量新知識分子控制起来。对那些倔强的知識分子有一个新的办法：瘋人院。

的确这不是机械地恢复斯大林的領導方法。但是从斯大林的逼供信，即从对那些无辜的，而是被屈打成招的人进行判决过渡到“在法律上”規定对經濟犯、伪造单据者处以枪决，这恰好符合了馬克思所熟識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循环。

《資本論》里有这样的評論：“在英国，人們禁止焚杀魔女的时候，我們在英国看見了伪造銀行券者处絞刑的命令。”〔30〕

还要提到的是，这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1957—1958年工业改革中宣布的經濟領導权力下放。苏联国民經济委员会逐步地扩大了，根据1963年3月的統計，已不再是一百零四个了，而是只有二十五个左右。在这个时期，一些部改換名称重新成立起来——作为苏联部长會議各有关方面的委员会。1963年3月13日最高經济委员会建立之后，国民經济的領導又全部集中起来了。〔31〕

在研究苏联的“再斯大林化”的时候，为了便于了解，我們沒有提到同时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的发展。根据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社会基本法則，所有我們称之为党的机关发动攻势的措施都包括了影响新知識分子的目的。1957年夏天把“反党集团”赶下台，同时带来了經濟領導权力下放，这件事我們已經提及。从斯大林的五年計劃过渡到七年計劃，只不过是更长期的計劃，而从工业領導人的观点来考虑这是一种进步。除其他方面外，“第二次非斯大林化”自动地从道义上譴責了党的机关的专橫。党的机关的改革本身也包含着某些适合技术知識分子胃口的东西：現在工业厂长面对着的是党的督促員，党的督促員比过去懂得更多的专业，这是因为他們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方面。但是他們的作用并未因此而改变，甚至对他們來說有可能更好地起督促員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这又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客观的論点。

使技术知識分子的影响发展成为决定性的、有前途的因素，其最重要的方面是大胆地修改了继承下来的价值規律及其对苏联制度的意义的观点。

正如我們所知，对正統的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貨幣关系观点的审查不是一次，而是逐步完成的：1953年要求承认价值規律

首先是躲躲閃閃，之后，这种要求便越来越强硬，到了 1956 年便废除了斯大林在 1952 年制定的有关价值規律的清規戒律。

然而，在 1957 年党和国家发生大危机时，技术知識分子才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1957 年 5 月，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事件，虽然不如苏共中央第一書記或是苏联部长會議主席下台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似乎要大得多。当时在苏联科学院的国民經济研究所里进行了一次討論，討論結果汇集在一本名为《价值規律和它在苏联国民經济中的运用》的书中，并且出版了該书。

如果我們在这里研究这次重要討論的全部問題，就会扯得太远。书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在国家領域内生产的和流通的生产資料也是商品。”

在叙述为什么要在馬克思主义思想范围内革命性地审查原有观点的理由时，主要报告人，科学院院士康·瓦·奥斯特罗維雅諾夫說，生产資料的商品性质是来自“国家所有制发展的特点和内在需要本身”。“在国家和国营企业之間，在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关系存在这样一种經济形式是有客观必要的，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对企业中的活的和物化了的劳动給予等价报酬的原則的。”^[32]

成为这个綱領最基本核心的观点是，如果国有化的工业全部劳务和产品不是以一种标准的資本主义方式作为价值进行交換，那么国有化的工业也不能起作用，这就是說，必須把客观上正确地确定所有劳务和产品的价值，看成是明智地領導經济所应具备的絕對必要的条件。

如果回想一下这件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修正具有革命性质。斯大林在五年之前，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1952 年）一书中，早就明确地警告过国民經济学家，其中包括奥斯特罗維雅諾夫本人在內：“……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是从这个

著名的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依照需要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摈斥任何商品交换的，因而也摈斥把产品轉化为商品，同时也就是把产品轉化为价值的。”〔33〕

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修正，直接为苏联领导人作出下述决定开辟了道路，1958年秋天，苏联领导人决定彻底地改变农业的組織领导，解散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出售給集体农庄，这都是集体农庄主席过去一再提出的要求。

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修正也为1961年1月1日彻底的货币改革开辟了道路，在这次改革中，按十比一的比例改变各种工资和价格，而强制的外汇率确定为一卢布等于一点一美元，也就是四点四馬克。

在这里我們不研究这次改革的經濟方面的問題。从政治上来看，无疑的是努力强迫居民以及在工业管理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式的”节约。赫魯曉夫在1960年5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作报告，在談到货币改革的理由时說：

“目前出現这样情况：一个戈比（一卢布等于一百个戈比。——作者）丢在大街上，有人經過那里，他不会弯下腰把它撿起来的。如果实行了新货币，那么就不会把一个戈比扔掉，会把它撿起来，因为它可以买一盒火柴啊……”

此外，还将提高卢布和戈比在企业經濟活动中的作用，这将会促使合理地使用物质、劳动和货币儲备。”〔34〕

这是非常引人注意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出人意料地号召居民为一个戈比，也就是为0.00987412克黄金弯腰，而列宁曾經想用黄金建造公共厕所。确实，赫魯曉夫已經发表过很多非正統的思想，当这些思想用来为共产主义服务时，他就把它們收回了：人們会想到，例如，他号召居民保留私有牲畜，因为这对他沒有絲毫妨碍，以后他又咒罵财产的形成。

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估計，在这一点上，修正馬克思主义也不会被人信以为真的。关于这件事以后还要談到。

最后还要談到的是，奥斯特罗維雅諾夫的主旨报告与苏共新綱領中頗为有趣的一段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

“在共产主义建設中，必須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內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这里，运用經濟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潤、貿易、信貸、財政这些发展經濟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35]

这个观点涉及到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九点綱領中的个别方面，这些都是赫魯曉夫迄今不可能實現的，而且是他首先不得不放弃的。

从同一个思想中也还产生了 1962 年夏天經濟学博士伊·利別尔曼的一項大胆建議。他指出應該使利潤成为衡量成就的最重要的，而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标准，厂领导和职工應該参与分享利潤。^[36]

实际上这是要求建立一种在国家管理下的市場經濟。這項建議当然被拒絕了。

今天，当关于价值規律的討論已得出某些結論，虽然还没有得出全部結論时，我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赫魯曉夫在 1957 年夏天的关键性斗争中能贏得胜利。各个国家的命运不是以某些野心家的阴谋詭計为轉移的，而是以各階級的意志为轉移的，而赫魯曉夫在这个时候显然是得到苏联社会的两个主要力量的支持。我們尽管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价值規律在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我們知道，所有同意修正斯大林观点的党的干部都支持赫魯曉夫，而被赶下台的党的干部却反对这种改革。

确实，这不仅是赫魯曉夫最大胆的，而且也是最危險的手腕。

奥斯特罗維雅諾夫关于承认生产資料商品性质的必要性是来

自“国家所有制发展的特点和内在需要本身”的論点，明显地证明了，党的领导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不是自願的，而是事实所迫，毫無疑問是非常勉强的。因为在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在党的机关和技术知識分子之間存在着一种妥协的因素。

尽管承认在开展共产主义建設的整个时期有向一个戈比弯腰的必要性，但也还是有所保留的：

“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經濟上就将过时和消亡。”〔37〕

这种界限在理論上是毫无意义的。要么通过把财产集中在国家手中来直接分配产品——（不是产品在价值上的轉換），是可能的話，那么斯大林关于现在就扩大“产品直接交換”的因素的建議就是正确的；要么是奥斯特罗維雅諾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在国有經濟內部也是如此——是出于国有經濟本身的“需要”。这样一来，即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当全部财产都集中在国家手中时，也还必须保留商品的流通（商品—货币关系）。

实际上，这种保留完全有可能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如我們所知，苏联的經驗证实了恩格斯对保留商品流通所引起的政治后果的古老分析，从长远看来，它使苏共领导只有选择不顾一切經濟上的考虑而消灭商品流通的道路。我們想在下一章中再研究这个趋势。

今后二十年的斗争

尼古罗·馬基雅維里^①在1513年忠告他的君主說：“首先，他不要侵占臣民的财产，因为人总是对失掉财产比对死掉父亲还要感到痛苦。”

他在书中另一处写道：

“只要人的财产和尊严沒有遭到侵犯，只要人是滿意地生活着……因此我的結論是，只要君主对待人民很好，他就用不着担心任何阴谋叛变。如果他被人民所痛恨，他就得害怕所有的人。”

約瑟夫·斯大林在他的办公桌上据說是經常放着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他再次证明了这个論点是正确的：他进行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沒收财产行动，因此他势必終生“害怕所有的人”，势必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現在我們是俄国开始的第三次布尔什維克革命的目击者。它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首先涉及到的是完全的和大部分的无偿沒收各城市的私人房产。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則是“自願”放弃个人的宅旁园地和个人的牲畜，以及不增加所得税，以利于扩大集体农庄的“公积金”（这种“公积金”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后将要变成全民公有财产，即国家财产），和承担无报酬的劳动义务等等。

^① 尼古罗·馬基雅維里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年)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身沒落貴族家庭。曾任佛罗伦薩共和国要职，著有《君主論》等书。他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甚至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謂“馬基雅維里主义”)。——譯者

政府的沒收措施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例如1961年9月《建築報》登載了鄂木斯克一位女工用全名簽署的讀者來信。她談到兩個月前登載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阿歷克賽·雷雪托夫經理因給自己蓋了一所房子而遭到批評。這位女工寫道：

“阿歷克賽·雷雪托夫的第宅應該蓋，而且應該蓋得很華麗。他值得夸耀和贊揚！在雷雪托夫所蓋的宅子里，人們可以住好幾十年。他將來不能把它帶進墳墓中去……”

雷雪托夫在蓋成這所宅子之前一定工作了好幾年。因此人們不應把蓋房子的雷雪托夫看成是盜賊。我再重復一遍說：他是一個好樣兒的！”

我們通過“新聞機構”的分析知道，遭到批評的人進行了自衛，而且對這點有很多報道，尤其是那些有名望的房主利用了他們的種種關係來保护自己的財產。

如果把全部關於“自願的”或強迫的沒收房地產的文學描寫和事實報道綜合起來，就可以得出下列結論，根據1963年初的情況，至少是全部現有的城市和城市類型的居民區的私人房屋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沒收下列房屋認為是“合法”的：(1)由於濫用職權蓋起來的房子，(2)建造房屋用的資金來路不明，(3)房子為房主提供非勞動的收入。在蘇聯是沒有獨立的司法制度的，因此可以向任何一個在職的房主“證明”他曾濫用職權。大多數人為了有一所自己的房子需要奮鬥一番——個人的勞動，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合法的手段（如接受貸款）、半合法的手段（如從垃圾堆和瓦礫堆里收集磚頭）和不合法的手段（倒賣、盜竊等）以及利用種種關係，這些往往都同時起作用。因此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可以為“來路不明”找到證明。

從出租房間中獲得租金（它可以作為沒收的“法律基礎”），不僅是通常現象，而且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人口的流動很大，特別是

那些領導人員時常調換崗位，因而他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房子賣掉或租賃出去。此外，大部分的房子都負有債務，因此只有出租，別無其他辦法。^① [1]

我們可以就第三次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這個方面情況大致作一估計：

1961年城市和城市型的居民區住房面積為十億零一千七百萬平方米，其中私人所有的住房面積為三億九千一百萬平方米。^[2] 如果我們按每所房屋大約一百平方米計算，那末約有四百萬個房主，連同家屬約有一千六百萬，即約占全部人口的7%。人們會不會把所有這些人的房產沒收，現在很難說。但是，他們是受到威脅的，而且他們是一些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起着官方或非官方的重要作用的人……

這一發展的另一條“綫”是農民把私有宅旁園地和私有牲畜“自願”轉讓給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一行動是當時赫魯曉夫親自倡導的，赫魯曉夫在1958年秋與他家乡卡利諾夫卡的集體農民談話中（第二十一次非常黨代表大會的前夕，二十一大是1959年2月舉行的，它向共產主義跨出了決定性的第一步）說出了這種思想，農民在將來不該占有自己的一塊土地和牲畜，這樣他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參加集體勞動和“休息”。^[3]

蘇聯作家謝爾蓋·伏羅寧形容過，沒收宅旁園地——不管以什麼理由——對農民說來意味着什麼。他描寫一個農民當他聽到他的宅旁園地被沒收時是怎樣的哀嘆：

“在這聲哀嘆中交集着絕望、憂郁、憤怒和悲哀。

“土地啊！最珍貴的東西，它攪着人心，怎能落入他人之手。自己的一小塊土地，儘管小，但這是自己的，在這塊土地上他是主人，

① 蘇聯諷刺雜誌《鱷魚》在1963年初登載了一幅漫畫，題為《自己的別墅》，在每個窗子，每個陽台和每個露台上都寫着“招租”，而房主卻住在狗窩里。

任何其他人都不是主人，土地，唯一的土地，他的土地，即属于他本人的一块土地。他哺育过它，哺育过它，它似乎是有生命的。追求土地象追求少女一样。許多夜晚他不能入睡，他在床上不停地翻身，总是想着他的土地。”〔4〕

領养老金的人对于党领导强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企图沒收他們晚年消遣的果树、葡萄树的反应，这里值得一提。1961年9月《乌克兰真理报》的一篇报道写道：

“有許多人会說：‘我宁願把这些果树砍掉，也不把它交给农庄’，而且現在不少人已經表示：‘这些果树我誰都不給。’”〔5〕

在为建設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連山羊也被說成是“資本主义的根源”，《經濟报》在1962年11月刊登了一篇特写的文章，它令人惊异地报道說：

“每一年可以从一头山羊身上获得八百克上等羊毛，可以織出两条围巾，这能給飼养者带来将近一百卢布的收入……您如果到乡村去走一走……就会看到这么一种景象：所有的人，大大小小，不是坐在織布机上（！）就是手里拿着織衣針。”〔6〕

在研究由于党领导竭力强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引起的紧张状况时，必須考虑到，这不仅損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这些措施直接損害着所有人的利益。在大量沒收私人新建房屋之后，城市私人兴建住房实际上停頓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同时城市房荒簡直不堪設想。法定居住面积标准每人是九平方米；这对城市里多数人說来是一个不能实现理想。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溫市委会不得不于1961年7月規定，绝对最低标准每人为五平方米。〔7〕

或者我們还可以举反对私有牲畜的例子。1960年1月，苏联私人占有的母牛計一千七百万头。在这一年的头十个月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在党負責人的友好的支持下，尽管既沒有准备畜舍也沒有准备飼料，却向私人“购买”了八百万头牲畜。許多

地方买了来不得已又屠宰了。一年以后赫魯曉夫咆哮道：“只有敌人——而不是共产党人——才会这么干。”〔8〕

但是，不幸的事情已經发生了，根据許多而且常常頗怀怨恨情緒的苏联报道判断，損失的規模很可观。《文学报》在1960年5月写道，某一集体农庄“向庄員购买了五百条奶牛，农庄答应向所有的人供应牛奶。但是实际上現在——在实行这一‘进攻’之后几个月——每天仅仅向三千个庄員供应一百五十公升牛奶：仅仅是給病人和儿童的，每人半公升！”〔9〕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很快对国内經濟的发展发生了非常有害的作用，这是意料中的。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在1962年初不得不指出：

“国内谷物……的总产量，以这三年（1959—1961年）的平均产量与前三年（1956—1958年）的平均产量相比，甚至有些下降。肉的总产量（包括私养牲畜。——作者）以这三年（1959—1961年）与1956—1958年相比，增长了22%，但1961年比1959年少，比1960年仅增加1.5%……牛奶产量在1959—1961年几乎没有增长。”〔10〕

現在插入一段話：1959年，即第二十一次非常党代表大会毫不隱諱地宣布党领导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意图的这一年，可以表明，党的最高领导关于落后傾向的根本原因是完全清楚的……

有人要問：赫魯曉夫——人們背后称他是开明的极权主义或十足的实用主义——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呢？从他的立場出发，把向共产主义过渡推延到将来岂不更好么？这从意識形态方面看并不困难（馬克思不曾規定期限），从政治上說，也許更有利！

也許……也許并不！对苏联总的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結論，苏联领导在五十年代的下半期，除了不顾一切向共产主义过渡，走这一条道路之外，完全没有別的选择，所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首要的原因是劳动市場的发展。斯大林死后，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經濟以外的强制”方法如果还不能說是已被物质刺激劳动所代替，至少也可以說是放松了。1956年4月25日废除了1940年頒布的禁止更換劳动崗位，否則处以监禁的非常令人憎厌的法律。^[11]总之，劳动立法是大大放松了。結果是劳动市場的窄口增多到灾难性的程度。1960年格魯吉亞第一書記姆日阿瓦納澤报告說，沒有完成最低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員的人数不断增加，1958年平均为14.1%，1959年約16%。

阿尔泰边疆区党委书记K·普辛报告說，边疆区各国营农場能劳动的人有三十五万四千人，其中有十五万五千人，即約44%根本不按規定参加劳动。

赫魯曉夫終於被迫在1962年11月宣布重新修改劳动法，以防止劳动力的流动。^[12]要发现劳动力到哪里去了，这并不困难。在农业方面，农民和国营农場的工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于自己的宅旁园地；1963年1月发表在《哈薩克斯坦党的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說，一个国营农場的生产小組长从宅旁园地所掙的錢比他整个小組在国营农場的田地上掙得的还要多。

城市里的人搞黑市活动。当时出現了一个特殊的術語叫“沙巴施尼克”（卖廢材的人，黑市工人）。沙巴施尼克經常挂“生产队”牌子，但人們称它为地下商号。例如，烏茲別克斯坦在1962年4月枪决了一个組織的两个领导人，这个組織就是通过黑市承包开凿自流井业务的。^[13]

因此，苏共领导很快就要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支付适当的报酬，这就意味着要改組全部經濟結構和私人資本的构成；或者設法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任何人不能得到超过官方規定份額以上的东西。

在經濟效果逐漸成为唯一判断效果的标准之后，在各經濟单

位，例如在集体农庄中，积极性起来了，但党领导对这点是不会感到舒坦的。我們知道，“真正有才干的經營者”竭力为“自己的”单位保留尽可能多的产品，而以尽可能少的产品供应国家。沒有完成的官方計劃，往往通过“黑市”或“灰市”来填补。然而問題不仅是这些。許多文章报道，集体农庄，即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工业企业单位的姿态出現。

这并不是新現象。早在 1952 年，当时还是官运亨通的馬林科夫就曾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号召，要集体农庄庄員停止兴建自己的磚瓦厂及其他工业企业。

十一年以后《鱷魚》画报报道了三个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庄，其中两个具有象征性的名称叫做“共产主义之路”和“先鋒队”，第三个叫做基洛夫集体农庄，这三个农庄都組織灯心、斧柄、绳索和其他許多手工业品的生产。基洛夫集体农庄有六十三个庄員从事绳索生产，非庄員也能参加，这一事实证明集体农庄领导人的思想是非常資本主义式的，把劳动力看作商品。绳索生产的收入完全足够用来在黑市购买計劃中所不足的奶牛和鴨子，作为义务繳售給国家。〔14〕

第二个强迫党领导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原因是“黑市”和“灰市”的不断增长。在上面引述的报道集体农庄工业活动的那篇文章中，例如还談到，它們的經營联系很广，由莫斯科地区伸展出去，从波罗的海到摩尔曼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

甚至赫魯曉夫本人在报告里都說出許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1962 年 11 月他說道：

“仅仅是 1962 年上半年送交法院审理的案件，貪污盜窃造成的直接損失就达五千六百万卢布……（折二亿四千六百四十万馬克）。

“潛入吉尔吉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針織厂的騙子，长期以

米盜竊國家財產……總計值三百多萬盧布……(折一千三百二十萬馬克)。

“在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企業里，他揭發出巨大的貪污案件。經辦人集團……以國家企業名義與商業機關的工作人員勾結一起開展分支很廣的私人買賣活動……關於這一‘營業所’的規模，從涉及的有罪責人員達一百五十餘名這一點就可以作出判斷。

“當前在哈薩克斯坦、立陶宛、烏克蘭以及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許多地區，正在檢查較大規模的貪污盜竊谷物……在黑市出售的案件。與這項罪行有關的人員盜竊了約四百万普特糧食（合六萬四千噸）。”〔15〕

然而，強迫蘇共領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不僅是經濟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首先是衡量決策的標準問題，確切地說，即把經濟效果放在首位的嘗試所起的政治後果，以及這個嘗試對黨務工作者的地位和態度所起的影響。

在這方面無疑已經採取了一些步驟。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里聲稱：

“要評價黨的負責人的工作，首先要看他負責的那個經濟單位發展的成績如何。”〔16〕

我們知道這樣重新評價所產生的一些後果，首先是大大加強了技術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力量的信心，而黨的機關的影響則相應地減少了（參見《早期資本主義替代體的理論》一章）。此外，幾乎可以說，許多黨的督促員——其中有相當高的黨的督促員——變得意志消沉了，他們現在感到自己差不多是經濟部門的經理。

後果是意識形態工作顯然是鬆勁了，《共產黨人》雜誌在1960年底報道說，赤塔州委會“在六年中（1954—1960年），關於群眾政治工作問題既不放在赤塔州委會全體會議上討論，也不放在‘積極

分子’大会上討論，区委第一書記不在州委常務委員會的會議上作關於群眾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17〕

另一結果是宣傳工作完全停止了。例如關於經濟效果是判斷標準的宣布，對宣傳品的出版的影響真是慘極了。前面曾經提到，蘇聯的宣傳品本來並不受歡迎。當強迫“政治改造”放鬆以後，對宣傳讀物的興趣也就下降了。

早在1958年，最高級宣傳幹部在一次“全蘇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上抱怨說，許多出版社拒絕出版政治著作，它們把這看作“賠本生意”。1960年1月，中央發布了《關於在當前條件下黨的宣傳任務》的決議，這並非第一次，在這同時，《蘇維埃圖書業》雜誌在一篇社論里指出：

“圖書業的許多單位首先是從商業上的考慮來訂購圖書，它們不以足夠力量去推廣當代的作品，特別是政治著作和現代小說，却超額訂購許多外國作家的並沒有什麼藝術價值的作品的譯本。”〔18〕

根據下面的數字，對圖書印數的分配情況可以大致有個概念：在白俄羅斯這樣一個不經常為最高黨領導所注意的、比較小的共和國，1960年規定僅僅出版十六萬冊本國作家的作品，而外國驚險小說和文學作品達一百五十四萬五千冊。

1962年4月，《文學報》對於《老練的顧問們》一書的暢銷感到惱火，這本書三年來單是俄文版的總印數就約達一千五百萬冊。這誰也不能責怪，因為當時圖書業的成績是按銷售額來計算的。優秀的書便暢銷，因而有些科學機關用編寫圖書來填滿錢櫃。例如，薩拉托夫大學靠翻譯雷馬克的《三個伙伴》和《生死的時代》做了一筆好買賣，從而，如果不說恰恰解決了，那末可以說大大改善了它的財務困難情況。〔19〕

相反，宣傳品賣不出去，再以白俄羅斯為例，1962年初報道

說，沒有足够的地方存放滞銷书，人們不得不把这些书“堆着，过些時間以后把数十万册书籍作为废纸处理。”〔20〕显然，出版者是考虑到1960年的批評的，把党的文献印数提高数十万册，但这恰好是以后作废纸处理的数十万册书……

此外，苏联高等学校明显地缺乏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切高等院校中是必修課）課程的教師和“其他哲学課程”的教授，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共青团真理报》1962年7月报道說，苏联只有37.5%的“哲学教授”——約为二千六百三十人中的七百人——受过高等教育。願毕生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数，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是下降了。莫斯科大学1955年还有一百三十五个馬克思列宁主义专业毕业生，这些学生是在四、五年前，也就是說是在斯大林时代注册入学的，1962年就只有六十五个学生，如情况不变，到1965年馬克思列宁主义課程必然有一半沒有教师担任。〔21〕

党的督促員——首先是党的宣传家——在苏联始終是一个常常使人畏懼而很少受人尊敬的人。因此，随着党机关地位的动摇，在斯大林死后十年中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心程度也下降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后，关于某些党务工作者的“意志消沉”我們不仅有間接的证据，而且也有直接的证据。在党机关的地位极大动摇时期，即从斯大林逝世到“反党集团被揭发”和布尔加宁下台这段时期，党务工作者显然感到自己沒有把握，几乎不能“果断行动”。

例如，1957年在有区党委书记出席的“托木斯克国立大学的党员大会上……发生了一起反党的騷乱……而区委书记沒有說一句話”。还在1959年，共青团首脑謝米恰斯內伊就曾憤慨地說，共青团干部（大多数同时是党员）竟在有人“当他們的面說出与我們（共产党人——作者）格格不入的主张时，而羞慚地一言不

发……”[22]

根据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列·弗·伊利切夫的发言证明，党领导在斯大林死后的十年才使党机关的威信提高到能有效地控制精神生活的程度。伊利切夫在1962年末到1963年初的艺术家和作家讨论会后，在1963年3月7日说：

“特别重要的是，在党的思想的有力影响下，艺术家讨论的情况改变了，许多艺术工作者思想中的‘没有保障’感觉开始消失，人们开始高声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用害怕被人斥责为反动派和落后作家。一切都恢复正常了。”①[23]

这一段讲话同时也供认了，到那时为止，党的机关还没有控制，或没有完全控制思想的发展。这种情况曾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反抗巢穴的存在会导致在国内经济生活中为共产党独裁所不能容忍的趋势。这些反抗巢穴无疑最终会成为国内的决定性的力量，迟早会使苏联共产党在俄国的独裁倾覆。

这种最初和最清楚的发展形式表明宗教在共产党俄国令人惊异的复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出生的，也就是说，显然只是在共产党影响下成长的。根据苏联报刊报道判断，在斯大林死后时期，教会利用党机关工作很不顺利的机会，进行扩大自己的宣传。例如，1959年11月《文学报》报道了萨拉托夫区的伏尔强卡村的一个二十五岁的神甫约翰，他被描写为是一个外貌端正、目光安详慈善的人，说他的博学多才赢得了“虔诚青年的钦佩”。有一天他竟敢于在讲坛上说：

“兄弟们！……如果有人给我们派来一个宣传家，那末我们可

① 一切迹象表明，“没有保障感觉”，即党务工作者认识到他们不能坚持自由讨论，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因为伊利切夫于1963年6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在他的重要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并进一步阐述了思想。[23a]

以，上帝保佑，向他提出一些他絕不能回答的問題！”这家报纸补充說：

“一个宣传家不久之后曾来到区里，但他沒有在伏尔强卡村露面。”

1960年《苏維埃俄罗斯报》报道，在某些地方教堂比开放着的俱乐部更多。在一个村子里，神甫——除星期六和星期日祈禱之外——一年举办四十五次讲道，而俱乐部只举办十次报告，在另一个村子是六十次讲道对三个报告。

1961年刊载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几封讀者来信，指責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并要求把有关家长送交法庭。

而1962年，我們可以在《消息报》上讀到一則关于乡村神甫尼古拉·图洛夫斯基的报道，他已攫夺了村里的全部权力，甚至区的国家檢察官也不得不說：“我們宁可不去触犯这个教士。不然就无法在吵吵嚷嚷中脫身。”这篇报道在結語中要求：“如果教会成了……积极宣传宗教的場所，……那末我們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采取坚决的措施。”〔24〕

发展的另一条綫是爭取——很少精确地下过定义，但却非常精确地感觉到的——思想自由、行动和意志自由的斗爭，这个斗爭迟早会导致发生与现状的对抗性冲突，也就是說，最后会汇合在有意識地反对共产主义的潮流之中。

西方有人喜欢把这些称为两代人的問題，即“父与子”間的冲突。实际上是新知識分子和党机关之間的階級冲突，虽然冲突中青年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伊利亚·爱伦堡（生于1891年）是要求精神自由而挺身出来的最早的一批人中的一个：把任何独立思想都看作“对党和国家紀律的敌意的破坏”的区委书记梅德維捷夫，在作出这种行动时大約才三十岁。

爭取精神自由的斗爭，或者說，对执政者的反抗，表现为各种

不同的形式，例如不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期刊的出版，1955年12月維爾紐斯大學的《無花果葉》；1956年列寧格勒大學《藍色的花蕾》和鐵道學院的《新聲》；1957年莫斯科大学官方的大學生報受到譴責，說它轉載了“資產階級報刊對蘇聯報刊的毀謗性的攻擊”。

1957年5月《文學報》報道了一個自稱為“ни бо, ни чѐ”的流派。這個名字是從俄文 *Ни в бога, ни чорта*（不信神也不信鬼）的字母簡寫而成的，它可算是赤裸裸虛無主義的示威。

1959年12月烏克蘭共青團機關報寫了一篇關於基輔詩人和作家非法集團的報道：

“……這一小撮人勾結在一起只有一個目標：詆毀蘇聯人創造的一切。他們吃的是我們的面包和牛油，住的是舒適的住宅，而辱罵所有那些他們所享用的東西的創造者。”

1960年9月，《消息報》攻擊非法雜誌《句法》說道：

“無數宣言和聲明，有的以韻文形式，有的以散文形式，都出自這支筆。上面寫的是什麼呢！最重要的就是顛覆。”

還應提一提的是，1962年夏莫斯科大学圖書館學院取締了一個名叫“青年類人猿世界協會”的組織，這個組織都是由最優秀的大學生組成，根據會章，它是以爭取“人類逐漸向後和平演變的猿猴”為目標，實際上是以爭取人類擺脫技術進步為目標。

在這些“幽默的”要求背後，隱藏着反對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一觀念的明確的鬥爭宣言；章程規定之一是：“青年類人猿世界協會會員有權把自己的利益置於社會利益之上。”……[25]

期待一種新的東西，期待新的革命事件，是現代俄國愛好自由的詩歌的特點。這一感覺甚至滲入正式出版的詩文中。如葉甫根尼·葉甫圖申科在他的最優秀詩篇中的一首關於一個象徵同時代人的詩中寫道：

“我不知道，他要什么，
但我知道，他就在近旁……
他手中拿着一个苹果，
徘徊在附近某个地方……
世界上的一切都等待他，需要他，
渴望着他这个不相識的人，
他带着坚实的苹果，
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
我恐惧他的目光，
因为，自己应有的权力，他将感觉到，
如果他已認識，要矗立在世界面前，
他讲的将是嶄新的語言。”^[26]

在叶甫图申科的詩篇中，苹果是未来理想、一切开始的固定不变的象征，这种类似救世福音的思想，說某个人将要到来，讲的将是“嶄新的語言”，在共产主义的意識形态看来应被詛咒为十足的异端。^①

这种思想在非法刊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們敢負完全責任这么說，其根据是：1962年从苏联走私来一份其象征性的刊題叫《凤凰》的非法杂志，这份杂志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其中有几首詩在1962年初受到苏联官方刊物的責难。俄国流亡者杂志《ГРАНЬ（边缘）》（1962年第52期）全文翻印了《凤凰》的文章，因为《凤凰》的作者現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了。

《凤凰》集团大概是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积极反对共产党独裁的急先鋒。我們从《共青团真理报》和1962年1月的《青年共产党人》杂志的两篇文章中获悉有这么一个集团的存在，这两篇文章报道說，这个集团的成員——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會員一样——

从事文学，但不仅仅从事文学。他们“越来越仇恨（苏联）社会……（他们）象着魔的兔子一样，窃听陈词滥调的‘美国之音’的吠叫……他们大肆污蔑诽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苏联青年。”

下面的谴责很有意思：“这个集团中的成员谁都不想在军队中服务，因为军队会使人‘标准化’”。

根据一切现象判断，这多少总是一种有形的组织。这些成员在一个“革命前的老妇人”住宅里集会。理论家是两个曾在莫斯科大学肄业的学生。领袖可能是尤·卡兰斯科夫，据说他的诗是“恶毒的反苏维埃主义”。

第二个理论家是一个曾在大学肄业的十九岁的大学生，报道

-
- ① 1963年夏叶甫图申科和另外几个青年诗人发表了一些“忠于路线”的作品。如果考虑到当时他们有被送进疯人院去的危险，也就可以理解他们了。叶甫图申科早就预料到类似的一着，他在1962年写道，

“诗并不是和平的祈禱所。
诗是冷酷的战争。
诗有自己的独特的变幻手法。
战争总是战争。
诗人就是士兵。
当他处在公理的烟火之中，
他便敢干一切。
第一线战士的行动，
后方的耗子怎能理解？
战士受到鼠疑的侵袭，
远方的射击。
耗子把勇敢视为姿态，
把斗争的战略看成懦怯……
诗人是明智的库图佐夫，
为了能进攻，他须退却……”[26a]

这首诗发表得很及时，这最有力地证明，叶甫图申科和他的朋友懂得进行有谋略的战斗，他们现在的态度必须被看作深谋熟虑和完全正当的决断：退却是“为了能进攻”。

說，他企图用特殊的論文证明，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不存在”的，就是說，这个組織的成員純粹是形式的。

非常聳人听闻的一点是，这个集团的成員并不是只限于在最狹隘的圈子里朗誦他們的作品。他們“冲向”莫斯科馬雅可夫斯基廣場，那里长期成了年青詩人的自由讲坛，他們向群众宣传他們的观点。关于卡兰斯科夫还报道說，他从沒有在馬雅可夫斯基廣場露过面，而只是派別的人去，这表明一个密謀組織的存在。^[27]

卡兰斯科夫的詩事实上是代表真理号召暴动的一些口号。例如他在他的《人类宣言》上写道：

“别相信——部长、領袖、报纸！
起来，你們这些躺在地上的人們，
我在这里，
号召反抗，
为真理而斗争，
不願再这么下去，
要粉碎套在你們身上的
用谎言編成的黑色鎖鏈。”

但杂志上还有一些更富有反抗性的詩。如安·符拉基米罗夫写道：

“人声沸騰，
似潮滾滾。
澎湃喧天也夹杂低声絮叨。
有人在召喚我們，有人在召喚我們。
要推翻信条教义，

我們不会赤手空拳来的。
我們的口袋中
藏有冰冷的蓝光閃閃的手枪。”

第三个詩人是 N·諾尔，他發揮了“手枪”这个主题。他在致《他的朋友們》中写道：

“不，举枪向綠衫队射击，
这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是詩人，不干这种事，
而且我們的敌人也太强大。
不，在这雷声隆隆的决定性时刻，
我們当中不会再产生旺代人^①。
我們的事业更多的是理想，
棍棒，我們是不需要的。
不，举枪射击不是我們的事！
但在决定性的时刻，
历史总是要造詩人，
而詩人造出了士兵。”

人們一定会想到，在苏联創作和传播这类詩篇，即使在今天，也是等于自杀。作者是完全意識到这一点的。但这个諾尔写道：

“即使我們只是少数！
即使我們弱小！”

① 旺代是法国西部沿大西洋的一省，1793—1795年曾在这里发生过反对法国革命的情事。——譯者

我們不会贊美(你們的)飼料!
这些飼料早就使我們作嘔。
我們的思想需要营养,
我們需要自由和舒暢。
相信理智,
相信进步和运动。
即使我們只是少数!
即使我們弱小!
逐渐我們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們將埋葬你們阴湿的巢穴
以及里面的朽木。
可能我們人数还少!
我們有信心! 我們等待!
讓我們作出牺牲!
我們的时刻将要到来!”〔28〕

上述这些現象都是根本上排除“建立”“有限自由”的可能性的現象。自由只能受自願的服从所限制，而且只有原則上肯定自己社会秩序的人們才自願服从。不管是“秘密資本主义”，即經濟自由，或是对精神自由的要求，都完全一样，在强制很少放松的情况下，这些傾向已明显地可以看到，这是不容怀疑的，每次进一步放松独裁就会大大扩大独裁崩潰的可能性。

上面引述的詩不仅是詩人个人豪迈气概的明证，而且也是社会紧张一定发展阶段的标志；这些詩不可爭辯地证明，苏联社会內部存在着一股力量，它們不相信“改头換面”的独裁，这些力量是把推翻这个独裁作为自己的目标，它們已經为自己的运动作出英勇豪迈不怕任何牺牲的某种伟績，毫无疑问，它們与沙皇时代的最終

推翻了沙皇制度的革命者相比，其重要性絕不逊色，人数也并不少。

从历史前景来看，我們可以說，在俄国以及后来在它的卫星国里的共产党独裁，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我們在那里已經看到馬克思非常确切地叙述过的情况：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們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現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現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縛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今天可以說：政治——作者)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經濟基础的变更，在全部龐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变革。”〔29〕

这种矛盾的存在不是通过指出經濟成就、玩弄統計数字而能加以否认的，因为問題不在于，目前的制度是否作出“很多”成績，而是它是否作出“足够的”成績，并且，首先是，它是否令人滿意地利用了現有的各种可能性。在这两点上，布尔什維克制度是經不起批評的：它不能給居民以人类尊严所需的生活条件，它长期摧毁自发产生的生产力，因为牛羊倒毙，是由于共产党政府不允許私人拥有牛羊，但政府既不能“社会”飼养，又不能妥善安置；住宅不能建造，因为房主会被視为窃賊；私人的菜园、果园由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被消灭；最后举机器为例，机器利用率很低，甚至閑置。“計划經濟的愚蠢”，特别是繁多計划的愚蠢极为普遍；尤其糟的是人，由于要消灭“秘密資本主义”，他們不是活动能力瘫痪了，就是“肉体上被消灭”了；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它們却被所有制关系毁灭了，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如果政治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允許的話，它們是可以补充現有生产力的。

至于說到精神面貌，历史經驗教导說，如果不是支持政府，而是反对政府被认为是英勇行为，如果人的牺牲精神不是为加强，而

是为改变现存秩序服务，那末这个制度势必垮台。

然而，我們不仅以認識历史前景为滿足，而且还要估計最近将来的发展趋势，这里适用另一些規則。历史上曾有不少荒謬的制度，經歷很長時間才被推翻，例如俄国的沙皇制度，而現在有那种如斯大林称之为“上层建筑积极保护基础”的現象。

可能会决定今后若干年代的发展趋势的目前情况大致如下：

苏共領導除了发动第三次布尔什維克革命以外，沒有別的选择，那就是剝夺新的領導階层的財產。实际上我們前面已計算过，苏联（城市里）約有四百万所私人住宅。1959年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数达二千万人，其中九百四十万是男人。^[30] 由此可知，在要求占有私人住宅的家庭中，几乎有一半已經有了私人住宅。在新兴知識分子中无疑百分比要高得多。繼續容忍私人建筑住宅和私有資本主义傾向的发展，簡直就会出现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对抗这种傾向的有效措施因不足半数而行不通了；苏共領導用来对付这个領導階层的資產階級化的主要力量，是旁人所羨嫉的。只要这个集团成員半数以上还没有完全資產階級化，那末就可繼續利用这个力量，但是进一步資產階級化，就会使党机器瘫痪。

苏联經濟中的私有部門在“自由化”时期比国营部門增长得远为迅速。

向共产主义过渡将消除共产党領導所不喜欢的大部分政治現象：废除貨幣实际上将使黑市貿易无法进行，在一个以兵营方式建立的社会中，思想控制也就能够加强，只能出版“忠于路綫”的書籍，出版社既然用不着为利潤而苦恼，就不需要根据讀者的願望出书。

現在困难在于，向不計价格的“分配”过渡是以生产大大增长为前提，生产的增长，如果没有商品流通的发展——貨幣交易和生产的分散經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形成了一个死圈子：如果

下决心使生产增长，那末国家的发展就会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如果朝共产主义方向走，那末生产就要减少——結果也是离开了共产主义。

由于經濟規模日益扩大，經濟本身的划分越来越細，因此情况就更为复杂：1925—1926年苏联約有六千个大小工厂；1957年約有二十万个工厂，并且大約还有十万个正在建造中。依靠“分配原則”經營六千个工厂，勉强还能办到，当供应与分配的对象增至三十万个时，就完全办不到了。^[31]

由此可見，苏共领导面临的选择是很简单的：如果它放弃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个制度就会崩潰，要是它推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上面所看到的种种消极現象将变本加厉……

解决办法在哪里呢？

从理論上看是有办法解决的，只要共产党领导能够造就出“新人”来，他們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工作”，并且“从健康的机体的需要出发工作”，創造最好的成績。但认为共产党领导能造就出这样一种“可爱的人”的假定，是毫无根据的。可是有一种政治局势，它能使人出于理想主义（然而它必須有适量的宣传和恐怖的支持）而比正常情况下發揮更大的效力。这种局势只有在需要解决一个国家的重大任务——它证明所有的力量全力以赴是正确的時候才能出現。

例如在俄国革命和內战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在已經举起共产主义旗帜的社会集团中，情况就是如此。在所有其他国家中則是在被认为是民族迫切要求的战争时期。如果党的领导能向人民提出一个“重大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是共产党独裁生存的前提，或者說得更好些，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那末党的领导就能解决許多自己的問題，它就能再次地推迟危机。

但是俄国沒有共产党独裁所必需的，或者說向共产主义过渡

所必需的国家的内政任务。

今天俄国最重要的内政问题，是提高生活水平和完善法治国家——这两者不是引导苏共统治趋向巩固，而是趋向覆灭。

再看对外政策，这里我们触及到了当前世界政治中最有严重后果的方面。

革命前的俄国有一句这样的话“该诅咒的问题”，它是指一切可能的问题而言，从历史人物的作用，到妇女选举权止。今天的俄国只有一个“该诅咒的问题”，那就是：

要共产主义有什么用呢？

我们知道，甚至连共产党理论家也已经放弃对共产主义自发胜利的希望，那末对那些感到独裁没有益处的人经常提出这种“社会发展的科学表述”是否适宜的问题，就更不用大惊小怪了。“该诅咒的问题”甚至出现在政治笑话中。

在六十年代初，所谓“埃里温电台丛书”的笑话颇为流行。这些丛书大多数是以“听众问答”的形式奉献给读者的。一个听众问道：瑞士能建立共产主义吗？回答：能，但有什么用呢？（另一个不同的说法：能，但这似乎有点可惜。）

的确，要共产主义有什么用呢？

共产党独裁从1937年以后，最迟从1950年以后就已经是多余的了，甚至是寄生性的了，对于这个独裁来说，只有一项“重大任务”，即为独裁制度的生存而进行辩解。这项任务就是向前运动，即为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而斗争，特别是为扩大共产主义对西欧的统治而斗争。

所有富于活力的独裁，当它们所倡议的内政任务已经完成，就倾向对外实施扩张政策。

上面我们曾经研究过苏维埃制度中的共产主义世界革命思想，并且已经指出，这种思想是维护这个制度所必不可少的。然

而，这种思想要能起到它的作用，就必须为人们所相信。独裁的内政基础越狭窄，它就越要能为人相信。但从俄国立场来看，为扩大共产主义的统治而斗争是与争取俄国西部边境最终安全的斗争連結在一起的。

这里就为目前俄国共产党领导提供了一个机会。问题很清楚，向共产主义过渡，即更大地把全部政治经济权力集中于领导手中，为顺利地向英吉利海峡推进，也为排除西方任何新入侵危险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似乎是使共产党领导能粉碎反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反抗的唯一论据——它是与必要的组织措施、思想控制和恐怖手段相结合的。

苏共领导认识这条道路已十多年了，关于这个看法有非常真实的根据。最迟是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952年10月）以后，苏共最高领导普遍地关心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和对外政策斗争的问题。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结束时作的纲领性的演说：

“如果认为我们的党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因而已不再需要支持，那就错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过去始终需要，而且将来仍然需要国外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自然，我们的党不能不报答兄弟党，它也必须给它们以支持，同时必须给它们的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它们的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以支持。大家知道，这正是我们的党现在所做的。”

斯大林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上台的，当时必须战胜他的最强大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即忠于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口号的、在外国共产党人中比斯大林威望更高的托洛茨基，从这一情况看来，斯大林的这个演说就特别发人深思了。也许是从那时起，斯

大林就极其不信任外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能力的估计也抱非常怀疑的态度。他还曾把外国共产党人当作一切法西斯头目一起清洗。然而在他的晚年，斯大林显然相信，如果要在俄国维护共产党专政，在新的条件下必须回到“托洛茨基主义”，他宣称：

“那些还没有取得政权……的共产党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当然对它们来说，进行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它们的工作并没有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在沙皇时代那样困难……”

但是俄国共产党人排除了这些困难……而且获得了胜利。那些政党也会这样的。”^[32]

年迈的共产主义领袖在这次演说之后与他的俄国和外国战友长辞了，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演说。

与1928—1948年时期（从国际主义者托洛茨基的被逐，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日丹诺夫之死亡）相比，对共产主义世界革命思想的态度有着简直是一个革命的改变。“一国的社会主义”现在又回到“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如果有人真想最扼要地把斯大林统治与赫鲁晓夫统治之间的实质差别作一对比的话，那末就可以看到，差别不在于继承者在非“斯大林化”或再“斯大林化”之间的摇摆，不在于后者的爱发表演说，而在于赫鲁晓夫普遍地对外交政策问题，特别是对世界共产主义问题，给以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注意力。

斯大林在三十年的统治中只有两次离开苏联领土：1943年去德黑兰，1945年到柏林；这两个首都当时都驻有苏联军队。

赫鲁晓夫正相反，他大约有10%的时间在国外，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度过的，接待外宾的时间不计在内。此外，似应谈谈赫鲁晓夫对“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其概况如下：赫鲁晓夫时期被提到重要地位的大多数新主张，是关于争取共产主义世界革

命的斗争問題和对如何最有效地推行共产主义扩张这一問題的
回答。

这点首先可举經常被引述的共处政策为例。在八十一国共产党《声明》(1960年)中，共产党明确地提出共处政策的概念，这个概念是：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間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33〕

共产党人从不隐瞒，他們所理解的共处并不是放弃他們的最終目标。但他們一直迴避公开承认，他們把共处政策看作是共产主义扩张的另一种手段。

此外，他們特別着重为各种形式的斗争方法进行辯护。关于这点苏共第三个《綱領》是这样写的：

“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将取决于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对斗争的一切形式——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議会的和非議会的——掌握到什么程度，以及它們对于最迅速地 and 突然地 (1) 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有怎样的准备。”

但是，“不管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新的……国家政权的形式如何不同，它們的实质只有一个，即无产阶级专政……”〔34〕，大家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独裁。

第三，关于支持民族主义的論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一論点虽然与馬克思的阶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违背，但策略上可能是有利的。例如第三个《綱領》中写道：

“觉醒了的人民的解放运动，在許多国家里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同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对压迫

的一般民主的内容，共产党人是支持它的，认为它在一定阶段上，从历史上看来是正确的。”〔35〕

第四，共产党人对待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修桥者”的态度似乎是一个新的论题。

在十二个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中写道：

“日趋尖锐的矛盾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而且存在于垄断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存在于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以至资产阶级之间。”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一系列国家中，

“有必要建立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36〕

我们在第三个《苏共纲领》中也能看到同样的思想：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它也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其他小私有者、大多数职员和知识分子以至一部分中等资本家的主要敌人（1）。

“工人阶级（意即共产党人——作者）把主要打击指向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消灭垄断组织的独裁，对民族的所有基本阶层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这便有可能把反对财政寡头压迫的一切民主运动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反垄断组织的洪流。”〔37〕

为了认识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性，可以断定，这些论点最多只能被认为是旧概念的继续发展，因为这些论点中没有一个具有真正的新内容。

共产党领导关心世界革命问题，可以追溯到战后时期，最迟至1950年，当时斯大林宣称：

“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科学。”〔38〕

关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手段的论点和关于运用各种不同方法的必要性的论点，列宁在1920年就已提出。〔39〕

斯大林在 1950 年宣布：

“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38〕

他在 1952 年声称要支持民族主义：

“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已經被抛在一边了。毫无疑问，正是你們，共产主义和民主政党的代表們，将必須举起这面旗帜，打着它繼續前进，如果你們希望作你們国家的爱国者的話，如果你們希望成为你們民族的領導力量的話。”〔32〕

与资产階級合作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出現，那里写道：

“在德国，当资产階級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儈。”〔40〕

认为赫魯曉夫关于共产主义讲了些新东西，是不正确的，但他在澄清苏联領導的計劃和意图方面作出了許多貢獻，以致使大家知道：

根据一切現象分析，苏共領導的各种秘密估計同我們一样，也是从对内政情况的估計出发的，苏共領導很清楚，唯一能拯救俄国共产党独裁并使之苟延几十年的办法，是在欧洲进行有效的扩张，唯有在欧洲取得成就才是維持俄国的独裁制度的充分的論据，才能为由于共产党統治引起的一切弊端进行辯护。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方的联合軍事力量比苏联集团的要强大許多倍。当前对西方的直接进攻，对苏联說来无异于自杀——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說明为什么要推行“共处政策”。

另一方面，扩张不能无限期推延，因为内政的紧张程度随時間的推移越来越尖銳，所以要求对外政策取得成就也越来越迫切。于是在共产党領導人的头脑中似乎出現了一个确定的時間表：今后二十年的斗争。

共产主义“基础”的建設綱領規定为期二十年，在这期間要实

現的恰恰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那些最引人想起“未来的兵营”的特征。

綱領中規定，“在十至十五年內，公共飲食業同家庭做飯比較，將占優勢”。在二十年終了時，“社會基金”大約將等於居民需要總額的一半：寄宿學校免費供養兒童，對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給予物質供應，實行免費醫療等等。

這個綱領以如下的許諾作為最高目的，“保證蘇聯的生活水平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高”（！），但受下列條件限制：

“所擬定的綱領在和平的條件下是可以順利實現的。國際局勢的複雜化和由此引起的國防費用的必要增加，可能延遲提高人民福利計劃的實現。”〔41〕

蘇聯領導，不管是在什麼條件之下，要在這一期間向其本國居民提供一個與高度發達國家相比即使只是大致相同的生活水平，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就提出保留條件：只有在“和平條件下”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實現，這是一種不祥之兆。

無論如何，到七十年代中期，共產黨領導人就必需向居民，至少需向它的黨員解釋國家貧困的原因。因此，蘇聯領導現在已經處在為這個時刻策劃一種能為生活水平低下進行有力辯護的緊張狀態，這種思想表現得很明顯。如果說，蘇聯領導已推卸了保證“最高”或即使只是比較高的生活水平的責任，那末把國家變為一個兵營，變成一個巨大的兵營的企圖仍然存在，在那裡，每個人——至少是可能進行戰爭所必需的人——得到自己的定額配給；在那裡，全部剩餘價值歸國家領導支配。

很遺憾，這還不是蘇聯領導制訂的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計劃——把蘇聯，可能還有它的歐洲衛星國，變成一個巨大的兵營，作為暴力擴張共產黨勢力範圍的準備的計劃——的唯一標志。

1961年9月科學院院士斯特魯米林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

了一篇标有挑战性题目《未来二十年的世界》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西方很少为人重视。文章里写道，在未来二十年中，人类的半数(1)将处在共产党统治之下。

斯特鲁米林的论据基本上是根据下列这一点：“仅仅自1945年以来，即在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集团的人口由于新成员国的加入，至1960年增长了八亿三千万人，其中从希特勒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人口近八千万，不发达国家人口约七亿五千万，这数字占不发达国家人口的36%”。〔42〕

斯特鲁米林说，他审慎地假定，在未来二十年中“只要”再有30%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受共产党统治，从“帝国主义阵营”转入的不超过10%；并假定到1970年达到上述百分率的一半。根据这二个假定(已把自然增长率考虑在内)，他制订了下面的数字表，以表明未来二十年中“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其他国家”即中立和独立国家的人口发展情况(单位：百万人)。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绝对数	%	绝对数	%	绝对数	%
1. 社会主义国家	1,050	35	1,597	45	2,295	54
2. 帝国主义国家	600	20	631	18	600	16
3. 其他国家	1,350	45	1,318	37	1,248	30
总 计	3,000	100	3,546	100	4,203	100

斯特鲁米林的阐述特别使人感兴趣，因为他似乎合法地把苏共领导的秘密计划，第一个以“不受拘束的”文章方式公诸于世。他是第一个在1958年论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面貌的人。那时在西方没有人认真地对待他所说的那一套，而三年以后它们却成为正式的党的路线。

我们先不研究他的各个论据是否可靠，而来看看他的一些思

路：

在 1945—1960 年期間，共产党統治扩张到八个欧洲国家：波兰、羅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苏占区、匈牙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亚洲共产党統治的国家是中国、北朝鮮、北越。（蒙古事实上早已是共产党統治的。）还应把古巴島計算进去。这就是斯特魯米林計算的八亿三千万人的增长数。根据我們按苏联 1960 年統計年鉴的計算，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口是八亿零六百九十五万八千人——計算时我們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作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計入——，但斯特魯米林大概把从前是波兰的而現在被苏联占領的地区，以及比薩拉比亚作为特別統計数字計入，可能他还有其他数据。对这二千三百万人，我們不想爭論。

斯特魯米林自然知道，大多数成果应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沒有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扩张。只有古巴（約有七百万人）的共产党人是在沒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也許还有約有一千六百万人的北越。

所以，如果斯特魯米林要得出如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看到的那种类似的結果，那末他必須也把类似的原因估計在內。这并非必然是世界大战。但是，無論如何在斯特魯米林的，因而也就是在共产党領導的估計中，軍事爭端必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对不論在哪个国家中的共产党的暴动給予軍事援助，是当前共产主义意識形态的牢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因而也是“行动的指南”。

斯大林在 1952 年宣布：

“自然，我們的党不能不报答兄弟党，它必須也給它們以支持，同时必須給它們的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它們的人民維護和平的斗争以支持。大家知道，这正是我們的党現在所做的。”^[32]

这种思想在执政的共产党的 1957 年《宣言》中是以如下的公

式来表述的，“兄弟般的相互支援”是共产党統治的各国間关系的“牢不可分的組成部分”。1960年更賦予这种思想以新的尖銳的形式：

“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無論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或者对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命运，都負有历史性的責任。”〔43〕

然而，这还不够。如果說，1957年共产党人的領袖們只是讲，他們将以联合力量鎮压共产党統治的国内的暴动，那末1960年他們已提出高得多的要求：

“共产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輸出。它們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是号召各国人民团結起来……并且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防止和坚决回击帝国主义者干涉任何一个国家的奋起革命的人民的事务。”〔44〕

这些话原文是用黑体字排印的，无非证明苏联领导打算利用其他国家的任何叛乱——他們称之为革命——作为进行武装干涉的理由。

最后須要考虑另外二种情况：首先是苏联人口的特殊不利的年龄結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不仅付出了数百万人生命的代价，而且还少出生几百万人。根据1959年1月15日的人口統計的結果，年龄結構如下：

年度	出生人口 (单位： 千人)	其中男的 (单位：千人)	平均每年度 男人數(单位： 百万人)	适龄服兵 役年度 ^①
1950—1959	46,363	23,608	2.6	1970—1979
1940—1949	31,808	16,066	1.6	1960—1969
1935—1939	20,343	10,056	2.0	1955—1959

① 据认为，二十岁的男人是一个受完教育的最适于服役的士兵。

1930—1934	18,190	8,917	1.8	1950—1954
1925—1929	18,999	8,611	1.7	1945—1949
1920—1924	11,590	4,528	0.9	1940—1944 ^① [45]

这个表明显地指出，苏联领导在六十年代初可以支配的现役士兵人数比 1959 年以前少，六十年代一直到 1970 年同前几年度相比，青年至少每年度少五十万。苏联领导从 1970 年起每年度至少拥有二百六十万适龄的人，比六十年代后半期每年多一百二十万人。

虽然苏联奉行“火箭外交”政策，但他们自己似乎并不相信“武器是绝对的”。例如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

“我们认为，在现代的条件下，未来的世界大战不管损失多么巨大，都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大量兵力进行的。”^[46]

所以，从人口的年龄结构看可以认为，苏联在 1970 年前几乎不可能采取冒险的对外政策步骤，因为它缺少能组成数以百万计的军队的人员。

看来总的前景如下：

苏联内政上的矛盾那么尖锐，它唯有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被消除。

然而，立即实施这个政策有两个主要障碍：苏联人口的不利的年龄结构和西方相对的牢固团结。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和平共处政策是共产主义扩张唯一可行的手段。它保证苏联有一个喘息时刻，至少包含一个动摇西方团结的机会，从而为以后富于希望的扩张创造前提。

然而，和平共处政策不仅不能消除内在矛盾，反而使它更加尖

① 有关更早年代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无需研究。

銳，因此，使之收斂的因素消失后，苏联扩张的要求将大大加强，这倒是值得担心的。

人口年齡結構的不利情况，在七十年代初将被克服，而西方團結的发展却不能預測。不过，估計一下共产党領導对西方各种不同情况的預料的反映，总是可以的。

在西方常常討論，苏联是否“願意”或“不願意”战争。這個問題的提法是錯誤的。共产党領導人自然宁願全世界都无抵抗地落入他們的手中。但是，这是不会发生的。問題應該这么提：如果共产党的領導人知道，扩张即意味着战争，他們是否会放弃扩张？或者說，他們会不会冒险一战，那怕是原子战争？

在估計国家領導人可能采取的态度时，預測总是只有一个意思，即分析那些我們认为对这些領導人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因素，因而答案只能是“如果方式”，答案只能在与其它因素和情况的关系中找到。

我們曾經作出这样的結論，苏共領導唯有通过有效的扩张才能緩和內政矛盾，但是，这样做将涉及到目前政治制度的存亡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得出結論，苏共領導即使只有一線胜利的机会，他們为了拯救自己的制度会进行許多冒险，会进行非常多的冒险，那怕是冒战争的危險。

然而，如果苏共領導觉得进行战争是沒有胜利的把握，那末情况就不一样。我們看到战后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几乎二十年来一直到現在，苏联謹慎地避免了一切会导致战争的步驟，因为目前他們沒有在一次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可能。大概他們在将来也不会有另一种做法，因为很难設想象苏共中央这样的一个集团会作出絕望的决定来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苏共中央委員是很老练和冷靜的政治家，他們不会作出这种孤注一擲的决定。面临着制度可能崩潰的前景，他們仍下定决心进行“英勇的自杀”，这是不很可

能的。西方的机会和人类的希望就在这里！如果西方在今后二十年内能大致保持东西方間，特别是苏联集团和西欧之間軍事潜力的相同比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那样，那末二十年后易北河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的共产党独裁将不复存在。在这样情况下，今天从内部在埋葬俄国独裁的和只有通过对外扩张才能抵銷的所有那些因素，将第一次真正發揮效力——共产党领导沒有充足的手段来消除那些因素。

制度崩潰的形式自然不能預言。苏联社会中存在着一切有可能的内部冲突的幼芽：武装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政变、宫廷革命等等。政变的可能性較大，因为不能指望会发生社会革命，也就是說，沒有一个新的领导阶层来总的接替现在的领导阶层，因为俄国沒有潛在的领导阶层。政变是指当前领导阶层的政治組織的改变，是指推翻共产党的独裁机器，而这样的改变通常不是通过内战，而是通过政变和宫廷革命来实现的。

为了防止誤解，我要着重指出，苏維埃帝国的未来取决于各社会力量，而不是取决于苏共上层领导的个别人的更換。特別不应把希望寄托在赫魯曉夫的解职上，因为党领导已經預先采取了尽可能减少因赫魯曉夫下台不可避免要引起震动的措施。不断清洗的原則（參見第 223 頁）自动保证了权力集中在取得第一书记职位，即已获得 51% 的中央委員的支持的人的手中。因为他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撤除委員中的 25%，这就是說，最迟在四年中他保证自己拥有 75% 的多数，这样他便掌握了絕對权力。

在这种制度下，一个非党务工作者要合法地控制政权，也完全是不可可能的，因为党务工作者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絕對多数。关键問題不是誰将代表党的机关，而是党的机关能不能保持它的地位，而这取决于世界共产主义的整个形势。

結 束 語（节譯）

如果共产主义能够继续不断地吞并其他地区，它就能在俄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共产党领导人能够靠散布祖国受到威胁的神话来激起人民的爱国心，共产主义也能够——至少在理论上——延长它的寿命。要是西方能够把这两个因素排除掉，那末，可以肯定地说，整个共产党独裁就会崩溃。换句话说，对共产主义进行积极斗争的最适当的战略和最适当的战术，不在于进行解放战争，而是首先在欧洲挡住共产主义的任何进一步扩张，而且要使它绝无进行扩张的可能。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西方国务活动家正是推行这种战略，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共产主义世界帝国内部结构的瓦解，主要就是由于下一情况发生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没有一个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的民族生存受到西方的威胁，另一方面，甚至共产党领导人也觉得进一步向前推进的一切尝试都是不会成功的。柏林问题上的退却就为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这个问题上，吞并西柏林的坚决步骤在1958年就已宣布，但在此后五年中并没有能够获得实现。

要是西方能够在今后二十年中挡住共产主义的扩张，要是西方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使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一再必须作出这样的看法，对西方直接进攻或对西方进行政治破坏是不可能的，那末，在俄国和在欧洲卫星国里共产党独裁的崩溃是历史上注定不可避免的（也许阿尔巴尼亚是例外）。

共产党人一直向前推进到大西洋岸并不能消除高度发达的早

期資本主义替代体内在矛盾的作用，但却会使它的崩潰推迟。所以人类的問題并不在于未来是否属于共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后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間崩潰……

在結束本书时，我想向共产主义的所有敌人和所有朋友提一提卡尔·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所写的那几句话，我相信，这几句話是对那种复杂的、多方面的和充滿矛盾的現象，也就是人們慣于把它說成是共产主义的現象的最好的評述：

“正如我們評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我們評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恰恰相反，这个意識正須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現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释。”

注 释

早期资本主义替代体

- [1]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UdSSR, Institut für Ökonomie, *Politische Ökonomie*. Lehrbuch, Düsseldorf 1955, S. 125.
- [2] *ib.*, S. 82.
- [3] Marx, Karl, *Das Kapital*, Berlin 1951. Bd. I, S. 752.
- [4] *ib.*, S. 753.
- [5] *ib.*, S. 802.
- [6] *ib.*, S. 754.
- [7] *ib.*, S. 801.
- [8] *ib.*, S. 802.
- [9] *Geschichte der KPdSU* (B), S. 354.
- [10] *Ugolovnoe zakonodatel'stvo SSSR i sojuznych respublik*. Sbornik, gosjurizdat, M. 1957, S. 23.
- [11] *ib.*, S. 15—26.
- [12] Marx, Karl, *Das Kapital*, *op. cit.*, S. 791.
- [13] *ib.*, S. 797.
- [14] *BSE I*, Bd. 31, S. 371.
- [15] *BSE I*, Bd. 31, S. 374—375.
- [16] Marx, Karl, *Das Kapital*, S. 777.
- [17] Lenin, *Werke*, Bd. 33, S. 174—178.
- [18] *BSE I*, Bd. 35, S. 386, «Kuzneckij metallurgičeskij kombinat», und *BSE II*, Bd. 4, S. 339, *Bardin*.
- [19] *Geschichte der KPdSU*, S. 574.
- [20] Moskatov, P., *Geroičeskij rabočij klass našej rodiny*, M. 1946, 2. Aufl., S. 23.
- [21] Stalin, *Fragen des Leninismus*, S. 404.
- [22] *Sbornik zakonov SSSR i ukazov Presidiuma Verchovnogo Soveta SSSR, 1938—1944*. Izdanie «Vedomostej Verchovnogo Soveta SSSR», M. 1944, S. S. 139—141—143—144—245. Weiter:

- Sbornik zakonov* 1944.
- [23] Marx, K., *Das Kapital*, S. 776.
- [24] Vgl. insbesondere:
 Ackermann, Klaus: *Das Land der stummen Millionen*, Tübingen, 1951.
 Gollwitzer, Helmut: *«...und führen, wohin du nicht willst»*, München, 1951.
 Klinge, Wolfgang: *Im Räderwerk der sowjetischen Planwirtschaft*, Pfaffenhofen-Ilm, 1957.
 Roeder, Bernhard: *Der Kartorgan*, Traktat über die moderne Sklaverei, Köln-Berlin, 1956.
 de Santerre, Maximilian: *Ihr Name ist Legion*, München, 1962.
 Scholmer, Josef: *Die Toten kehren zurück*, Köln-Berlin, 1956.
 Starlinger, Wilhelm: *Grenzen der Sowjetmacht*, Kitzingen, 1954.
- [25] *Sovetskaja justicija*, Ježedekadnyj žurnal Narodnogo komisariata justicii R. S. F. S. R., 23, 20. 8. 1932, S. 1.
- [26] *The Anatomy of Terror*, Khrushchevs Revelations about Stalins Regime, Public Affairs Press, Washington D. C., 1956, S. 52. Weiter: *The Anatomy of Terror*.
- [27] *Partijnaja žizn'*, žurnal CK KPSS, M. 1960, S. 54 ff. Weiter: *P. Ž.*
- [28] *Komsomol'skaja pravda*, M. 15. 9. 1962.
- [29] Stalin, J., *Fragen des Leninismus*, op. cit. S. 420.
- [30] Nove, Alec.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1961, S. 267.

其他国家的經驗

- [1] *BSE II*, Bd. 7, S. 367, Bd. 34, S. 9.
- [2] Vgl. *Keesings-Archiv*, entsprechende Daten.
- [3] Laeuen, Harald, *Polnische Tragödie*, Stuttgart, 1935, S. 325.
- [4] *Keesings-Archiv*, 1957, S. 6600 A, 6674 B.
- [5] *ib.*, 1962, 9734 D.
- [6] *ib.*, 1956, S. 6069—6070.
- [7] Huebbenet, Georg von, *Die Rote Wirtschaft wächst*, Aufbau und Entwicklungsziele des Comecon, Düsseldorf, S. 139.
- [8] *Hinter dem Eisernen Vorhang*, München, herausgegeben von Radio Free Europe, Nr. 11, 1961, S. 10.
ib., S. 11.

党的机关及其职能

- [1] Achminow, G. F., *Die Macht im Hintergrund*, Spaten-Verlag, Grenchen, Schweiz, 1950, 306 Seiten.
- [1a] Crankshaw, Edward, *Rußland und Chruschtschow*, Berlin, 1959, S. 168.
- [2] Burnham, James,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 [3] Boettcher, Erik, *Die sowje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am Scheidewege*. |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59,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Akademie für Gemeinwirtschaft, Hamburg, S. 50.
- [4] ib., S. 206—207
- [5] ib., S. 210.
- [6] ib., S. 256.
- [7] ib., S. 280, Anm.
- [8] ib., S. 273.
- [9] ib., S. 279.
- [10] *P. Ž.*, Nr. 1, 1962, S. 48.
- [11] ib.
- [12] Lenin, *Werke*, Bd. 32, S. 2—3.
- [13] ib., S. 4.
- [14] Stalin, *Fragen des Leninismus*, S. 151.
- [15] *Statu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Sowjetunion*, angenommen vom XXII. Parteitag der KPdSU am 31. Oktober 1961,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M. 1962, S. 16. Weiter: *Statut der KPdSU*.
- [16] *BSE II*, Bd. 39, S. 521.
- [17] Kausionen O. V. u. a., *Osnovy marksizma-leninizma*, učebnoe posobie, M. 1959, S. 553. Weiter: *Osnovy marksizma-leninizma*.
- [18] *Statut der KPdSU*, S. 12.
- [19] Konstantinow, F. V. (red.), *Istoričeskij materializm*, 3. Auflage, M. 1954, S. 43.
- [20] *P. Ž.*, Nr. 3, 1957, S. 59.
- [21] Barsukov, H. (red.), *Partijnaja rabota v promyšlennosti*, Sbornik statej, M. 1956, S. 21—22—152—269.
- [22] *Izvestija*, 30. 8. 1961; vgl. auch, Doroš in *Izvestija*, 8. 10. 1961.
- [23] Virta, Nikolai, *P'esy*,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chudožestvennoj literatury, M. 1949, S. 95—175.
- [24] Ovečkin, op. cit., S. 210.
- [25] ib., S. 12.

- [26] *ib.*, S. 14.
- [27] *Kommunist*, Nr. 14, 1953, S. 20.
- [28] *Oktjabr'*, Organ sojuza sovjetskich pisatelej SSSR, Maj Nr. 11, 1957, S. 22. Weiter: *Oktjabr'*
- [29] *Izvestija*, 28. 8. 1959.
- [30] *Oktjabr'*, Nr. 1. 1949, S. 130 ff.
- [31] *Kommunist*, Nr. 17, 1954, S. 29.
- [32] *Programm der KPdSU*, S. 159.
- [33] *Kommunist*, Nr. 10, 1962, S. 17.
- [34] Ovečkin, op. cit., S. 348.
- [35] *ib.*, S. 387.
- [36] *ib.*, S. 299.
- [37] *Oktjabr'*, op. cit., S. 138.
- [38] *Kommunist*, Nr. 12, 1961, S. 90.
- [39] *P. Ž.*, Nr. 10, 1955, S. 38.
- [40] Ovečkin, op. cit., S. 209.
- [41] Lenin, *Werke*, Bd. 29, S. 388.
- [42] Mess, Henry A.,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1942, S. 85—86.
- [43] Vgl. *KPSS v rezoljucijach*, Bd. I., S. 677.
- [44] *ib.*, Bd. II, S. 215.
- [45] Bakšiev, D., *Centralizm i demokratizm v boľševistskoj partii*, M. 1948, S. 53.
- [46] *P. Ž.*, Nr. 9, 1956, S. 3—4.

技术知識分子——共产主义掘墓人

- [1] Ovečkin, op. cit., S. 264, 349—353.
- [2] *Literaturnaja gazeta*, 4. 7. 1953
- [3] *P. Ž.*, Nr. 10, 1955, S. 68.
- [4] *Literaturnaja gazeta*, 3. 9. 1960.
- [5] Fischer, Ruth, *Stalin und der deutsche Kommunismus*, op. cit., S. 578.
- [6] Stalin, *Fragen des Leninismus*, S. 401—402.
- [7] Voznesenskij, N. A., *Platiletnij plan vosstanovlenija i razvitija narodnogo chozjajstva SSSR na 1946—1950 gg.*, M. 1946, S. 28.
- [8] Granik, David, *Management of the Industrial Firm in the USSR*, New York, 1954, S. 121
- [9] *Pravda*, 8. 8. 1955.
- [10] *Kommunist*, Nr. 12, 1961, S. 94—95.
- [11] Ovečkin, op. cit., S. 334—335.

- [12] *Kommunist*, Nr. 12, 1961, S. 93.
- [13] *Pravda*, 9. 9. 1962
- [14] Marx, Karl, *Das Kapital*, op. cit., Bd. III, S. 867.
- [15] Lenin, *Werke*, Bd. 31, S. 6.
- [16] ib., Bd. 27, S. 116.
- [17] ib., Bd. 15, S. 129—130.
- [18] *Programm der KPdSU*, S. 106.
- [19] *Pravda Ukrainy*, 3. 9. 1961.
- [20] Ovečkin, op. cit., S. 95 ff.
- [21] *Izvestija*, 31. 7. 1960.
- [22] *Plain Talk*, New York, Dezember 1949.
- [23] *Pravda*, 10. 5. 1955.
- [24] *Kommunist*, Nr. 12, 1961, S. 95—96.
- [25] *Plain Talk*, New York, Dezember 1949.
- [26]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UdSSR, Institut für Ökonomie
Politische Ökonomie, Lehrbuch, Düsseldorf, 1955, S. 125
- [27] *Kommunist*, Nr. 12, 1961, S. 95—96.
- [28] Rosenstock, Eugen, op. cit., S. 26.

来自下面的压力

- [1] Lenin, *Werke*, Bd. 10, S. 244.
- [2] *XXII s-jezd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Stenografičeskij otčet, M. 1962. Weiter: *XXII s-jezd*, Bd. I, S
111; *N. Ch. SSSR v 1960 godu*, S. 8.
- [3] *Statut der KPdSU*, S. 6.
- [4] ib., S. 4.
- [5] *N. Ch. SSSR v 1960 godu*, S. 8.
- [6] ib., S. 33 ff.
- [7] *Pravda*, 29. 3. 37.
- [8] Fainsod, Merle, *How Russia Is Ruled*, Harvard, 1953, S. 178
Mehnert, Klaus, *Der Sowjetmensch*, Stuttgart, 1955, S. 42
- [9] *Pravda*, 29. 3. 1937.
- [10] Virta, N., op. cit. S. 173.
- [11] *Sbornik zakonov*, 1944, S. 245—246.
- [12] *Izvestija*, 11. 6. 1961, 4. 8. 1961
- [13] *P. Ž.*, Nr. 3, 1954, S. 48—49. Vgl auch *P. Ž.*, Nr. 9, 1955, S
3 und *P. Ž.*, Nr. 4, 1955, S. 66.
- [14] ib., Nr. 15, 1955, S. 9.
- [15] ib., Nr. 19, 1956, S. 28—29.

- [16] Vg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München, Nr. 10, 1956, S. 10—11.
- [17] *P. Ž.*, Nr. 5, 1955, S. 53 ff.
- [18] Stalin, J., *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 M. 1952, S. 85 ff. Weiter: Stalin, *Ö. P.*
- [19] *Oktjabr*, Nr. 11, 1957, S. 205 ff.
- [20] *Statut der KPdSU*, S. 6.

早期資本主义替代体的理論

- [1] Boettcher, op. cit., S. 108, 201, 218, 280.
- [2] Marx, Engels, *Werke*, Berlin 1962, Bd. 20, S. 278.
- [3] ib., S. 283.
- [4] ib., S. 280.
- [5] ib., S. 283—284.
- [6] *Pravda*, 17. 5. 1955.
- [7] *P. Ž.*, Nr. 4, 1955, S. 65—66. *P. Ž.*, Nr. 6, 1955, S. 78.
- [8] *P. Ž.*, Nr. 3, 1955, S. 59.
- [9] *P. Ž.*, Nr. 6, 1955, S. 12—13.
- [10] *Pravda*, 10. 2. 1963.
- [11] *Ékonomičeskaja gazeta* Nr. 1, 1961, S. 43.
- [12] *Izvestija*, 1. 10. 1961.
- [13] *Sovetskaja Kirgizija*, 8. 1. 1962.
- [14] *Izvestija*, 10. 9. 1960.
- [15] *Sovetskaja Kirgizija*, 31. 1. 1961.
- [16] *Izvestija*, 28. 8. 1959.
- [17] *Pravda*, 5. 6. 1960.
- [18] *P. Ž.*, Nr. 19, 1960, S. 7.
- [19] ib., Nr. 4, 1955, S. 66.
- [20] *Komsomol'skaja pravda*, 15. 9. 1962.

以人民的名义

- [1] Maizenberg, L. I., *Cenoobrazovanie v narodnom chozjajstve SSSR*, M. 1953.
- [2] *Izvestija*, 15. 9. 1953.
- [3] *Pravda*, 12. 1. 1961.
- [4] ib., 6. 3. 1960.
- [5] *Komsomol'skaja pravda*, 3. 6. 1962.
- [6] *Kommunist*, Nr. 4, 1960, S. 14.
- [7] *Boļševik*, Nr. 10—11, 1938, S. 20.

- [8] *Zarja vostoka*, 14. 5. 1959.
- [9] *Kommunist*, Nr. 4, 1960, S. 14.
- [10] *Izvestija*, 15. 3. 1960.
- [11] *Promyšlenno-ékonomičeskaja gazeta*, 6. 1. 1960.
- [12] *Kommunist*, Nr. 4, 1961, S. 31.
- [13] *Promyšlenno-ékonomičeskaja gazeta*, 8. 6. 1958.
- [14] *Kommunist*, Nr. 10, 1961, S. 126.
- [15] *Izvestija*, 21. 7. 1959; *Literaturnaja gazeta*, 19. 2. 1959.
- [16] *Komsomol'skaja pravda*, 30. 3. 1958.
- [17] *Komsomol'skaja pravda*, 23. 9. 1958; *Seľskoje chozjajstvo*, 6. 3. 1960; *Kazachstanskaja pravda*, 3. 3. 1960
- [18] *Komsomol'skaja pravda*, 13. 8. 1958, 25. 7. 1959.
- [19] *P. Ž.*, Nr. 1, 1957, S. 6; *Izvestija*, 3. 6. 1958.
- [20] *Izvestija*, 26. 3. 1959
- [21] *ib.*, 29. 9. 1961.
- [22] *Gudok*, 23. 7. 1959.
- [23] *Krokodil*, Nr. 14, 1958.
- [24] *Izvestija*, 3. 6. 1961.
- [25] *Novyj mir*, Nr. 9, 1956, S. 12.
- [26] *Literaturnaja gazeta*, 13. 6. 1953.
- [27] *Pravda*, 14. 8. 1953.
- [28] *Kommunist*, Nr. 15, 1960, S. 52.
- [28a] *Pravda*, 26. 4. 1963.
- [29] *Literaturnaja gazeta*, 27. 5. 1950.
- [30] Rosental, M. und Judin, P., *Kratkij filosofskij slovar'*, M. 1951, S. 518—19.
- [31] Sammelwerk: *Filosofskije problemy fiziki*, M. 1952, S. 54.
- [32] Alfinogenov, Strach, in: *P'esy sovetskich pisatelej*, Sbornik Izdatel'stvo «Iskusstvo», M. 1954, S. 483
- [33] Solženicyň, A., *Novyj mir*, Nr. 12, 1962, Nr. 1, 1963. Voronin, Sergej, *Literaturnaja Rossija*, Nr. 5, 1963.
- [34] *Junost'*, Nr. 2, 1963, S. 47—48
- [35] *Pravda*, 2. 12. 1962.
- [36] *Sozialističeskaja zakonnost'*, Nr. 2, 1962.
- [37] *Literaturnaja gazeta*, 3. 12. 1953.
- [38] *Pravda*, 17. 5. 1955
- [39] *ib.*, 17. 7. 1955.
- [40] *Pravda*, 16. 7. 1959; *Izvestija*, 22. 7. 1959; *Kommunist*, Nr. 10, 1960, S. 9—34; *Ékonomičeskaja gazeta*, 28. 4. 1961.

斯大林的最后灼見：回到馬克思那里去
——未来的兵营

- [1] *Pravda*, 2. 8. 1950.
[2] Stalin, *Ö. P.*, S. 66—67
[3] Stalin, *Probleme des Leninismus*, M. 1928, S. 450—451
[4]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Werke*, Bln., Bd. 3, S. 33; Weiter:
Marx-Engels, *Werke*.
[5] M. u. E., *A. Sch.*, Bd. II, S. 17.
[6] Marx-Engels, *Werke*, Bd. 20, S. 277.
[7] *ib.*, Bd. 3, S. 32.
[8] *ib.*, Bd. 20, S. 272.
[9] Stalin, *Ö. P.*, S. 29—30.
[10] Marx-Engels, *Werke*, Bd. 20, S. 271.
[11] *Komsomol'skaja pravda*, 7. 9. 1958.
[12] *Promyšlenno-ëkonomičeskaja gazeta*, 12. 10. 1958.
[13] Stalin, *Rechenschaftsbericht dem XVII. Parteitag der KPdSU*
(B).
[14] *Pravda*, 27. 6. 1958.
[15] *Literatura i žiznj*, 27. 11. 1959.
[15a] *Pravda* vom 19. 6. 1963.
[16] Nove, Alec, *Die sowjetische Wirtschaft*, Wiesbaden, 1962, S.
304 ff.
[17] Stalin, *Ö. P.*, S. 22—23
[18] Voznesenskij, N., *Voennaja èkonomika SSSR v period otečest-*
vennoj vojny, M. 1948, S. 18.
[19] *Politische Ökonomie*, op. cit., S. 94.
[20] Marx, Karl, *Das Kapital*, Bd. III, S. 30.
[21] *ib.*, S. 839.
[22] Stalin, *Ö. P.*, S. 21.
[23] *Novyj mir*, Nr. 9, 1956, S. 12.
[24] Stalin, *Ö. P.*, S. 23—24.
[25] *Komsomol'skaja pravda*, 11. 6. 1960.
[26] Stalin, *Ö. P.*, S. 67—68.
[27] *ib.*, S. 65
[28] *ib.*, S. 65.
[29] Lenin, *Werke*, Bd. 19, S. 33.
[30] Lenin, *Ausgewählte Werke* in 2 Bänden, M. 1947, Bd. II, S. 667.
[31] Lenin, *Werke*, Bd. 30, S. 274—275

- [32] *Programm der KPdSU*, S. 123.
- [33] *Kommunist*, Nr. 8, 1962, S. 86 ff.
- [34] *Izvestija*, 7. 10. 1961.
- [35] Stalin, *Ö. P.*, S. 67—93.

基本規律在起作用

- [1] *Programm der KPdSU*, S. 166.
- [2] *N. Ch. SSSR*, 1956, S. 29; *N. Ch. SSSR v 1960 godu*, S. 82.
Für das Jahr 1955 sind in der ersten Quelle die Zahlen 389 bzw. 216 angegeben
- [3] *N. Ch. SSSR v 1960 godu*, S. 361.
- [4] *Programm der KPdSU*, S. 106.
- [5] *ib.*, S. 107—108.
- [6] *ib.*, S. 109.
- [7] *ib.*, S. 116.
- [8] *ib.*, S. 106.
- [9] Stalin, *Ö. P.*, S. 112.
- [10] *Programm der KPdSU*, S. 112.
- [11] Zitat nach Leonhard, *Kreml ohne Stalin*, S. 429.
- [12] *Programm der KPdSU*, S. 111
- [13] *ib.*, S. 108.
- [14] *Kommunist*, Nr. 2, 1962, S. 115.
- [15] *The Anatomy of Terror*, S. 69—70.
- [15a] Boettcher, *op. cit.*, S. 293.
- [16] Boettcher, *op. cit.*, S. 50.
- [16a] *Ékonomičeskaja žiznj SSSR 1917—1959*, M. 1961, S. 522 und 538.
- [17] *Kommunist*, Nr. 15, 1952, S. 4.
- [18] *Pravda*, 9. 8. 1953.
- [19] *ib.*
- [20] *Kommunist*, Nr. 14, 1953, S. 26.
- [21] *ib.*, S. 13.
- [22] *Literaturnaja gazeta*, 30. 1. 1954.
- [23] *BSE II*, Bd. 26, S. 145.
- [24] *BSE II*, Bd. 46, S. 390.
- [24a] Boettcher, *op. cit.*, S. 51—52.
- [25] Leonhard, Wolfgang, *Kreml ohne Stalin*, S. 29.
- [26] *BSE II*, Bd. 6, S. 260. Vgl. auch Boris Meissner, *Rußland im Umbruch*

- [26a] Boettcher, op. cit., S. 287.
 [27] *XX s-ezd KPSS*, Bd. 1, S. 152, 283, 323.

牺牲斯大林，为的是拯救斯大林主义

- [1] Chruschtschow, XX. Parteitag, S. 133.
 [2] *The Anatomy of Terror*, S. 21.
 [3] *XXII s-ezd KPSS*, Stenografičeskij otčet, Bd. I—III, M. 1962, Bd. I, S. 105 Weiter: *XXII s-ezd*
 [4] *The Anatomy of Terror*, S. 70.
 [5] Vgl. Boris Meissner, *Rußland unter Chruschtschow*, M. 1960, S. 30 ff., und Wolfgang Leonhard, *Kreml ohne Stalin*, S. 348 ff.
 [6] *P. Z.*, Nr. 16, 1956, S. 49 ff.
 [7] *XXII s-ezd*, Bd. III, S. 16.
 [8] Oveškin, op. cit., S. 17.
 [9] *ib.*, S. 13—14.
 [10] *ib.*, S. 290.
 [11] K. M. u. F. E., *A. Sch.*, Bd. I, S. 33.
 [12] *Pravda*, 8. 11. 1956
 [13] *ib.*, 30. 12. 1956.
 [14] *Programm der KPdSU*, S. 6, 9, 18, 23, 30.
 [15] *Pravda Ukrainy*, 11. 8. 1962.
 [16] *Pravda*, 10. 3. 1963.
 [17] *ib.*
 [18] Vgl. Andreas Bilinsky, *Parasitengesetze in der Sowjetunion*, im Jahrbuch für Ostrecht II—2, 1961, 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Ostrecht, München
 [19] *Kommunist*, Nr. 15, 1960, S. 119 ff.
 [20] *Izvestija*, 19. 5., 21. und 28. 7. 1961.
 [21] *Izvestija*, 7. 5. 1961; 1. 7. 1961; *Vedomosti VS SSSR*, 1962, 8, § 85.
 [22] *XXII s-ezd*, KPSS, Bd. III, S. 19.
 [23] *Nedelja*, M. (Sonntagsbeilage zu *Izvestija*), 1. 9. 1962.
 [24] *Ékonomičeskaja žizn'*, SSSR, 1917—1959, op. cit., S. 472—619.
 [25] *Sovetskaja Rossija*, 19. 11. 1959; *Pravda*, 14. 2. 1960.
 [26] *Izvestija*, 21. 7. 1959, 12. 11. 1959, 24. 5. 1960, die Zeitschrift *Architektura SSSR*, Nr. 3, 1960 S. 7, Nr. 5, 1960, S. 2—3.
 [27] *Zarja vostoka*, 12. 6. 1962.
 [28] *Programm der KPdSU*, S. 161—162.

- [29] *Pravda*, 10. 3. 1963
- [30] Marx, Karl, *Das Kapital*, op. cit., Bd. I, S. 795
- [31] *Keesings-Archiv*, 10 328 B, 10 260 B, 1962; 1083 A, 1963.
- [32] Ostrovitjanov, (red), *Zakon stoimosti i jego ispol'zovanie v narodnom chozjajstve SSSR*, M. 1959, S. 18—19.
- [33] Stalin, Ö. P., S. 91.
- [34] *Pravda*, 6. 5. 1960.
- [35] *Programm der KPdSU*, S. 106.
- [36] *Pravda*, 9. 9. 1962.
- [37] *Programm der KPdSU*, S. 106.

今后二十年的斗争

- [1] Vgl. *Stroitel'naja gazeta*, 23. 7. 1961 u. 8. 9. 1961.
Vgl. *Kazachstanskaja pravda*, 18. 12. 1962, *Trud*, 7. 3. 1962,
Pravda, 2. 9. 1960, 18. 7. 1962, *Izvestija*, 21. 7. 1959
- [2] *N. Ch. SSSR v 1960 godu*, S. 614.
- [3] *Pravda*, 21. 10. 1958.
- [4] *Ostlicht*, S. 58.
- [5] *Pravda Ukrainy*, 3. 9. 1961.
- [6] *Ékonomičeskaja gazeta*, 17. 11. 1962.
- [7] *Kommunist* (Zeitung, Erivan'), 18. 7. 1961.
- [8] Vgl. *N. Ch. SSSR v 1960 godu*, S. 450, *Kommunist*, Nr. 17, 1960, S. 61, *Pravda*, 22. 1. 1962.
- [9] *Literaturnaja gazeta*, 26. 5. 1960, auch 1. 12. 1960.
- [10] *Kommunist*, Nr. 4, 1962, S. 5.
- [11] *Ékonomičeskaja žisn'*, op. cit., S. 370, 587.
- [12] *Zarja vostoka*, 26. 1. 1960, *Pravda*, 30. 11. 1960 u. 20. 11. 1962
- [13] *Partijnaja žisn' Kazachstana*, Nr. 1, 1963, S. 43, *Ékonomičeskaja gazeta*, Nr. 17, 23. 4. 1962.
- [14] *Pravda*, 6. 10. 1952, *Krokodil*, Nr. 10, 1963.
- [15] *Pravda*, 17. 11. 1962.
- [16] *XX s-ezd*, Bd. I, S. 106.
- [17] *Kommunist*, Nr. 15, 1960, S. 65.
- [18] *Materialy vsesojuznogo soveščanija zavedujuščich kafedrami obščestvennyh nauk*, M. 1958, S. 495; *Sovetskaja knižnaja trgovlja*, Nr. 7, 1960, S. 1.
- [19] *Pravda*, 13. 4. 1960, *Literaturnaja gazeta*, 14. 4. 1962, *Izvestija*, 26. 5. 1960.
- [20] *Sovetskaja Belorussija*, 27. 1. 1960.

- [21] *Komsomol'skaja pravda*, 31. 7. 1962.
- [22] *P. Ž.*, Nr. 7, 1957, S. 15, *Komsomol'skaja pravda*, 26. 2. 1959.
- [23] *Pravda*, 8. 3. 1963.
- [23a] *Pravda*, 19. 6. 1963.
- [24] *Literaturnaja gazeta*, 21. 11. 1959, *Sovetskaja Rossija*, 30. 10. 1960, *Komsomol'skaja pravda*, 15. 8. 1961, *Izvestija*, 28. 6. 1962.
- [25] *Komsomol'skaja pravda*, 12. 12. 1955, 4. 1. 1956, 16. 12. 1956, 7. 6. 1962, *Trud*, 8. 1. 1957.
- [26] Jevtušenko, Evg., *Vzmach ruki*, M. 1962, S. 199—200.
- [26a] Jevtušenko, Evg., *Nežnost'*, *Sovetskij pisatel'*, M. 1962, S. 56.
- [27] *Komsomol'skaja pravda*, 14. 1. 1962, *Molodoj kommunist*, Nr. 2, 1962.
- [28] *Grani*, Izdatel'stvo «Posev», Frankfurt-Main, S. 124, 126, 151, 179.
- [29] M. u. E., *A. Sch.*, Bd. I, S. 338.
- [30] *N. Ch. SSSR v 1960, godu*, S. 8.
- [31] Vgl. Wagenlehner, Günther, *Das sowjetische Wirtschaftssystem und Karl Marx*, Köln, 1960, S. 275.
- [32] *Pravda*, 15. 10. 1952.
- [33] *Kommunist*, Nr. 17, 1960, S. 17.
- [34] *Programm der KPdSU*, S. 49.
- [35] *ib.*, S. 56.
- [36] *Pravda*, 22. 11. 1957.
- [37] *Programm der KPdSU*, S. 44—45.
- [38] *Pravda*, 2. 8. 1950.
- [39] Vgl. Lenin, *Werke*, Bd. 30, S. 442 ff., Bd. 31, S. 406 ff., 486 ff.
- [40] M. u. E., *A. Sch.*, S. 53.
- [41] *Programm der KPdSU*, S. 117.
- [42] *Kommunist*, Nr. 13, 1961, S. 27 ff.
- [43] *Kommunist*, Nr. 17, 1960, S. 30.
- [44] *ib.*, S. 26.
- [45] *N. Ch. SSSR v. 1960 godu*, S. 12.
- [46] *XX s-ezd KPSS*, Bd. II, S. 112.

Herman F. Achminow
DIE TOTENGRÄBER
DES KOMMUNISMUS
*Eine Soziologie der
bolschewistischen Revolutionen*

Steingrüben Verlag GmbH.

Stuttgart, 1964

根据西德斯图加特施坦因格吕本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64年德文版译出

• 供内部参考 •

共产主义掘墓人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社会学
(节 译)

赫尔曼·阿赫米诺夫著

北京翻译社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 字数 209,000

1965年12月第一版 196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833 定价(五) 1.20 元